

赵慧芝 著

古代科學家傳

中

中外名文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古代科学家传(中)

赵慧芝 主编

目 录

酈道元传

——《北 史》卷二七 杨文衡译 (522)

信都芳传

——《北 史》卷八九 冯 时译 (527)

宋景业传

——《北 史》卷八九 冯 时译 (533)

綦母怀文传

——《北 史》卷八九 赵慧芝译 (536)

张子信传

——《北 史》卷八九 冯 时译 (539)

徐 謩传

——《北 史》卷九〇 万 芳译 (542)

马嗣明传

——《北 史》卷九〇 万 芳译 (546)

傅仁均传

——《旧唐书》卷七九 刘次沅译 (549)

李淳风传

——《旧唐书》卷七九 冯 时译 (559)

李 皋传

——《旧唐书》卷一三一 周世德译 (566)

杜 佑传

——《旧唐书》卷一四七 赵 荣译 (577)

马 摠传

——《旧唐书》卷一五七 赵 荣译 (592)

段成式传

——《旧唐书》卷一六七 赵慧芝译 (595)

姜师度传

——《旧唐书》卷一八五 赵 荣译 (597)

崔善为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刘次沅译 (600)

甄 权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 (603)

甄立言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 (605)

宋 侠传

——《旧唐书》卷一九 任 旭译 (607)

许胤宗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 (608)

孙思邈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 (611)

张文仲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 (618)

孟 诜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任 旭译 (621)

- 玄 奘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范楚玉译 (624)
- 一 行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曲安京译 (628)
- 王 焘传
——《新唐书》卷九八 任 旭译 (634)
- 阎立德传
——《新唐书》卷一〇〇 赵慧芝译 (636)
- 陆 羽传
——《新唐书》卷一九六 曾雄生译 (639)
- 陆龟蒙传
——《新唐书》卷一九六 曾雄生译 (644)
- 陈 玄传
——《旧五代史》卷九六 赵慧芝译 (648)
- 王 朴传
——《新五代史》卷三一 卢莲蓉译 (650)
- 马重绩传
——《新五代史》卷五七 卢莲蓉译 (658)
- 宋敏求传
——《宋 史》卷二九一 赵 荣译 (662)
- 燕 肃传
——《宋 史》卷二九八 赵慧芝译 (667)
- 沈 括传
——《宋 史》卷三三一 范楚玉译 (672)
- 苏 颂传
——《宋 史》卷三四〇 夏经林译 (682)
- 王 存传
——《宋 史》卷三四一 李仲均译 (702)

韩彦直传

——《宋史》卷三六四 曾雄生译 (709)

张 翥传

——《宋史》卷三七九 赵 荣译 (737)

范成大传

——《宋史》卷三八六 杨文衡译 (721)

黄 裳传

——《宋史》卷三九三 任文坚译 (729)

刘義叟传

——《宋史》卷四三二 卢莲蓉译 (746)

程大昌传

——《宋史》卷四三三 夏经林译 (749)

秦 观传

——《宋史》卷四四四 曾雄生译 (756)

郭 雍传

——《宋史》卷四五九 郭 健译 (759)

王处讷 王熙元传

——《宋史》卷四六一 卢莲蓉译 (763)

苗 训 苗守信传

——《宋史》卷四六一 李维宝译 (768)

韩显符传

——《宋史》卷四六一 李维宝译 (772)

史 序传

——《宋史》卷四六一 李维宝译 (778)

刘 翰传

——《宋史》卷四六一 屈宝坤译 (781)

王怀隐传

——《宋史》卷四六一 张慧芳译 (787)

陈昭遇传

——《宋史》卷四六一 赵慧芝译 (789)

赵自化传

——《宋史》卷四六一 张慧芳译 (790)

冯文智传

——《宋史》卷四六一 张慧芳译 (793)

刘 越传

——《宋史》卷四六一 张慧芳译 (795)

沙门洪蕴传

——《宋史》卷四六一 张慧芳译 (797)

法 坚传

——《宋史》卷四六一 张慧芳译 (799)

僧怀丙传

——《宋史》卷四六二 单瀚清译 (800)

许 希传

——《宋史》卷四六二 张慧芳译 (802)

庞安时传

——《宋史》卷四六二 王亚芬译 (804)

钱 乙传

——《宋史》卷四六二 王亚芬译 (809)

僧智缘传

——《宋史》卷四六二 王亚芬译 (814)

皇甫坦传

——《宋史》卷四六二 王亚芬译 (816)

王克明传

——《宋史》卷四六二 王亚芬译 (818)

直鲁古传

——《辽史》卷一〇八 王亚芬译 (822)

耶律敌鲁传

——《辽史》卷一〇八 王亚芬译 (824)

张中彦传

——《金史》卷七九 周世德译 (826)

耶律履传

——《金史》卷九五 刘次沅译 (832)

杨云翼传

——《金史》卷一一〇 刘次沅译 (837)

刘完素传

——《金史》卷一三一 郝恩恩译 (847)

张从正传

——《金史》卷一三一 郝恩恩译 (849)

李庆嗣 纪天锡传

——《金史》卷一三一 郝恩恩译 (851)

张元素传

——《金史》卷一三一 郝恩恩译 (853)

耶律楚材传

——《元史》卷一四六 江小涛译 (855)

张文谦传

——《元史》卷一五七 刘次沅译 (878)

李冶传

——《元史》卷一六〇 何绍庚译 (885)

李谦传

——《元史》卷一六〇 刘次沅译 (890)

杨恭懿传

——《元史》卷一六四 潘鼎译 (894)

王恂传

——《元史》卷一六四 胡铁珠译 (900)

郭守敬传

——《元史》卷一六四 潘 鼐译 (906)

齐履谦传

——《元史》卷一七二 刘次沅译 (923)

贾 鲁传

——《元史》卷一八七 刘荣汉译 (932)

李好文传

——《元史》卷一八三 雒后坤译 (940)

朱震亨传

——《元史》卷一八九 朱建平译 (948)

贍 思传

——《元史》卷一九〇 赵 荣译 (950)

杜 瑛传

——《元史》卷一九九 刘次沅译 (957)

李 杲传

——《元史》卷二〇三 朱建平译 (962)

阿老瓦丁传

——《元史》卷二〇三 王 冰译 (968)

亦思马因传

——《元史》卷二〇三 王 冰译 (971)

阿尼哥传

——《元史》卷二〇三 王 冰译 (974)

刘 元传

——《元史》卷二〇三 任文坚译 (978)

朱 棣传

——《明史》卷一一六 范楚玉译 (981)

朱载堉传

——《明史》卷一一九 赵慧芝译 (985)

吴伯宗传

——《明史》卷一三七 卢莲蓉译 (989)

胡 俨传

——《明史》卷一四七 刘荣汉译 (992)

徐有贞传

——《明史》卷一七一 刘荣汉译 (997)

王廷相传

——《明史》卷一九四 赵 荣译 (1008)

唐顺之传

——《明史》卷二〇五 李 书 于天池译 (1014)

潘季驯传

——《明史》卷二二三 赵 荣译 (1021)

王士性传

——《明史》卷二二三 杨文衡译 (1027)

左光斗传

——《明史》卷二四四 赵 荣译 (1030)

孙元化传

——《明史》卷二四八 王 冰译 (1039)

徐光启传

——《明史》卷二五一 范楚玉译 (1042)

耿荫楼传

——《明史》卷二六七 曾雄生译 (1049)

黄省曾传

——《明史》卷二八七 曾雄生译 (1051)

王 潮传

——《明史》卷二八九 曲安京译 (1053)

滑 寿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58)

葛乾孙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61)

吕复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63)

倪维德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65)

周汉卿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69)

王履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72)

戴思恭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75)

盛寅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78)

吴杰传

——《明史》卷二九九 朱建平译 (1083)

许绅传

——《明史》卷二九九 郭健译 (1086)

酈道元传

——《北史》卷二七

【说明】酈道元（公元？—527年），字善长，范阳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北魏地理学家。他出身于官僚世家，曾祖父、祖父均为太守，父亲任刺史、尚书右丞等职。父亲死后，袭爵永宁侯，按惯例降为伯，任尚书主客郎。历任治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孝昌三年（公元527年），被人陷害，死于关中阴盘驿亭。主要著作有《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和《七聘》诸文。流传至今的只有《水经注》一种。

酈道元在地理学上的成就，反映在《水经注》这部书中。此书是酈道元以《水经》为蓝本，以作注的形式写成的地理巨著。书中以水道为纲，将河流流经地区的古今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古迹等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记述。

酈道元，字善长，起初，继承父亲的封爵永宁侯，按照惯例，由侯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因道元执法清正苛刻，举荐他由太傅掾升任书侍御史。李彪被仆射李冲参奏下台后，道

元因为是李彪的下属官员也被罢免。景明期间（公元500—503年），道元任冀州镇东府长史。冀州刺史于劲，是顺皇后的父亲，当时带兵在关中打仗，不在冀州上任。州上的事全由道元管理达三年之久。由于道元行政严酷，所以不仅是官吏畏惧，就是奸诈小人和强盗也纷纷逃离冀州，到别的地方去。后来调道元去鲁阳郡代理太守，他向皇帝打报告，请求在鲁阳建立学校，勉励教师和学生。皇帝指示说：“鲁阳原来因为是南方边远地区，不立大学。现在可以允许，使鲁阳象西汉文翁办学那样成为有文化教养的地区。”道元在鲁阳郡的日子，老百姓佩服他的威名，不敢违法。延昌期间（公元512—515年），道元任东荆州刺史，行政威猛跟在冀州一样。当地百姓向皇帝告状，告他苛刻严峻，请求前任刺史寇祖礼回来。等到寇祖礼回来并派遣戍边士兵七十名送道元回京时，两人都因为犯事被罢官。

后来道元任河南尹。北魏明帝因为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等镇均改为州，这些州的郡、县、戍名称，命令用古城邑为标准。皇帝指令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大都督李崇一道按驿站制度兼程而行，筹划哪些地方宜立郡、县、戍，哪些地方要裁减去留。正赶上诸镇叛乱，他们的工作没有结果就回去了。

孝昌（公元525—527年）初期，梁朝派遣将领攻打扬州，刺史元法僧又在彭城叛乱。孝明帝命道元持节、兼侍中、代理行台尚书，指挥调遣各路军马，依照仆射李平的故事。梁朝的军队到涡阳，被击退，道元指挥军马追杀，获胜。

后来任命道元为御史中尉。道元素有行政严猛的名声，掌

握大权的人开始有些畏惧。但过了一段时间后，道元纠正不正之风没有显著的成绩，他的声望受到很大损害。司州牧、汝南王悦宠爱男娼丘念，常常跟他一起睡觉，一起生活。等到选举州官时，全由丘念操纵。平时丘念隐藏在悦的家里，隔三差五才回一次家。道元秘密查清丘念回家的规律，找一次机会把丘念抓住，关进监狱。悦上告灵太后，请求释放丘念。灵太后命令释放，道元抢在命令下达之前把丘念处死，并因此事而检举悦的违法行为。

正在这个时候，雍州刺史萧宝夤反叛北魏的意图已经暴露，侍中、城阳王徽一向忌恨道元，就劝灵太后派道元为关右大使去视察萧宝夤。萧宝夤害怕道元收拾他，于是派手下的行台郎中郭子帙把道元围困在阴盘驿亭。亭在山冈上，平时喝水靠山下的水井。道元在山冈上打井十余丈仍无水，水尽力竭，郭的人马翻墙入亭，把道元和他的弟弟以及两个儿子杀害。道元怒目高声骂萧，气绝而亡。萧宝夤派人把道元父子、弟弟埋葬在长安城东。萧宝夤平定之后，道元的尸骨迁回家乡。朝廷追赠道元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

道元好学，一向喜欢阅览奇书。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有《七聘》等文章流行于世。然而兄弟之间不能团结和睦相处，又多嫌忌，当时的舆论有点看不起。儿子孝友继承爵位。

（杨文衡 译）

【原文】

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彪为仆射李冲所奏，道元以属官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刺史于

劲，顺皇后父也，西讨关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后试守鲁阳郡，道元表立黉序，崇劝学教。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蛮伏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为东荆州刺史，威猛为政，如在冀州。蛮人诣阙讼其刻峻，请前刺史寇祖礼。及以遣戍兵七十人送道元还京，二人并坐免官。

后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驰驿与大都督李崇筹宜置立，裁减去留。会诸镇叛，不果而还。

孝昌初，梁遣将攻扬州，刺史元法僧又于彭城反叛。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梁军至涡阳，败退。道元追讨，多有斩获。

后徐御史中尉。道元素有严猛之称，权豪始颇惮之。而不能有所纠正，声望更损。司州牧、汝南王悦嬖近左右丘念，常与卧起。及选州官，多由于念。念常匿悦第，时还其家，道元密访知，收念付狱。悦启灵太后，请全念身，有敕赦之。道元遂尽其命，因以劾悦。

时雍州刺史萧宝夤反状稍露，侍中、城阳王徽素忌道元，因讽朝廷，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亭在冈上，常食冈下之井。既被围，穿井十余丈不得水。水尽力屈，贼遂逾墙而入。道元与其弟道（缺）二子俱被害。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宝夤犹遣敛其父子，殓于长安城东。事平，丧还，赠吏部尚书、冀

州刺史、安定县男。

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然兄弟不能笃睦，又多嫌忌，时论薄之。子孝友袭。

信都芳传

——《北史》卷八九

【说明】信都芳，字玉琳，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一带）人，生年不详，卒于东魏武定（公元543—547年）年间。是北朝时东魏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技术家。他少年聪颖，读书和思考问题时非常专心致志，甚至不闻雷声，行路掉进坑里。他曾受到江南名儒、祖冲之之子祖暅的教诲与指点，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这些都是他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学者的必备条件。信都芳擅长天文历算，在数学方面，他曾对有关勾股、重差的问题做过研究与注释，并抄集注解《诗》、《书》、《易》、《礼》、《春秋》五经中有关算术的内容，成《五经宗》。在天文学方面，信都芳著《四术周髀宗》。自汉代以后，因天文学的发展，盖天说已逐渐显示出它的缺陷，因而不能与浑天说抗衡，信都芳在《四术周髀宗》中，本“浑盖合一”的学说，试图调和浑天说与盖天说的矛盾。他还著有《灵宪历》，但书未成就去世了。

信都芳巧思绝伦，想法奇妙，深通律管候气之法，复原古式。他将芦苇中的薄膜填入律管，只要节气应至，相应律管中的芦苇膜即会飞出。他曾指着天上的云彩对人说：“春分

之气来了。”待人们察验律管，果然应验，而且月月不差。他又有二十四轮扇测二十四节气法，将扇埋入地中，每一气至则一扇自动，其他扇不动。与律管定气的结果完全一致。这些发明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相继失传了。

值得指出的是，信都芳描画古代各种机械制作并记载其原理和制作方法，著成《器准》一书，这是我国较早的机械图纸专著，可惜也已亡佚。他还著有《史宗》数十卷及《乐书》、《遁甲经》等书。

信都芳，字玉琳，河间人。他少年时代即通晓算术，且常有灵巧高妙的构思和想法。当他潜心研究问题的时候，非常聚精会神，甚至有时走路都会掉进坑里。他经常对人说：“算术非常玄妙，灵活巧妙而又精密入微，每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根本听不到雷鸣之声。”他对待学问的态度就是这样。后来，魏安丰王元延明召募他住在自己的宾馆中。当时，江南名人祖暅因先前在边境上被抓获，为魏拘执，也留住在延明的宾馆中，他精通历法算术，但并没有得到安丰王的款待。信都芳劝谏安丰王，对祖暅应以礼相待。后来，祖暅被放还南朝，他把自己的很多知识与方法都传授给了信都芳，因此，信都芳的算术更加精密了。延明家中藏书很富。他本想抄录汇集《五经》中有关算术的内容写成《五经宗》，再汇集有关古今音乐的内容写成《乐书》，且集中浑天仪、欹器、地动仪、铜乌、漏刻、候风仪等多种精巧仪器，描画它们的图像而成《器准》，并让信都芳负责演算。此后正值延明南逃，于是信都芳自己开始了撰写与注释。

信都芳后在并州乐平的东山过着隐居生活，太守慕容保乐听说后想要召见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信都芳拜见了慕容太守。于是保乐的弟弟慕容绍宗把他推荐给了齐神武高欢，作了他的门客，并被封为中外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性格清俭质朴，对物质利益不感兴趣。绍宗曾给他一匹瘦弱的马，他不肯骑；夜里又派奴婢侍女引诱他，用这种方法来试探他，信都芳则忿然呵斥轰打侍女，不让她靠近自己。信都芳一生清廉自守，对物质没有任何要求。后来他对重差和勾股也有研究注释，又著有《史宗》一书。

信都芳不仅治学精专，而且对多种学问有着广泛的涉及，丞相仓曹祖珽对他说：“律管吹灰的技艺十分精妙，很久以来已没有人懂得了，我想了很久都不得门径，请先生试着考虑考虑。”信都芳留意思索了十几天，便告知祖珽说：“我得到答案了，然而最后一定要用河内生长的芦苇内的薄膜。”祖珽选用别的东西试验，都不能应验。后来找到了河内生长的芦苇膜，用信都芳所说的方法演示，果然在交节气的时候，与节气相应的律管，芦苇膜就会飞出，其它管内的苇膜则纹丝不动。这种技艺由于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终于没能得以实行，以致于渐渐地失传了。

信都芳还著有《乐书》、《遁甲经》、《四术周髀宗》等书。他在《四术周髀宗》一书的序中说：“汉成帝时，学者询问盖天说的仪器，扬雄答道：‘盖天说的仪器嘛，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学者又询问浑天说的仪器，扬雄又说：‘落下闳制造了它，鲜于妄人为它作了计算，耿中丞为它设计了星象，符合实际天象，所以一直都在使用。’这些话是说盖天仪器比较简

陋，而浑天仪则很精密。盖天仪器是根据测量太阳的影子而设计制造的，使用时间长了，就会与刚刚制成时不同，从而出现误差，所以说‘不很符合实际天象’。浑天仪则是依靠对天体的实际测量而设计制造的，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很难改变，所以说‘符合实际天象’。当时，太史令尹咸正在彻底地研究日晷，他改变周代的古老方法，扬雄见到后认为是件难事。昔日周公以测度日影的方法测量大地，以王城所在的位置作为标准点，自那时直到汉代，盖天仪器已经大变。浑天仪需要俯视，以《灵宪》为它的理论；盖天仪需要仰视，以《周髀》为它的方法。俯视与仰视虽然不同，但道理却相一致。古人制造它们，表示天空并模拟日月星辰等天象。芳以为浑天仪的计算精密入微，方法灵活而要义繁多，所以省略其要点，简化其根本，共著述二篇，综合六种方法，名为《四术周髀宗》。”

另外，上党人李业兴修定了新的历法，自认为比赵馥、何承天和祖冲之三人撰定的历法精密，信都芳提出五条反驳李业兴的新历，而后又自己撰修了历法，名为《灵宪历》，他对于频大月频小月的计算，日食必发生在朔日的讨论，证据充分，辨别明晰。他常说：“何承天也用这种方法，但结果却不能很精密。《灵宪历》如果能写成，几百年内一定不会有人提出不同的议论。”但书还没有完成，信都芳就去世了。

（冯 时 译）

【原文】

信都芳字玉琳，河间人也。少明算术，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坠坑坎。常语人云：“算历玄妙，机巧精微，我每

一沈思，不闻雷霆之声也。”其用心如此。后为安丰王延明召入宾馆。有江南人祖暕者，先于边境被获，在延明家，旧明算历，而不为王所待。芳谏王礼遇之。暕后还，留诸法授芳，由是弥复精密。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

后隐于并州乐平之东山，太守慕容保乐闻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见焉。于是保乐弟绍宗荐之于齐神武，为馆客，授中外府田曹参军。芳性清俭质朴，不与物和。绍宗给其羸马，不肯乘骑。夜遣婢侍以试之，芳忿呼殴击，不听近己，狷介自守，无求于物。后亦注重差、勾股，复撰《史宗》。

芳精专不已，又多所窥涉。丞相仓曹祖珽谓芳曰：“律管吹灰，术甚微妙，绝来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试思之。”芳留意十数日，便报珽云：“吾得之矣，然终须河内葭莩灰。”祖对试之，无验。后得河内灰，用术，应节便飞，余灰即不动也。不为时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绝。

又著《乐书》、《遁甲经》、《四术周髀宗》。其序曰：“汉成帝时，学者问盖天，杨雄曰：‘盖哉，未几也。’问浑天，曰：‘落下闳为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几乎，莫之息矣。’此言盖差而浑密也。盖器测影而造，用之日久，不同于祖，故云‘未几也’。浑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隐见难变，故云‘几乎’。是时，太史令尹咸穷研晷盖，易古周法，雄乃见之，以为难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汉朝，盖器一改焉。浑天覆观，以《灵宪》为文；盖天仰观，以《周髀》为法。覆仰

虽殊，大归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浑算精微，术机万首，故约本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术周髀宗》。”

又上党李业兴撰新历，自以为长于赵馥、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难业兴五□。又私撰历书，名曰《灵宪历》，算月频大频小，食必以朔，证据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为此法，而不能精。《灵宪》若成，必当百代无异议者。”书未成而卒。

宋景业传

——《北史》卷八九

【说明】宋景业，广宗（今河北省威县东）人。生卒年未详。他是南北朝时期东魏与北齐两代的著名学者，但史籍有关他的生平事迹记载不多。他通晓《易经》，并研习阴阳消长及行星占候之学，兼通天文历法。东魏武定初年（公元543—547年），任北平太守。北齐天保初年，任散骑侍郎，封爵长城县子。东魏末年，他为文宣帝高洋受禅称帝极尽粉饰，屡陈瑞应，深博高洋的欢心。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文宣帝命他撰造《天保历》，并于次年颁行。

宋景业，广宗人。他通晓《周易》，研究过阴阳变化及行星占测气候的学问，同时还兼通天文历法。东魏武定元年，任北平太守。北齐文宣帝高洋作东魏丞相的时候，宋景业也同在晋阳。他通过高德政上书高洋说：“《易稽览图》载：‘鼎卦为五月，占卜时遇到此卦，圣人就要作君主了，皇天也会延长他的寿命，在东北方的水域之中，庶民百姓要作帝王，高得之。’我来郑重地解释一下这段话：东北方的水域说的就是渤海，高得之，表明了姓高的人要称王天下。”其时正值东魏

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三月。高德政、徐之才也都劝文宣帝高洋顺应天命，接受东魏皇帝的禅让而称帝，于是一同前往邺城。走到平都城时，很多大臣出来阻止这个计划，并要重返晋阳。贺拔仁等人甚至称：“宋景业用谎言蛊惑齐王，使齐王是非不辨，最好杀了他，以告谢天下。”高洋却说道：“宋景业应当作帝王的老师，怎么可以杀他呢？”回到并州后，文宣帝命宋景业用筮草占卦，筮占的结果是，乾卦的第一爻和第五爻起了变化，由阳爻变为阴爻，所以整个卦由乾卦变成了鼎卦。景业说：“乾卦代表君王和皇天，所以《易经》载：‘有人骑着六条龙在天上巡御’。而鼎卦则是五月卦，所以最好选择在仲夏时节的良辰吉日，顺应天命，接受帝位的禅让。”当时有人议论：“阴阳讖纬之书说过，五月之中不可以作官，如果违反了这项禁忌，必死在官位上。”景业说道：“这正是件大吉大利的事情，帝王为皇天之子，再也没有去位的可能了，怎么能不最终死在他的岗位上呢？”高洋听后非常高兴。

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宋景业被封为长城县子，奉诏撰修《天保历》，李广为此书撰写了序言。

（冯 时 译）

【原文】

宋景业，广宗人也。明《周易》，为阴阳纬候之学，兼明历数。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齐文宣作相，在晋阳。景业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览图》曰：‘《鼎》，五月，圣人君，天与延年齿，东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谨案：东北水，谓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时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并劝文宣应天受禅，乃之邺。至平城都，诸

大臣沮计，将还。贺拔仁等又云：“宋景业误王，宜斩之以谢天下。”帝曰：“宋景业当为帝王师，何可杀也？”还至并州，文宣令景业筮，遇《乾》之《鼎》。景业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时乘六龙，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顺天受禅。”或曰：“阴阳书，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景业曰：“此乃大吉，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帝大悦。

天保初，封长城县子，受诏撰《天保历》，李广为之序。

綦母怀文传

——《北史》卷八九

【说明】綦母怀文，姓綦母，名怀文。东魏北齐人，籍贯和生卒年不详。曾任过北齐信州刺史。綦母怀文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冶金技术家。他最大的贡献是总结历代炼钢工匠的丰富经验，创造了一种新的炼钢方法，后世称为“灌钢法”或“团钢法”。就是先把含碳量高的生铁熔化，浇灌到含碳量低的熟铁上，使碳渗入熟铁，以增加熟铁的含碳量。经数次熔炼，使熟铁渗碳成钢。这种方法不但能提高炼钢质量，而且能增加钢的产量，是我国古代炼钢技术上的重大成就，对后世钢铁冶炼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此外，綦母怀文在制刀工艺和热处理技术上也有独特的创造。他用上述方法冶炼的所谓“宿铁”制成刀具后，再用牲畜、家禽的尿与油脂分别淬火。这样制成的刀剑，锋刃坚利，不易折断，刚柔兼备，经久耐用。使用畜尿和油脂作淬火介质，使钢材更为坚韧。这是对钢铁淬火工艺的重大改进，此技术在钢铁制造工艺史上也具有一定意义。

綦母怀文，不知是何处的人，以掌握炼丹、占卜一类的

技术为东魏神武帝高欢服务。东魏孝静帝武定（公元543—550年）初年，高欢率领齐军与西魏宇文泰在芒山展开大战，当时齐军的旗帜都是红色的，西魏军队的旗帜都是黑色的。怀文便说：“红，是火色；黑，是水色。水能使火灭掉，不应该以红色旗帜与黑色旗帜对阵。土能克制水，应该把军队的旗帜改为黄色。”神武帝于是就把旗帜改为赭黄色，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河阳旗”。

綦母怀文创制了宿铁刀，它的方法是：把生铁熔化，精心地浇灌到熟铁上，经数次熔合就成为钢（即是早期的灌钢）。以熟铁作刀脊，宿铁作刀刃的刀具，先放在五种牲畜的尿液中磨洗，然后再用油脂淬火冷却。用这种方法制作的刀剑，可以刺穿三十层铁甲。现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冶炼钢铁的方法，就是綦母怀文留传下来的方法。用以制造刀剑仍很锋利，但不能一下子截穿三十层铁甲。怀文又说：“广平郡（今河北永年县东南）南有干子城，是楚国的铸剑名家干将铸剑的地方。用那里的土研磨刀剑可以使其光莹洁亮。”

怀文常说：“以前在晋阳（今山西晋源镇）的学堂任职时，学堂中有一位蠕蠕族人，有位同学堂的胡地的和尚指着这个人，对怀文说：‘此人有奇异的算术方法。’”于是指着庭院中的一棵枣树说：‘让他用筹码演算，就可知道树上果实的数目。’于是让他试算，并分辨树上有多少已成熟的红果实，有多少未完全成熟的半红半白的果实。算完后，扑击下果实一数，只少一个。算的人说：‘一定不少，再摇一摇树。’果然又落下一个。”綦母怀文曾任信州（今四川奉节县东）刺史。

（赵慧芝 译）

【原文】

綦母怀文，不知何许人也，以道术事齐神武。武定初，齐军战芒山，时齐军旗帜尽赤，西军尽黑。怀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灭火，不宜以赤对黑。土胜水，宜改为黄。”神武遂改为赭黄，所谓“河阳幡”者也。

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是其遗法，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顿截三十札也。怀文又云：“广平郡南干子城，是干将铸剑处，其土可莹刀。”

每云：“昔在晋阳为监馆，馆中有一蠕蠕客，同馆胡沙门指语怀文云：‘此人别有异算术。’仍（似“乃”字之误）指庭中一枣树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实数。’乃试之，并辨若干纯赤，若干赤白相半。于是剥数之，唯少一子。算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实。”怀文位信州刺史。

张子信传

——《北史》卷八九

【说明】张子信（公元？—577年），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北魏、北齐时代的天文学家。关于他的天文学成就，《隋书》、《新唐书》、《宋史》等书的天文历志中多有记载。他经常隐居于白鹿山。只是偶到京城游历。当时的著名文人魏收、崔季舒等人对他十分赏识，曾作诗相赠。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张子信为逃避战乱，躲到海岛上过了三十多年的隐居生活，由于他博闻强记，擅长天文历算，在此期间，专心致力于天文历法的研究，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就。北齐武成帝太宁年间，被征为尚药典御。武平初年，朝廷又要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但他对仕途不感兴趣，于是听凭自己的志愿，还归山中，在隐居中度过了晚年。张子信在避居海岛的三十年中，发现太阳周年运动的速度并不是均匀不变的，从而推翻了关于太阳每日在黄道上的行移度数相等的传统认识。张子信还最早发现了五星运动的不均匀性现象，并提出了五星入气加减的改正方法。张子信的重要贡献，不仅导致了历法中由平朔到定朔、由平气到定气的改革，导致了日、月食推算精确度的提高，而且导致了我国古代五星位置推算工作的进

步。对北齐至隋唐时期以及后世天文学及历法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张子信的天文学成就，如关于太阳运动的不均匀性以及四季时间长度不同的发现，也曾对印度天文学者产生过一定影响。

张子信，河内人。对古代文献略有涉猎，少年时代就以通晓医术而闻名。他一直在白鹿山过着隐居生活，只是偶尔出山到京城游历，并深为魏收、崔季舒等人所器重。北齐大宁年间，张子信被征聘任尚药典御。武平元年，朝廷又要征聘他出任太中大夫，但他顺随自己的志愿，放弃做官的机会，返回了白鹿山。张子信还擅长运用《周易》布筮草占卜问卦以及风角占测气候等方法。一次，武卫奚永洛与张子信对坐交谈，忽然喜鹊在庭院中的树上鸣叫，并争斗着掉下树来。子信说：“喜鹊的叫声不祥，天色将晚的时候会起西南风，风吹过此树，掠过屋檐角，就会发生因言语而引起的麻烦。今天夜里如有人呼唤，一定不能去，即使是皇帝下令，也要以有病为由推脱掉。”子信走后，果然象他说得那样刮起了西南风。当天夜里，琅琊王五次派人来，急切地召唤永洛，并且对他说：“皇帝诏唤你去。”永洛准备起身前往，他的妻子苦苦地挽留他，但却没有留住，结果正应了子信的预言，永洛翻身落马，摔断了腰，不能动弹。第二天早晨，起身还很困难。在北齐灭亡的那一年，张子信去世了。

(冯 时 译)

【原文】

张子信，河内人也。颇涉文学，少以医术知名。恒隐白

鹿山，时出游京邑，甚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宁中，征为尚药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征之，听其所志，还山。又善《易》筮及风角之术。武卫奚永洛与子信对坐，有鹊鸣庭树，斗而堕焉。子信曰：“不善，向夕，当有风从西南来，历此树，拂堂角，则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唤，必不可往，虽敕亦以病辞。”子信去后，果有风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称坠马腰折，不堪动。诘朝而难作。子信，齐亡卒。

徐 謖 传

——《北史》卷九〇

【说明】徐謖（约公元432—512年），字成伯。他是徐文伯的弟弟。南北朝北魏医家。徐謖去青州之时，适逢慕容白曜平定东阳，被俘入北魏而送到京城。献文帝想验证徐謖的才能，让病人藏于幕内。徐謖隔幕诊脉，同样将病人形色症候予以准确诊断，于是被献文帝所看重，授官为中散。以后又逐渐升至内侍长。当时名医李脩，较他更为朝廷重用，文明太后以经方试问徐謖与李脩等，謖所论不及李脩，然謖合和药剂，临床治疗疾病之效验却比李脩精妙。但他性格孤僻，妒忌心强，侍奉医药多不能令人随意。孝文帝迁都洛阳，徐謖待遇较以前有所改善。后来徐謖去嵩山居住了一段时间，准备为皇帝炼制金丹，以助延年益寿。然而最终没有成功。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皇帝在悬瓠县患大病，派使者骑马急召徐謖。徐謖赶去为皇帝治病，疗效大验。皇帝为此对他大加嘉奖，授官封爵，赏赐财物。诸亲王也随着赠送很多物品。

徐謖时常服用养生药饵，年近八十岁鬓发不白，身体尚健。后因年老任光禄大夫，死后赠官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

号靖。

徐謩，字成伯，丹阳人，原籍东莞。他与哥哥徐文伯等均善于医药。徐謩因去青州，适逢慕容白曜平定东阳，故被俘入魏，送至京城。献文帝想验证徐謩的才能，让病人藏于幕内，令徐謩隔幕诊脉，他将病人形色症状诊断十分准确，于是被献文帝所看重。授官为中散，后渐升至内行长。文明太后时常询问徐謩有关医药经方问题，所见不及李孝为朝廷重用。徐謩处方用药，治疗效果均较李孝为好。然而他性情孤僻易生妒意，承奉医药也不能合人心意。虽然贵为王公大人，也不为之处理治疗。

孝文帝迁都洛阳，待徐謩较以前有所改善。孝文帝若身体稍有不适，以及他所钟爱的冯昭仪有病，均请徐謩治疗。后来又任徐謩为中散大夫，调任侍御师。徐謩打算为孝文帝炼制金丹，以助延年益寿。于是去嵩山居住，采集药物，炼制金丹，然而一年后仍未成功，只好作罢。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皇帝在悬瓠县患病且日渐加剧，派使者骑马急召徐謩，命他从水路前往，一日一夜行程数百里。到达目的地，徐氏为皇帝治病疗效大验。九月皇帝到达汝水之滨，为徐謩大设珍膳宴席，聚集众官员，且特别赐徐謩坐上席，将美味佳肴都放在他的面前，又命左右官员宣陈徐謩为皇上解除病苦，救急治危，立下功劳，宜给予酬劳赏赐。皇帝于是下诏书赞美他，授予他为大鸿胪卿、金乡县伯，并赐钱绢、杂物、奴婢、牛马等。丰厚的物品都经大内送呈皇帝检阅才赐予他。诸亲王、咸阳王禧等人也分别赠送他物品，都达到千匹。以

后徐謩又随从孝文帝到达邺城，孝文帝旧病发作，徐謩日夜侍奉于他身旁。第二年跟随孝文帝去马圈，孝文帝病情日趋加剧，常常皱眉不愉快，严词责问且要鞭打徐謩，幸而最终他被免罪。孝文帝驾崩后，徐謩跟随皇帝灵柩返回洛阳。

徐謩时常服用养生药饵、吞服道符，年近八十岁而鬓发不白，体力不衰。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徐謩因年老而授光禄大夫。死后赠官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号靖。他的儿子名踐，字景升，承袭徐謩爵位，官至建兴太守。

（万芳译）

【原文】

徐謩字成伯，丹阳人也，家本东莞。与兄文伯等皆善医药。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东阳，获之，送京师。献文欲验其能，置病人于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宠遇。为中散，稍迁内行长。文明太后时问经方，而不及李杲之见任用。謩合和药剂，攻疗之验，精妙于杲。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虽贵为王公，不为措疗也。

孝文迁洛，稍加眷待，体小不平，及所宠冯昭仪有病，皆令处疗。又除中散大夫，转侍御师。謩欲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采营其物，历岁无所成，遂罢。二十二年，上幸县瓠，有疾大渐，乃驰驿召謩，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有大验。九月，车驾次于汝滨，乃大为謩设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謩于上席，遍陈肴觞于前，命左右宣謩救摄危笃振济之功，宜加酬赉。乃下诏褒美，以謩为大鸿胪卿、金乡县伯，又赐钱绢、杂物、奴婢、牛马，事出丰厚，皆经内呈。诸亲王咸阳王禧等各有别赉，并至千

匹。从行至邺，上犹自发动，寤日夕左右。明年，从诣马圈，上疾势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诮，又欲加之鞭捶；幸而获免。帝崩后，寤随梓宫还洛。

寤常有将饵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鬓发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为光禄大夫。卒，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曰靖。子践，字景升，袭爵。位建兴太守。

马嗣明传

——《北史》卷九〇

【说明】马嗣明，河内野王（今河南沁阳）人。南北朝时期北齐医学家。青年时期即博览群书，研读医学典籍，医术精湛。为人诊脉，可预见病人一年后死生吉凶。魏朝官员邢邵独生子大宝，十七、八岁患伤寒，马嗣明诊脉后说：“邢公子伤寒病可不治自愈。然脉象显示不出一年就会死去，发觉已晚，不可救治。”大宝果然不出一年病故。北齐朝廷官员杨愔患背部肿，马嗣明以练石外搽治愈其疾，杨愔因此格外器重他。马氏还用灸法治愈两奴仆遍身发青、虚弱不能进食之病症。并及时救治一例虫兽咬伤病人，保全其性命。马嗣明医技高妙。曾任北齐通直散骑常侍。

马嗣明，河内野王人。年轻时博览纵观，研读医学书籍。为他人诊脉治病，可判断一年后死生吉凶。邢邵（字子才）独生儿子大宝，非常聪明敏慧，十七、八岁时患伤寒，嗣明给他看病，退而告诉杨愔说：“邢公子伤寒病可不治自愈。但他的脉象显出不到一年就会死去，发觉稍晚了一些，不再可以救疗。”几天以后，杨愔、邢邵两人一起于内殿陪宴，文宣帝

说：“邢子才的儿子长大成人，人善不恶，我想给予他近地一郡。”杨愔以他年少为由，未予封爵之剖符。宴会完毕，杨愔向文帝上奏：“马嗣明曾称大宝脉象险恶，一年内可能死去，如果他去那里，很难求到医药。”此事于是作罢。大宝未至一年而卒。杨愔患背部肿疾，马嗣明以练石为他涂搽即治愈其疾。于是被杨愔格外器重。练石制作方法：用鹅鸭蛋那么大的粗黄色石头，猛火烧之令红，放入淳醋中，有石屑自落醋里。反复烧至石头全部成为石屑，取石屑曝晒冷干，捣细过筛，用醋和涂肿处，没有不治愈的。

武平年间，马嗣明官任通直散骑常侍。他采用的针灸穴位常常与《明堂针灸图》不同。有一人家，两名奴仆均患病，全身发青，渐渐虚弱不能进食，看了许多医生，皆不识此病。嗣明施用灸法，于两足趺上各灸二十一壮，即治好该病。武平年末，他随从皇上去晋阳，到达辽阳山，见数处贴榜。说有一户人家女儿生病，如有人能治愈，赏钱十万。很多名医都揭榜去那户人家，询问疾病状况，然而俱未下手治疗。唯有嗣明为她诊治，询问她的发病原由，患者说曾用手拿一根麦穗，看见一条长约二尺形似蛇的红色东西进入她的手指中，因而受惊倒地。当时即觉手臂既疼且肿，一个多月后渐渐延及半身，肢体关节皆肿起来，疼痛难以忍受，呻吟声日夜不断。嗣明给她开了处方，嘱人骑马去城里购药，并告诉服药方法，前后服用汤药十剂、散药一剂。至嗣明第二年随从皇上返回，此女孩已平安恢复如故。嗣明技艺精妙，有许多这样的事例。

(万 芳 译)

【原文】

马嗣明，河内野王人也。少博综经方，为人诊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宝，甚聪慧，年十七、八患伤寒。嗣明为其诊脉，退告杨愔云：“邢公子伤寒不疗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觉之少晚，不可复疗。”数日后，杨、邢并侍宴内殿。文宣云：“邢子才儿大不恶，我欲乞其随近一郡。”杨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罢，奏云：“马嗣明称大宝脉恶，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医药难求。”遂寝。大宝未期而卒。杨愔患背肿，嗣明以练石涂之，便差，因此大为杨愔所重。作练石法：以粗黄色如鹅鸭卵大，猛火烧令赤，内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里。频烧至石尽，取石屑曝干，捣下筛，和醋以涂肿上，无不愈。

武平中，为通直散骑常侍，针灸孔穴，往往与《明堂》不同。尝有一家，二奴俱患，身体遍青，渐虚羸不能食。访诸医，无识者。嗣明为灸两足趺上各三七壮，便愈。武平末，从驾往晋阳，至辽阳山中，数处见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购钱十万。又诸名医多寻榜至是人家，问疾状，俱不下手。唯嗣明为之疗。问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麦穗，即见一赤物长二尺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惊倒地。即觉手臂疼痛，月余日，渐及半身，肢节俱肿，痛不可忍，呻吟昼夜不绝。嗣明即为处方，令驰马往都市药，示其节度，前后服十剂汤，一剂散。比嗣明明年从驾还，此女平复如故。嗣明艺术精妙，多如是。

傅仁均传

——《旧唐书》卷七九

【说明】傅仁均，滑州白马人（今河南滑县），生卒年不详。东都（洛阳）道士。善长历法计算。以编历功于唐初任员外散骑常侍，太史令。唐朝初建，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推荐傅仁均制定新历。他上表说明他的新历有七大特点：1. 以武德元年（戊寅年，即公元618年）为上元，称为戊寅元历；2. 采用岁差，五十余年冬至差一度，与《尧典》日短星昴的记载相符；3. 能推出《诗经》日食；4. 与鲁僖公时冬至记录符合；5. 采用定朔，因而有连着三个大月或三个月；6. 周日时辰以子半起始，周天度数由虚六度起；7. 采用定朔，因而晦朔两日看到月亮的缺点不再出现。傅仁均的《戊寅元历》建立在东汉两晋南北朝至隋代天文学重大进展的基础上。其基本特点是：1. 废除了繁琐无用的上元积年方法，废除了不精确的闰周概念；2. 采用了精密的定朔方法；3. 继续采用先进的岁差方法。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戊寅元历》于武德元年七月颁行后，遭到多方反对。唐书本传及历志中记载了王孝通的驳辞和傅仁均的辩辞，以傅仁均胜利告终。傅仁均的改革终于难以为当时接受。武德九年（公

元626年),上元积年被恢复。武德十九年出现连续四个大月,导致定朔法夭折,到李淳风《麟德历》才部分实行。这两项改革,直到元代《授时历》才得以彻底实行。《授时历历议》中称傅仁均为四大历家之一。

傅仁均,滑州白马人。善长天文历法计算。武德初年,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上书推荐他。唐高祖李渊召令他修改旧历。傅仁均上表说了七件事:

第一,当初洛下閎以汉武帝太初元年丁丑为新历的起始,历元为丁丑。如今大唐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极,所造的历,上元就定在戊寅年,甲子日。用“三元”方法一百八十年为周期,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则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一直到今天都适用。

第二,《尧典》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人所造的历,没有一个能符合的。如今我造的历,每五十余年冬至点移动一度。参校周、汉以来的记载,千载无差。

第三,经书中的日食,《毛诗》最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按我的历法,可以推出周幽王六年辛卯朔日食,与此相符。

第四,《春秋命历序》载有:“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前人各种历法都不能符合。我的历法推得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与之相同。从那以后(与历代记录相符),并无差错。

第五,古时历书,日食常在晦日(朔前一日),或在初二日;月食常在望前或望后。我的新历,有时连着三个大月,有时连着三个小月。这样,日食总是在朔日(初一),月食总在

望日前。与鲁史（春秋）记载校验，没有差错。

第六，前代造历，时辰不从子时半开始，星度不从虚宿中开始。我的历法，时辰从子时开始，星度从虚六度起，与时辰相配，得到子时为中，符合阴阳的规律和历术的原则。

第七，按前人各种历法，月亮常常在晦日仍可在东方见到，朔日仍可在西方看到。我的新历以月亮的实际位置定朔日，永无这种毛病。

经过几个月，新历完成献上，名曰《戊寅元历》，皇帝很赞赏。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七月，下令颁行新历，任命傅仁均为员外散骑常侍，赐丝绸二百段。

后来中书令封德彝报告历法差误，吏部郎中祖孝孙奉命考察。此外，太史丞王孝通以《甲辰历》为根据批驳傅仁均：

《尧典》说：“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国解释说，七宿同时可见，只举其中间一宿而已。可见中天的星宿并无一定，只是两分两至时各举一宿为代表。昴为西方七宿中居中之宿，虚为北方七宿居中者。一分（秋分）一至（冬至）各举出中间一宿，其余六宿就都知道了。至于春分举（南方）鸟星，夏至举（东方）火星，这一分（春分）一至（夏至）又举出七宿全体，则西方、北方的星宿也可想见。如今傅仁均专以日中星昴一句为根据来做定朔，歪曲经文原意，不是错误的吗？再说《月令》，仲冬“昏在东壁”，可见昴中的说法并不准确。如果说陶唐（尧）时代恰恰是昴中，后代逐渐变化，直变到东壁，那么尧前七千余年，冬至日便成了翼宿（黄昏时）中天。时代愈远，差距愈大，谬误愈加明显。

如今测得（冬至日）黄昏东壁星中天，太阳应在斗十三度。如果翼宿中天，太阳就应在井十三度。井宿在最北，离人最近；而斗宿极南，离人最远。日在井则天下最热，在斗则最冷。如果（如傅仁均所说）尧前冬至反而最热，夏至反而最冷，四季倒错，寒暑易位，这是绝对不合道理的。再说，郑康成是知识渊博的人。他对弟子孙皓说：（《尧典》中）日永星火，只是中天星在大火这一次（一组恒星）三十度里，并非说火就仅指心宿恰恰正中。再说，平朔、定朔，过去就是两家；平望、定望，从来就是两种方法。三大三小（按：月相连）是定朔、定望的方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的原则。日月运行，有时快有时慢。每月相逢一次，叫做“合会”，因而晦朔日期不定，由编历的人安排。若一定按定朔方法来定月大月小，虽然日月会合能够确定。但蓂、元、纪这些历元的原则就都不符合了。若要远处符合起始历元，近处合理地处理余数，日月会合时允许稍有误差，历元又能相符，那就要数《甲辰元历》最好了。

傅仁均答辩道：

（南朝）宋代祖冲之早已创立（移动冬至点的）的差术，到隋代张胄玄等人加以改进。虽然所用的差度大小不同，道理是一样的。如今王孝通不懂宿度差移的事实，不明黄道迁改的道理，固执南斗为冬至恒星，东井为夏至之宿，故意刁难，这哪里是不变的道理？太阳在星宿中运动，如同邮传在驿站间行走。既然宿度每年有差，黄道因而随着变易。哪能用胶柱不变的道理来刁难

运行着的天体呢？

《易经》说：“治历明时”；《礼记》说：“天子玄端，听朔于南门之外；”《尚书》说：“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氏说：“上日就是朔日。”《尚书》又有：“季秋日朔，辰不集于房。”孔氏说：“集，日月相合。不合，可见是日食。”又说：“先时，不及时皆杀无赦。”先时就是预报的朔日不准确。之所以有先后之差，是不知道定朔的道理。《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春秋》记载日食三十五次。左丘明说：“不书朔，官失之也。”说明圣人孔子不言晦，只记朔。”自春秋以后，离圣人的时代渐远，历法差误，不能辨证（春秋时代的记载）。因而秦汉以来，日食多不在朔日。（南朝）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提出定朔的看法，但未能详细证明，为太史令钱乐之、散骑常侍皮延宗所压制。王孝通今天所说，是皮延宗的旧话。何承天当时理论不完善，因而被压制。我如今把其中道理简单申明一下。

编历的根本，必要推算上元。这时日月相逢如合璧，五星会聚如连珠，夜半冬至、甲子日同时发生。从此以后，各个天体速度不同，日月五星分散运行，不知何年何月其运动的余数同时为零，日月五星才能恰巧又相会在一起。唯有日分、气分有可能同时为零，因此才有日月合朔于冬至的三端之元。故而编造历法的人以小余为零作为元首，这是纪日数的起始日，并不关日月合璧的事。人们传说，大小余都为零时，即定为夜半甲子朔旦冬至之日，这是不懂真正原理的说法。为什么呢？冬至

(来自太阳运动)有一定的规律,而朔是由月亮运动决定的。既然月亮运动快慢无常,三端哪能轻易相合?因而必需日月相合,又恰巧在冬至这一天,才能叫合朔冬至。前代诸历,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大余为零的年(这样的年冬至为甲子日)为元做为规律,而不知道日月五星七曜散行,气朔不合。如今我的历法只取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的日子为上元,以此为起始,按规律推算以至于今日,以定朔方法确定朔日,不管三端的事。这些事皮延宗不懂,何承天也不清楚,怎么能作为理由来批驳我呢?

祖孝孙听后同意了傅仁均的说法。

贞观初年,益州人阴弘道又把王孝通的论点提出来,终究未能驳倒傅仁均。李淳风又提出十八条意见批驳《戊寅元历》,崔善为奉命考察双方得失。结果七条按李淳风的意见执行,其余十一条仍按傅仁均的方法。傅仁均后来当太史令,死于任上。

(刘次沅 译)

【原文】

傅仁均,滑州白马人也。善历算、推步之术。武德初,太史令庾俭、太史丞傅奕表荐之,高祖因召令改修旧历。仁均因上表陈七事:

其一曰:“昔洛下閤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甲子日登极,所造之历,即上元之岁,岁在戊寅,命日又起甲子,以三元之法,一百八十去其积岁。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之首,则合璧连珠,悬合

于今日。”

其二曰：“《尧典》为‘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前代造历，莫能允合。臣今创法，五十余年冬至辄差一度，则却检周、汉，千载无违。”

其三曰：“经书日蚀，《毛诗》为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臣今立法，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蚀，即能明其中间，并皆符合。”

其四曰：“《春秋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诸历莫能符合。臣今造历，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则同，自斯以降，并无差爽。”

其五曰：“古历日蚀或在于晦，或在二日；月蚀或在望前，或在望后。臣今立法，月有三大三小，则日蚀常在于朔，月蚀在望前。却验鲁史，并无违爽。”

其六曰：“前代造历，命辰不从子半，命度不起虚中。臣今造历，命辰起子半，度起于虚六度，命合辰，得中于子，符阴阳之始，会历术之宜。”

其七曰：“前代诸历，月行或有晦犹东见、朔已西眺。臣今以迟疾定朔，永无此病。”

经数月，历成奏上，号曰《戊寅元历》，高祖善之。武德元年七月，诏颁新历，授仁均员外散骑常侍，赐物二百段。

后中书令封德彝奏历术差谬，敕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又太史丞王孝通执《甲辰历法》以驳之曰：

案《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氏云七宿毕见，举中者言耳。是知中星无定，故互举一分两至之星以为成验也。昴西方处中之宿，虚为北方居中之星，

一分各举中者，即余六星可知。若乃仲春举鸟，仲夏举火，此一至一分又举七星之体。则余二方可见。今仁均专守昴中而为定朔，执文害意，不亦谬乎！又案《月令》：仲冬“昏在东壁。”明知昴中则非常准。若言陶唐之代，定是昴中，后代渐差，遂至东壁。然则尧前七千余载，冬至之日，即便合翼中，逾远弥却，尤成不隐。且今验东壁昏中，日体在斗十有三度；若昏于翼中，日应在井十有三度。夫井极北，去人最近。而斗极南，去人最远，在井则大热，在斗乃大寒。然尧前冬至，即应翻热，及于夏至，便应反寒。四时倒错，寒暑易位，以理推寻，必不然矣。又，郑康成博达之士也，对弟子孙皓云：日永星火，只是大火之次三十度有其中者，非谓心之火星也，实中正也。又平朔、定朔，旧有二家；平望、定望，由来两术。然三大三小，是定朔、定望之法；一大一小，是平朔、平望之义。且日月之行，有迟有疾，每月一相及，谓之合会，故晦朔无定，由人消息。若定大小合朔者，合会虽定，而蓂元纪首，三端并失。若上合履端之始，下得归余于终，合会时有进退，履端又皆允协，则《甲辰元历》为通术矣。

仁均对曰：

宋代祖冲之久立差术，至于隋代张胄玄等，因而修之，虽差度不同，各明其意。今孝通不达宿度之差移，未晓黄道之迁改，乃执南斗为冬至之恒星，东井为夏至之常宿，率意生难，岂为通理？夫太阳行于宿度，如邮传之过逆旅，宿度每岁既差，黄道随而变易，岂得以胶柱

之说而为斡运之难乎？

又案《易》云：“治历明时”。《礼》云：“天子玄端，听朔于南门之外。”《尚书》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孔氏云：“上日，朔日也。”又云：“季秋月朔，辰不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则日蚀随可知矣。”又云：“先时、不及时，皆杀无赦。”先时，谓朔日不及时也。若有先后之差，是不知定朔之道矣。《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春秋》日蚀三十有五，左丘明云：“不书朔，官失之也。”明圣人之教，不论于晦，唯取朔耳。自春秋以后，去圣久远，历术差违，莫能详正。故秦、汉以来，多非朔蚀，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见意，不能详究，乃为太史令钱乐之、散骑侍郎皮延宗所抑止。孝通今语，乃是延宗旧辞。承天既非甄明，故有当时之屈。今略陈梗概，申以明之。

夫理历之本，必推上元之岁，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以后，既行度不同，七曜分散，不知何年更得余分普尽，还复总会之时也？唯日分气分，得有可尽之理，因其得尽，即有三端之元。故造经立法者，小余尽即为元首，此乃纪其日数之元，不关合璧之事矣。时人相传，皆云大小余俱尽，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此不达其意故也。何者？冬至自有常数，朔名由于月起，既月行迟疾无常，三端岂得即合？故必须日月相合，与冬至同日者，始可得名为合朔冬至耳。故前代诸历，不明其意，乃于大余正尽之年而立其元法，将以为常，而不知七曜散行，气朔不合。今法唯取上元

连珠合璧，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合朔之始以定，一九相因，行至于今日，常取定朔之宜，不论三端之事。皮延宗本来不知，何承天亦自未悟，何得引而相难耶？

孝孙以仁均之言为然。

贞观初，有益州人阴弘道又执孝通旧说以驳之，终不能屈。李淳风复驳仁均历十有八事，敕大理卿崔善为考二家得失，七条改从淳风，余一十一条并依旧定。仁均后除太史令。卒官。

李淳风传

——《旧唐书》卷七九

【说明】李淳风（公元 602—670 年），岐州雍县（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唐初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唐代初年，皇家天文机构仍袭用北魏制造的铁铸浑仪，已不能适应当时天文学发展的需要。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李淳风设计制成了浑天黄道仪。新浑仪内外三重，在古浑仪的六合仪和四游仪之间，增加一重三辰仪，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这具浑仪复杂精密，对后世的浑仪制造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还撰写《法象志》七卷，历数前代浑仪之得失。

李淳风深通历算，龙朔二年（公元 662 年），李淳风以刘焯《皇极历》为基础，增损编定《麟德历》，首次废除古历中“章”、“蔀”、“纪”、“元”的计算，并对各种天文数据确定了同样的分母，大大简化了计算步骤。新历同时采用定朔安排历谱，尽管它设立了一些迁就方法；它废除了闰周，直接以无中气之月置闰；它完全由观测和统计来求得回归年和朔望月长度，并在日食计算中提出蚀差的改正项。

李淳风撰述甚丰，仅存书目者即不下三十余种，百卷之

众，其中《乙巳占》十五卷、《观象玩占》五十卷等，俱存于世。

李淳风，岐州雍县人。他的祖辈自太原迁至此地。父亲李播曾作隋代高唐县尉，因官职低微，很不得志，所以弃官作了道士，他对古代文献典籍极为熟悉，自名道号黄冠子。曾注释《老子》，撰写《方志图》，有文集十卷，都流传于世。李淳风自幼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他博览群书，尤其通晓天文、历算和阴阳之学。唐贞观元年，他驳斥傅仁均关于历法的议论，很多观点都对旧说加以调和，无所偏颇，迎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为此被授官作了将仕郎，留在太史局内值班，以备君主顾视问询。不久他又上表太宗说：“现在天文台上放置的观测仪器还是北魏遗留下来的旧物，检查一下它的结构用法，粗疏错漏实在很多。臣根据《虞书》的记载，舜帝使用以玉制成的天体观测仪器，来观测排比日、月、五星的运行，这就是古代用浑天仪考察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星进退运行的情况。《周官》所载大司徒的职责，是用圭表测定日影的长短，以便确定大地的中心。这也是利用浑天仪观测到的太阳沿黄道运行的原理的明确证明。直到周代末年，这种仪器才失传。西汉武帝年间，落下闳重新制造了浑天仪，但他的设计却有很多疏漏不全面的地方。所以贾逵和张衡都各自铸造了新仪，陆绩和王蕃也陆续进行了修订和增补，有的在浑天仪上增加装饰一些主要星官，设置机械装置来配合漏壶流水的传动；有的则只单独设置一个不合太阳运行轨道的赤道规，推验日月五星的行度都以赤道为准。今天来检验实

际天象，太阳在冬至时位于最南方，夏至时位于最北方，而赤道应当定在中间，这样做完全看不出南北的不同，用这种仪器来测定日月五星的行度，怎么能得到真实的结果呢？黄道浑仪的失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了。”

唐太宗认为他的说法很新奇，于是命令将它制造出来，至贞观七年仪器制成。这具浑仪用铜铸成，内外三层，下有十字形底座支撑，每个十字的顶端各树立一只鳌足，用来支托仪器，并以四只鳌足支托浑仪地平规的四点作为东、南、西、北四极。浑仪上的第一组仪器名叫六合仪，包括子午环、地平环、外赤道环，三环交结于四极之内，上面标示出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甲、乙、丙、丁等十干，子、丑、寅、卯等十二辰和经纬度各三百六十五度，应有尽有。第二组仪器名叫三辰仪，圆环的直径为八尺，包括赤道环、黄道环和白道环，天上二十八宿的距度和日月五星的运行位置，都可通过这组仪器完备地表现出来，三辰仪位于六合仪之内旋转游移。第三组仪器名叫四游仪，双重圆环上附有极轴，用来连结配有玉饰的望筒，并且将浑仪其他圆环穿连起来组成一个整体；另外使双环上极轴的北端固定在天北极的位置，南端伸向天南极并与地轴平行，双环在最里层绕极轴东西旋转；同时望筒在双环之间可以南北移动，仰视时可用它观测天上的星辰，俯视时又可识读日规上的刻度。当时人们都称赞这些做法十分巧妙。李淳风又对前人所造浑仪的得失优劣加以评论，撰有著作七卷，名为《法象志》，上奏太宗。太宗大加赞赏，并将淳风所造的浑仪安放在凝晖阁内，同时加封他作了承务郎。贞观十五年，授李淳风太常博士，不久又转任太史

丞，参与撰写《晋书》和《五代史》，这两部书中的《天文志》、《律历志》和《五行志》都系淳风所作，同时他又参与撰写《文思博要》。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淳风升任太史令。

当初在太宗之世，有一部名叫《秘记》的书说：“唐代自开国三世之后，就会有一位女主继承王位而代唐掌有天下。”太宗为询问此事曾秘密召见李淳风，淳风说：“臣根据天象推算，女主代唐的征兆已经形成，而且此人已经出生，就在陛下的宫内，从今算起不过三十年，定将享有天下，并会把唐王室的后代诛灭干净。”太宗说：“现在就把可疑的人全部杀尽，怎么样？”淳风说：“天命所定要发生的事，根本就没有消除逃避的道理。将要称王的人不会被杀死，只怕那些可疑的人白白送死而冤枉了无辜。况且根据天象判断，现在征兆既成，又在宫内，已是陛下的眷属，过三十年人就老了，人一旦老了就会变得仁慈，虽然王朝最终改姓易主，但她对陛下的子孙或许不会特别地加以翦除。今天如果将她杀死，便一定会死而复生，那时将长成少壮之躯，极为严酷狠毒，定会杀戮她过去的仇人。如果是这样，陛下的子孙将难逃厄运，必然会被她斩尽杀绝。”太宗认为淳风的话很有道理，便也不再追究了。

李淳风每次占卜吉凶，都会应验，非常准确，就象把军符的两半合在一起那样丝毫不差。当时擅长数术的人都怀疑他有鬼神相助，而不是靠他自己的学习练就的本领，但最终还是不能了解其中的奥秘。唐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李淳风又因过去撰修国史有功，被赐封昌乐县男的爵位。当初，太

史监中负责占卜吉凶的官员王思辩上表奏称,《五曹算经》、《孙子算经》等十部算学经典的条理多很杂乱。李淳风又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人,奉诏注解《五曹》和《孙子》等十部算学经书。书写成后,唐高宗命令在国家设立的学校中使用。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李淳风改作秘阁郎中。当时使用的《戊寅元历》已渐渐出现了误差,于是淳风又根据刘焯编制的《皇极历》进行增补修定,撰成《麟德历》上奏高宗,凡精通历法的人都称赞此历精密。唐咸亨元年,李淳风又重新担任了太史令。同年去世,时年六十九岁。他所撰写的《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加之推衍的《齐民要术》等,共十余部著作,大都流传于世。

李淳风之子李谚,孙李仙宗,都作了太史令。

(冯 时 译)

【原文】

李淳风,岐州雍人也。其先自太原徙焉。父播,隋高唐尉,以秩卑不得志,弃官而为道士,颇有文学,自号黄冠子。注《老子》,撰《方志图》,文集十卷,并行于代。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初,以驳傅仁均历议,多所折衷,授将仕郎,直太史局。寻又上言曰:“今灵台候仪,是魏代遗范,观其制度,疏漏实多。臣案《虞书》称,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则是古以混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周官》大司徒职,以土圭正日景,以定地中。此亦据混天仪日行黄道之明证也。暨于周末,此器乃亡。汉孝武时,洛下閎复造混天仪,事多疏阙。故贾逵、张衡各有营铸,陆绩、王蕃递加修补,或缀附经星,机应漏水,或孤张

规郭，不依日行，推验七曜，并循赤道。今验冬至极南，夏至极北，而赤道当定于中，全无南北之异，以测七曜，岂得其真？黄道浑仪之阙，至今千余载矣。”

太宗异其说，因令造之，至贞观七年造成。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焉。第一仪名曰六合仪，有天经双规、浑纬规、金常规，相结于四极之内，备二十八宿、十干、十二辰，经纬三百六十五度。第二名三辰仪，圆径八尺，有璇玑规、黄道规、月游规，天宿矩度，七曜所行，并备于此，转于六合之内。第三名四游仪，玄枢为轴，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又玄枢北树北辰，南距地轴，傍转于内；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仰以观天之辰宿，下以识器之晷度。时称其妙。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著书七卷，名为《法象志》以奏之。太宗称善，置其仪于凝晖阁，加授承务郎。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寻转太史丞，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又预撰《文思博要》。二十二年，迁太史令。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

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淳风每占候吉凶，合若符契，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不因学习所致，然竟不能测也。显庆元年，复以修国史功封昌乐县男。先是，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五曹》、《孙子》十部算经理多踳驳。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五曹》、《孙子》十部算经。书成，高宗令国学行用。龙朔二年，改授秘阁郎中。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咸亨初，官名复旧，还为太史令。年六十九卒。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并演《齐民要术》等凡十余部，多传于代。

子谚、孙仙宗，并为太史令。

李 皋 传

——《旧唐书》卷一三一

【说明】李皋（公元 733—792 年），字子兰。公元 752 年嗣承王位，不久就外放温州长史。随即代理知州，不料遇上荒年，李皋表示愿杀一身而救活数千百姓的生命，立即开仓放粮，同时自请擅自开仓的处分。他在官时公正廉明，以良政闻名朝野。公元 780 年升湖南观察使，招降被逼上梁山的王国良将军，结义为兄弟，王将军立即开仓库、焚战备，恢复当地农业生产。李皋长于识拔和使用人才，他所选拔的将佐如伊慎、李伯潜、刘旻、王锬、马彝、许孟容等都成为他非常得力的臂助。他曾用计破蔡山，大败敌军，乘胜连克蕲州，黄州，复大破李希烈部饶将杜少诚；又攻下了平静、白雁等关，迫使李希烈不得不收兵作大规模的撤退。李皋其后任江陵尹、荆南节度使等，政府倚为江汉屏障。李思登降，他先后收复了四州十七县。又开垦荒地五千顷，建设了十几个乡镇村落。

李皋曾创制两轮的轮桨战舰，速度快而又耐用。他创制轮桨船（车船）虽然是再创造，却起了承先启后的重大作用，使我国古代船舶人力推进的最高技术得以绵延不断。

他又制造欹器，可见他对古代工艺制造的酷爱。他是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造船专家。

李皋（公元733—792年），字子兰，曹王明的玄孙，嗣王戡的儿子。少年时就补官任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嗣承王位，授职都水使者，三次升迁到秘书少监，都与正职俸禄相同。他多智计，善于利用事机使得办事方便。侍奉太妃郑氏恭敬体贴，是有名的孝子。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京师乾旱，一斗米要值数千钱，人民死亡的很多。李皋筹计俸禄不足以养活全家，急忙申请调任外官，朝廷不允。李皋就故意触犯一点小罪，贬职温州长史。不久就代理知州。当年农业歉收。温州官仓存有官米几十万斛，李皋准备用来救济灾民，掾吏不敢奉行，叩头请求李皋等候皇上的旨意，李皋说道：“一个人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死的，那里有时间上稟，如果牺牲我一人，能救活数千人的性命，那就太好了！”于是打开州仓放粮赈济，并立刻派人飞马上奏章请罪，自请擅自开仓放粮的罪责。皇上知道以后不但不怪罪，反而优诏嘉许他这样做，并加少府监职衔。李皋到属县巡视时，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在路旁哭泣，李皋十分同情地温言询问，老妇哭诉道：“妇人李氏有两个儿子，一名钧，一名镠，在外做官二十年不曾回家一次，老妇穷得活不下去了！”当时钧任职殿中侍御史，镠任职京兆府法曹，都是以文章考取高科，很有名望。李皋慨叹道：“‘入则孝、出则悌、行有余力然后可以学文’。像他们两个这样为人岂能厕身于列卿之间？！”因此上奏章弹劾，两人一并被除名永不

录用。李皋改调处州别驾，代理知州，在任上政绩斐然而闻名四方。不久就被征召到京师，一时之间尚未及召见，便上书论述为政之道，遂简放衡州刺史。又因小事违犯了法度，降调潮州刺史。当时杨炎正好贬谪到道州，他清楚地知道李皋的情况，等到杨炎当了宰相，就重新任命李皋为衡州刺史。起初，御史来查办李皋的案件，李皋唯恐太妃担忧，从府中出来时穿平民服色，回府以后仍穿官服，言谈笑貌一如平日，太妃竟一无所知，降调潮州则谎称升迁，到这时官复原职了，才哭泣着告诉太妃已往的经过，并且说道：“不是很头痛的事，孩儿不敢禀告，恐母亲悬念不安！”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李皋升任湖南观察使。前任观察使辛京杲贪狠残暴，有镇将王国良坐镇邵州武冈县，家中富有财产，京杲贪枉竟加国良以死罪，良十分害怕，乘着民众都困苦不堪，就分散家财召聚众人，占据了武冈县造反了。几道的节度使会兵讨伐，两年都不能攻下武冈县。李皋奉到命令时叹道：“驱逐疲敝的老百姓，杀尽造反的人，这不是对圣明的朝廷尽责。”派使臣送信给国良，信中说道：“我看将军并不是敢于做大逆不道的事的人，大概是遭受了不白之冤，只是为了免得冤枉死了才这样做。将军遇到我还不快快投降么？小王和将军都是被辛京杲冤枉的人，我已经蒙圣上昭宥了，我又何能忍心持刀杀将军？将军如果不以为然，我就以阵术破将军的军阵，以大举进攻来屠戮将军的城池，这恐怕就不是将军所估计的了！”国良捧着来信一忽儿担忧，一忽儿又欢喜，派了使者请求投降，这也未必就是最后的决定。当天李皋亲自到县受降，中途有侦察骑兵飞马来报告说：“国良

军中有变，明说投降，乃是诈降！”李皋道：“这就不是你们所能晓得的了！”于是留下他率领的兵将，自称受降使者，单骑直入国良所居堡垒。国良下令让使者进堡，李皋来到军中高声呼唤道：“有识得曹王的吗？我就是曹王。国良何不快降？”全军都惊骇得直瞪着眼，不敢动一动。恰巧有认识的人走来了，大声说：“是曹王，是曹王。”互相传告，国良趴下叩头请罪，李皋拉着国良的手亲切地说要结拜为兄弟。因此，国良将攻防用具全部焚毁，打开仓库将物资钱粮都分给兵士，让他们恢复农业生产。有圣旨赦免国良的罪，恩赐新名，叫维新。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郑太妃去世，李皋护送母丧到江陵，适逢梁崇义反叛朝廷，李皋被重新起用为左卫大将军，再回湖南，不久又加散骑常侍。李希烈反叛唐朝，李皋升调江西道节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到洪州以后，召集了全体将校官吏发布命令：“曾经立功尚未申报的，再行申报核办；有计策谋略而才能足以充当军佐的，另行申明核办。”有裨将伊慎、李伯潜、刘弼、都上前自报，李皋观察他们的语气，查验他们的功绩，一律补授大将。擢升王锬为中军，任马彝、许孟容为幕僚。于是修缮军械，制造战舰，统率着两万多兵马。当初，伊慎曾率领江西兵跟随李希烈平襄州，李希烈反叛朝廷以后，唯恐李皋任用伊慎，暗中派人赠送锁子甲，又伪造伊慎的来往信件，留放在洪州境地之内，皇上闻知以后就派中使（太监）来处斩伊慎，这时李皋拜表上闻，请留伊慎一命，令他有报效朝廷的机会。当时交战双方隔江布阵，太监又奉命到军中来，李皋将伊慎劝勉一番，令他立功

自效；并将所乘的马和自用的兵器甲冑相赠，令他率领先锋军打头阵，李皋亲率大军继进，责令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伊慎果然打败敌军，杀死敌兵数百人，这样伊慎才得以免罪不究。敌军在蔡山建立了碉堡寨栅，李皋观察以后，认为地势险峻难以强攻，就散布消息声称要西向攻取蕲州，一面准备战舰，又分兵沿着南岸与水师一同逆江西上。敌军以老弱兵守寨栅，率领着大部精锐兵马也沿江随着李皋的战舰西上，一南一北与李皋大军隔江遥遥相望。这时离开蔡山已有三百多里了。于是李皋命令岸上的步兵一律上船，顺流放舟浩浩东下，没有两天就攻破了蔡山大寨。敌军回兵来救，终于晚了一天。李皋轻取蔡山老营又大破救兵之后，乘胜进军攻破蕲州城，敌将李良投降。又攻取黄州，杀死敌军一千多名，李皋的大军军容更盛、兵威更壮了。元帅舒王加授李皋为前军兵马使。

这时德宗住在奉天府，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强行截取专卖盐铁的专款，陈少游的使者包佶将夺取的盐铁专款从长江运送，已经到达蕲口。当其时李希烈已经屠戮汴州城，又派遣饶将杜少诚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来进犯蕲、黄，即将阻断江上航道。李皋派遣伊慎率领七千兵抵御，与敌军即将在永安城遭遇接战。伊慎建立了三座寨栅，相隔四里左右，鼓角列在中栅。少诚一到，立即分兵三队，各围一座寨栅。少诚的兵尚未合围，鼓声一起，三座寨栅寨门大开，众兵将一齐出击，也不布阵，只是一鼓作气往前冲击，敌军大乱，少诚败走，这一役杀死敌兵一万多人，埋葬尸体就堆成一座很高的大土丘。李皋论功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官衔，又加封五百户。

皇上到梁州时献俘、进呈敌首的人也陆续都来了。李皋认为皇上蒙尘在外，他不敢居住在城内，于是就在西塞山上游大洲地方屯驻兵马；并在邻近县分设立军市，商人们带了货物都陆续到军市来了。皇上加任李皋为工部尚书。皇上圣驾回到京师，李皋又派遣伊慎和王锬率领兵马围攻安州，州城由于柴水的阻隔易于固守，进攻了许多天不能攻下。希烈派遣他的外甥刘戒虚率领步兵和骑兵八千人来援，李皋命令分一部分兵力由李伯潜率领在应山迎击，这一仗俘获了戒虚和大将二名、裨将二十名，杀死敌兵一千多人。当面绑缚了戒虚等人来到城下，令人说降，敌军声称：“得大将和宾佐一二人来城中表示诚意，那就一准投降了。”李皋就命令王锬、马彝二人攀绳进城，城中的敌人欢然大叫着出城投降。希烈又派兵援救随州，李皋命令伊慎在厉乡迎击，大败援兵。克复了平静、白雁等关。希烈十分害怕了，才退兵。

贞元（公元785—805年）初年，李皋简放江陵尹兼荆南节度使等职，江汉地区倚李皋为长城。不久，李思登以随州来降。李皋先后攻下了四州十七县。行军以来大小战役十几次，未曾打过一次败仗。淮西平定以后，李皋申请护送母柩回东都合葬，皇上派遣中使来吊丧，赠李皋的父亲右仆射官衔，封赠他的母亲为曹国太妃。葬礼完毕，李皋朝见皇上，皇上下诏命李皋回驻地，再出东都到墓地拜祭，观看的乡亲们都觉得他很是荣耀。

原先江陵的东北方傍着汉朝古堤，有荒废的田地二处，每逢夏季则江水泛滥，李皋命人堵塞旧决口，开拓了田地五千多顷，每亩地收获一钟（约合640升）的粮食。又规划开发

长江南岸荒废的洲渚，建设房屋村舍，在夹江上架设桥梁二座，流亡的百姓自愿来投奔的有二千多户。从荆州（江陵）到乐乡二百里之间，建设了十几座乡镇村落，大的村落都各有几百户。楚地风俗浮薄，当地人从来不愿打井，都是从陂塘河川中取水饮用，李皋开始命乡村百姓集资打井，使人们用水方便。

刚平定了李希烈，吴少诚就杀了陈仙奇，皇上认为襄州、邓州乃是军事要冲，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派李皋任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节度使等，又将汝州、随州改属山南东道管辖。李皋练兵储粮，买回鹌马扩充骑兵，又举行大规模演习和校阅来训练兵士，少诚对他很是惧怕。李皋生性勤俭，知道百姓的困苦，设立监司听取下面的意见和申诉。他深知军将和官员的优缺点，行赏行罚说了都必定做到。他巡视所到之处，十分注意平抑物价，昂贵的物资则开仓出售，用以供给军将和官员的工薪，又足以使豪势之家不能屯积居奇谋取暴利。平时常动脑筋发挥他的智巧制造战船，船傍安装桨轮二座，踏动起来乘风破浪，速度就像云帆风蓬齐张一般，他所设计制造的战船简易低廉而又耐用。又曾制造欹器送进宫中。每逢送人们物品，常亲自称量，署中公家的绸缎布匹，都加上印记，以杜绝官吏的谋私。

起初、扶风人马彝还没有一点名气，李皋就开始起用他，最后马彝终以正直有骨气而闻名朝野。汉阳王张柬之有私人园林在襄州的西郊，当地官府常借地公宴或招待来宾，李皋准备买下这座园林，马彝听了整一整衣襟上前说道：“张汉阳有使国家中兴的功绩，如今他遗留下来的产业，应当为他保

存百代，王爷您即便想得到它，又怎能让他的子孙自行变卖呢？”李皋立刻改容谢过，说道：“失言了！主办这事的人也失言了！让您笑话！没有您，我怎能听到这样的话？”李皋始终认为改过迁善、知人善任是自己应当做的事，因此他的幕僚客卿以及军官将佐后来多成为大官。贞元八年（公元792年）三月在任上因暴病去世，享年六十岁。皇上停朝三天，赠李皋右仆射职衔，按级别吊唁致送丧仪，谥号为成，有子三人：象古、道古、复古。（周世德 译）

【原文】

李皋字子兰，曹王明玄孙，嗣王戡之子。少补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天宝十一载嗣封，授都水使者，三迁至秘书少监，皆同正。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

上元初，京师旱，斗米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度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无几，摄行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皋欲行赈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人命，利莫大焉！”于是开仓尽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天子闻而嘉之，答以优诏，就加少府监。皋行县，见一媪垂白而泣，哀而问之，对曰：“李氏之妇，有二子：钧、镠，宦游二十年不归，贫无以自给。”时钧为殿中侍御史，镠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艺登科，名重于时。皋曰：“‘入则孝，出则悌；行有余力，然后可以学文’若二子者岂可备于列位！”由是举奏，并除名勿齿。改处州别驾，行州事，以良政闻。征至京，未召见，因上书言理道，拜衡州刺史。坐小法，贬潮州刺史。时杨炎谪官道州，知皋事直；及为相，复拜衡州。初，

皋为御史覆讯，惧貽太妃忧，竟出则素服，入则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为潮州，谗词谓迁，至是复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闻。

建中元年，迁湖南观察使。前使辛京杲贪残，有将王国良镇邵州武冈县，豪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危惧，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诸道同讨，联岁不能下。皋授命日，乃曰：“驱疲𦍋，诛反侧，非所以奉圣朝事。”遣使遗国良书曰：“观将军非敢大逆，盖遭谗嫉，救误死而已。将军遇我，何不速降？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杀将军耶？将军以为不然，我以阵术破将军阵，以攻法屠将军城，非将军所度也。”国良捧书，且忧且喜，遣使请降，亦未必决。皋即日赴县受降，中道有候骑驰告曰：“国良军中有变，言降是诈也。”皋曰：“非尔辈所知。”遂留麾下兵，单骑假称使者，径入国良垒中。国良召使者入，皋遂大叫军中曰：“有人识曹王否？只我是。国良何不速降？”一军愕眙不敢动。适有识者走至，传呼曰：“是”。国良匍匐叩头请罪。皋执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备，散仓库，给兵士，令复农桑。有诏赦国良罪，赐名维新。

建中二年，丁母艰，奉丧至江陵。会梁崇义反，乃授起复左卫大将军，复还湖南，寻加散骑常侍。李希烈反，迁江西道节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集将吏而令曰：“尝有功未申者，别为行；有策谋及器能堪佐军者，别为行。”有裨将伊慎、李伯潜、刘旻皆自占，皋察其词气，验其有功，悉补大将。擢王锬委之中军，以马彝、许孟容为宾佐。缮甲兵，具战舰，将军二万余。初，伊慎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

州，及反，惧皋任之，乃阴遣遗之锁甲，又诈为慎书往复，置遗于境。上闻，即遣中使斩慎，皋表请舍令自效。会与贼夹江为阵，中使又至，皋乃勉令以功自赎，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令将锋而先，皋率军继之，责其有功，果大破贼，斩首数百级，慎方得免罪。贼树堡栅于蔡山，皋度险峻不可攻，乃声言西取蕲州，理战舰，分兵傍南涯，与舟师泝江而上。贼以老弱守栅，引军循江随战舰，南北与皋相直，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令步兵登舟，顺流东下，不日拔蔡山。贼还救，间一日方至，大破之。因进拔蕲州，降其将李良，又取黄州，斩首千余，兵益振。舒王为元帅，加皋前军兵马使。

德宗居奉天，淮南节度陈少游强取盐铁钱，其使包佶以财币泝江，次于蕲口。时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饶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蕲、黄，将绝江道。皋遣伊慎将七千众御之，遇于永安城，慎列三栅，相去才四里，列鼓角中栅。少诚至，分兵围之，部队未严，声鼓而三栅齐出奋击，不为行阵，贼乱，少诚败走，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进封五百户。上至梁州，进献继至。皋以上蒙尘于外，不敢居城府，乃于西塞山上游大洲屯军，从近县为军市，商货毕至。加工部尚书。驾还京师，又遣伊慎、王锬将兵围安州，州城阻溃水为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来援。皋命李伯潜分师迎击于应山，获戒虚及大将二，裨将二十，斩首千余。面缚戒虚等之城下，乃使人说之，贼曰：“得大将及宾佐一二人为信，当降。”皋乃使王锬、马彝绳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随州，皋令伊慎击于厉乡，大破之，复平静、白雁等关。希烈惧，乃戢兵。

贞元初，拜江陵尹、荆南节度等使，江汉倚皋为固。未几，李思登以随州降。凡下州四、县十七。大小十余阵，未尝败衄。淮西既平，请护丧柩东都，上遣中使吊，赠父右仆射，母曹国太妃。葬毕来朝，诏还镇，出东都以拜墓，观者荣之。

先，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隄二处，每夏则溢，皋始命塞之，广田五千顷，亩得一鍾。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饮陂泽，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

初平希烈，吴少诚杀陈仙奇，上以襄、邓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等使，割汝、随隶焉。练兵积粮，市回鹘马益骑兵，尝大畋以教士，少诚憚之。性勤俭，知人疾苦，设监司能恭听于下，持将吏短长，赏罚必信。所至尝平物价，贵则出卖之，给将士廩俸，豪家不得擅其利。常运心巧思为战舰，挟二轮蹈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进入内中。每遗人物，常自称量。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绝吏之私。

初，扶风马彝未知名，皋始辟之，卒以正直称。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皋将买之，彝敛衽而言曰：“张汉阳有中兴功，今遗业当百代保之，王纵欲之，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皋谢曰：“主吏失词，为足下羞；微足下，安得闻此言！”以改过迁善、知人任下为己任，故宾从将佐多至大官。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废朝三日，赠右仆射，赠吊有差，谥曰成。子象古、道古、复古。

杜佑传

——《旧唐书》卷一四七

【说明】杜佑（公元734—812年），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在科学上以地理学贡献最大。是唐代著名地理学家。

杜佑出身于官僚家庭，早年以荫入仕，此后历任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司空、司徒、同平章事（宰相）等职位。杜佑喜读书学习，而且经常手不释卷孜孜不怠。著有《通典》一书（200卷），记述上古至唐代中叶的中国古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及议论得失等，全书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是我国现存最早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与后来宋郑樵的《通志》、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清代官修《续通典》、《皇朝通典》都为补《通典》之作。《通典》将历代地理志内容改编为州郡、边防两典。州郡典，以古代雍州、梁州、荊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等九州为纲，记述历代疆域、区划沿革。其中尤其珍贵的是首次记载了军事地理沿革，及其有关军队编制、实力、粮饷、给养等情况。《通典》的附论，考证翔实，颇有新见，如关于黄河上源问题，经

杜佑考证，纠正了长期以来“伏流重源”的错误学说，对后世影响重大。

边防典，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东西南北边疆的部落和相邻国家的情况，计有一百九十三个部落和国家，内容相当丰富，成为后世研究边疆史地、中外交通史和民族史的珍贵史料。

《通典》还保存了不少今已亡佚的典籍的片断和文章，仅严可均编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就有近九百条是从《通典》中辑出的。

《通典》中还保存了很多科技史料和科技典籍内容，例如《通典》辑录的杜环《经行记》一书的部分内容，在地学史上极有参考和研究价值。

杜佑，字君卿，京兆府万年县人。他的曾祖父叫杜行敏，为荊州、益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父叫杜慤，为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他的父亲名杜希望，历任鸿胪寺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封为右仆射。杜佑因照顾而进入政界，任候补济南郡参军、剡县县丞。当时润州刺史韦元甫曾受过杜希望的照顾，有恩于杜佑的父亲。杜佑便去拜见韦元甫，元甫不知他是谁，只是以旧日朋友的孩子来待他。有一天，韦元甫处理公务，有一件麻烦的案子不能确定，见杜佑正在身旁，便试问杜佑该如何处理，杜佑随口应答，句句切中要害，元甫感到非常惊奇，于是便上奏任命他为司法参军。韦元甫任浙西观察、淮南节度时，都任杜佑为从事，他深得韦元甫的信任。杜佑逐步升任检校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江西青苗使、抚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杨炎任宰相时，被

调入京，历任工部郎中、金部郎中，并行水陆转运使，后改任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当时正有军事活动，后勤转全委杜佑负责，升他为户部侍郎、度支判官。后为卢杞所嫉恨，被派任苏州刺史。当时杜佑母亲在世，卢杞却以原苏州刺史因母亲去世而空下的职位授给杜佑，杜佑不去就职，很快又改换为饶州刺史。时间不长，杜佑兼御史大夫，任岭南节度使。当时，唐德宗在兴元，国家事情，执政的人常常遗漏。过去岭南节度常常兼任五管经略使，而惟有杜佑没有兼任，因此，五管地区不属于岭南，便是自杜佑开始的。

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又出任陕州观察使，升任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因母亲去世辞职，不久又被特诏召回，转任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去世，张建封的儿子张愔被军队拥立。皇帝委任杜佑为淮南节度使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政事，兼徐泗节度使，前去讨伐。杜佑便大力准备船只，派遣孟准先行阻击。孟准渡淮河时被张愔部击败，杜佑杖责孟准，巩固阵地不敢前进，直到最后，皇帝下令将徐州授予张愔，而再令杜佑兼任濠、泗等州的观察使。在扬州他们设置了三十多处营寨进行修整备战，但幕僚将帅间却矛盾重重，制约无方，判官南宫搏、李亚、郑元均相互争权夺利，大大影响了军政。德宗知道此事后，他们逃至岭南地区。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杜佑入京，被授为检校司空、同平章政事，充任太清宫使。德宗去世，杜佑掌管丧葬事宜，不久，进升为检校司徒，充任度支盐铁等使，仍为同平章政

事，很快又授为弘文馆大学士。当时，王叔文为副职，杜佑虽为正职，但实际由王叔文主持工作。叔文因事罢官后，杜佑又奏请李巽为副职，有不少建树。顺宗去世，杜佑又负责丧葬事宜，不久让位请李巽代替自己的正职。过去，度支部为了控制费用，逐渐转权于百司官员，设置了很多官员，使管理上繁杂难管。杜佑开始上奏请将营造修缮类归由将作府管理；本炭归司农府、印染等归到少府，从而使各部门职责明确，条理清晰。朝廷同意了他的建议。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拜封杜佑为司徒、同章政事，封为岐国公。当时河西地区的党项族暗中引导吐蕃人入侵边地。边将为了取功，急请出兵攻击。杜佑为此上疏论述说：

我看到党项与西戎暗底来往，多次有投降的人说明这一事实。但朝廷讨论，认为应当积极备战防止侵略，增加兵甲，要准备邀击侵略者。这都是些没有切中要害的凡人之见。

边疆蛮夷少数民族侵扰华夏中国，自古唐虞时就是这样。周宣王中兴周朝，玁狁族侵扰为害，也只是命南仲去朔方筑城防卫，将他们追到太原，也是仅到双方边境而止，以不愿激怒远方少数族而使之对中国造成危害。秦平定六国，依靠其兵力，在北方修筑长城，以抗拒匈奴，向西追赶羌族等于塞外。其结果，劳民伤财引起怨恨纷起，国无宁日，谪戍不断。汉武帝依靠文帝、景帝所留下的财富，遣将兴兵作战，从而使全国人口死亡过半，只得痛下停止轮台屯田的命令。过去史书记载这些事，都是褒扬他们先糊涂而后明白。因此，圣明的君王

治理天下，只有务求安静抚民，从西部流沙、东部到海，在南北广大地区都广施文明理教，而不以远方的东西为珍品，不谋求远方的贡献。即使国内民力劳疲而又多事于外，其结果必然是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所以，前代忠臣，都有纠正君王决定的议论。淮南王请求停止用兵于闽越，贾捐之愿意放弃珠崖地区，其对国家的安危利弊，都明载于史。

过去冯奉世假传汉代皇帝的命令，攻击莎车，将莎车王的首级送到长安，使汉朝威震西域，宣帝非常高兴，准备给予封爵赏地。肖望之却独以为矫诏有违君命，虽然他取得了战功，但不能以之为榜样，恐怕以后的出使人员争相发兵出击其他国家，为汉朝滋惹麻烦，肖望之的话言之有理，于是被采纳。唐自武则天以来，突厥默啜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多次侵扰边城，造成很大危害。开元初年，边将郝灵佺亲自出阵捕斩其首领，将首级传回京城，自认为很有功劳，无人能与已相比，静等给自己的奖赏封拜。当时宋璟任宰相，考虑到武臣为了取功劳而为国家生事，所以，只授予郝灵佺郎将之职。由此到开元盛朝，没有人在提开拓边疆之事，从而使中国得以安静，外部少数民族也相安无事。这些都是成败可证的事实，作为鉴戒并不远。

而且党项为一小的民族，杂乱的居住于中国汉人之间，其本已具有中国的道德观念，应当安抚绥靖。加上边将贪财，常有侵扰，或看中他们的良马，或夺取他们的子女，贿赂当地物产，征发役徒。劳苦一多，叛乱逃

亡便出现了，或者与北狄通使往来，或者与西戎联合侵扰边疆，他们这样事处有因，实应征除。《传》中说：“远方的人不臣服，那么就修养文治德义而使他们来服属。”《管子》说：“国家不能使勇猛的人守边境。”这确实是圣明哲人从小见大的远大谋略。现在西戎正强大，而国家边备尚不充实，这确实应认真挑选优良将帅，让他们谨必修葺边境，确保信义，不进行任何索取，用以表示朝廷对少数民族的关怀绥抚。如果他们来犯就征伐，他们离开就谨行防御而已，自然对待他们，去其奸猾，何必大兴兵戎，而劳费人力资财。

皇帝为圣人君子，哺育众生，行动必须遵法古人，要深谋远虑。我真诚希望您为长远着想，不轻易兴兵，这是天下的万幸之事。我对伦理道义不大熟悉，学不渊博，只因受皇帝宠信，作为朝廷老臣，朝廷的恩德深之无比，诚心报答朝廷。这些芜杂不成体统的文字呈上，有损您的时间精力，深为惶恐。

皇帝对杜佑的这些建议深以为然，并予以采纳。

一年多以后，杜佑请求辞职回家，皇帝不同意，只让他三五天去一次中书省，平章政事。每次上奏事情，宪宗皇帝都优礼待之，不叫他的名字，常叫他司徒。杜佑在京城南樊川有佳林亭，花木幽深，杜佑经常与公卿大臣们在这里聚会，在此安置了许多伎乐人员。杜佑的几个孩子都在朝廷任职，当时兴盛富贵，没有人能与他相比。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生病，六月，再次请求辞职回家，先后四次上奏，情真意切，宪宗不得已而同意了他的请求。下有诏书说：

杜佑尽力为国家操劳，是诸臣的好榜样；辞去荣耀回家，表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况且他身居要职，深明大义尽力襄助皇帝，具有告老让位的意志，和对皇帝象金石一样的忠诚。告谕再三，他的态度愈坚强，因此应顺其心愿，给上进的人以名利，优待贤良年老之人，这是圣王教育的根本。

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阁大学士、太清宫使、上柱国、岐国公、食邑有三千户的杜佑，为国家极优秀的人材，身怀经义道德之学，有敦厚朴实的风貌。其待人宽裕因之性情，谋略有益于事业的发展。他博闻强记，熟悉历代沿革的适宜所在，执政为民，小心处理与民众密切相关的要害问题。由此再掌国事，数历藩方，负责戎族事务。为国家重任所依托，他先服侍上一朝代，又在我身边工作，毫无松懈之时。任命他为上公重臣从政于朝廷，可以说是国家的元老，这是人们都敬慕的。

我继承先辈业迹，想加以弘扬扩大，选求老臣勤勉之人致力发展，因此不顾他的辞职请求而留任他，他又以年老有病而告辞再三，为时已久，不能挽留，深为遗憾。古代先王圣人的君臣之间，臣有年老告退，君王有以优厚赏赐回报情谊的情况。于是，我就象停邓禹敷教之劳而继续增加王祥辅政那样的职遇，以使他安度晚年，静养神气永葆福乐。仍给予增加官阶，以表示宠信，可加之光禄大夫、守太保，并在初一、十五可来朝见。当日，皇帝派遣中使赴杜佑家，赏赐给他绢五百匹、钱

五十万。当年十一月杜佑去世，终年七十八岁。朝廷停止办公三天，册赠为太傅，追谥为安简。

杜佑敦厚朴实有力，特别精通为官之道，虽然外表宽和随便，但却处事有方。他讲求宏观上就简处事，不喜细察明分，管理民众，从方便着手。应变处理西戎事件，即不是他的长处。杜佑非常喜欢学习，涉猎古今书籍文章，以富强国家安静人民为要务。最初，开元末年，刘秩采集经史百家的观点，依据《周礼》六官所掌部门，撰写了分门书三十五卷，名叫《政典》，深为当时人所推崇，房琯认为其才能超过了刘更生。杜佑得到这本书，细细寻味，认为所列条目不全，于是扩大它，又加入开元礼、乐等内容，写成二百卷的一本新书，叫《通典》。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从淮南让人将书带到京城献于皇帝。杜佑说：

我听说太上圣人立德，是很难的事；其次立功，是在当代进行；再次，立言，是为了教育后代人。因此，过去的哲人们相传撰述，以对政事有益，利用建国兴家。我本是以门荫而步入官员行列。作官不是游戏，才不等人，故谨记自强，而用力读书。虽然经历曲折，或工作繁劳，但都珍惜时光，不曾轻易浪费时间。《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都是君臣父子的根本，十伦五教的大纲，如日月普照，天地的最大德义。百王以它为本，自古以来都在遵从。然而它们大多记事件，而极少保留下有关法制材料，我的愚见或许没有达到高深的内涵，让其荒虚，实为我的猜度。每每念及迷迷糊糊的学习，没有探寻政治论述，大略观察历代圣哲的论著，大

多只说不利之事，而缺少改变的方法。我虽愚笨知识浅薄，却注意其利弊，而不求其终始。《周礼》等秦代未灭尽的典籍，虽有繁芜，亦为依据。对于过去的有关事非，可作为现在与将来的借鉴，亦予以大致收录。自从开始这一工作，至今已有三十六年，自己才思愚钝，言辞混乱。图书很多、事项也不少，工作将完，愧有许多缺误，实不能表现出宏大的计划，只是尽自己的能力而已。该书共九门，二百卷，不能不上献皇帝，表明我的志向所在。这些有扰您的视听，深感惶恐无措。

皇帝对此下诏嘉奖，令将《通典》藏入书府。该书盛行于当时，礼乐刑政的渊源，千年之事犹如在指掌间清晰明了，深为学者所赞赏。

杜佑性格勤奋而不知疲倦，虽然位及将相，却常常手不释卷。白天处理公务，接待宾客，晚上则在灯下读书，认真不苟。他与宾客僚佐谈话，人们都害怕与他辩论而佩服他的知识渊博，若有疑误，他也能指明更正。杜佑一生言行一致，没有什么缺点。只有在淮南工作时，他的妻子梁氏去世后，他升小妾李氏为正房太太，封为密国夫人，他的亲属子弟都不同意，当时议论也指责这件事。杜佑有三子，师损继承家业，最后以司农少卿而终。

(赵 荣 译)

【原文】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人。曾祖行敏，荆、益二州都督府长史、南阳郡公。祖慤，右司员外郎、详正学士。父希望，历鸿胪卿、恒州刺史、西河太守，赠右仆射。佑以荫入

仕，补济南郡参军、剡县丞。时润州刺史韦元甫尝受恩于希望，佑谒见，元甫未之知，以故人子待之。他日，元甫视事，有疑狱不能决，佑时在旁，元甫试讯于佑，佑口对响应，皆得其要，元甫奇之，乃奏为司法参军。元甫为浙西观察、淮南节度，皆辟为从事，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入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管经略使。杨炎入相，征入朝，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并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时方军兴，馈运之务，悉委于佑，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为卢杞所恶，出为苏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苏州忧阨授之，佑不行，俄换饶州刺史。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岑南节度使。时德宗在兴元，朝廷故事，执政往往遗脱；旧岭南节度，常兼五管经略使，佑独不兼。故五管不属岭南，自佑始也。

贞元三年，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校检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丁母忧，特诏起复，累转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十六年，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卒，其子愔为三军所立，诏佑以淮南节制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要以讨伐。佑乃大具舟舰，遣将孟准先当之。准渡淮而败，佑杖之，固境不敢进。乃诏以徐州授愔，而加佑兼濠、泗等州观察使。在扬州开设营垒三十余所，士马修葺，然于宾僚间依阿无制，判官南宫搏、李亚、郑元均争权，颇紊军政，德宗知之，并窜于岭外。

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充太清宫使。德宗崩，佑摄冢宰，寻进位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依前平章事。旋又加弘文馆大学士。时王叔文为副使，佑虽总统，

而权归叔文。叔文败，又奏李巽为副使，颇有所立。顺宗崩，佑复摄冢宰，寻让金谷之务，引李巽自代。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费，渐权百司之职，广署吏员，繁而难理；佑始奏营缮归之将作，本炭归之司农，染练归之少府，纲条颇整，公议多之，朝廷允其议。

元和元年，册拜司徒、同平章事，封岐国公。时河西党项潜导吐蕃入寇，边将邀功，丞请击之，佑上疏论之曰：

臣伏见党项与西戎潜通，屡有降人指陈事迹，而公卿廷议，以为诚当谨兵戎，备侵轶，益发甲卒，邀其寇暴。此盖未达事机，匹夫之常论也。

夫蛮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兴，獫狁为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追之太原，及境而止，城不欲弊中国而怒远夷也。秦平六国，恃其兵力，北筑长城，以拒匈奴，西逐诸羌，出于塞外。劳力扰人，结怨皆乱，中国未静，白徒竟起，海内云扰，实生谪戍。汉武因文景之富，命将兴师，遂至户口减半，竟下哀痛之诏，罢田轮台。前史书之，尚嘉其先迷而后复。盖圣王之理天下也，唯务绥静蒸人，西至流沙，东浙于海，在南与北，亦存声教。不以远物为珍，匪求遐方之贡，岂疲内而事外，终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纳忠之臣，亦有匡君之议。淮南王请息师于闽越，贾捐之愿弃地于珠崖，安危利害，高悬前史。

昔冯奉世矫汉帝之诏，击莎车，传其王首于京师，威震西域，宣帝大悦，议加爵土之赏。肖望之独以为矫制违命虽有功效，不可为法，恐后之奉使者争逐发兵，突

厥默啜兵强气勇，屡寇边城，为害颇甚。开元初，边将郝灵佺亲捕斩之，传首阙下，自以为功，代莫与二，坐望荣宠。宋璟为相，虑武臣邀功，为国生事，止授以郎将。由是讫开元之盛，无人复议开边，中国遂宁，外夷亦静。此皆成败可征，鉴戒非远。

且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丞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传》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管子》曰：“国家无使勇猛者为边境。”此诚圣哲识微知著之远略也。今戎丑方强，边备未实，诚宜慎择良将，戒之完葺，使保诚信，绝其求取，用示怀柔。来则惩御，去则谨备，自然彼怀，革其奸谋，何必遽图兴师，坐致劳费。

陛下上圣君人，覆育君粉，动必师古，谋无不臧。伏望坚保永图，置兵衽席，天下幸甚。臣识时经纶，学惭博究，窃鼎铉之宠任，为朝廷之老臣，恩深莫伦，志愚思报，臧否备阅，刍蕘上陈，有渎旒宸，伏深惶悚。

上深嘉纳。

岁余，请致仕，诏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中书，平章政事。每入奏事，宪宗优礼之，不名，常呼司徒。佑城南樊川有佳林亭，卉木幽邃，佑每与公卿讌集其间，广陈妓乐。诸子咸居朝列，当时贵盛，莫之与比。元和七年，被疾，六月，复乞骸骨，表四上，情理切至，宪宗不获已许之。诏曰：

宣力济时，为臣之懿躅；辞荣告老，行已之高风。况

乎任重公台，义深翼赞，秉冲让之志，坚金石之诚。敦谕既勤，所执弥固，则当遂其衷恳，进以崇名，尚齿优贤，斯王化之本也。

金紫光禄大夫、守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上柱国、岐国公、食邑三千户杜佑，巖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炽，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由是再司帮用，累历藩方，出总戎麾，入和鼎实。聿膺重寄，历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诏册，登之上公，肃恭在廷，华发承弁。兹可谓国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

朕缵承丕业，思弘景化，选劳求旧，期致时邕，方伸引翼之仪，遽抗悬车之请。而又固辞年疾，乞就休闲，已而复来，星珪屡变，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际，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优赐以徇其情，乃辍邓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辅导之秩，俾养浩然之气，安于敬止之乡，庶乎怡神葆和，永绥福履。仍加阶级，以厚宠章，可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是日，上遣中使就佑第赐绢五百匹、钱五百千。其年十一月薨，寿七十八，废朝三日，册赠太傅，谥曰安简。

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已任。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

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贞元十七年，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曰：

臣闻太上立德，不可庶几；其次立功，遂行当代；其次立言，见志后学。由是往哲递相祖述，将施有政，用义邦家。臣本以门资，幼登官序，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徒怀自强，颇玩坟籍。虽履历叨幸，或职剧务殷，窃惜光阴，未尚轻废。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宠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测，莫达高深，辄肆荒虚，诚为亿度。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尚赖周氏典礼，秦皇荡灭不尽，纵有繁杂，且用准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布在方册，亦粗研寻。自顷纘修，年踰三纪，识寡思拙，心昧辞芜。图籍实多，事目非少，将事功毕，罔愧乖疏，固不足发挥大猷，但竭愚尽虑而已。书凡九门，计二百卷，不收不具上献，庶明鄙志所之，尘渎圣聪，兢惶无措。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

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佑谈论，人憚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

在淮南时，妻梁氏亡后，开嬖妾李氏为正室，封密国夫人，亲族子弟言之不从，时论非之。三子，师损嗣，位终司农少卿。

马 摠 传

——《旧唐书》卷一五七

【说明】马摠（公元？—823年），唐代京兆扶风县人。曾任岭南、蔡州、桂州、许州、华州等地地方官。担任刺史、都护、观察处置使等职。还曾任刑部尚书、检校尚书左仆射、户部尚书等。马摠对儒学、天文、历算、史地等都有精深的研究，擅长于行政管理，平时喜读书，常常手不释卷，马摠著有《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一百多卷书流传于世。

马摠，字会元，唐扶风县人。少年时为孤儿，比较贫穷，爱学习，秉性耿直，不随便交游朋友。贞元（公元785—804年）年间，姚南仲镇守滑台，马摠被聘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合，监军诬陷南仲有不法行为。等到罢免南仲时，马摠也受牵连而被贬为泉州别驾，监军则升掌枢密院。福建观察使柳冕求令要杀马摠，命从事穆赞拘捕审讯马摠。穆赞说马摠无罪，他才得以幸免于死。后依其才能而转任恩王的教师。元和（公元806—820年）初年，迁为虔州刺史。元和四年，兼御史中丞，充任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马摠的儒学功力

深厚，尤擅长于政事，在南海多年，清廉正直，不挠民众，使当地少数民族大为便利。他还在汉代所竖立铜柱处，用一千五百斤铜特铸了二铜柱，刻写唐的德义，以继承汉代伏波将军的遗迹。他因安抚绥靖少数民族的功劳，而被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转任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进京为刑部侍郎。裴度任淮西宣慰使，奏请马摠担任制置副使，吴元济被诛杀后，裴度留马摠于蔡州，为彰义军留后。不久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任淮西节度使。马摠认为申、光、蔡等州长久陷于叛贼之手，人们不懂法规，便刑罚教育并重，予以教导改化。上奏建议改彰义军为淮西，使叛贼留下的一切痕迹都去掉不存。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马摠转任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次年，改任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元和十四年，迁任检校刑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又授予检校尚书左仆射之职。入京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公元823年）去世，追赠右仆射。

马摠善于理政办事，军政事务后常有空闲，公务之余，经常手不释卷的读书。著有《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多卷，流传于世。（赵荣译）

【原文】

马摠，字会元，扶风人。少孤贫，好学，性刚直，不妄交游。贞元中，姚南仲镇滑台，辟为从事。南仲与监军使不叶，监军诬奏南仲不法。及罢免，摠坐贬泉州别驾，监军入掌枢密。福建观察使柳冕希旨欲杀摠，从事穆赞鞠摠，赞称

无罪，搃方免死。后量移恩王傅。元和初，迁虔州刺史。四年，兼御史中丞，充岭南都护、本管经略使。搃敦儒学，长于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于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以绥蛮功，就加金紫。八年，转桂州刺史、桂管经略观察使，入为刑部侍郎。裴度宣慰淮西，奏为制置副使。吴元济诛，度留搃蔡州，知彰义军留后。寻检校工部尚书、蔡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节度使。搃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贼寇，人不知法，威刑劝导，咸令率化。奏改彰义军曰淮西，贼之伪迹，一皆削荡。

十三年，转许州刺史、忠武军节度、陈许潞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明年，改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十四年，迁检校刑部尚书、郢州刺史、天平军节度、郢曹濮等州观察等使，就加检校尚书左仆射。入为户部尚书。长庆三年卒，赠右仆射。

搃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所著《奏议集》、《年历》、《通历》、《子钞》等书百余卷，行于世。

段成式传

——《旧唐书》卷一六七

【说明】段成式（公元？—863年），字柯古。唐代西河（今山西汾阳）人。是学问广博的生物学家，也是文学家。他官至太常少卿。

段成式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段文昌是唐代著名文学家，曾两度任西川节度使。家中有丰富藏书，段成式博览强记，有志学问。任秘书省校书郎时，在秘阁又读了很多书，因而具有渊博的知识。尤其对动植物兴趣极浓，自幼就喜欢对其观察研究。他著的《酉阳杂俎》是一部颇有生物学成就的书。

《酉阳杂俎》，正集二十卷，续集十卷。分为艺绝、器奇、医、乐、事感、物异等三十余类，涉及的科学范围很广，其中对生物方面的记载很多，正集有广动植物五卷，续集又有支动、支植物三卷。各又分若干篇，如把动物分为羽篇、毛篇、鳞介篇、虫篇、肉攫部五篇来叙述。对动物的进化、一般特点、各种动物的情况等作了具体介绍。有些是自己亲眼观察所得，有些则是传说。有许多记载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例如，虫篇记“颠当”（即螳螂）为自己窝穴伪装活动门；鳞介篇记“乌贼”吐墨黑御敌等。尤其是关于动物保护色和植物

指示矿藏的记载，可以说是科学上的创造性发现，在生物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此外，段成式写了很多诗词，清人辑有《段成式诗》。该书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他的两个儿子也有著作传世，是唐代著名音乐家。

段成式，字柯古，凭借父亲的地位荫得官职，任秘书省校书郎（即担负皇家图书馆中的编校工作）。他刻苦学习，深入钻研，秘阁图书馆中珍藏的所有书籍，他都翻看阅读过。经几次升迁，任尚书郎。唐懿宗咸通（公元860—874年）初年，出任江州刺史。晚年辞官，退居襄阳，过着安逸自由舒适的生活。家中藏有很多历代书籍，他以研读书籍为乐趣，尤其对佛学典籍更有兴趣。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一书流传于时。

（赵慧芝 译）

【原文】

成式，字柯古，以荫入官，为秘书省校书郎。研精苦学，秘书阁书籍，披阅皆遍。累迁尚书郎。咸通初，出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阳，以闲放自适。家多书史，用以自娱，尤深于佛书，所著《酉阳杂俎》传于时。

姜师度传

——《旧唐书》卷一八五

【说明】姜师度（公元 653—723 年），唐魏州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人，为明经举人，曾任大理卿、光禄大夫、将作大匠，以及易州、陕州、河中府、同州等地方官。师度为政勤恳，敏于技巧，尤热衷于水利工程，对沟渠水利有深刻的见解，擅于开挖沟渠为民服务。曾主持开挖过防止契丹的水沟、用于漕运的平虏渠、运输粮食的地下通道，以及灌溉盐池及农田的水渠等工程，皆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姜师度，唐魏州人，为明经举人。唐神龙初年，渐升为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任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师度为政勤恳，人又才思聪敏，深知沟洫的利害。最初，在蓟门北开沟灌水，以防备奚、契丹族的侵入。又按照魏武旧渠，依海开挖漕渠，名为平虏渠，以躲避海上行船的艰难，使漕运的人至今获益。不久升银青光禄大夫，又迁升为大理卿。景云二年（公元 711 年），转为司农卿。

开元（公元 713—756 年）初年，任陕州刺史。陕州西太原仓据于水陆二运之便，经常从太原仓用车运米到河边，然

后装船。师度便开挖了一条地道，从上倒入粮食，使粮食很方便的流到河边，节省运输费用数以万计。开元六年，改蒲州为河中府，师度被任命为河中尹，令他修缮府第。原先，安邑盐池逐渐干涸，师度便让人开拓盐湖，疏通水道，做为盐屯，使公家私人皆获其利。师度改任同州刺史，他又在朝邑、河西二县界，依古通灵陂，挑选田地引洛水和堵堰黄河水进行灌溉，用以种稻，达二千多顷地，分为十几处屯田所，所获利益数以万计。皇帝特授予他金紫光禄大夫，不久改任将作大匠。

第二年，左拾遗刘彤上书建议：“建议设置盐铁官，收取盐铁利润以供国家开支，可免贫人负担重赋，使贫困的人获得一些救济”。此疏上奏后，皇帝让宰相讨论是否合适，大家都认为盐铁的收入，对国家非常有用。于是令师度和户部侍郎强循同管御史中丞，与各道按察使计划商定，以收取国内的盐铁之利。以后有很多不好的议论，使这件事最后未能实行。

师度在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余岁。师度爱好开挖沟洫，他所任职之处必定要发动群众修凿沟洫。虽然时常有不得获利的工程，但成功的很多。过去，太史令傅孝忠善于观察占卜星象，因此，当时人称他们说：“傅孝忠两眼观天，姜师度一心穿地”，作为俗语而流传。

（赵荣译）

【原文】

姜师度，魏人也。明经举。神龙初，累迁易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为河北道监察兼支度营田使。师度勤于为政，又

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始于蓟门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奚、契丹之寇。又约魏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以避海艰，粮运者至今利焉。寻加银青光禄大夫，累迁大理卿。景云二年，转司农卿。

开元初，迁陕州刺史。州西太原仓控两京水陆二运，常自仓车载米至河际，然后登舟。师度遂凿地道，自上注之，便至水次，所省万计。六年，以蒲州为河中府，拜师度为河中尹，令其缮缉府寺。先是，安邑盐池渐涸，师度发卒开拓，疏决水道，置为盐屯，公私大收其利。再迁同州刺史，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余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特加金紫光禄大夫，寻迁将作大匠。

明年，左拾遗刘彤上言：“请置盐铁之官，收利以供国用，则免重赋贫人，使穷困者获济。”疏奏，令宰相议其可否，咸以为盐铁之利，甚裨国用。遂令师度与户部侍郎强循并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计会，以收海内盐铁。其后颇多沮议者，事竟不行。

师度以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余。师度既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虽时有不利，而成功亦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纬，时人为之语曰：“傅孝忠两眼看来，姜师度一心穿地。”传之以为口实。

崔善为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崔善为，生卒年不详。贝州武城人（今河北南宫县）。在隋朝任楼烦郡司户书佐时为唐高祖李渊属下，建议并参与李渊起义，任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官至尚书左丞。贞观初，任陕州刺史，后任大理、司农二卿，秦州刺史。崔善为精通天文历法。武德初年始用傅仁均《戊寅元历》，一时议论纷纷。当时任大理卿的崔善为奉命考校，改动其中数十条。贞观（公元627—649年）初年李淳风指出该历错误十八条，崔善为又奉命考校，多有评论。

崔善为，贝州武城人。祖父崔颢是北魏的员外散骑侍郎。父亲崔权会，任北齐的丞相府参军事。崔善为好学，善长天文历法计算，又通晓政治经济。二十来岁时由州里举荐，任文林郎。隋文帝营造仁寿宫时，崔善为带领工匠五百人。右仆射杨素是工程总监，巡视到崔善为的住地，要来花名册点名。崔善为手拿名册背诵人名，五百人竟没有一个差错，杨素大为吃惊。从此各地有疑难案件，常派崔善为去审理，都能巧妙地解决。

隋文帝仁寿年间，崔善为任楼烦郡司户书佐。唐高祖李渊当时任太守，对他十分礼遇。崔善为看到隋朝腐败，私下劝李渊取而代之，很受赞许。李渊起事后，崔善为任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爵位。唐高祖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历任内史舍人、尚书左丞，名声很好。下级官吏厌恶他严厉廉明，因为他背驼身矮，就编了顺口溜嘲骂他：“崔先生弯得象只钩，熬年头得到封侯，肩膀上没有脖颈，胸前多长一个头。”高祖李渊听到后安慰说：“浅薄的小人，仇恨正直。从前北齐末年奸吏编歌骂斛律明月，而高纬昏庸，杀了他一家。我虽然不算高明，但也绝不会干这样的事。”于是悬赏追查惩处编造流言的人。当时傅仁均发表了《戊寅元历》，一时间议论纷纷，有褒有贬。李淳风也指出其中十八条错误缺点。奉高祖命令，崔善为考校了傅、李二家的优缺点，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唐太宗贞观初年，崔善为任陕州刺史。当时朝廷议论，让人口稠密地区的人民迁移到人口稀少地区。崔善为上表说：“京城附近人口稠密，青壮年男子都编入军府。若让他们随意迁移，流出关外，则京城附近空虚，实在不是好办法。”于是移民的事情没有进行。崔善为后来历任大理寺卿、司农卿，工作称职。但由于与少卿关系不好，离京任秦州刺史，死在任上。追赠刑部尚书。

（刘次沅 译）

【原文】

崔善为，贝州武城人也。祖瘞，后魏员外散骑侍郎。父权会，齐丞相府参军事。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明达时

务，弱冠州举，授文林郎。属隋文帝营仁寿宫，善为领丁匠五百人。右仆射杨素为总监，巡至善为之所，索簿点人，善为手持簿暗唱之，五百人一无差失，素大惊。自是有四方疑狱，多使善为推按，无不妙尽其理。

仁寿中，稍迁楼烦郡司户书佐。高祖时为太守，甚礼遇之。善为以隋政倾颓，乃密劝进，高祖深纳之。义旗建，引为大将军府司户参军，封清河县公。武德中，历内史舍人、尚书左丞，甚得誉。诸曹令史恶其聪察，因其身短而伛，嘲之曰：“崔子曲如勾，随例得封侯。膊上全无项，胸前别有头。”高祖闻之，劳勉之曰：“浇薄之人，丑正恶直。昔齐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纬愚暗，遂灭其实。朕虽不德，幸免斯事。”因购流言者，使加其罪。时傅仁均所撰《戊寅元历》，议者纷然，多有同异，李淳风又驳其短十有八条。高祖令善为考校二家得失，多有驳正。

贞观初，拜陕州刺史。时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善为上表称“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其事乃止。后历大理、司农二卿，名为称职。坐与少卿不协，出为秦州刺史，卒，赠刑部尚书。

甄 权 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甄权（公元 541—643 年），隋唐年间医学家，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他因母亲体弱多病，与弟立言潜心医学，精究方书，行医济世，活人甚众，于针术、脉理造诣颇深。隋开皇初（公元 581 年）任秘书省正字，后因病辞职。隋武将库狄谿因患风痺，手不能拉弓，经多方诊治无效，甄权针其肩隅穴，一针而愈。深州刺史成君绰患颈肿，喉闭不下水米已三日，他以三棱针刺其手指端，微放血，应手气息即通；次日饮食如故。

甄权医术朝野闻名，他不仅针术娴熟，还精通颐养摄生之术，深知吐故纳新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清素，可使胃气调和增长精气。贞观中奉敕修《明堂》、校定《图经》。贞观十七年（公元 634 年）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访询药性及养生之道。他将所著《药性论》上报，太宗授其朝散大夫，并赐寿杖衣物。当年寿至一百零三岁而终。他一生著述很多，绘有《明堂人形图》，撰有《针经钞》、《脉经》、《针方》、《脉诀赋》、《药性论》等，惜均已亡佚。其中部分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

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尤其是甄氏的《明堂人形图》在当时流传广泛，唐代名医孙思邈即根据其所绘图形重新绘制修订为“人体经络俞穴彩图”（已佚）。甄权在古代针灸专家中可称为巨擘，对针灸学术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甄权，许州扶沟人。曾因母亲患病，与其弟立言精究医方，深得医学真谛。隋开皇初年，任秘书省正字，后称病辞官。隋鲁州刺史库狄𪖈苦于患风痹，手不能拉弓，诸医不能治愈，甄权说：“若将弓箭瞄准箭靶，一针可以使其射。”针刺其肩隅一穴，当时即能射箭。甄权治病，大多与此相同。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甄权已一百零三岁，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探视其饮食起居，访询用药之道，并授予甄权朝散大夫之职，赐寿杖衣物。是年逝世。著述有《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任旭译）

【原文】

甄权，许州扶沟人也。尝以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隋开皇初，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疾免。隋鲁州刺史库狄𪖈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谓曰：“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即射。权之疗疾，多此类也。贞观十七年，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

甄立言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甄立言（公元 545—？ 年），隋唐间医学家，与兄甄权同以医术名于一时。立言精通本草，诊治寄生虫病尤有神效。当时有一名叫明律的尼姑，六十余岁，心腹鼓胀，身体羸瘦二年多。立言为其诊脉，指出是误食而致的寄生虫病。他令患者服药一剂后，很快吐出一虫，病即全愈。唐武德年间他曾任太常丞，主管礼仪和选试博士。贞观中奉诏修订《明堂》，并与甄权、承务郎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等校定《图经》，不久去世。生前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本草集录》二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这些著作均已散佚，但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其佚文。其中《古今录验方》在诊治疾病和鉴别诊断方面有独特贡献。书中所载：“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关糖尿病的最早记录。

甄权之弟甄立言，唐武德（公元 618—626 年）年间接连升迁至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唐太宗令立言为其诊治，诊毕上奏道：“从今日起过十一日，午时必死。”果

然如其预言。当时有一尼姑名叫明律，六十余岁，患病心腹鼓胀，身体消瘦，已经二年。立言诊其脉说：“其腹中有寄生虫，是误食头发而致。”因此令患者服雄黄，不一会吐出一条蛔虫，如人小手指粗细，唯独无眼，以火烧之，尚有发味，病乃全愈。立言不久逝世。生前撰有《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任 旭 译)

【原文】

弟立言，武德中累迁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太宗令立言视之，即而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时有尼明律，年六十余，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脉曰：“其腹内有虫，当是误食发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无眼，烧之，犹有发气，其疾乃愈。立言寻卒。撰《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

宋 侠 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宋侠（约公元六、七世纪），隋唐间医学家。洛州清漳（今河北省肥乡县东）人。北齐东平王孝正之子，医术精湛，闻名于时。曾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撰有《经心录》十卷，惜已亡佚，部分内容被收入《外台秘要方》和《医心方》等书。

宋侠，乃洛州清漳人氏，北齐东平王文学孝正之子。曾以医术闻名于世，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撰有《经心录》十卷，流行世间。

（任 旭 译）

【原文】

宋侠者，洛州清漳人，北齐东平王文学孝正之子也。亦以医术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药藏监。撰《经心录》十卷，行于代。

许胤宗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许胤宗（公元 536—626 年），隋唐间著名医学家。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曾为南朝陈国新蔡王外兵参军、义兴太守。陈国灭亡后入仕隋，任尚药奉御。唐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授散骑侍郎。

胤宗以医术著名，精于脉诊，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法。公元六世纪中，陈国柳太后中风口噤不能服药。他曾用药物薰蒸法治疗，使药气入病人腠理而取效。胤宗因此被授以义兴太守。他临症不仅用药灵活，而且疗效显著，尤善于治疗骨蒸病。武德年间关中（今陕西中部）一带结核病流行，患者大批死亡，诸医束手无策。然经许氏诊治者，多获全愈。他治病用药强调切脉诊断的重要性，曾批评“不能识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的医生，主张治病要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他一生医术精湛，诊脉用药，独具特色，可惜生前未曾著述。

许胤宗是常州义兴人氏。早年效力于南朝陈国。新蔡王叔齐为政时，任外兵参军。当时柳太后患病中风不能讲话，许

多名医为她治疗皆无效，太后脉象更加沉而口噤不能开。胤宗道：“口不能服药，宜用药汤蒸气薰治，可以使药物之力自皮肤肌肉和脏腑的纹理而入。皮肉腑脏通达，病可以全愈。”于是制备黄芪防风汤几十斛，放置于太后床下，药汤蒸气如烟雾升腾。当天晚上太后就能开口说话了。胤宗因治疗有效被越级授以义兴太守的职务。陈国灭亡以后，胤宗入仕隋朝，任尚药奉御。至唐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升任散骑侍郎。当时陕西关中一带肺结核病流行，得之必死，互相传染，众医生束手无策，没人能治这种病。而胤宗每次治疗，必全愈。有人对胤宗说：“您的医术如此神效，为什么不著书立说传给后人呢。”胤宗答道：“医学，道理深奥，在于人的思考和理解。脉象变化微妙，脉理意义深邃，最难于区别，虽然心中有所体会，但很难用语言来说清楚。而且古代治疗疾病的著名医家，最重视诊脉。精确分别脉象，然后认识疾病。药对于病来说，有正对症的，只须单用一味药，直攻病之所在，药力纯正强大，病可以很快全愈。现在许多医家不能辨脉，不知得病原因，仅凭主观猜测，处方药味繁多，就象围猎，不知兔子在哪儿，多发人马，旷野围剿，希望有人偶然相逢。象这样治病，不也太粗疏了吗！假如有一味药偶然对症，然而与其它药物相混和，君药、臣药互相制约，药的力度就受影响，难以治愈疾病，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脉理的深刻道理，既然不能用语言讲清楚，虚设一些经验医方，难道不是徒劳无功吗。我已考虑很久，所以不能著述。”许胤宗寿至九十余岁逝世。

（任 旭 译）

【原文】

许胤宗，常州义兴人也。初事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时柳太后病风不言，名医治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胤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薰之。令药入腠理，周理即差。”乃造黄耆防风汤数十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由是超拜义兴太守。陈亡入隋，历尚药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骑侍郎。时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传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胤宗曰：“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于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耳”。年九十余卒。

孙思邈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孙思邈（公元 581—682 年），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世称孙真人，后人尊之为药王，是唐代杰出的医学家。

孙氏自幼聪颖洞达，敏慧强记，七岁能够日诵千言，人称圣童。他博学多闻，涉猎群书，二十岁就精通经史百家之说，善谈庄老，兼好佛学。他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成年之后，隐居在太白山，专事医学活动。唐太宗、高宗均曾征召，他皆推辞不受。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他以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著成《千金要方》三十卷。永淳元年（公元 682 年）他集晚年三十年经验，撰成《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补《要方》之遗，同年逝世。

孙思邈医术精湛、知识渊博，治病不拘泥于古人的方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的限制，广收民间单方、验方。他不仅精通内科，而且擅长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养性，食疗、炼丹、卫生等均有深入研究，同时还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这使他成为唐代医学大师，而且一变羸弱之体而至百岁，且视听不衰，

神采丰茂。

孙思邈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的医学经验，集中反映在他的医学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两部《千金》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丰富医学经验；不仅收载了唐以前的古方；而且记录了民间单方；总结了药学知识；发展了伤寒学说；在诊断学上把疾病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治疗学上丰富了医疗技术；并为儿科、妇产科成为专科创造了条件；发展了养生长寿学说；并在制药化学方面记录了硫磺伏火法。

孙思邈是京兆府华原人。七岁开始读书，一日能诵读千余字。二十岁左右，善谈庄子、老子及百家学说，同时喜欢佛学的经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到他感叹地说：“这是神童，只可惜他器量宏大，很难为一般人所任用。”周宣帝时，由于王室纷争，更迭频繁，思邈隐居于太白山中。隋文帝杨坚辅佐北周时，征聘思邈为国子博士，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就任。思邈曾对亲属讲：“过五十年后，会有圣人出现，我将助之以济人。”至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思邈到京城长安，见他容颜面貌十分年轻，太宗感慨地说：“由此可知有德性的人果真可以尊重，姜尚、广成子，怎会是传说之言呢？”太宗要授予他官位，他恳切推辞，不肯接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召见他，任命他为谏议大夫，又坚持不肯接受。

上元元年（公元675年）思邈称病请求回归故乡。高宗特赐良马和鄱阳公主故居令其居住。当时名人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人都以师礼问学于他。他曾随皇帝避暑于九成宫，卢

照邻留住他家。当时宅院庭前有一棵病梨树，照邻以病梨树为题作赋。赋的序中言：“癸酉年，我因病住在长安城光德坊的官舍。老年人都说：‘这是鄱阳公主的故居。过去公主尚未出嫁即去世，所以其府邑被废弃’。现在有孙思邈处士住居。思邈学问广博，通古博今，学尽星相医卜、调生养性之术，善谈道家正一学术，如古代道家庄子，精通佛学之理，恰如今之大居士维摩诘。他推算演绎天文、地理、历数等学问，有如洛下閎、安期先生一样。”照邻患有难以治愈的疾病，于是问思邈：“名医能够治愈疾病，是什么道理呢？”思邈回答：“我听说善于讲解天地四时变化的人，必须参照人体的理论，善于谈论人身生理病理的，也须依据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地有春夏秋冬四时和木火土金水五行变化，寒暑交替，循环运行。天地之气调和则降而为雨，怒则鼓荡为风，凝结则为霜雪，弥漫散布则为彩虹，这是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人体有四肢五脏，觉醒和睡眠，呼吸吐故纳新，水谷精华往来，循环流动而成为营卫之气，显露于外为神采和气色，发扬而为声音，这是人体的一般规律。阳气有形可察，阴气为精所化，自然界和人体的规律是相同的。如果阴阳失调，阳气蒸腾则生热症，阴气凝滞则生寒症，精气郁结则生癭瘤赘肉，下陷则生痈疽，气逆妄行则见短气喘息，气血衰竭则憔悴枯槁。症候表现于面部，变化显露于形体，推而广之，用这个规律解释自然界也是相同的。因此木火土金水五星盈亏，日月星辰错行，日蚀月蚀，慧星流逝，都是自然界的危险征象。寒暑不能适应季节，是天地万物变化反常；石立土踊，是大自然的赘瘤；山崩地陷，是大自然的痈疽；狂风暴雨，是大自然

的短气喘息；河川干涸断流，是大自然的憔悴枯槁。当人们患病时，高明的医师用药物、砭石、针刺予以疏导和治疗。当自然界出现反常时，圣人以高尚的道德调和之，并辅以人事。因此形体有病可以治愈，天地有灾可以消除。”又说：“治病用药要胆大，看症辨病要心细谨慎，知识要丰富，行为要端正。就如《诗经》所说：‘如同面临深渊，如同脚履薄冰’比喻小心；用‘英勇无畏，出生入死保卫城池的勇士’比喻大胆；‘不因利欲而违礼，不因不见义勇为而内疚’，说的是行为端正；‘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发现了事物的端倪，应立即起来行动，不得待终其日’，说的是知识经验皆丰富。”

思邈自称生于隋文帝开皇辛酉年（公元601年），今年已九十三岁了。询问乡邻故里，都说他是数百岁的人了。他谈论起周、齐朝的事情，栩栩如生，就象亲眼所见，据此考虑他已不止百岁了。然而他依然耳目聪明，神色面貌很精神，可以称他为古代聪明博学有识的长生不老之人。

唐代初期，魏徵等奉命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历史，恐怕有遗漏，曾多次拜访孙思邈。他口授介绍，有如亲眼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带领他的五个儿子佺、倬、俊、佑、佺去拜见思邈，思邈说：“俊将最先显贵；佑要到晚年发迹；佺的名气最大，但他会因掌握兵权而祸及自身。”此后果然象他所预言的一样。太子詹事卢齐卿小时候向他请教人伦的事，思邈说：“你五十年后将做官，我的孙子将为你的下属。你要自己保重。”后来齐卿成为徐州刺史，思邈的孙子孙溥果然是徐州萧县县丞。思邈开始评论齐卿的时候，孙溥还没有出生，却预先知道他的事。凡是他的种种特殊的事迹，多数与此相

类似。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思邈逝世。他留下遗言令薄葬,墓中不要放随葬的器物,祭祀不用牛、羊、猪等。思邈死后一个多月,仍容貌颜色不变,举尸入棺,就象没有份量一般,当时人们都感到很奇怪。他生前曾自注《老子》、《庄子》,编撰《千金方》三十卷流行于世。另撰有《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任旭译)

【原文】

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

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思邈曾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之赋,其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学殚数术。高谈正一,则古之蒙庄子;深入不二,则今之维摩诘耳。其推步甲乙,度

量乾坤，则洛下閤、安期先生之俦也。”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之于人；善言人者，亦本之于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蜺，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憔悴。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慧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憔悴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行之方也，‘见机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

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采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东台侍郎孙处约将其五子佺、微、俊、佑、佺以谒思邈，思邈曰：“俊当先贵；

佑当晚达；佺最名重，祸在执兵。”后皆如其言。太子詹事卢齐卿童幼时，请问人伦之事，思邈曰：“汝后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孙当为属吏，可自保也。”后齐卿为徐州刺史，思邈孙溥果为徐州萧县丞。思邈初谓齐卿之时，溥犹未生，而预知其事。凡诸异迹，多此类也。

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面容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自注《老子》、《庄子》，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又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及《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张文仲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张文仲（公元 620—700 年），唐代著名医学家，为洛州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为侍御医，后升至尚药奉御。他与李虔纵、韦慈藏医术齐名，尤善疗风症。他曾奉诏汇集当时名医共同编撰治风医书，由麟台监王方庆监修，撰成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一十八首，上奏朝廷。另撰有《随身备急方》三卷、《法象论》一卷，均已佚，《外台秘要方》中可见其部分内容。

张文仲，是洛州洛阳人。年青时与同乡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同以医术闻名于时。武则天初年，张文仲任侍御医。当时特进苏良嗣在殿庭跪拜时晕倒，武则天令张文仲、韦慈藏随至住所为其诊治。文仲说：“这是因为忧郁愤怒，邪气激越，如果两胁疼痛，则病重难治。”从早晨始侍候，不到吃一顿饭的时间，即两胁疼痛。文仲又说：“若痛至心，即不能救治了。”不一会儿，心中绞痛，即不再下药。傍晚苏良嗣去世。文仲特别善于治疗风疾。此后武则天令文仲汇集当时名医，共同编撰治疗风气的医方，并令麟台监王方庆监修。文仲奏道：

“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一般医药虽同，人的性情各有差异。庸医不懂药的性味功用，冬夏失其节气，因此害人。只有脚气、头风、上气三种病症，须要经常不断服药，其它则可以在发病时临时治疗。但有风气症的患者，春末、夏初和晚秋，需要通泄，则病不加剧。”于是文仲编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共十八首，呈皇上。唐久视年（公元700年）文仲任尚药奉御时逝世。生前撰有《随身备急方》三卷，流行于世。

李虔纵，官至侍御医。韦慈藏景龙年中任光禄卿职。自武则天、唐中宗以后，医界均推张文仲等三人为首。

（任 旭 译）

【原文】

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嗣于殿庭因拜跪便绝倒，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忧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肋，则剧难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时，即苦冲肋绞痛。文仲曰：“若入心，即不可疗。”俄顷心痛，不复下药，日旰而卒。文仲尤善疗风疾。其后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于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视年终于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于代。

虔纵，官至侍御医。慈藏，景龙中光禄卿。自则天、中宗已后，诸医咸推文仲等三人为首。

孟 诜 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孟诜（公元 621—713 年），唐代著名医学家，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他自幼喜欢医学，通晓医药养生，曾从师于名医孙思邈。他曾应举参加进士科考试，唐垂拱初年（公元 685 年）升任凤麟阁舍人，后因得罪武则天，被贬为台州司马，又转升春官侍郎，后被相王李旦召为侍读，长安年间任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故又被称为孟同州。

孟诜居官敛洁，于政事之暇，好集医方，致力于饮食养生。神龙初年（公元 705 年）孟氏八十余岁时退居伊阳山养老。虽年事高暮，但由于他通晓养生之道，长于饮食疗法，精力体力十分充沛。景云元年（公元 710 年）唐睿宗召其至京师，孟诜以年事已高固辞。孟诜知医精药，主张养性者善言不离口，良药不离手。生前著有《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原书均已亡佚，现存仅有《食疗本草》辑佚本。该书内容丰富，记载了不少唐代初期本草书中未载的食用药物，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饮食疗法专著。此外孟氏还撰有《家礼》、《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

孟诜是汝州梁县人。应举考中了进士。垂拱初年进升为凤阁舍人。孟诜青年时代爱好医药方术，曾在凤阁侍郎刘祎之家，见到皇家赐给刘祎之的黄金，他对祎之说：“这是药金，如果用火烧金，必有五种颜色的烟气”。依法试验，果然如此。武则天听说此事后心中不悦，因借事端将孟诜贬出京城至台州任司马。后升任春官侍郎。唐睿宗李旦为相王时，召孟诜做侍读，讲经读史。长安年间他任同州刺史，加官为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公元705—707年）初年退休，回归伊阳山故居，专心致力于研究药物的调养补益。孟诜虽然年事很高，但雄心和体力与壮年时一样。他曾对亲友说：“保养身体、修养性情的人，经常要善言不离口，良药不离手。”睿宗李旦即位后，召他去京城长安，准备加以重用。孟诜以年老体衰为由，坚持没有接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睿宗诏令赐给他衣物百段，又令有关部门于每年春秋二季为孟诜特别提供羊酒和糜粥。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河南尹毕构认为孟诜有古代圣人的风度，下令将孟诜的住处改名为子平里。不久孟诜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孟诜为官，喜欢深入考察，清正廉明，公务虽然繁杂而治理得井然有序。撰有《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任旭译）

【原文】

孟诜，汝州梁人也。举进士。垂拱初，累迁凤阁舍人。诜少好方术，尝于凤阁侍郎刘祎之家，见其敕赐金，谓祎之曰：“此药金也。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则天闻而不悦，因事出为台州司马。后累迁春官侍郎。睿宗在藩，召

充侍读。长安中，为同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致仕，归伊阳之山第，以药饵为事。诜年虽晚暮，志力如壮，尝谓所亲曰：“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睿宗即位，召赴京师，将加任用，固辞衰老。景云二年，优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所居为子平里。寻卒，年九十三。

诜所居官，好勾剥为政，虽繁而理。撰《家》、《祭礼》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

玄奘 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玄奘（公元 602—664 年），唐代高僧。通称他“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本姓陈，名祿，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他和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经典三大翻译家，唯识宗的创始人之一。十三岁就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曾游历国内各处寺院讲学、问难，颇有心得。与此同时，接触到佛教各派理论，又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怀疑原有译经有讹谬。于是下决心要亲自到印度去求法。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也有贞观二年和三年说的），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高昌之后又经过今乌兹别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国境而进入印度。贞观四年，到达了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玄奘在印度各地游历，遍访五印度，并到过尼泊尔南部。贞观十五年，他携带所取得的佛经六五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正月回到长安。

玄奘不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佛教学者，还是著名的旅行家。他到印度去取经，历时十九年，行程五万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回长安后，他把旅行中的所见

所闻，进行口授，由弟子辩机笔录，写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本书采取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的体例，把所经过的许多城邦和国家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民俗民风都作了简要记述。书中对地理情况的描述非常生动，如谈到凌山说：“山谷积雪，春夏合冻，虽时消拌，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对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素叶水城的描述是：“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陶，林树稀疏。气序风寒，人衣毡褐。”关于葱岭（帕米尔）则写道：“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地多出葱，故谓葱岭。”《大唐西域记》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等地古代历史地理和从事考古的重要资料。因此，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玄奘和尚，原姓陈，洛州偃师人。隋炀帝大业末年出家。他广阅博览，接触了各派佛教经典和理论著作。曾说翻译的佛经有许多错误，所以许下愿心要去西域，广求不同的经本，以为参考验证。唐贞观初年，他随一批商人去西域游历。玄奘深通佛学，擅长辩讲，所到的地方都被邀请去宣讲佛经，或参加佛学辩证会。远近的外域人都很尊敬钦佩他。玄奘在西域十七年，游历了一百多个国家，并通晓当地的语言。因而收集这些国家的山脉、河流、民间传说、民风习俗和土地所出特产等资料，写成《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回到京师长安。唐太宗对玄奘完成取经任务归来，非常高兴，亲自接见，并和他讨论了西行情况与收获。随后下

诏让玄奘留住在弘福寺内，把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经翻译出来。又命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选调了五十多个博学的僧人协助做整理比较工作。

唐高宗在东宫做太子时，给文德太后诵经礼忏和祈祷祝福，修建了慈恩寺和译经院。并出动了皇家旗幡仪仗，命九部乐班和京师各寺庙的旗幡仪仗，簇拥着女乐，迎送玄奘和所翻译的佛经佛像和其他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命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同给玄奘定稿的佛经润色加工。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协助增译工作。总计完成七十五部，上送给朝廷。后来，因京师的居民纷纷争着前来礼敬求晋见，玄奘于是奏请希望找寻一幽静地方继续佛经翻译工作。高宗批准迁移到宜君山旧有玉华宫。显庆六年（公元664年），玄奘去世，年五十六岁。归葬在白鹿原，送葬的善男信女有几万人。（范楚玉 译）

【原文】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

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居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

一行传

——《旧唐书》卷一九一

【说明】一行（公元 673—727 年），俗姓张名遂。唐代高僧，杰出的历算大师。

他编制的《大衍历》（公元 727 年制成，729—757 年行用）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几部历法之一。为了使这部历法所取常数更加精确，他与梁令瓚同制黄道游仪，并重新测定了一百五十余颗恒星的位置。一行还发起组织在全国十二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并根据南宫说所率小组的测量结果，归算出相当于子午线纬度的长度值。

南北朝时期，中国天文学取得了两项极其重要的发现：日月岁差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将这两项成果引入历法计算，使隋代前后的数理天文学产生了实质性的飞跃。但是，由于一直缺乏系统慎密的论证，人们对岁差现象的存在始终将信将疑，一行在《大衍历议》中翔实而严谨的论述，彻底冰释了人们的疑虑，使之成为后世历家必然考虑的一个历算项目；而对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描述，自张胃玄与刘焯以来因观测未臻精密，在日行速的递变上于春（秋）分前一日太阳运行最快（慢），后一日则变得最慢（快），致使在两分点产

生了巨大间跃。一行明确指出了这种太阳运动模式的不合理性，并从理论上予以重构，使之与实际更加吻合，成为此后历家普遍认同的楷模。

在算法理论上，一行利用刘焯等间距分段二次插值法的原理，率先使用了不等间距二次内插法。

僧一行，原姓张名遂，魏州昌乐县人。襄州都督、郾国公张公谨之孙。一行父亲张檀，任武功令。

一行自幼聪明敏捷，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历术星象、阴阳五行等方面的学问。当时有个名叫尹崇的道士，学识广博，藏有许多古书。一行拜访尹崇时，从那里借来杨雄的《太玄经》，拿回家研读。几天后，一行再访尹崇，将《太玄经》奉还。尹崇道：“这部书意蕴深奥，我读了多年，仍不能理解透彻，你应该尝试着钻研一番，为何匆匆归还此书呢？”一行说：“我已经弄懂了这部著作的意思。”

于是，一行拿出他读《太玄经》后撰写的《大衍玄图》及《义决》请尹崇过目，尹崇惊讶不已，遂与一行讨论《太玄经》的奥妙所在，对一行的敏悟力深为叹服。尹崇对别人说：“这个后生真乃颜渊（公元前521～前490年）再世也。”一行由此名声鹊起。

武则天之侄武三思（公元？—707年）因仰慕一行的才学与品行，意欲与之结为朋友，一行闻风逃避，躲藏了起来。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隐居嵩山，从师普寂禅师。

唐睿宗李旦（公元662—716年）即位后（公元710年），令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节征召一行出山，一行以体弱有病为

由坚辞不从。后来一行步行至荆州当阳山，在悟真和尚门下修习梵文律历。

唐开元五年（公元 717 年），玄宗李隆基（公元 685—762 年）令他的族叔礼部郎中李洽持诏书到荆州强行请一行出山。一行抵达京城后，被安置在光太殿。唐玄宗数次亲访，向一行讨教安国抚民的道理与方法，一行出言皆真切直率，毫无隐讳。开元十年（公元 722 年），永穆公主出降，玄宗令有司备优厚礼品发送，其规格要与太平公主当年享受的待遇相同。一行认为，唐高宗李治晚年，仅有太平公主（公元？—713 年，武则天生）这么一个女儿，因此，特封厚礼，加之太平公主本人骄横跋扈，得罪了许多人，此事不应效仿。玄宗采纳了一行的意见，马上下令，按常规发送，不再大操大办。一行对皇上的规劝之言，皆如上述一类。

一行特别长于著述，曾撰有《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及《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

当时《麟德历经》推算渐显不很准确，一行奉皇上令，参考以前各代历法，改编新历。同时皇上令率府长史梁令瓚等人及工匠共同创制黄道游仪，用以观测推考日月五星等七颗天体的视运动规律，以期让历法推算同实际观测互相印证。

于是，一行按《周易》大衍之数立意布算，编撰了《开元大衍历经》。

唐开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一行去世，享年 45 岁。受赐封号“大慧禅师”。

一行生前，曾从堂祖父东台舍人太素，共撰《后魏书》一

百卷，其中《天文志》太素未及完成，是一行接着而做完的。皇上为一行写碑文，并亲笔手书于碑石上。还从皇室金库中拨出五十万钱，用于建塔所塑铜像之资。第二年，皇上驾临温、汤两地，路过一行塔前，停马徘徊，令品官至塔前告知一行之灵皇上出巡河南的目的。又赐赠绢丝五十匹，用以移栽塔前的松柏。

一行生前曾云游四方，访求有才学之士，希望能彻悟大衍之术的奥妙，他行至天台山国清寺时，看见一院落，门前流水潺潺，古松环抱，便站立在屏风前，听到院内一大和尚正在庭堂摆布算筹，这个和尚对其门徒说：“今日应有一弟子远道而来访求我的算法，按筹算计算他应已到门前，为何不见有人引他进来呢？”当下又布一算，说道：“门前溪水将向西倒流，访学之弟子亦已来临。”一行应声探身走进院内，叩头施礼，请求教授其法，于是他将大和尚的高超算术尽数学到。再看门前溪水，果然改向西流。

道士邢和璞曾对尹愔说：“一行难道是圣人吗？汉代落下闳编制《太初历》时说：‘此历再过八百年将误差一日，届时必有圣人来订正之。’至今恰好八百年，而一行所制《大衍历》正好纠正其误差，可见落下闳所言不谬。一行不是圣人又是什么呢？”

（曲安京 译）

【原文】

僧一行，姓张氏，先名遂，魏州昌乐人，襄州都督、郾国公公谨之孙也。父擅，武功令。一行少聪敏，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先达，素多坟籍。

一行诣崇，借杨雄《太玄经》，将归读之。数日，复诣崇，还其书。崇曰：“此书意指稍深，吾寻之积年，尚不能晓，吾子试更研求，何遽见还也？”一行曰：“究其义矣。”因出所撰《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以示崇。崇大惊，因与一行谈其奥赜，甚嗟伏之，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一行由是大知名。

武三思慕其学行，就请与结交，一行逃匿以避之。寻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沙门普寂。睿宗即位，敕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一行固辞以疾，不应命。后步往荆州当阳山，依沙门悟真以习梵律。

开元五年，玄宗令其族叔礼部郎中洽移敕书就荆州强起之。一行至京，置于光太殿，数就之，访以安国抚人之道，言皆切直，无有所隐。开元十年，永穆公主出降，敕有司优厚发遣，依太平公主故事。一行以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其礼，又太平骄僭，竟以得罪，不应引以为例。上纳其言，遽追敕不行，但依常礼。其谏诤皆此类也。

一行尤明著述，撰《大衍论》三卷，《摄调伏藏》十卷，《天一太一经》及《太一局遁甲经》、《释氏系录》各一卷。

时《麟德历经》推步渐疏，敕一行考前代诸家历法，改撰新历，又令率府长史梁令瓚等与工人创造黄道游仪，以考七曜行度，互相证明。于是一行推《周易》大衍之数，立衍以应之，改撰《开元大衍历经》。至十五年卒，年四十五，赐谥曰大慧禅师。

初，一行从祖东台舍人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其《天文志》未成，一行续而成之。上为一行制碑文，亲书于石，

出内库钱五十万，为起塔于铜人之原。明年，幸温汤，过其塔前，又驻骑徘徊，令品官就塔以告其出豫之意，更赐绢五十匹，以蒔塔前松柏焉。

初，一行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门有流水，一行立于门屏间，闻院僧于庭布算声，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也？”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趋入，稽首请法，尽受其术焉，而门前水果却西流。

道士邢和璞尝谓尹愔曰：“一行其圣人乎？汉之落下闳造历，云：‘后八百岁当差一日，必有圣人正之。’今年期毕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谬，则落下闳之言信矣，非圣人而何？”

王 焘 传

——《新唐书》卷九八

【说明】王焘（公元 670—755 年），陕西郿县人，唐代医学家。他出身于世代官宦家庭，儿时常患疾病，成年后究心医学，多次从学于名医，精通医术。他母亲患病，王焘侍汤奉药，衣不解带。他为官历任徐州司马、给事中、邳郡太守，其才学闻名于时。

公元八世纪初，他在国家藏书馆——弘文馆任职长达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并将所参阅的医书逐条摘录，去粗芜，采精华，注明出处卷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天宝年间他出守大宁。王焘目睹偏僻之地缺医少药，疾病流行的惨状，他取所集经方，亲施方药，治病救人。鉴于历代方书篇目杂乱，遂立志编选一部集历代医论和医方的医学大全。

他治学严谨，勤奋刻苦，系统收集了盛唐以前的经验医方，计古方五、六十家，近著数千万卷，历时十年，于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 年）著成《外台秘要方》共四十卷，凡一千一百零四门。另著《外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方》的简本。其书先医论，后列方，讨论精明，治法大备，可惜原

书已亡佚。

王焘性情极其孝顺，任徐州司马。母亲患病，他常年侍奉，衣不解带，亲自询视调理羹汤药剂。他多次跟随著名医学大家游历习医，遂深得医学要旨。他根据所学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编撰著书，名为《外台秘要》。书中讨论阐述，条理分明，为世人所推崇。王焘生前历任给事中、邳郡太守。他为官清正廉明，闻名于时。 (任 旭 译)

【原文】

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计绎精明，世宝焉。历给事中、邳郡太守，治闻于时。

阎立德传

——《新唐书》卷一〇〇

【说明】阎立德（字，公元？—656年），名阎让，生年不详，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隋唐年间著名建筑艺术家、工艺绘画家。

阎立德出生于工艺世家，父亲阎毗，因擅长工艺，被选拔到隋朝宫廷任殿内少监。阎立德和其弟阎立本受家学影响，加上自己的刻苦钻研，也都以工艺技术和绘画闻名于世。

阎立德于唐初入仕，历任秦王府士曹参军、皇宫中尚衣奉御、将作少匠、将作大匠、殿中监、工部尚书等职。他在建筑上的主要贡献是在总结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营护唐高祖李渊的献陵，规划设计和营建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主持建造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建筑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受到了嘉奖；在制造航海大船和筑路搭桥方面立了军功；在制作皇帝、大臣们穿戴和使用的礼服、礼具方面也充分显示了高超的绘画和工艺技术才能，获得了良好效果，受到皇上和王公大臣们的欢欣。

阎让字立德，以字行世，京兆府万年（今陕西省西安

市)人。父亲阎毗,在隋代宫廷中任殿内少监,他原来是因为有工艺特长才进宫为官的,所以阎立德和弟弟阎立本也都很灵活巧妙,善于思考。唐武德(公元618—626年)初年,阎立德任秦王府士曹参军,随从秦王李世民平定东都洛阳。后升迁为尚衣奉御,他设计创制了皇帝和王公穿戴的六种礼服、腰舆、伞扇等都典雅有法度,符合礼仪要求。贞观(公元627—649年)初年,历任将作少匠、进爵大安县男。因保护治理唐高祖李渊的陵墓有功劳,授予将作大匠。文德皇后去世,他代理司空之职,在营建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昭陵时,因管理不善而免去职务。后来又被起用,任博州刺史。唐太宗巡幸洛阳时,下诏令阎立德选择比较清凉的干燥高地营造避暑离宫,他经过勘察,选择了汝州(今河南临汝县)的西山,其位置可以遥控汝水,斜眼可以看到广成泽,号称襄城宫,他调用了一百多万民工修建。宫殿建成后,烦杂闷热,不宜作避暑宫馆居住,唐太宗将其废弃,赐给当地百姓,阎立德也因此而免官。

不久,又恢复他将作大匠的官职,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负责制造航海大船五百艘,并随从太宗征伐辽东,代理殿中监职责,他规划建筑军用土山,因此而攻破安市城。军队胜利回师,当行至辽泽时,前面有二百里延续不断的沼泽烂泥地挡住去路,不能通行,阎立德率众筑路架桥,使军队顺利通过,而没有停留,太宗非常高兴,赏赐给他很多上好财物。他又主持建造翠微、玉华两座宫殿,提升为工部尚书。唐太宗逝世,他又代理司空之职,主持举行安葬典礼仪式及其营护山陵等事务,事毕后,以有功劳而进爵大安县公。永

徽五年（公元 654 年），唐高宗李治巡视万年宫，他被留守京师，率领门徒四万人治理修建京城。他去世以后，追封为吏部尚书、并州（今山西太原地区）都督，陪葬于昭陵，赠谥号为康。（赵慧芝 译）

【原文】

阎让字立德，以字行，京兆万年人。父毗，为隋殿内少监，本以工艺进，故立德与弟立本皆机巧有思。武德初，为秦王府士曹参军，从平东都。迁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腰舆、伞扇咸有典法。贞观初，历将作少匠、大安县男。护治献陵，拜大匠。文德皇后崩，摄司空，营昭陵，坐弛职免。起为博州刺史。太宗幸洛阳，诏立德按爽塏建离宫清暑，乃度地汝州西山，控汝水，睨广成泽，号襄城宫，役凡百余万。宫成，烦燥不可居，帝废之，以赐百姓，坐免官。

未几，复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遂从征辽，摄殿中监，规筑土山，破安市城。师还，至辽泽，互二百里，淖不可通，立德筑道为桥梁，无留行。帝悦，赐予良厚。又营翠微、玉华二宫，擢工部尚书。帝崩，复摄司空，典陵事，以劳进爵大安县公。永徽五年，高宗幸万年宫，留守京师，领徒四万治京城。卒，赠吏部尚书、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康。

陆 羽 传

——《新唐书》卷一九六

【说明】陆羽（公元733—804年），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又号东冈子、竟陵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唐代茶学家。一度曾为伶工。上元初（公元760年）隐居苕溪（今浙江湖州）。著有《茶经》三卷，总结唐以前种茶经验和自己的体会，包括茶的起源、种类、特性、制法、烹煎、茶具，水的品第，饮茶风俗，名茶产地以及有关茶叶的典故和药用价值等，是世界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

《茶经》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有关茶事活动的历史，还从植物和古农学的角度，记录了茶树的植物形态、命名、生态环境、种植方法，以及自古以来各种加工制作和饮用方法等，表明我国是茶叶的故乡。（二）《茶经》对饮茶功效的探讨，提出饮茶有解热渴，驱凝闷，缓脑疼，明眼目，息烦劳，舒关节，荡昏寐等功效，同时还提出，饮茶能“醒酒”，“令人不眠”，长期饮茶能“有力悦志”，“增益思考”，“轻身换骨”；茶叶还被列入医药处方，主治“痿疮”，“小儿惊厥”等症。为茶叶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基础。（三）《茶经》总结，推广了迄唐代中期我

国先进的造茶工艺。把造茶法归结为采，蒸，捣，拍，焙，穿，封七道工序，并提出了制茶质量的鉴别方法。使得造茶有个完整的概念和统一的规范，便于推广。（四）《茶经》记载了一整套茶的煮饮法。总结出了被后人概括称为的“煎茶法”的煮饮法，是饮茶史上的一次飞跃，这种茶法至今仍然保留在闽越一带的功夫和日本的茶道之中。（五）《茶经》的问世还促进了中国与周边民族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的交往。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湖北天门）人。不知是谁生的，有人说，是个和尚从水边捡来的，并收养了他。长大后，他用《周易》给自己算了一卦，得到的是《蹇》卦中的《渐》卦，卦说：“大雁飞翔到陆地上，它的羽毛可以用来做装饰。”便以陆为自己的姓氏，来取名字。

小时候，他的老师教给他左右书写横排的文字。他回答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兄弟，也没有子孙后代，可以尽到自己的孝心吗？”老师听后气愤，罚他去搬运垃圾，清除脏污，又让他去放三十头牛。陆羽偷偷地用竹枝在牛背上写字。得到一篇张衡写的《南都赋》，他又不认识其中的字，便正襟危坐，装模作样，仿效那群小孩，口中念念有词，好象能背诵出来的样子。给老师抓住了，命令他去割草。当他背诵文章的时候，总是糊里糊涂，好象有遗漏似的，过一天不能背出来，主人使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他，他自己感叹地说：“时光都白白地过去了，为什么还读不好书呢！痛哭得不得了，便逃跑了，躲藏起来，成为卖艺的人，并作了几千字的幽默诙谐的小品。

天宝（公元742—756年）年间，复州有人饮酒聚会，官

吏任陆羽为歌舞表演队的导演,太守李齐物对他感到很惊奇,授以他一些书,于是他便在火门山建起了简易的房子。他长相难看,说话结结巴巴,又喜欢跟人辩论。听到人家有什么好事,就好象自己有了什么好事似的。见到人家有什么过错,就去规劝人家,甚至于为此人家跟他有抵触情绪。朋友们一道聚会,只要有不合他意的地方,他就气走了。人家都觉得他是个容易生气的人。和人家有约,不管是遇上了下雨落雪,虎狼挡道,他都要去。

上元(公元760—761年)初年,他又隐居到了苕溪(今浙江湖州),自称“桑苎翁”,关门写书。有时一个人在荒野中漫步,一边读着诗,一边还敲击木头。走来走去,心情不好,或者是大哭一场之后回家。所以当时的人们都把他称之为“今日的楚狂人接舆”。过了很久以后,皇帝下诏任命陆羽为太子文学,升为太常寺太祝,没有到任就职。贞元(公元785—805年)末年,逝世。

陆羽喜欢饮茶,著有《茶经》三篇,讲述茶的起源,茶叶生产方法和茶具,特别详备,从此之后,天下就更加知道饮茶了。当时卖茶的人,甚至有的把陆羽像制成陶器模形,放置在烧火的烟囱之间,将陆羽祭礼为茶神。有个名叫常伯熊的人,根据陆羽的论述,进一步去宣传茶的功效。御史大夫李季卿到江南来视察,停留在临淮,知道伯熊擅长于煮茶,便他叫来了,伯熊拿着茶具将茶呈献在御史大夫面前,李季卿为此两次举起了茶杯。到了江南,又有人向他推荐陆羽,他又把陆羽叫来了,陆羽穿着一身随随便便的衣服,拿着茶具走了进来,李季卿对他没有礼节的表示,陆羽为此感到羞愧。

又重新写作了《毁茶论》。在他以后，尚茶成为一种风气，当时回纥（今维吾尔族）人进京朝拜，开始赶着马来交换茶叶。

（曾雄生 译）

【原文】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乃以陆为氏，名而字之。

幼时，其师教以旁行书，答曰：“终鲜兄弟，而绝后嗣，得为孝乎？”师怒，使执粪除污塿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潜以竹画牛背为字。得张衡《南都赋》，不能读，危坐效群儿嘒嘒若成诵状，师拘之，令薤草莽。当其记文字，懵懵若有遗，过日不作，主者鞭苦，因叹曰：“岁月往矣，奈何不知书！”呜咽不自胜，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

天宝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师，太守李齐物见，异之，授以书，遂庐火门山。貌倜傥，口吃而辩。闻人善，若在自己，见有过者，规切至忤人。朋友燕处，意有所行辄去，人疑其多嗔。与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阖门著书。或独行野中，诵诗击木，裴回不得意，或恸哭而归，故时谓今接舆也。久之，诏拜羽太子文学，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职。贞元末，卒。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炆突间，祀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论复广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临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执器前，季卿为再举杯。

至江南，又有荐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陆龟蒙传

——《新唐书》卷一九六

【说明】陆龟蒙，字鲁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生年不详，约唐中和元年（公元 881 年）卒。晚唐著名的诗人、小品文作家和农学家。出身官宦之家，早年曾热衷于功名，后隐居故乡松江甫里，过起了躬耕南亩，垂钓江湖的生活。写下了许多反映农事活动和农民生活的诗、赋、杂著。其中《耒耜经》一文，对当时江南水田耕作农具江东犁的各部结构与功能做了详细的描写，还提到了其它四种配套农具，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具专著，也是第一篇谈论江南水田农业生产的专文。他还作有《渔具十五首并序》及《和添渔具五篇》、《和茶具十咏》对渔具和茶具，以及捕鱼方法作了较全面的叙述。他所作的诗文中，还涉及到植物保护、动物饲养等多方面的内容。

陆龟蒙，字鲁望，是陆元方的七世孙。父亲陆宾虞，以长于文学做过御史。龟蒙少年时候，高傲豪放，通晓《六经》的大义，尤其精通《春秋》。在参加过一次进士考试落第后，便跟随湖州刺史张抃游历。后张抃在湖州和苏州两地做

官，便让他做了自己的幕僚，他曾经到达饶州，整整三日，没有人接见他。刺史蔡京带着自己的一班官吏来见他，陆龟蒙很不高兴，甩甩衣袖就走了。

居住在松江甫里，写了许多论著，尽管深愁满怀，疾病缠身，甚至连十天的生计也没有着落，他还是没有停止写作。文章写成之后，便将稿子塞进箱子，甚至几年也不去理它，被喜欢多事的人盗去。得到一本书便读得滚瓜烂熟然后再抄录下来，仔细加以核对，朱笔黄笔从不离开手，他的藏书虽然不多，但少而精，都可以流传。借别人的书，发现书中篇章次序有损坏，或是有错乱，他都一定会为人家删补改正。喜欢听取别人意见，阐述观点从不疲倦。

陆龟蒙有田几百亩，房屋三十多间。田因为地势低下，下大雨便与江水连成一片，因此常常面临饥饿之苦。他亲自扛着耒耜，耕耘除草，从不休息。有人讥笑他太劳苦了，他回答说：“尧舜因劳作变得又黑又瘦，大禹也是手上长满了老茧，他们那些圣人尚且这样，我一个平民百姓，能不勤劳吗？”喜好饮茶，在顾渚山下建置了一个茶园，把每年收取来的租茶，自己进行品评划分等级，张又新写有《水说》七种，其中列第二的是慧山泉，第三是虎丘井，第六是松江。有人愿意成全他的嗜好，尽管是百里之外，也要帮他弄到。当初，他饮酒沉醉如病，再后把酒给戒了。后来，客人来了，他只拿着壶摆着杯，但不喝酒。不喜欢与一般庸俗之人交往，就是到他门上，也不肯接见。不乘马，只坐船，船上没有帐篷和席子，往来时带上一捆书，一个茶炉，文房四宝和书桌、鱼具。当时有人称他为“江湖散人”，有人号他为“天随子”、“甫里

先生”，他把自己则比作“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后来朝廷曾以“高士”的荣誉征召他，他不去。李蔚、卢携平素与他的关系挺好，到他们主持国事时，征召他担任左拾遗。任命的诏书刚下，龟蒙便与世长辞了。光化年间（公元898—901年），韦庄上书表彰陆龟蒙及孟郊等十人，都被追赠与“右补阙”。

陆氏的祖籍在姑苏，屋门前有块巨石，陆氏的远祖陆绩曾经在吴国担任郁林太守，被罢免回家时，一点儿行装也没有，由于船太轻不可以过海，便拿石头做为重物压船底，人们称颂他的廉洁，号为“郁林石”，世世代代都保存在他的故居。

（曾雄生 译）

【原文】

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也。父宾虞，以文历侍御史。龟蒙少高放，通《六经》大义，尤明《春秋》。举进士，一不中，往从湖州刺史张抟游，抟历湖、苏二州，辟以自佐。尝至饶州，三日无所诣。刺史蔡京率官属就见之，龟蒙不乐，拂衣去。

居淞江甫里，多所论撰，虽幽忧疾痛，赏无十日计，不少辍也。文成，窜稿篋中，或历年不省，为好事者盗去。得书熟诵乃录，讎比勤勤，朱黄不去手，所藏虽少，其精皆可传。借人书，篇秩坏舛，必为辑褫刊正。乐闻人学，讲论不倦。

有田数百亩，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则与江通，故常苦饥。身畚鍤，蓐刺无休时，或讥其劳，答曰：“尧、舜黻瘠，禹胼胝。彼圣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园顾渚

山下，岁取租茶，自判品第。张又新为《水说》七种，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虽百里为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后客至，絜壶置杯不复饮。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不乘马，升舟设蓬席，赍束书、茶灶、笔床、钓具往来。时谓江湖散人，或号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渔父、江上丈人。后以高士召，不至。李蔚、卢携素与善，及当国，召拜左拾遗。诏方下，龟蒙卒。光化中，韦庄表龟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赠右补阙。

陆氏在姑苏，其门有巨石，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

陈 玄 传

——《旧五代史》卷九六

【说明】陈玄，生卒年不详，京兆（今西安市）人。五代时期的著名医学家。

陈玄出身于世代医家，他继承家学，不但医术高明，医德也很高尚。因为后唐武皇李克用（当时为晋王）治病，侍奉中药，而受到武皇重用。武皇性情残暴，杀人成性，他左右的人如有小过失，就必置于死地。每当他暴怒时，陈玄镇静地冒威劝谏，使不少人得以免祸，而受到他的恩德。他将他所著医书《要术》中的 75 首治病验方和百种配制药的方法，刊刻在石头上，公布于众，供病人选用，反映他具有崇高的医道。

陈玄，京兆（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家庭世代从医，起初陈玄在河中（府治在今山西省永济县的蒲州）节度使王重荣府上为医。乾符年间（公元 874—879 年），后唐武皇李克用（当时为晋王）自太原率兵攻打叛臣王行瑜（按：《新唐书》卷二二四记，李克用灭王行瑜是在乾宁二年，即公元 895 年），路经蒲中时，陈玄侍候武皇服用汤药，武皇对他非常器

重，随武皇回到太原，陈玄每天服侍在他的身边。武皇性情刚烈暴躁，爱杀人，没有人敢说话。陈玄非常了解其情况，每当武皇暴怒时，则镇静沉着地进行开导劝谏，使不少人得以免祸。因而晋地的人深受陈玄的恩德，勋贵权贵们常常赠送他礼物。陈玄喜欢喝酒，并乐于助人，赠送给他的东西，随时又用于款待客人或送予他人，自己并不留存。

后唐明宗年间（公元926—933年）做太原少尹，后为太府卿。长兴年间（公元930—933年），汇集一生行医过程中经临床验证有效的药方七十五首，以及百余种成药的配制方法，称为《要术》，刊刻在石板上，安放于太原府衙门的左边，公布于众，生病的人总是从这里选择药方治病。天福年间（公元936—942年），因为年迈，上表请求退休，官至光禄卿，卒于晋阳，享年八十多岁。（赵慧芝 译）

【原文】

陈玄，京兆人也。家世为医，初事河中王重荣。乾符中，后唐武皇自太原率师攻王行瑜，路出于蒲中，时玄侍汤药，武皇甚重之，及还太原，日侍左右。武皇性刚暴，乐杀人，无人敢言者，玄深测其情，每有暴怒，则从容启谏，免祸者不一，以是晋人深德之，勋贵赂遗盈门。性好酒乐施，随得而无私积。

明宗朝，为太原少尹，入为太府卿。长兴中，集平生所验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药法百件，号曰《要术》，刊石置于太原府衙门之左，以示于众，病者赖焉。天福中，以耄期上表求退，以光禄卿致仕，卒于晋阳，年八十余。

王 朴 传

——《新五代史》卷三一

【说明】王朴（公元 905—959 年），字文伯，山东省东平人。天文历法家。在后周朝官至端明殿学士、左散骑常侍。王朴为人敏锐多才智。显德二年（公元 955 年），受诏改定历法。他批判了《符天历》、《调元历》为流俗不经之学，是天竺番僧之妖术，恢复了中国古代传统的计算方法。于显德三年（公元 956 年）历成，定名为《钦天历》颁行。《钦天历》是自唐《大衍历》以来自成一家言的历法，多有创新，在预报交食、推算五星行度等方面都较为精密。王朴还精通音律，在乐器政事方面也有所贡献。

王朴字文伯，山东省东平县人。年轻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担任校书郎的职务，在后汉枢密使杨踰门下谋事。杨踰与王章、史弘肇等人有矛盾，王朴看到后汉兴旺的日子不长，隐帝岁数小性格软弱，任用小人，并且杨踰身为大臣，却与武将文官有怨仇，知道后汉王朝定要大乱，就离开杨踰往东回归家乡。后来李业等人教隐帝杀掉掌权的大臣，杨踰和王章、史弘肇都被杀掉，三家的门客大多被祸及，王朴却因此

独自幸免于祸。

周世宗为节度使镇守澶州，时王朴做他的书记官。周世宗做开封尹时，任王朴为右拾遗，做了推官。周世宗登上皇位，王朴又改任比部郎中，他献出《平边策》一文，那上面写道：

后唐违背正义失掉了吴、蜀之地，后晋违背正义失掉了幽州、并州。察看它们所以丧失土地的原因，就能了解平定天下的方法。在丧失土地的时候，国君错庸政治混乱，兵士骄横百姓困乏，靠近国君的人在朝廷内做各种坏事，远离国君的人在边外叛乱，小的事情制止不了而超越本份，大的事情制服不了以至于滥用职权，天下人离心离德，人们不听从命令，吴、蜀乘混乱之机就私自独立，幽州、并州乘此期间占据了那些地盘。平定天下的方法正在于以后唐、后晋的失败为教训罢了。一定要首先任用贤良之人，辞退不贤之士，以肃清时弊；任用有才能的人撤掉无能之辈，因才使用；用恩德和信用为号令，来团结天下人之心；赏功罚罪，来发挥他们的力量；谦虚节俭来充实国家的财力；使用徭役要按时节，以抚慰百姓。等到他的仓库充实了，器具用品齐备了，人民可以使用而办事了，对方的人民知道了我国的政治和教化治理得很好，上下同心，国家力量强大，财力充足，人民安居乐业，将相和好，就拥有一定取胜的时势，那么了解对方情况的人就愿意为他当间谍，知道对方山川地势的人就愿意为他当向导。对方的百姓和这里的百姓民心相同，就是与天意相同；与天意相同，那就没有不

成功的道理。

攻击和夺取的方法，应从容易的地方开始。当今只有吴这个地方容易图谋，它往东临海，向南至长江两岸，可以找到袭击的地方有二千里之多。从戒备少的地方先攻击，东边戒备就袭击西边，西边戒备就袭击东边，对方必定奔走来解救它薄弱之地，在它奔走运动的时候，能够以此了解对方的虚实和兵力的强弱。攻击它的虚弱之处，就会所向无敌。不要用大兵团作战，仅仅用轻锐的小股兵力袭击它。敌方内心胆怯软弱，每当他们知道我方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域，就会动用大的兵力来应付，几次动用大的兵力，就会造成百姓困顿国力衰竭，只要不动用大的兵力，我方就会获得胜利。敌方衰竭我方胜利，那么长江以北各州就为国家所有的了。已经取得江北各州，那么就可用敌方百姓补充我方的军力，长江之南也就不难平定了。如果这样则花费力气少而获得的功利多。得到了吴地，广东广西地区的人民都将成为内臣归附于我，岷、蜀地区递封书信就可使它们归顺。如不归附，就四面包围进攻，卷席之势平定蜀地。吴、蜀之地平定了，幽州便可望风而来归顺。只有并州是死硬的贼寇，不能用恩德、信用利诱他们，定要用强兵攻打，等到它的国力衰竭，气势已丧尽，不足以成为边疆之患之时，方才可以图谋对付他们。如今正是兵精足用，战争器械已备，国君部下知道法度，各位将领服从命令的时候，只要一声命令之后，就能够平定边远地区。

臣下我不过是个书生罢了，本不配议论国家大事，至

于上文不合大体，不合机变之处，只希望陛下宽恕了！

以后改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并参与开封府领导职务。一年中，又改任左散骑常侍，并任端明殿学士。这个时候，世宗刚登位，锐意征讨四方，已经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又亲自在高平打败了刘旻，率兵回来后更加严格训练士兵，充满了一统天下的抱负。多次探访大臣，询问治理天下的方法，选拔了文学之士徐台符二十人，让他们写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两种论文，王朴在选拔出的人士之中。但是当时文人学士都不希望皇上急于用兵，认为平定社会不听命令和动乱的局面，首先应该把治理文德放在首位。唯独翰林学士陶谷、谏议，御史中丞杨昭俭和王朴都说用兵这一策略。王朴说江淮一带是能首先夺取的。世宗已经了解到王朴这人的声望，又看到他的议论伟大高远，越发感到他很不同寻常，把他召来和他一起商讨国家大事，看法没有不吻合的，于是决心任用他。显德三年（公元956年），讨伐淮一带，任命王朴做东京副留守。回京城后，又任命他做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又升任做枢密使。显德四年，再次征伐淮河地区时，让王朴担任留守京师的官。

世宗在位的时候，国家对外出征讨伐外敌，对内则整理修改法令制度。王朴为人聪明、目光敏锐，很有才华智慧，不仅仅能在国家事务上独挡一面，甚而至于在阴阳、律历等学问上，也没有不精通的。显德二年，皇上命令王朴修定国家的历法，他就抛弃清除了当时《符天历》等流俗不经的学问，增设了通、经、统三法，用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的数字，推算日月五星的行度，这就是《钦天历》。显德六年，

皇上又令王朴查考审定雅乐。王朴认为十二种律管互相吹奏，很难得出好的乐声，就按照京房所定音律的准则，用九尺长的弦十三根，按照奏管的长短尺度分别设立柱，用七声为韵，音乐声合成后很是柔和美妙。

王朴性情刚强果断，又为世宗所信任，凡是他所做的，在当时没有敢难为他，当然当时的人也不能超过他。世宗讨伐淮地时，王朴留守京城，扩建新城，沟通道路，使京城气势宏伟壮阔，现在的京城规格模式，大多是他所规划制订。他所规定的音乐，直到现在仍在应用而未能改变。他所提出的用兵策略，绝不只是一时的权宜之策。至于所说的当时各国兴盛、灭亡的依次顺序说：“淮南可以最先夺取，并州则是死硬顽固贼寇，将在最后灭亡。”在以后宋朝兴起，平定了国境边远地区，唯独并州最后降服，这些都象王朴预言的。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春天，世宗派遣王朴视察汴口一带，在那里制作了斗门。在回京城的路路上，经过了已故的宰相李谷的府第时，突然疾病发作，仆倒在席位上，将其抬回家中以后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四岁。世宗亲自参加他的丧仪，用玉钺叩在地上，大声痛哭达四次之多。死后赠给了侍中的官位。

（卢莲容 译）

【原文】

王朴字文伯，东平人也。少举进士，为校书郎，依汉枢密使杨邠。邠与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见汉兴日浅，隐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为大臣，与将相交恶，知其必乱，乃去邠东归。后李业等教隐帝诛权臣，邠与章、弘肇皆见杀，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独免。

周世宗镇澶州，朴为节度掌书记。世宗为开封尹，拜朴右拾遗，为推官。世宗即位，迁比部郎中，献《平边策》，曰：

唐失道而失吴、蜀，晋失道而失幽、并。观所以失之之由，知所以平之之术。当失之时，君暗政乱，兵骄民困，近者奸于内，远者叛于外，小不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滥，天下离心，人不用命，吴、蜀乘其乱而窃其号，幽、并乘其间而据其地。平之之术，在乎反唐、晋之失而已。必先进贤退不肖，以清其时；用能去不能，以审其材；恩信号令，以结其心；赏功罚罪，以尽其力，恭俭节用，以丰其财；徭役以时，以阜其民。俟其仓廩实、器用备、人可用而举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强财足，人安将和，有必取之势，则知彼情状者愿为之间谍，知彼山川者愿为之先导。彼民与此民之心同，是与天意同；与天意同，则无不成之功。

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当今惟吴易图，东至海，南至江，可挠之地二千里。从少备处先挠之，备东则挠西，备西则挠东，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间，可以知彼之虚实、众之强弱，攻虚击弱，则所向无前矣。勿大举，但以轻兵挠之。彼人怯弱，知我师入其地，必大发以来应，数大发则民困而国竭，一不大发则我获其利。彼竭我利，则江北诸州乃国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扬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吴、则挂、广皆为内臣，岷、蜀可飞书而召之。如不至，则四而并进，席卷而蜀平矣。吴、蜀平，幽可望风而至。唯并必列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必

须以强兵攻，力已竭，气已丧，不足以为边患，可为后图。方今兵力精练，器用具备，君下知法，诸将用命，一稔之后，可以平边。

臣书生也，不足以讲大事，至于不达大体，不合机变，惟陛下宽之！

迁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岁中，迁左散骑常侍，充端明殿学士。是时，世宗新即位，锐意征伐，已挠群议，亲败刘旻于高平，归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数顾大臣问治道，选文学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及《平边策》，朴在选中。而当时文士皆不欲上急于用武，以谓平定僭乱，在修文德以为先。惟翰林学士陶谷、御史中丞杨昭俭与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谓江淮为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见其议论伟然，益以为奇，引与计议天下事，无不合，遂决意用之。显德三年，征淮，以朴为东京副留守。还，拜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迁枢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师。

世宗之时，外事征伐，而内修法度。朴为人明敏多材智，非独当世之务，至于阴阳律历之法，莫不通焉。显德二年，诏朴校定大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经之学，设通、经、统三法，以岁轨离交朔望周变率策之数，步日月五星，为《钦天历》。六年，又诏朴考正雅乐，朴以谓十二律管互吹，难得其真，乃依京房为律准，以九尺之弦十三，依管长短寸分设柱，用七声为均，乐成而和。

朴性刚果，又见信于世宗，凡其所为，当时无敢难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师，广新城，通道路，壮

伟宏阔，今京师之制，多其所规为。其所作乐，至今用之不可变。其陈用兵之略，非特一时之策。至言诸国兴灭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后亡。”其后宋兴，平定四方，惟并独后服，皆如朴言。

六年春，世宗遣朴行视汴口，作斗门，还，过故相李谷第，疾作，仆于坐上，舁归而卒，年五十四。世宗临其丧，以五钺叩地，大恸者数四。赠侍中。

马重绩传

——《新五代史》卷五七

【说明】马重绩（公元 880—944 年），其祖先为北方少数民族，后从军定居太原。五代时期的天文历法家。后唐庄宗（公元 923—926 年）时开始在朝做官，石晋时担任司天监。由于战争，致使司天监漏刻制度发生混乱，规定太阳中午时，才作为午时的开始（午初）。马重绩发现这种算法不合中国传统的计时原则，于天福三年（公元 938 年）上报朝廷，重新将日中改为午正。

天福四年（公元 939 年），又造新历，进呈给石晋政府，经过考校后，于第二年颁行，定名为《调元历》。经近年研究发现，《调元历》源于曹士蒨著的《符天历》，受到西域天文学的影响。马重绩原为北方少数民族，可能受到西域文化的影响，他将西域系统的《符天历》进献给朝廷，也是事出有因的。近世历法史家朱文鑫在《历法通志》中曾严厉地批评刘羲叟在《司天考》中囿于成见，不加细察而弃之，任其淹没，并肯定《调元历》、《宣明历》，《崇元历》三家之长，尤具特色，未必不如王朴的《钦天历》。

马重绩，字洞微，他的祖先原来是北狄人，历代在军队里服务。马重绩年轻时学习天文历术，熟悉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历》，居住在太原。后唐庄宗（李存勖）镇守太原，每次用兵征讨的时候，都必定询问他出兵的吉凶状况，马重绩每次所答的话都没有不中的，所以让他做大理司直的官。后唐明宗孝嗣原的时候，罢免了他的官职，而不重用。

后晋高祖石敬瑭占据太原，反抗后唐的统治，后唐的末代皇帝派兵围困他，形势很危急，他就让马重绩占卜，卜到《同人》这一卦，说：“天火之象，乾健而离明。‘健’的意思指君子的德行，‘明’的意思是面向着南面的意思，这些都是治理天下的象征。‘同人’的意思是人心相同，所以必定有与我有同心的人。《易经》又说：‘战乎乾。’‘乾’指西北方，又说：‘相见乎离。’‘离’指南方。这个与我同道的人难道是从北面往南而来吗？‘乾’是西北方，作战而取得胜利，是九月和十月之间吗？”这一年九月，契丹人帮助后晋打败后唐的军队，于是后晋就取得了统治地位。并授予马重绩太子右赞善大夫这个官职，又任命为司天监。第二年，张从宾叛乱，皇帝又让马重绩占卜，占卜到《随》这一卦，说：“向南边看到析木这个星次，木不能自己延续下去，空虚而动，动了之后就倾覆。节气快到秋天了，无所作为了。”到七月的时候张从宾就失败了。高祖非常高兴，赏赐给他好马、用具和钱币。

在天福三年的时候，马重绩上书说：“历法和天象，是国君树立一气的原始，显示对万邦的命令的。但是自古至今所记载的，对其进行考核审查，多有差误：《宣明历》的节气和朔望是与天象相符合的，但所推五星的行度却与测验不合；

《崇玄历》所推得的五星行度与天相合，但所推节气却有一日之差。如果以《宣明历》推气朔的方法，配合《崇玄历》的步五星原理，二种历法相参考，就都与天象相符合。以前的各种历法，都以天正十一月为岁首，以远古甲子为上元，积年越来越多，而误差却越来越大。我当臣子的参考这两种历法，创造出一种新法，以大唐天宝十四年乙未为上元，正月中气雨水为气首。”皇帝就下诏书到钦天监，让赵仁琦、张文皓等检测符合的情况。赵仁琦等上复说：“第二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绩的历法检测，都与天象相合无差。”于是便颁布诏书使用新历，并定名为《调元历》。颁行了数年因出现了误差，就废而不用。

马重绩又说：“漏刻的使用方法，以中星考定，以一昼夜为一百刻。以八又六十分之二十刻为一个时辰。每个时辰又以四刻十分以后为时正的开始。这是自古以来一直所用的方法，但现在却失传了，以午正为一个时辰的开始，直到未四刻十分还仍然为午时。由于这个原因，昼夜昏晓，都偏离了正确的时辰，请求依古法改正过来。”政府听从了他的意见。

马重绩去世时享年六十四岁。（卢莲蓉 译）

【原文】

马重绩字洞微，其先出于北狄，而世事军中。重绩少学数术，明太一、五纪、八象、《三统大历》，居于太原。唐庄宗镇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问之，重绩所言无不中，拜大理司直。明宗时，废不用。

晋高祖以太原拒命，废帝遣兵围之，势甚危急，命重绩筮之，遇《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离明。健者君之

德也，明者南面而向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战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见乎离。’离，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而南乎？乾，西北也，战而胜，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岁九月，契丹助晋击败唐军，晋遂有天下。拜重绩太子右赞善大夫，迁司天监。明年，张从宾反，命重绩筮之，遇《随》，曰：“南瞻析木，木不自续，虚而动之，动随其覆。岁将秋矣，无能为也！”七月而从宾败。高祖大喜，赐以良马、器、币。

天福三年，重绩上言：“历象，王者所以正一气之元，宣万邦之命。而古今所纪，考审多差，《宣明》气朔正而星度不验，《崇玄》五星得而岁差一日，以《宣明》之气朔，合《崇玄》之五星，二历相参，然后符合。自前世诸历，皆起天正十一月为岁首，用太古甲子为上元，积岁愈多，差阔愈甚。臣辄合二历，创为新法，以唐天宝十四载乙未为上元，雨水正月中气为气首。”诏下司天监赵仁锜、张文皓等考核得失。仁锜等言：“明年庚子正月朔，用重绩历考之，皆合无舛。”乃下诏班行之，号《调元历》。行之数岁辄差，遂不用。

重绩又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昼夜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为一时，时以四刻十分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传，以午正为时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为午。由是昼夜昏晓，皆失其正，请依古改正。”从之。

重绩卒年六十四。

宋敏求传

——《宋史》卷二九一

【说明】宋敏求（公元1019—1079年），字次道，北宋赵州平棘人。在科学上，以地理学贡献较大。宋敏求进士出身，官至史馆修撰、龙图阁直学士等职。他藏书丰富，知识渊博，尤其熟悉朝廷典故。曾参与修撰《唐史》，补作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还编有《唐大诏令集》一百三十卷，撰有《长安志》二十卷，以及笔记《春明退朝录》等多种著作。其中《长安志》是全面叙述唐代旧都长安的市场、街道、宫室、官邸，以及府县的政治、官员、河渠、关寨、风俗、物产的志书。并上溯汉以来的长安以及周围整个雍州和所属各县的情况，具有较高的地学价值。元代李好文在此书基础上又撰著《长安图志》上中下三卷。后世往往将《长安志》和《长安图志》合刊为一书，有好几种版本，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宋敏求字次道，中进士，任馆阁校勘。曾参加苏舜钦的进奏院会，出任集庆军判官。王尧臣修《唐书》，见于敏求熟悉唐代事情，而奏请他为编修官。因敏求的祖母去世，皇帝

令他在家修书。守丧完毕，出任太常礼院同知。

石中立去世，不久，他的儿子也去世，再无其他儿子。他的孙子祖仁不知自己应如何服丧，请官府讨论。宋敏求认为应服丧三年，应当去官，着重孝服。其他同僚所持意见不一，判寺宋祁认为敏求的意见为是，便将它作为律令。加任他为集贤院校理。后受宋庠的推荐为西京通判。任群牧度支判官。骑马时坠马伤足，后出任亳州知州。治平年间，召他回京任《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起草诰令、负责太常寺。

宋英宗死后未葬时，有人说皇家宗亲稍远的人可以进行婚嫁，宋敏求却认为皇帝未入葬，不能举行婚嫁。隔了一年，又有人说起这件事，敏求说：凡宗室亲属脱了义服而穿白色素服即可以嫁娶。大家都认为他说的话不对，将他贬为绛州知州。王珪、范镇乞请留下他，让他完成《实录》的写作。宋神宗说：“典礼是国家的重要事项，而错误这样多，怎能没有责任。”然而，敏求所议，最初并不错，曾公亮讨厌刘瑾附会敏求的意见，便因此事将他除去。当年，皇帝又将他诏还回京。

徐国公主依靠夫兄的关系为侄子奏请官职，敏求上疏认为此将乱国家纲纪，并予以纠正。王安石讨厌吕公著，诬陷他说韩琦要判乱，象赵鞅兴兵晋阳，为除皇帝身旁的坏人，将他改放颍州。宋敏求应起革命令，王安石让他写明罪状，但宋敏求却只是叙述此事有失实之处。王安石生气地上告皇帝，令陈升之改正宋敏求所写的话。宋敏求请求辞职，皇帝没有同意。

当李定从秀州判官授职御史时，宋敏求归还任命的有关

材料，而以本官右谏议大夫的身份，奉朝廷令考试贤良方正，孔文仲回答准确，被敏求评为优等，王安石更加生气，罢免了孔文仲。大家都为宋敏求担心，皇帝却更加爱护他，授为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邓润甫对皇帝说：“群臣喜欢相互妒嫉、打小报告，这不是国家的美德，应选用敦厚老成的人，以改变这种陋习。”于是加授宋敏求为龙图阁直学士，令他修撰两朝正史，掌管均国公的文书。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敏求去世，终年六十一岁。后特别追赠为礼部侍郎。

宋敏求家中藏书有三万卷，他皆大略通读，尤熟悉朝廷典故，士大夫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必然找他询问解疑。曾补写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一百四十八卷。他所著作品很多，学者有疑问常找他咨询。他曾建议说：“河北、陕西、河东考生，性格纯朴，而文采不大好，所以被录取的很少。因而，可请各转运使推荐有技术、才能的人，授给以官职，使人材参杂使用，学者有上升的道路。再有，各州郡有学校而没有负责教育的官员，所以，学生便易于离乡而到处求师，因而，请政府设置负责教育的官员。”后来，这些措施大多付之实施。

（赵荣译）

【原文】

敏求字次道，赐进士及第，为馆阁校勘。预苏舜钦进奏院会，出签书集庆军判官。王尧臣修《唐书》，以敏求习唐事，奏为编修官。持祖母丧，诏令居家修书。卒丧，同知太常礼院。

石中立薨，子继死，无他子。其孙祖仁疑所服，下礼官议。敏求谓宜为服三年，当解官，斩衰。同僚援据不一，判

寺宋祁是其议，遂定为令。加集贤校理。从宋庠群，通判西京，为群牧度支判官。坠马伤足，出知亳州。治平中，召为《仁宗实录》检讨官，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判太常寺。

英宗在殡，有言宗室服疏者可嫁娶，敏求以为大行未发引，不可。逾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义服，服降而练，可嫁娶矣。坐前后议异，贬秩知絳州。王珪、范镇乞留之，使成《实录》。神宗曰：“典礼，国之所重，而误谬如是，安得无责。”然敏求议初不误，曾公亮恶礼院刘瑾附敏求为说，故因是去之。是岁，即诏还。

徐国公主以夫兄为侄奏官，敏求疏其乱天伦，执正之。王安石恶吕公著，诬其言韩琦欲因人心，如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出之颍州。敏求当草制，安石谕旨使明著罪状，敏求但言敷陈失实。安石怒白于帝，命陈升之改其语，敏求请解职，未听。

会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敏求封还词头，遂以本官右谏议大夫奉朝请。策试贤良方正，孔文仲对话切直，擢寘优等，安石愈怒，罢文仲。人为敏求惧，帝独全护之，除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邓润甫为帝言：“比群臣多尚告讐，非国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士，以变薄俗。”乃加敏求龙图阁直学士。命修两朝正史，掌均国公笺奏。元丰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赠礼部侍郎。

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补唐武宗以下六世《实录》百四十八卷，它所著书甚多，学者多咨之。尝建言：“河北、陕西、河东举子，性朴茂，而辞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请令转运使择荐有行艺

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参用，而士有可进之路。又州郡有学舍而无学官，故士轻去乡里以求师，请置学官。”后颇施行之。

燕 肃 传

——《宋史》卷二九八

【说明】燕肃（公元 961—1040 年），字穆之，山东益都人。是宋代著名机械学家和潮汐学家，也是诗人和画家。

燕肃的主要科学成就有三：一是对潮汐很有研究。他在东南沿海地区任职期间，对潮汐进行了十年之久的实地观测，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资料，著成《海潮图》和《海潮论》。他认为潮汐大小与太阳无关而与月亮有关，即朔、望潮大，上、下弦潮小。计算得到潮时逐日推迟时间有大尽、小尽（1 月 30 天和 29 天）之分，将 1 天定为 100 刻，大尽为 3. 72 刻，小尽为 3. 735 刻。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如此精确度感到十分惊讶；二是发明莲花漏法。他因研究潮汐和准确计时的需要，于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 1030 年），在漏壶计时器中首次使用了漫流系统，即在漏壶的上部开孔，使多余的水由此溢出，以保持壶中恒定水位，消除因水位的变化对流量产生的影响，从而大大提高了漏壶计量时间的准确度。三是复制出已失传的指南车和记里鼓车。燕肃的指南车是一辆两轮独辕车，每个车轮附一个齿轮，两个小齿轮分别与该齿轮啮合。另有一个中心齿轮带动车上的木人引臂指南。形

制和机构十分巧妙。此外，他还制造过欹器，考验校正过多种乐器的音律。

燕肃，字穆之，是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县）人。他的父亲燕峻，是一位性格豪爽负气仗义的人。当后晋的太师寿王杨光远谋反的时候，燕峻带领他的所属部众迎接讨伐杨光远的符彦卿，于是迁居曹州（今山东曹县）。燕肃幼年丧父，孤独贫困，但仍坚持远游学习。后来考中进士，出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的观察推官。寇准主持凤翔府时，推荐燕肃任秘书省（即为掌管文艺、图籍、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的官署）著作佐郎，主持临邛县（今四川邛崃）工作。临邛县的县民深受官吏的压榨和侵扰，燕肃于是把木头削成木简，县民的诉讼中有牵连的人，名字就写在木简上，让他们自己来认罪，当事者都能按期来投案。后来主持考城县，又被任命为河南府通判。在皇帝下诏任命燕肃为监察御史时，寇准正任河南知府，便向皇帝奏明留下了他。

后来升任殿中侍御史，出任广南西路（辖境相当于今广西、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的提点刑狱。又升任侍御史，转到广南东路（辖境相当于今广东贺江、罗定江、漠阳江以东地区）任职。此后，为参知政事丁谓所不喜欢，便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府。后又转到明州（今浙江宁波）任知府，当地的居民具有强硬粗暴、轻率好斗的不良风气，燕肃下令严厉处罚先动手打人的人。于是打架斗殴的人渐渐的没有了。他代理主持昭文馆的时候，任定王府的记室参军，掌管章表、书记、文檄之事，并兼任尚书省的刑部官

员。他建议说：“京城里的死刑犯有给予一次复核奏请的机会，而州、郡地方监狱中有案情可疑的或者其情可怜的死刑犯向上级部门请求复审时，大多被中央执法部门驳回，并且还增加了不应该上奏的罪。希望和京城的制度一样，死刑犯的案子允许上诉复审。”于是皇上下诏允许有疑问的案犯以及情有可怜的犯人都可向上级部门请求复审。燕肃的这个建议，记载在《宋史·刑法志》上。从此以后，死刑犯请求上级复审，大多得到宽恕。这个规定是自燕肃建议开始的。

燕肃后来提拔为龙图阁侍制，暂时代理审刑院的官员，并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知府。回到京城后，任纠察在京刑狱的副职，再次兼任尚书省的刑部官员，后又升迁左谏议大夫，任亳州（今安徽亳州）知府，青州知府。此间恰逢年成歉收，便委他兼任京东路（治所今河南商丘县南）的安抚使。后又调回中央任太常寺并兼任大理寺的官职，再次主持刑审事务。燕肃说：“过去太常寺的钟、磬等乐器都涂上颜色，每隔三年一次皇帝在郊外祭天地祖先，就再重新涂上一遍颜色。随着年代逐渐长久，涂上的颜色越积越厚，声调也就越来越不合乎音律。”皇上便下诏让燕肃与李照、宋祁一起以王朴的《律准》来校正钟磬乐器的音准，于是经过铲削洗涤，敲击调试，使之与律准相合，在皇家后花园试验，声调都很和协、合乎音律。又下诏让燕肃与章得象，冯元详细地考察计时器具刻漏。燕肃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颖州（今安徽阜阳）知府，邓州（今河南邓县）知府。官职升至礼部侍郎后退休，后来去世。

燕肃爱好做诗，他的诗多达数千首。他生性精明机巧，善

于绘画，他的画被列为妙品。他用各种颜色的墨彩作画，布色有浓有淡，其形象意境微妙、深远，尤其善长画古木折竹。燕肃曾制造指南车、记里鼓车和欹器献给朝廷，上奏自己所撰《莲花漏法》。皇帝下诏让当时掌管观察天气，考定历数的司天台将燕肃制的莲花漏放在钟鼓楼下验证，说莲花漏所计时间与当时用的《崇天历》的不一样。然而燕肃到过的地方，都将其刻在石头上以记录莲花漏计时的方法，州郡用它计时以确定早、晚时间、民间都推崇这种计时方法，认为方便、精确。他在明州，撰写了《海潮图》和《海潮论》两部论著。

(赵慧芝 译)

【原文】

燕肃，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侠，杨光远反时，率其属迎符彦卿，遂家曹州。肃少孤贫，游学。举进士，补凤翔府观察推官。寇准知府事，荐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知临邛县。县民尝苦吏追扰，肃削木为牒，民讼有连逮者，书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县，通判河南府。召为监察御史，准方知河南，奏留之。

迁殿中侍御史，提点广南西路刑狱，迁侍御史，徙广南东路。还，为丁谓所恶，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轻悍喜斗，肃下令独罪先殴者，寸是斗者为息。直昭文馆，为定王府记室参军，判尚书刑部。建言：“京师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上请，多为法司所驳，乃得不应奏之罪。愿如京师，死许复奏。”遂诏疑狱及情可悯皆上请，语在《刑法志》。其后大辟上请者多得贷，议自肃始。

擢龙图阁待制、权知审刑院、知梓州，还，同纠察在京

刑狱，再判刑部，累迁左谏议大夫，知亳州，徙青州。属岁歉，命兼京东安抚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复知审刑。肃言：“旧太常钟磬皆设色，每三岁亲祠，则直饰之。岁既久，所涂积厚，声益不协。”乃诏与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划涂考击，合以律准，试于后苑，声皆协。又诏与章得象、冯元详刻漏。进龙图阁直学士，知颍州，徙邓州。官至礼部侍郎致仕，卒。

肃喜为诗，其多至数千篇。性精巧，能画，入妙品，图山水罨布浓淡，意象微远，尤善为古木折竹。尝造指南、记里鼓二车及欹器以献，又上《莲花漏法》。诏司天台考于钟鼓楼下，云不与《崇天历》合。然肃所至，皆刻石以记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晓，世推其精密。在明州，为《海潮图》，著《海潮论》二篇。

沈括传

——《宋史》卷三三一

【说明】沈括（公元 1031—1095 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为宋仁宗嘉祐（公元 1056—1063 年）年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职。除对科学、政治、军事外，对文学、艺术、历史和考古等也有深刻研究。沈括一生著述甚多，可惜大多亡佚。现存除《梦溪笔谈》外，尚有《长兴集》、《苏沈良方》及一些亡佚著作的辑本。

《梦溪笔谈》是以笔记体裁写成的，全书二十六卷，另外还有《补笔谈》三卷、《续笔谈》十一篇。内容包括沈括对科学技术、艺术和历史等方面的见解，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外交和军事等状况，还记载了不少今天唯一或难得的科技史料，如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喻皓的《木经》、信州湿法炼铜、延州油烟制墨法、高超发明的巧合龙门压埽法、羌族的冷煨铁甲法等等。均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称《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沈括在天文学领域做了大量工作，突出成就有二：一是首创“十二气历”。这是一种纯阳历的制度。19 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

的肖伯纳历，其实质便与“十二气历”相似；另一是改进天文仪器浑仪、浮漏和圭表，并写有三篇关于天文仪器的杰出论文。数学方面，沈括发明的隙积术和会圆术，开创了中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在物理学方面，有对凹面镜的解释，透光镜的探讨？并最早明确记述了指北针和地球磁偏角，对共振现象、海市蜃楼、虹、雷电、乐律等也进行了研究。地学方面，他在游览考察了雁荡山地貌后，提出流水侵蚀作用成因说；考察太行山后，又正确推断出华北大平原是由泥沙淤积而成的。沈括在地图学、水利学、医药学等领域也有所造诣。

沈括字存中，以父荫授为海州沭阳县（今江苏沭阳）主簿。沭阳县傍着沭水，乃《周礼·夏官·职方氏》中所说的“浸曰沂、沭”。原有的河道已漫衍成污泽，沈括率众新筑二道防水堤防，又修建地百渠九堰，用以分散节制河水，得到上好土田七千顷。

应科举考试中进士，参加编校昭文馆图书典籍，任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旧日的规章制度，有三年一次到郊外祀丘之礼，负责祀典的部门，按簿册所载行礼，副本被藏了起来，官吏相沿以此来求取好处。祭坛下张起帐幔，离城数里修筑有园囿，种植五彩缤纷的各色树木，雕刻的鸟兽连绵缠绕于其间。将举行祭祀仪式的那天傍晚，皇帝车驾到临观看。人们迎接于端门，陈列仪仗侍卫以示检阅，警戒森严，皇帝登高赏玩，似乎与斋戒祭祀不相宜。仅皇帝乘坐的车子一项，就需各类工匠侍役六七十人。沈括考证礼制沿革，写出

《南郊式》一篇，皇帝立即下令查核了有关事情，决定按新制定法式从事祭祀，经费节省以万计，神宗皇帝称赞说好。

迁升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掌管天文历数的官员，都是市井中庸俗无能之辈，对天文图像和仪器大多不知晓。沈括开始设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等天文仪器，招请卫朴制订新历法，又募召天下人士上献历书和占卜书。沈括使用各种有才学的士人，将原来的方技科分为五科，人员按不同专长安置适合的工作。给沈括增加史馆检讨之衔。

淮南地区发生饥荒，朝廷派遣沈括去察访。沈括打开常平仓发给饥民钱钞和粮食，同时疏通大小河流，治理垦种荒废了的田地，以救水灾。升职集贤校理，又被派去考察两浙农田水利。迁升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当时正大举征用民间车辆，老百姓不理解官府的用意，相互传言引以为忧。又市易司担心无法禁止川盐的销售，想完全废止私家盐井而运解池盐供销给老百姓。对这两件事发表意见的人很多，但都说不明白。沈括正侍奉于皇帝身旁，皇帝看着他说：“你知道征用车辆的事情吗？”回答说：“知道。”皇帝说：“如何？”回答说：“敢问一下，是作什么用？”皇帝说：“北方边境邻邦以马取胜，非车不足以阻挡。”沈括说：“本战的优点，见于历代。然而古人所谓的兵车，是一种轻车，五马驾驭回旋转弯，优点在于速度快捷。现在民间的载重车体积大而重，一天走不了三十里，所以历来称之为太平车，只可以用于和平无战争的时候。”皇帝高兴地说：“别人都没有谈到这一点。我当考虑考虑。”于是又问有关川盐之事，沈括回答说：“一切废除私井而运解盐的事，如果能统一由官家售卖，确实是好事。然

而忠州、万州、戎州、泸州间少数民族地区小盐井尤多，不可能一下子禁绝，而且势必要地方官加强警戒。我担心得到的好处不足以补偿用费。”皇帝点点头。第二天，二件事都宣布作罢。提升沈括为知制造，兼通进、银台司，自升中允到此才三个月。

任河北西路访察使。先是白银冶炼，由转运司设置官吏收其利，沈括说：“亲近重视财宝则国家贫困，是必然之势；人多则口袋里的钱财是否非分所得，如何检察？朝廷每年给予契丹银两数十万，因为白银不是北方所产，所以被看重而且知道其有用。过去的银城县、银坊城都陷于契丹，假使他们知道开凿矿山的利益，则中国的货币更轻贱，也不要依赖每年的馈赠。边境纷争事端从此要开始了。”

当时按田赋征京师近郊民户的马用于边防，老百姓深以为害。沈括说：“北方出产马而且人多习惯于骑战，就像中国精于使用强劲有力的弓箭。现在舍弃自己的专长，勉强自己去做所不能做到的，如何能取胜。”又边境士卒练武，以挽弓射箭决定出的优胜者，也未必能射穿皮革，因而宜强调以射远入坚为标准。提出的像这类建议凡三十一项，皇帝下诏都认可。

辽国的萧禧来宋朝争取河东黄嵬之地，留于驿馆不肯辞行，说：“必须求得回话后才回去。”神宗派遣沈括去辽国通问修好。出发前沈括到枢密院去阅看过去的有关文献资料，看到近年关于边界的协议书，系指古代长城为疆界，距现在的黄嵬地界有三十里远。就上书奏说此事。皇帝于休沐日开启天章阁召沈括当面讨论，高兴地说：“大臣们很不了解事情的

主次，几乎误国家大事。”命沈括将画图给萧禧看，萧禧方无话可说。赏赐沈括白银千两出使上路。到了契丹，契丹丞相杨益戒出面与沈括商谈。沈括掌握有关土地纠纷的资料数十件，预先叫其属下背诵牢记。杨益戒不论提出什么问题，沈括都领示部下列举回答。过了一天再问，亦如是回答。杨益戒无言应对，傲慢地说：“数里之地舍不得放弃，且愿轻易断绝友好关系吗？”沈括说：“军队的队列笔直显示雄壮，变曲则是衰疲。今天北方朝廷丢弃了先君信誉，以威力用于民，并不是对我们宋朝廷不利。”经过六次会谈，契丹知道不可强取，乃舍黄嵬而请以天池为界。沈括返回宋，在途中将辽国的山河险阻和曲直之处，风俗之纯朴敦厚，人情的向背，一一记录，成《使契丹图抄》上献给朝廷。拜封为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沈括曾到丞相府去禀白事情，吴充问道：“自从免役令下达后，老百姓訾骂到现在还没有停止，果真对老百姓怎样？”沈括说：“以为免役令不方便者，只有士大夫和住在城市习惯于免除徭役的人，他们不足以顾恤。不过小户人家本来不用出力役，而要他们也出役钱，则应加以考虑。假如能完全免除，使他们一无负担，就更好。”吴充同意他的看法，表示照此去推行。

蔡确说沈括有迟疑不决，处事不当，暗害司浓法的错误，降以为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明年，恢复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又出任知青州，还没来得及动身，又改延州。到任所，将皇帝另行赏赐的钱全都卖了酒，号召市镇清白人家子弟骑马射箭、角斗争胜，有超出众人技能者，亲自为之敬酒，致以

慰问鼓励。边境居民情绪高涨激昂，执弓带箭，只恐怕得不到先进。过了一年，召集得到装备好的勇武战士千余人，都补充为中军义从，声威雄壮过于其他州府。副总管种谔西向征战，攻下银、宥等地有功，加官龙图阁学士。朝廷派京师禁卫军到延州戍守，一再给予嘉奖赏赐而不及镇兵。沈括认为卫兵虽然重要，但连年打仗的却是镇兵。现在这样待迁不公平，会招来乱子。于是把皇帝的手书藏起来，假托朝命赏赐镇兵缗钱数万，同时派驿传上报此事。皇帝写信回答说：“这是右府官员分赏有失误，不是你察觉事情的时机，一定会扰乱军政。”自此，凡来不及向上请示的事，都可以自行作出决定。少数民族和汉族将士从皇城使以下，允许按以前的规定补授官职。

种谔的军队停留在五原，正逢下大雪，粮饷供应断绝，殿直刘归仁率领众人向南奔走，士卒三万人都溃逃入关内，居民惶惧警骇。沈括到东郊饯迎从河东回来的军队，收集得奔逃士卒数千，问道：“副都总管派遣你们回来取军粮，负责人是谁？”说：“在后面。”立即下令士卒各归屯所。到傍晚，又回来了八百人。不到十天，溃散士卒全部回来。沈括出来安屯士卒，归仁到，沈括说：“你回来取粮，为什么不带着军符？”归仁无法回答。就将刘归仁斩以示众。过了几天，皇帝派内侍刘惟简来查究反叛的人，沈括全作了回答。

大将景思谊，曲珍攻下西夏磨崖、葭芦、浮图城，沈括提议修筑石堡以与西夏对峙。这时，给事中徐禧到。徐禧要先筑城于永乐。皇帝命徐禧监领诸将去筑城，令沈括移府治傍镇守处，以接济军队费用。不久，徐禧失败覆没，沈括因

西夏人袭击绥德，先去救援，无力再援救永乐。因之坐罪降调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公元1086—1094年）初，迁移秀州，接着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州八年逝世，享年六十五岁。

沈括学识渊博，善写作，对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等无所不通，都有议论和著作。又把平日与宾客交谈的内容记载下来汇集成《笔谈》，内容多为朝廷归事典故、名臣故老的出身。本书流传于世。（范楚玉 译）

【原文】

括字存中，以父任为洙阳主簿。县依洙水，乃职方氏所书“浸曰沂、洙”者，故迹漫为污泽，括新其二坊，疏水为百渠九堰，以播节原菱，得上田七千顷。

擢进士第，编校昭文书籍，为馆阁校勘，删定三司条例。故事，三岁郊丘之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于利。坛下张幔，距城数里为园囿，植采木、刻鸟兽绵络其间。将事之夕，法驾临观，御端门、陈仗卫以阅严警，游幸登赏，类非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辈。括考礼沿革，为书曰《南郊式》。即诏令点检事务，执新式从事，所省万计，神宗称善。

迁太子中允、检正中书刑房、提举司天监，日官皆市井庸贩，法象图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浑仪、景表、五壶浮漏，招卫朴造新历，募天下上太史占书，杂用士人，分方技科为五，后皆施用。加史馆检讨。

淮南饥，遣括察访，发常平钱粟，疏沟渎，治废田，以救水患。迁集贤校理，察访两浙农田水利，迁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时大籍民车，人未谕县官意，相挺为忧；又市易司

患蜀盐之不禁，欲尽实私井而犂解池盐给之。言者论二事如织，皆不省，括侍帝侧，帝顾曰：“卿知籍车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对曰：“敢问欲何用？”帝曰：“北边以马取胜，非车不足以当之。”括曰：“车战之利，见于历世。然古人所谓兵车者，轻车也，五御折旋，利于捷速。今之民间輜车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谓之太平车，但可施于无事之日尔。”帝喜曰：“人言无及此者，朕当思之。”遂问蜀盐事，对曰：“一切实私井而运解盐，使一出于官售，诚善。然忠、万、戎、泸间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绝也，势须列侯加警，臣恐得不足偿费。”帝颌之。明日，二事俱寝。擢知制诰，兼通进、银台司，自中允至是才三月。

为河北西路察访使。先是，银冶，转运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宝则国贫，其势必然；人众则囊橐奸伪何以检颐〔察〕？朝廷岁遗契丹银数十万，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银城县、银坊城皆没于彼，使其知凿山之利，则中国之币益轻，何赖岁饷，领衅将自兹始矣。”

时赋近畿户出马备边，民以为病，括言：“北地多马而人习骑战，犹中国之工疆弩也。今舍我之长技，强所不能，何以取胜。”又边人习兵，唯怀挽疆定最，而未必能贯革，谓宜以射远入坚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诏皆可之。

辽肖禧来理河东黄嵬地，留馆不肯辞，曰：“必得请而后反。”帝遣括往聘。括诣枢密院阅故牒，得顷岁所议疆地书，指古长城为境，今所争盖三十里远，表论之。帝以休日开天章阁召对，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几误国事。”命以画图示禧，禧议始屈。赐括白金千两使行。至契丹庭〔廷〕，契丹

相杨益戒来就议，括得地讼之籍数十，预使吏士诵之，益戒有所问，则顾吏举以答。他日复问，亦如之。益戒无以应，谩曰：“数里之地不忍，而轻绝好乎？”括曰：“师直为壮，曲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会，契丹知不可夺，遂舍黄嵬而以天池请。括乃还，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拜翰林学士、权三司使。

尝白事丞相府，吴充问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诋訾者今未衰也，是果于民何如？”括曰：“以为不便者，特士大夫与邑居之人习于复除者尔，无足恤也。独微户本无力役，而亦使出钱，则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无所预，则善矣。”充然其说，表行之。

蔡确论括首鼠乖刺，阴害司农法，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明年，复龙图阁待制、知审官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镇，悉以别赐钱为酒，命廛市良家子驰射角胜，有轶群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劳之，边人驩激，执弓傅矢，唯恐不得进。越岁，得彻札超乘者千余，皆补中军义从，威声雄他府。以副总管种谔西讨拔银、宥功，加龙图阁学士。朝廷出宿卫之师来戍，赏赍至再而不及镇兵。括以为卫兵虽重，而无岁不战者，镇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乱。乃藏敕书，而矫制赐缗钱数万，以驿闻。诏报之曰：“此右府颁行之失，非卿察事机，必扰军政。”自是，事不暇请者，皆得专之。蕃汉将士自皇城使以降，许承制补授。

谔师次五原，值大雪，粮饷不继，殿直刘归仁率众南奔，士卒三万人皆溃入塞，居民怖骇。括出东郊饯河东归师，得

奔者数千，问曰：“副都总管遣汝归取粮，主者为何人？”曰：“在后。”即谕令各归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溃卒尽还。括出按兵，归仁至，括曰：“汝归取粮，何以不持军符？”归仁不能对，斩以徇。经数日，帝使内侍刘惟简来诘叛者，具以对。

大将景思谊、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芦、浮图城，括议筑石堡以临西夏，而给事中徐禧来，禧欲先城永乐。诏禧护诸将往筑，令括移府并塞，以济军用。已而禧败没，括以夏人袭绥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乐，坐谪均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继以光禄少卿分司，居润八年卒，年六十五。

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又纪平日与宾客言者为《笔谈》，多载朝廷故实、耆旧出处，传于世。

苏 颂 传

——《宋史》卷三四〇

【说明】苏颂（公元 1020—1101 年），字子容，泉州南安人。进士。先后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县知县、馆阁校勘、集贤馆校理、度支判官、淮南转运使、应天知府、尚书左丞、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等职。苏颂是位学者型官员，博学多才，通晓经史、九流、百家学说、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苏颂与韩公廉等人制成的水运仪象台，能用多种形式反映及观测天体运行。苏颂等人编纂的《图经本草》载有药草图，对于识别和使用药物很有益处，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苏颂字子容，是泉州南安人。父亲苏绅，葬于润州丹阳，因而苏颂家就迁居到那里了。他中进士第，历任宿州观察推官、江宁县知县。当时建业，自从后唐以后，有关的赋税、地图和户籍，都没有一定的标准，每到开始征敛时，多少都由官吏来定。苏颂在治理询问其它事情时，兼要问及人们邻里的人口地产，知道的很详细。到了记定户籍的时候，或者有人自报不周的，苏颂警告他说：“你家有某人某些产业，为什

么不报呀？”人们惊讶惧怕，都不敢隐瞒。于是他剔除了这个长期为害的弊病，规赋定额，简明而容易执行，其它的县令们把它看作是法律一样，以致于带领百姓拜谢于他的堂前。凡是民间有忿怨纠纷，苏颂总是开导讲理，说明乡亲之间应当相亲相善，如果因为一点小小的忿怨而彼此不高兴，以后一旦发生急迫的事情，还能依靠谁呢。人们经常感谢而去，或者在上告的途中想到他的这些话而停止下来。当时在监司王鼎、王绰、杨紘对于官吏称道的不多，看到苏颂所设，也说：“这不是我们所能做到的。”

苏颂调任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欧阳修将政事相与委托，说：“子容办理事物精明审慎，一旦经过他看过的东西，我就不用再去检查了。”当时杜衍辞老后居住在睢阳，看到苏颂，很是器重他，说：“像你这样，真正是所说的在结交上不能多得的人。”杜衍又把自认为一生中特别用心着力的地方，从小官员到侍从、宰相的施行设置，都讲给了苏颂，并且说：“告诉你这些事情，是知道以后你一定会出任这些官职，老夫我不是自己矜夸。”后来苏颂所历任的职官，大略正如杜衍所说的。

皇祐五年，召苏颂为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至和年间，文彦博是宰相，他请求建立家庙，此事到了太常院。苏颂认为：“讲到礼，士大夫家有田产就行祭礼，没有田产就行荐礼，这样有土地的人于是就建庙祭祀，有土地就有封爵，没有土地没有封爵的，他们的子孙就无法继承宗庙祭礼，这样有祭庙的人只限于他自己，后代没有封爵的，祭祀就废止了。如果参照合并古今的制度，根据封爵的命令，来制定等级差

别，赐赏给土地田产，然后再去讨论庙的制度。如果还没有这些条件，就参考唐代贤良的寝庙祠堂祭献的礼仪，只是使用一般的器皿和食品而已。”

嘉祐年间，皇帝下诏书命礼院讨论将已故的郭皇后神主牌位祔祭于景灵宫的事，苏颂说：“敕书上说‘一向因为忿郁忧愁，偶然地丧失了谨慎恭敬’，这是不可以废除的事。诏书又说：‘我想她为皇后只有十二年，侍奉先后，警奉陵寝。’这是有不应废的后悔之义。诏书又说：‘可以追认皇后，她可以祔祭于庙堂并加以追谥’，这是含有共同祔祭和追谥的意思。请将郭皇后的牌位祔祭在后庙，以此成就追认她的道理。”大家的观点不相一致，宰相曾公亮问道：“郭皇后是皇帝的元妃，如果祔祭在后庙，在事体上就会重复了。”苏颂说：“我朝有三圣，贺皇后、尹皇后、潘皇后都是元妃，在事体上正与之相似。今天只是在后庙中祔祭，这怎能引起相异的议论呢。”曾公亮说：“议论者以为这是暗中威迫了母后，这恐怕不是万岁的的祔祭相配的意思。”苏颂说：“如果在追谥上加一个‘怀’、‘哀’、‘愍’字，就不会威迫了。”曾公亮叹息敬重。

苏颂调迁为集贤馆校理，编定书籍。苏颂在集贤馆九年，奉侍他的祖母和母亲，供养他的姑母、姐妹和外族亲戚有数十人，都很融洽和谐，按时结婚出嫁。他妻小的衣食常常不足，而他却处之坦逸。富弼曾经称颂苏颂是和古代君子一样，等到和韩琦做宰相时，一起上表言称苏颂廉洁退让，所以苏颂得任颖州。通判赵至忠原本是边疆的来降者，所到之处都与职守争竞，苏颂对他以礼相待，显示出自己的诚意。赵至忠感激得流泪说：“我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也是见到义就折服，

我一生中真心敬服的人，只有你和韩魏公了。”

宋仁宗驾崩，建设坟陵，有关官员向各郡苛征不在时令难以得到的物品。苏颂说：“遗诏上要节俭，哪有地方不生产的东西强加征要的呢？看看有无的情况，随情办理。”英宗皇帝即位，召升他为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苏颂说：“周代制度是六军来自六乡，驻扎在三畿四郊；唐代设立十二卫，也是散布在畿内各县中，分别隶属于关内各府，都可以制约四方，作为国家的卫障。本朝禁军多屯居京师和畿内东南各县，虽然护卫馈运方便，但是西方武备特别欠缺。中牟和长垣是首都大门的要冲之地，两条边鄙驿路都由这里通过，而以前未在此屯兵驻守，没有什么防守，请在这里安置兵营增加兵力，以防非常之变。”第二年，饥民果然乘长垣空虚来犯，杀死官吏。正如同苏颂所忧虑的那样。苏颂又请议按照捕获盗贼的多少来作为考核县令的标准，他说：“巡检、县尉只会捕捉盗贼，但是不能够让人们不去做盗贼；能够使人们不去做盗贼的才是合格的县令。况且人民遭受剽窃劫掠的害处，当地长官没有责任，可以这样说吗？”

苏颂迁任度支判官，一次送契丹使者，途中驿宿恩州，驿馆失火，左右随从请苏颂出去躲避，苏颂没有动身。恩州士兵想要进入相救，苏颂关门不让他们入内，徐缓派防火兵卒扑灭了火。火在初起时候，恩州郡里的人涌涌汹汹，高喊契丹使者生变，救兵也要因此而生出事变，全依靠苏颂冷静的处置才止制住。这件事很快就在京师里传闻，神宗皇帝怀疑，苏颂送契丹使者回来，奏明了这件事，皇帝很长时间内都称赞他。皇帝任命苏颂为淮南转运使，召命他修撰起居注，升

任主持制造、通进银台司、审刑院工作。

当时金州知府张仲宣贪脏枉法至使人死而犯罪，法官审判时援引李希辅的案例，判为杖打脊背并刺黥放配海岛。苏颂奏说：“李希辅和张仲宣都是贪脏枉法，但在情节上有轻有重。李希辅知管台州，收受贿赂达数百上千计，定额之外又度僧免除税役。张仲宣所管有金矿场，有金矿的檄告，检查很严厉穷究，使得金矿收利很少，当地人害怕张仲宣采取行动，交给张仲宣八两黄金以使他派遣官员去查对，这只是违反朝命，可以参比巡检条例，和李希辅的案例有所不同。”神宗皇帝说：“免去杖打，还是黥面，可以吗？”苏颂说：“古时大夫以上不施刑具，张仲宣是五品官，现在宽免他死罪而黥面，使他和刑徒军隶为伴，虽然对他本人没有什么可怜，但要重视的，是污损耻辱了他的官衣官帽了。”于是免除了张仲宣的杖刑和黥刑，将他流放海外，这样做后便成为规定的法律。

苏颂还奏说：“提举青苗官不能体谅朝廷的意思，请功夺利，公务受到扰乱。而且它与各司不能相互统一，下达文书不一样，使得各地方州县无所适从。乞请将日常般事，众役的事务具交由监司管理，把提举改为它的属下，这样事务有了统一的管理，对于变更政治也没有什么损害。”皇帝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有大臣荐举秀州判官李定，皇帝召见李定，晋升为太子中允，并拜为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这时负责起草任职的制命诰令，他将那件任职命官的批语又发还回去了。皇帝又把这道批语发下，这时是苏颂负责，苏颂上奏说道：“太祖之朝，

天下刚刚安定,所以不起用单个的远臣来做显赫重要的官职。真宗以后,虽然有了一些幽居隐士和具有优异品行的人,但都没有超越他们的资格和官员。现在李定没有经过铨叙考核,就升任朝官,不是御史出身,就荐举任职于宪台,虽然朝廷使用人才急迫,而超越常规打乱了法律制度,所得到的小,所损失的大,我不敢起草这个诰命。”后来李大临负责此事,他也将批语发还回去了。神宗皇帝说:“去年曾诏令,台官有空缺,让御史台上奏荐举,可以不必拘泥于官职高低。”苏颂和李大临回答说:“以前的台官,都是由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的人来举荐充当。后来因为荐举人难有此相当的资格,所以朝廷才特开这个制度。这只不过是无限止具有博士、员郎的身份,并不是说候补官员也被允许举荐。如果不拘于官职高低,而且包括候补官员在内,那么秀州判官也可做里行,没有必要改为中允了。现在李定改做京官,这已经是特殊的恩惠了,再让他任职于宪台,祖先立朝以来,没有这样做的,宠幸之门一旦开启,仕途上争竞的人们,就寄希望于不按部就班有次序的晋升,而朝廷的官职爵号又有限,怎么能满足每个人的心愿呢!”他们坚持奏意不改,后来他们被免去起草制诰的职务,归入工部郎中班,天下的人们都称谓苏颂和宋敏求、李大临为“三舍人”。

年末,苏颂去任职于婺州府,刚要乘船沿桐庐江逆流而上时,忽然江水汹涌流急,船身横江倾斜要翻,苏颂母亲在船上几乎溺水,苏颂悲哀呼号下水救护他的母亲,船体忽然自己正位。他母亲刚到岸边,船就翻了,人们以为这时苏颂纯孝的感化。苏颂迁任于亳州,有强横妇人获罪应处杖刑,她

有病在身，苏颂每十天派人去检问，她都没有痊愈。谯县主簿邓元孚对苏颂儿子说：“你父亲办理政事高明而有名，怎么被一个妇人哄骗。只要派医生按法律来检查，自然不会受欺骗的。”苏颂说：“诸事自有公论，是不必记挂在心的。如果言论有轻有重，人们会有观望评论的，或许会做出令人后悔的事。”不久妇人病死，邓元孚惭愧地说：“我心胸狭窄，怎能窥测苏颂的心怀。”

苏颂被加封集贤院学士，任为应天知府。吕惠卿曾对人说：“苏子容是乡里中先辈，如果到朝廷，可以得做执政大臣。”苏颂听了，笑而不答，经过三次大赦，李大临还是侍众，苏颂才授秘书监、知通进银台司。吴越地区饥荒，选苏颂为杭州知府。一天，苏颂外出遇见一百多人，他们哀诉说：“我们因为转运司责备拖欠市易缗线，被夜囚昼捆，就是死了也无法偿还。”苏颂说：“我放了你们，让你们回去经营，于衣食开销之外，都用来偿还官府，以一定时间为限还足，可以吗？”他们都感谢苏颂，不敢负约，果然按期还足。

苏颂在有美堂宴请客人，有告将有兵乱，苏颂暗派人捕捉其头领十人，戴上木械囚于狱中，等到晚上宴席散去，客人们还不知道。到修撰两朝正史时，苏颂转任右谏议大夫。他出使契丹，正遇冬至这天，契丹历较宋历晚一天。北方人问哪个历法准确。苏颂说：“历法计算有差异，快慢早晚不同，如果是亥时交替节气，还在今天夜晚，如过几刻，就属于子时，就是明天了。或有先后，可以分别从用各自的历法。”北方人认为正确。出使回来说及此事，神宗赞许说：“我曾想过这个问题，这是最难的，你所回答的特别好。”因而问苏颂契

丹的山川地理、人心向背。苏颂答道：“他们讲和时间长了，很得中原典章制度礼义道德，用以维持政权，上下相安无事，没有分离二意。以前汉武帝自己说：‘高皇帝留下了平城的忧虑，虽然长久地征伐，但匈奴始终不能顺服。’到汉宣帝时，呼韩单于对汉称臣为藩。唐代自中叶以后，河湟被吐蕃攻陷，唐宪宗每每读看《贞观政要》，都慨然有收复河湟的意思。到宣宗时，就把三关、七州归于有司管辖。由此看来，外国或叛或服是常变的，与中原的盛衰无关。”苏颂的语意似有所指，神宗同意其说法。

元丰初年，苏颂暂代开封知府，严格刑罚。他说京师地广人稠，须要弹压镇服，应当用司法和武力官员来治理，不是毫、颖的卧而治之可以比较的。有个和尚犯法，事情关连祥符县令李纯，苏颂没有治理。御史舒亶追究他的过失，他被贬秘书监、濠州知府。

当初苏颂在暂代开封知府，国子博士陈世儒妻李氏厌恶陈世儒的庶母，想让她死了，就对众婢女说：“博士若有一天持丧，要厚赐你们。”不久陈世儒的庶母就被婢女杀死。开封府办理狱讼，法吏说李氏没有明说让婢女去杀陈的庶母，不应处死刑。有人中伤说苏颂要宽办陈世儒夫妇，皇帝召苏颂说：“这是人伦的大恶，应当穷究严治。”苏颂说：“此事归有关官吏管，我不敢说是宽，也不敢去说让他们加重治罪。”狱讼迟迟不决。到此，案子移到大理院审理，认定苏颂被人所请求，御史逮捕苏颂问话。御史说：“你赶快自己说出，不要加重困辱。”苏颂说：“诬陷人去死，不可以去做，如果是自己诬陷自己去得罪名，有什么伤害呢？”就写了几百字承认他

自己的过错。皇帝看奏书时，有疑惑，经反复究查，是大理丞贾种民增删了文字才成这样的，于是事情得以清楚。同朝大臣还是因为苏颂和人谈及陈世儒帷薄私事而责问他，苏颂承认说：“有此事。”以泄露狱讼情况为由，罢去他的郡职。

不久，苏颂为河阳知府，又改为沧州知府。他入宫辞行，皇帝说：“我知道你的才能很久了，但每次要重用你，都有事妨碍，这是命吧！你坚持正义，时间长了大家自然明白。”苏颂叩头拜谢。皇帝召他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唐朝制度，吏部主管选择文职官员，兵部主管选择武职官员；神宗说三代和两汉时没有文职武职的分别，议论的人不知如何办。苏颂说：“唐朝吏部有三铨法，分品级来掌管选官之事。现在要使文武官员一并归吏部管理，就要分左右曹来掌理其事，每次选官还要以品级分别处理。”由这开始吏部有了四选法。

一次苏颂与皇帝对话，神宗对苏颂说：“要想修撰一部书，这非你不可。契丹与我们通好八十多年了，其中的盟誓、聘使、礼币、仪式，都没有考据整理，只是怕修撰的人因职官的迁调使这部书不能早日完成。以你的愴度，这部书什么时间可以完成。”苏颂说：“需要一二年时间。”神宗说：“果然如此，除了你谁也不能这样敏捷呀。”等到书修好，神宗读了《序引》高兴地说：“正象《序卦》的文字一样。”赐此部名为《鲁卫信录》。

皇帝曾问宗子主祭、承重的意思是什么。苏颂答道：“古时代贵与贱使用不同礼仪，诸侯、大夫世代有爵禄，所以才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的含义不同，丧制一样但礼制不同，一般士人庶民与此没有什么关系。近代以后没有世袭爵

位了，因而也就不立宗庙了，尊与卑也就没有法制可依据了，嫡长子长孙和其它众子众孙没有什么不同。现在的《五服敕》说，嫡孙为祖父丧、长子为父亲丧还要服丧三年，他们活着时与人在礼制上一样，只是丧期时不一样，恐怕这不是古代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世俗之见以为，三年的服丧是承重，不知道是承其大宗之重。我听说庆历年间，朝廷有人议论百官的任子，对长子长孙给与官职，其余的都降免，这才是接近古时立宗的方法。乞请诏令礼官、博士议论礼律，合乎承重的，酌情根据古今收族主祭的礼仪立法，规定宗子继承祖业，以区别于众子孙。士人庶民不能同用一样的礼制，使人们知道尊敬祖先，不敢违背礼教。”授苏颂吏部侍郎、迁升为光禄大夫。遇母丧，皇帝派遣中贵人去唁劳，并赐千两白金。

元祐初年，苏颂为刑部尚书、吏部兼侍读。他上奏说：“我朝的典章制度，都是沿用唐朝的旧制，请乞诏令史官从《新唐书》、《旧唐书》中采录君臣的行为，每天进奉几件事，供皇帝您阅览。”皇帝就诏令经筵官遇到不是讲读日时，进献二条汉唐的故事典故。苏颂每次进献可以做规戒和对时事有补益的故事时，都要阐述自己的意见，反复论述。又说：“君主聪明，不能明言劝导，明言劝导会使之出偏激，偏激的祸患是很大的。现在是固守成业的时候，无心应对，就没有不治理好的。”每次进读到平弭兵甲安息百姓的故事，总是要援引古今事例，来劝动皇帝的心思。

不久之后请另外造铸浑仪，因而命苏颂提名荐举。苏颂精于律历，认为吏部令史韩公廉通晓算术，有巧妙思路，奏

请皇帝用他。授与古代方法，修造台三层，上面一层安放浑仪，中间一层安放浑象，下面安放司辰，设置一种装置，靠水力带动轮盘驱动，不必借助人力。时间到了，司辰出来告知。星辰日月运行次序，占候应验，晷所指时刻不差，白天黑夜都可以推知，这是前人所没有的。

苏颂前后掌管四选达五年之久，每每选人改官时，吏员都要纠查选人的缺点不足，所以都被延误阻滞。苏颂敕告下属官吏说：“某官因为某事应当去某处任职，符合的条款，都要全部报上来。从此后吏员不能得逞。每次上诉人来，苏颂都取案牒让来诉人自己看，诉者心服，就告退了；诉者不服，苏颂一定要前去咨间盘驳，看可以做的就做了，如果确有疑问，就将其奏明皇帝，或于都堂之上陈述清楚。所以选官们大多对他感恩戴德，没有得到想要的官职的人，也都心服而去。

苏颂迁任翰林学士承旨。元祐五年，升尚书左丞，曾摄行枢密院事务。边关元帅派遣种朴进京奏说：“得到谍报说，阿里骨死了，其国内不知立谁为王，契丹官员赵纯忠，谨信可用，我们想乘契丹国不安定，用数千劲旅，拥护赵纯忠，立他为契丹国主。”大家议论结果和边帅请求一样。苏颂说：“事态还不清楚，超过边境拥立君主，假使他们抗拒不与接纳，这要损害我们的威严庄重吧？还是再看看其事态发展，等到他们国内安定再抚辑它也不晚。”不久得知阿果骨仍然健在。

元祐七年，苏颂拜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颂做宰相，必定按以前成规先例办事，让百官遵法守职；量才任职，杜绝侥幸的根源，特别戒防武将抢功闹事；问题议论有不妥之处，

他总是毅然据理力争。贾易被任为苏州知府，苏颂说：“贾易在御史以敢言而有名，他已在监司，现根据赦令，反而让他下任知州，这是不可以的。”此事执争不下。谏官杨畏、来之邵说苏颂滞留诏命，苏颂于是上表章辞去相职，罢相后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出任扬州知府。走到河南辞职不走，告老退职，因以中太一宫而住在京口。绍圣四年，拜为太子少师致仕。

在苏颂执政时期，哲宗皇帝尚且年幼，诸臣百官太多扰乱，常说：“君主长大成人时，谁来承担责任呢？”每次大臣奏事，只是取决于宣仁后的，哲宗说话，没有人来答对，只是苏颂奏明宣仁后之后，一定要再禀明哲宗；皇帝如有宣谕，一定要告诉大臣们听从哲宗的话，等到贬谪元祐旧臣时，御史周秩弹劾苏颂。哲宗说：“苏颂知晓君臣礼仪，不要轻率地谈论这个老臣。”徽宗立为皇帝，进封苏颂太子太保，授赵郡公爵。建中靖国元年夏至之天，苏颂亲自起草遗表，第二天去世，享年八十二。皇帝为此诏令停朝两天，追赠他为司空。

苏颂才能强度量大，小事从不和人计较，用礼法来约束自己。虽然身为显贵，但生活如同寒士一样，从有文字以来，经史、九流、百家的学说，以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尤其精于典故，喜好和人谈论，娓娓不休。朝廷如有制作，都要请他指正。

苏颂曾经谈议过国子监，想让博士分经而讲；课试诸生，看他们才能品德如何来决定升俊的道路。谈论贡举，他认为要先看品行而后看其文采，革去封弥、誊录的方法，使得有关部门可以考察他的本质选拔人才要从地方州县做起，大致

恢复以前乡贡里选规范，评论人认为这是对的。

(夏经林 译)

【原文】

苏颂字子容，泉州南安人。父绅，葬润州丹阳，因徙居之。第进士，历宿州观察推官、知江宁县。时建业承李氏后，税赋图籍，一皆无艺，每发敛，高下出吏手。颂因治讯他事，互问民邻里丁产，识其详。及定户籍，民或自占不悉，颂警之曰：“汝有某丁某产，何不言？”民骇惧，皆不敢隐。遂铲剔夙蠹，成赋一邑，简而易行，诸令视以为法，至领其民拜庭下以谢。凡民有忿争，颂喻以乡党宜相亲善，若以小忿而失欢心，一旦缓急，将何赖焉。民往往谢去，或半途思其言而止。时监司王鼎、王綽、杨紘于部吏少许可，及观颂施設，则曰：“非吾所及也。”

调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欧阳修委以政，曰：“子容处事精审，一经阅览，则修不复省矣。”时杜衍老居睢阳，见颂，深器之，曰：“如君，真所谓不可得而亲疏者。”衍又自谓平生人罕见其用心处，遂自小官以至为侍从、宰相所以施設出处，悉以语颂，曰：“以子相知，且知子异日必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故颂后历政，略似衍云。

皇祐五年，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至和中，文彦博为相，请建家庙，事下太常。颂议以为：“礼，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是有土者乃为庙祭也。有田则有爵，无土无爵，则子孙无以继承宗祀，是有庙者止于其躬，子孙无爵，祭乃废也。若参合古今之制，依约封爵之令，为之等差，锡以土田，然后庙制可议。若犹未也，即请考案唐贤寝堂祠

飧仪，止用燕器常食而已。”

嘉祐中，诏礼院议立故郭太后神御殿于景灵宫，颂谓：“敕书云：‘向因忿郁，偶失谦恭。’此则无可废之事。又云：‘朕念其自历长秋，仅周一纪，逮事先后，只奉寝园。’此则有不当废之悔。又云：‘可追复皇后，其祔庙谥册并停。’此则有合祔庙及谥册之义。请祔郭皇后于后庙，以成追复之道。”众论未定，宰相曾公亮问曰：“郭后，上元妃，若祔庙，则事体重矣。”颂曰：“国朝三圣，贺、严、潘皆元妃，事体正相类。今止祔后庙，则岂得有同异之言。”公亮曰：“议者以谓阴逼母后，是恐万岁后配祔之意。”颂曰：“若加一‘怀’、‘哀’、‘愍’之谥，则不为逼矣。”公亮叹重。

迁集贤校理，编定书籍。颂在馆下九年，奉祖母及母，养姑姊妹与外族数十人，甘旨融怡，昏嫁以时。妻子衣食常不给，而处之晏如。富弼尝称颂为古君子，及与韩琦为相，同表其廉退，以知颍州。通判赵至忠本边徼降者，所至与守竟，颂待之以礼，具尽诚意。至忠感泣曰：“身虽夷人，然见义则服，平生诚服者，唯公与韩魏公耳。”

仁宗崩，建山陵，有司以不时难得之物厉诸郡。颂曰：“遗诏务从俭约，岂有土不产而可强赋乎？量其有无，事亦随集。”英宗即位，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颂言：“周制六军出于六乡，在三畿四郊之地；唐设十二卫，亦散布畿内郡县，又以关内诸府分隶之，皆所以临制四方，为国藩卫。国朝禁兵，多屯京师及畿内东南诸县，虽馈运为便，而西边武备殊阙。今中牟、长垣都门要冲，二鄙驿置皆由此，而旧不屯兵，阒无防守，请置营益兵，以备非常。”明年，饥民果乘

虚犯长垣，戕官吏，如颂虑。颂又请以获盗多寡为县令殿最法，以谓：‘巡检、县尉，但能捕盗，而不能使人不为盗；能使其不为盗者，县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长官不任其责，可乎？’

迁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驿舍火，左右请出避，颂不动。州兵欲入救，闭门不纳，徐使防卒扑灭之。初火时，郡人汹汹，唱使者有变，救兵亦欲因而生事，赖颂安静而止。遂闻京师，神宗疑焉，颂使还，入奏，称善久之。命为淮南转运使。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诰、知通进银台司、知审刑院。

时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辅例，仗脊黥配海岛。颂奏曰：“希辅、仲宣均为枉法，情有轻重。希辅知台，受赇数百千，额外度僧。仲宣所部金坑，发檄巡检体究，其利甚微，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属仲宣不差官比较，止系违令，可比恐喝条，视希辅有间矣。”神宗曰：“免杖而黥之，可乎？”颂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今贷死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所重者，污辱衣冠耳。”遂免杖黥，流海外，遂为定法。

又言：“提举青苗官不能体朝廷之意，邀功争利，务为烦扰，且与诸司不相临统，文移同异，州县莫知适从。乞与常平、众役一切付之监司，改提举为之属，则事有统一，而于更张之政无所损也。”不从。

大臣荐秀州判官李定，召见，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宋敏求知制诰，封还词头。复下，颂当制，颂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远而登显要者。真宗以来，虽有幽人异行，亦不至超越资品。今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

缘御史，荐置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未敢具草。”次至李大临，亦封还。神宗曰：“去年诏，台官有阙，委御史台奏举，不拘官职高下。”颂与大临对曰：“从前台官，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员外郎以下举充。后为难得资叙相当，故朝廷特开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员郎，非谓选人亦许奏举。若不拘官职高下，并选人在其间，则是秀州判官亦可为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改京官，已是优恩，更处之宪台，先朝以来，未有此比。倖门一启，则士涂奔竞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满其意哉！”执奏不已，于是并落知制诰，归工部郎中班，天下谓颂及敏求、大临为“三舍人”。

岁余，知婺州。方泝桐庐，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几溺矣，颂哀号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人以为纯孝所感。徙亳州，有豪妇罪当杖而病，每旬检之，未愈，谯簿邓元孚谓颂子曰：“尊公高明以政称，岂可为一妇所绾。但谕医如法检，自不诬矣。”颂曰：“万事付公议，何容心焉。若言语轻重，则人有观望，或致有悔。”既而妇死，元孚惭曰：“我辈狭小，岂可测公之用心也。”

加集贤院学士、知应天府。吕惠卿尝语人曰：“子容，吾乡里先进，苟一诣我，执政可得也。”颂闻之，笑而不应。凡更三赦，大临还侍从，颂才授秘书监，知通进银台司。吴越饥，选知杭州。一日，出遇百余人，哀诉曰：“某以转运司责逋市易缗钱，夜囚昼系，虽死无以偿。”颂曰：“吾释汝，使汝营生，奉衣食之余，悉以偿官，期以岁月而足，可乎？”皆谢不敢负，果如期而足。

颂宴客有美堂，或告将兵欲乱，颂密使捕渠领十辈，荷校付狱中，迨夕会散，坐客不知也。及修两朝正史，转右谏议大夫。使契丹，遇冬至，其国历后宋历一日。北人问孰为是，颂曰：“历家算术小异，迟速不同，如亥时节气交，犹是今夕；若逾数刻，则属子时，为明日矣。或先或后，各从其历可也。”北人以为然。使还以奏，神宗嘉曰：“朕尝思之，此最难处，卿所对殊善。”因问其山川、人情向背，对曰：“彼讲和日久，颇窃中国典章礼义，以维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离二之意。昔汉武帝自谓：‘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虽久勤征讨，而匈奴终不服。’至宣帝，呼韩单于稽首称藩。唐中叶以后，河湟陷于吐蕃，宪宗每读《贞观政要》，慨然有收复意。至宣宗时，乃以三关、七州归于有司。由此观之，外国之叛服不常，不系中国之盛衰也。”颂意盖有所讽，神宗然之。

元丰初，权知开封府，颇严鞭朴。谓京师浩穰，须弹压，当以柱后惠文治之，非亳、颖卧治之比。有僧犯法，事连祥符令李纯，颂置不治。御史舒亶纠其故纵，贬秘书监、知濠州。

初，颂在开封，国子博士陈世儒妻李恶世儒庶母，欲其死，语群婢曰：“博士一日持丧，当厚饷汝辈。”既而母为婢所杀，开封治狱，法吏谓李不明言使杀姑，法不至死。或谮颂欲宽世儒夫妇，帝召颂曰：“此人伦大恶，当穷竟。”对曰：“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宽，亦不敢谕之使重。”狱久不决。至是，移之大理。意颂前次请求，移御史台逮颂对。御史曰：“公速自言，毋重困辱。”颂曰：“诬人死，不可为已，若自诬以获罪，何伤乎？”即手书数百言伏其咎。帝览奏牍，以为疑，

反复究实，乃大理丞贾种民增减其文傅致也。由是事得白。同列犹以尝因人语及世儒帷薄事，颂应曰：“然。”以是为泄狱情，罢郡。

未几，知河阳，改知沧州。入辞，帝曰：“朕知卿久，然每欲用，辄为事夺，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颂顿首谢。召判尚书吏部兼详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选，兵部主武选；神宗谓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议者不知所处。颂言：“唐制吏部有三铨之法，分品秩而掌选事。今欲文武一归吏部，则宜分左右曹掌之，每选更以品秩分治。”于是吏部始有四选法。

因陛对，神宗谓颂曰：“欲修一书，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余年，盟誓、聘使、礼币、仪式，皆无所考据，但患修书者迁延不早成耳。然以卿度，此书何时可就？”颂曰：“须一二年。”曰：“果然，非卿不能如是之敏也。”及书成，帝读《序引》，喜曰：“正类《序卦》之文。”赐名《鲁卫信录》。

帝尝问宗子主祭、承重之义。颂对曰：“古者贵贱不同礼，诸侯、大夫世有爵禄，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义，则丧服从而异制，匹士庶人亦何预焉。近代不世爵，宗庙因而不立，尊卑亦无所统，其长子孙与众子孙无以异也。今《五服敕》，嫡孙为祖、父为长子犹斩衰三年，生而情礼则一，死而丧服独异，恐非先王制礼之本意。世俗之论，乃以三年之丧为承重，不知为承大宗之重也。臣闻庆历中，朝廷议百僚应任子者，长子与长孙差优与官，余皆降杀，亦近古立宗之法。乞诏礼官、博士参议礼律，合承重者，酌古今收族主祭之礼，立为宗子继祖者，以异于众子孙之法。士庶人不当同用一律，使人知尊祖，不违礼数也。”除吏部侍郎，迁光禄大

夫。遭母丧，帝遣中贵人唁劳，赐白金千两。

元祐初，拜刑部尚书，迁吏部兼侍读。奏：“国朝典章，沿袭唐旧，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颂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必述己意，反复言之。又谓：“人主聪明，不可有所向，有则偏，偏则为患大矣。今守成之际，应之以无心，则无不治。”每进读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动人主之意。

既又请别制浑仪，因命颂提举。颂即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则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

颂前后掌四选五年，每选人改官，吏求垢瑕，故为稽滞。颂敕吏曰：“某官缘某事当会某处，仍引合用条格，具委无漏落状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诉者至，必取按牒使自省阅，诉者服，乃退；其不服，颂必往复诘难，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则为奏请，或建白都堂。故选官多感德，其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迁翰林学士承旨。五年，擢尚书左丞。尝行枢密事。边帅遣种朴入奏：“得谍言，阿里骨已死，国人未知所立。契丹官赵纯忠者，谨信可任，愿乘其未定，以劲兵数千，拥纯忠入其国立之。”众议如其请。颂曰：“事未可知，其越境立君，使彼拒而不纳，得无损威重乎？徐观其变，俟其定而抚辑之，未晚也。”已而阿里骨无恙。

七年，拜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颂为相，务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职。量能授任，杜绝侥倖之原，深戒疆场之臣邀功生事。论议有未安者，毅然力争之。贾易除知苏州，颂言：“易在御史名敢言，既为监司矣，今因赦令，反下迁为州，不可。”争论未决。谏官杨畏、来之邵谓稽留诏命，颂遂上章辞位，罢为观文殿大学士、集禧观使，继出知扬州。徙河南，辞不行，告老，以中太一宫使居京口。绍圣四年，拜太子少师致仕。

方颂执政时，见哲宗年幼，诸臣太纷纭，常曰：“君长，谁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惟颂奏宣仁后，必再禀哲宗，有宣谕，必告诸臣以听圣语。及贬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颂。哲宗曰：“颂知君臣之义，无轻议此老。”徽宗立，进太子太保，爵累赵郡公。建中靖国元年夏至，自草遗表，明日卒，年八十二。诏辍视朝二日，赠司空。

颂器局阔远，不与人校短长，以礼自持。虽贵，奉养如寒士。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至于图纬、律吕、星官、算法、山经、本草，无所不通。尤明典故，喜为人言，亹亹不绝。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尝议学校，欲博士分经；课试诸生，以行艺为升俊之路。议贡举，欲先行实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使有司参考其素，行之自州县始，庶几复乡贡里选之遗范。论者韪之。

王 存 传

——《宋史》卷三四一

【说明】王存（公元 1023—1101 年），字正仲，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县）人。是著名的北宋方志地理学家。王存为庆历（公元 1041—1048 年）年间进士，历官秘书省著作佐郎、知太常礼院、尚书左丞等职。宋元丰（公元 1078—1085 年）间与曾肇、李德刍共同编修《元丰九域志》十卷。体例因袭唐《十道图》、宋《九域图》等图经，而取消其地图部分。以元丰八年（公元 1085 年）为断，首列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载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府、州、军、监、道里、户口、土贡、领县及县所辖之镇、堡寨、山泽等项。对府、州间四至八到，叙述最详；府州土贡，又备载贡物之额数，足资考核。不失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

王存，字正仲，江苏丹阳县人。自幼年就好读书。十二岁，辞别双亲从师于江西，五年才回家。当时学者的风尚为六朝骈俪之文，而王存独为先秦两汉散文数十篇，同乡老先生看见了，自认为赶不上。

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考中进士，调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市）主簿，进升上虞县知县。当地豪门大姓杀了人。很久没人敢过问，王存到县视事，察考案卷因为州官非法受赂，豪门又贿赂他官改变其官司，王存反而被罢官而去。过了很久，被任命为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县）推官。洁身自重，被欧阳修、吕公著、赵槩所知。治平中，调入京师任国子监直讲，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王存旧与王安石友谊很厚，王安石执政以后，屡次引见王存议论政事，不合，就称谢不再去。王存在三馆多年，未曾贬低别人以营谋官职地位。曾经被宋神宗赵顼召见便殿，多次上书陈述时政，因此说到当朝大臣，而无所依附，全为当时人所难言者。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神宗（赵顼）考察他忠诚老实无党派，任命他为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当时起居郎虽然日侍皇帝，而奏事必须禀告中书省等候旨意。王存请求恢复唐贞观年间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神宗是其言，可以直接去奏事，是从王存开始的。

第二年，任命他为右正言、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论证圜（圆）、丘合祭天地非古制，应当亲自祭祠北郊如《周礼》官制实行，神宗迫切需要人，王存请求自熙宁以来群臣因议论政事获罪的，或是有错误而被斥退而内情实出于忠心并非大过者，按其材质召见擢升，以备官方任用。话语合乎神宗的意思，录用提拔者很多人。又说：“大赦令出于皇上恩典，而近年来议论法律治刑狱的，多乞求不赦原来降职薪俸，官方禁止谒见，本为防止请托，而吊唁死者和问候疾病，

全都杜绝了，都不是方便事。”当政者不悦。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京城沿黄河居的人，盗开黄河南岸堤防，以扩大土地面积，有人请求命令凿堤者培土恢复原形，又有人请按百姓庐舍侵占官道者令其撤出。两个谋划出自中间人，皇上已经有诏书。王存说：“这是我的职责。”入大内向神宗奏明。当日即弛放修复河堤劳役的，首都人民欢呼相互庆贺。进升枢密直学士，改兵部尚书，转户部。神宗去世，哲宗（赵煦）继位，修筑神宗（赵頊）永裕陵寝费财甚巨，不过时即准备好，宰相又复迁兵部。太仆寺请示内外马政可以专门上达。不必隶属于驾部郎中。王存说：“如此，官制败坏。先帝（神宗）正省、台、寺、监之职责，使相互制约，不可使主管部门自行方便，而毁坏已成法规。”元祐初，还户部，固辞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三年，迁左丞。

有人建议停止训练京畿内保甲者，王存说：“今京师的兵士的减少，又废除保甲不训练，不是国家根本久长立国之计。而且先帝不怕难而实施，既然已经就绪，无故而废止，不可以”。门下侍郎韩维被罢官，王存说：“罢去一正直的人，使天下人失望，忠于国家的人恐怖，说别人坏话的人争相进取高位。”又议论杜纯不应该罢侍御史，王觐不当罢谏官。

四方奏报审判定案为死刑者，刑部援据近来判例请求宽免，尚书省屡次不能怜悯推却。王存说：“这是祖宗制度。主管部门欲留其活命，而朝廷打破惯例杀害，可以吗？”又说：“近年废除进士专经，参加诗赋，违背神宗减少词律、崇尚经术之意。”黄河决口改道向北流已几十年，水部建议仍还黄河

故道，王存争辩说：“故道河床已高，水性趋向下流，空费财力，恐怕不会成功。”最后停止了工役。蔡确作诗对朝廷有诽谤，王存与范纯仁欲减少其罪刑，蔡确再一次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王存也罢官，以端明殿学士知蔡确（今河南汝南县）。当初，王存之调兵部，是蔡确的力量。现今，为蔡确而罢官，士大夫善其能为蔡确减怨谤之罪，过一年多，又加资政殿学士、扬州知州。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润州（今江苏镇江市）相去仅一水之隔，用故宰相之先例，可以每年到家上坟，出钱分给邻里，准备酒食召集父老，互相敬酒，乡里传以为美谈。

召为吏部尚书。当时，朝廷朋党的议论正盛。王存与哲宗说：“人臣朋党营私，此风诚不助长，然而如不考察，则扩展到好人。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党，靠仁宗圣明，不为指者所迷惑，今天如果有进朋党之说的，愿陛下察考。”从此又与当政者乖戾不和，就新官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知府，改知杭州（今浙江杭州市）。

绍圣初（公元1094年），请求告老退休，提举崇禧观，迁右正议大夫退休。旧制，当得东宫太保、太傅荣誉虚衔荣典，有人指责王存曾建议退还侵占西夏的五砦，故削减其恩典，后又降职通议大夫。王存曾伤悼近世学士贵为三公卿相，而祭祀其祖先，但按一般平民的制度。王存归老建房定居，首先营造家庙。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卒，年七十九。赠左银青光禄大夫。

王存性情宽缓忠厚，平日家居严谨，不为欺诈违俗立异之行，至其所守的府州，则不可夺其志。司马光曾经说：“并

排奔驰于万马中，能停驻者，岂不是王存吗？”

(李仲均 译)

【原文】

王存字正仲，润州丹阳人。幼善读书，年十二，辞亲从师于江西，五年始归。时学者方尚雕篆，独为古文数十篇，乡老先生见之，自以为不及。

庆历六年，登进士第，调嘉兴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杀人，久莫敢问，存至，按以州吏受赇，豪赂他官变其狱，存反为罢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洁自重，为欧阳修、吕公著、赵槩所知。治平中，入为国子监直讲，迁秘书省著作佐郎，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存故与王安石厚，安石执政，数引与论事，不合，即谢不往。存在三馆历年，不少贬以干进。尝召见便殿，累上书陈时政，因及大臣，无所附丽，皆时人难言者。

元丰元年，神宗察其忠实无党，以为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时起居注虽日侍，而奏事必禀中书俟旨。存乞复唐贞观左右史执笔随宰相入殿故事，神宗颍其言，听直前奏事，自存始也。

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诰、同修国史兼判太常寺。论圜丘合祭天地为非古，当亲祠北郊如《周礼》。官制行，神宗切于用人，存请自熙宁以来群臣缘论事得罪，或诬误被斥而情实纳忠非大过者，随材召擢，以备官使。语合神宗意，收拔者甚众。又言：“敕令出上恩，而比岁议法治狱者，多乞不以赦降原减。官司谒禁，本防请託，而弔死问疾，一切杜绝，皆非便也。”执政不悦。

五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谋出自中人，既有诏矣。存曰：“此吾职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欢呼相庆。进枢密直学士，改兵部尚书，转户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财费，不逾时告备，宰相乘间复徙之兵部。太仆寺请内外马事得专达，毋隶驾部。存言：“如此，官制坏矣。先帝正省、台、寺、监之职，使相临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还户部，固辞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书右丞。三年，迁左丞。

有建议罢教畿内保甲者，存言：“今京师兵籍益削，又废保甲不教，非国家根本久长之计。且先帝不憚艰难而为之，既已就绪，无故而废之，不可。”门下侍郎韩维罢，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党沮气，谗邪之人争进矣。”又论杜纯不当罢侍御史，王觐不当罢谏官。

四方奏谏大辟，刑部援比请贷，都省屡以无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生之，而朝廷破例杀之，可乎？”又言：“比废进士专经一科，参以诗赋，失先帝黜词律、崇经术之意。”河决而北几十年，水官议还故道，存争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趋下，徒费财力，恐无成功。”卒辍其役。蔡确以诗怨讪，存与范纯仁欲薄其罪，确再贬新州，存亦罢，以端明殿学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确力也。至是，为确罢，士大夫善其能损怨。岁余，加资政殿学士、知扬州。扬、润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岁时过家上冢，出赐钱给邻里，又具酒食召会父老，亲与酬酢，乡党传为美谈。

召为吏部尚书。时，在廷朋党之论浹炽，存为哲宗言：

“人臣朋党，诚不可长，然或不察，则滥及善人。庆历中，或指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为党，赖仁宗圣明，不为所惑。今日果有进此说者，愿陛下察之。”由是复与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

绍圣初，请老，提举崇禧观，迁右正议大夫致仕。旧制，当得东宫保傅，议者指存尝议还西夏侵地，故杀其恩典，既而降通议大夫。存尝悼近世学士贵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归老筑居，首营家庙。建中靖国元年，卒，年七十九。赠左银青光禄大夫。

存性宽厚，平居恂恂，不为诡激之行，至其所守，确不可夺。司马光尝曰：“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其王存乎！”

韩彦直传

——《宋史》卷三六四

【说明】韩彦直，字子温，陕西延安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公元12世纪。系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宋代园艺学家。他写作了一部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柑桔专著《永嘉桔录》（或简称《桔录》）。大约在南宋淳熙元年至五年（公元1174—1178年）期间，他到温州（又名永嘉）做知州。因当地以盛产柑桔出名，写了《桔录》一书，共三卷。自序题于淳熙五年。书中记载了当时的柑桔品种二十七种，其中柑八种，桔十四种，橙子等五种。最末一卷讲种植方法，分种治、始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活、入药等九条，内容详实。

韩彦直，字子温。出生一周岁时，他父任补右丞奉郎，不久又进入秘阁。六岁那年，跟随父亲韩世忠入宫拜见高宗皇帝，皇帝命令他写大字，他受君命跪着写了“皇帝万岁”四个字。皇帝很高兴，抚摸着他的背说：“将来定是个优秀人才。”并亲手解下孝宗发角上束发的彩带，系缚在他头上，还赐给他金器、笔砚、监书、鞍马。十二岁时，赐给他三品官服。

绍兴十七年（公元1147年），在两浙转运司的考试中，一

举考中。第二年，考中进士，调任太社令。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父亲韩世忠去世，韩彦直守完孝，因秦桧向来对韩世忠不赞成和议而怀恨在心。便把韩彦直派出去担任浙东安抚司，主管机要文字方面的工作。秦桧死后，被授予光禄寺丞的职务。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调任屯田员外郎兼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张浚总管江淮军马时，被征召授权策划军事。张浚的督府解散后，无职事，但领薪水。

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韩彦直调任户部郎官、主管左曹，全面负责淮东军马钱粮。正赶上大军仓供应粮食，他直接乘坐小车前往察看，发现供应的粮食不足份量，便将有关负责人逮捕审理。起初，代管人因为缺乏粮食而停止供应。交接以后收到铜钱也仅仅二十万。第二年统计上报是头年的四倍，并且将盈余部分献给了朝廷。受到了皇帝的嘉奖，被授予司农少卿的职位，负责龙图阁、江西转运并暂兼江州知州。

当时朝廷归还给岳飞家的财产多在九江，因年数太久，产业的主人几经变换，官吏也趁机搞鬼。韩彦直将被隐藏起的财产，搜查出来，全部都归还了岳家。又担任司农少卿，全面管理湖北、京西的军马钱粮，不久又兼任发运副使。适逢当时的宰相不高兴，秘密启奏改换继任，韩彦直被授予利州观察使、襄阳知府、担任京西南路安抚使。

七年（公元1171年），韩彦直被授予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条陈上奏了有关军中的六件事，请求备配武器装备、增加战马、革除滥发奖赏、奖励有功人员、选拔勇敢有谋略的人才，扩充亲随军等，多被朝廷所采纳。先前军队里的骑

兵，大多不能步战，彦直命令骑兵穿上铠甲徒步行走，一天走六十里，虽然是统制官也要求带头以身作则，人人都习惯于劳苦，奔走起来就象飞一样。这件事传出以后，皇帝便命令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和江上各路军队仿照进行操练。

八年（公元1172年），韩彦直乞求重新担任文职官员。被授予左中奉大夫，担任敷文阁侍制、台州知州。请求立祠以供奉亲族。掌管佑神观。并担任奉朝请。向皇帝奏对说：“岳飞担任统帅时，身居鄂渚（湖北武昌西江中），统领管辖距离遥远的荆襄（湖北江陵、襄阳一带），田师中继任统帅以后，分鄂渚为二军行政区统辖。请求恢复原有的建置。”又请求合并京西、湖北转运合为一司，派出职官在襄阳设司，将各种事务统一管理。受到皇帝的好评。升为刑部侍郎。

第二年，又兼任工部侍郎。同僚中有人议论说：死刑经过再三审问不承认罪行的话，就应当根据许多证据来判刑，并想将此修订立为律令。韩彦直持不同意见，他对丞相梁克家说：“如果这样的话，善良的人被诬告，会产生许多冤假错案。即便是鞭抽棍打之类刑罚的用与不用，还须决定合适，况且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呢？”议论终于被阻止了。因建议剥夺吴名世改正错名，不妥当，被降官两级。

正在这时候，朝廷要派使者出使金国。朝臣们互相看着，没有人肯自告奋勇。皇帝只好亲自选派人前往，韩彦直接受命令以后，情绪激昂地上路了。刚一进入金国境内，金国使者蒲察问起交接国书的事，前后往复讨论了几十次，故意刁难，最后蒲察自觉理亏，便笑着说：“尚书，能力争主动。”到

了金国，几次遇到祸难，但他总是英勇不屈，保持气节。金国终于以礼相待送他回国。韩彦直受到了皇帝的赞叹。被提升为吏部侍郎，不久又掌工部尚书，恢复中大夫之称，改任工部尚书并临安知府。正要推辞，被说服之后，还是接受了。主管太平兴国宫，不久又主管佑神观、并担任奉朝请。

不久担任温州知州。第一件事就逮捕了老奸巨猾的王永年，狠狠地整治了他一顿，并戴上刑具流放到其他州去。上奏请求减免民间拖欠的赋税，用郡里剩余的财政收入来代缴。但是由于累次拖欠内库钱财，坊场钱发不出，结果给降官一级。海盗出没大洋之间劫掠财物，情势十分嚣张，韩彦直授给将领及地主豪强方略谋策，不到十天，就将海盗头目活捉，海路交通得到清理整顿。枢密上报了他的功劳，提升为敷文阁学士，但因为他的弟弟彦质为两浙转运判官，为避嫌而改换为泉（钱）府。请求立祠以奉养亲族。负责主管佑神观，仍然担任奉朝请。皇帝特别批准他服带鱼饰，以表示皇帝给予他特殊的待遇。

有一次，韩彦直入皇宫回答皇帝所提的问题时，请求查访靖康以来为国牺牲的烈士，用来鼓励对国家忠义的人。又向上举荐那些已经通过升迁稽核、实际经历了六次考试、没有因谋取私利而犯罪的人，进行行政和法律等多方面的考试，限定名额，评定高下等级，以使那些身世低微的读书人得以通过努力而求得一官半职，并确定为改革官吏任用制度。韩彦直还请求命令州郡各级官吏任职期满时，开列出本州实际的财政收入数目，全部公开移交给下任，并上报到上级有关部门，这样才可以审核属实，以防止徇私舞弊。皇帝都乐意

地采纳了。

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夏季发生旱灾,韩彦直应对皇帝诏令说:近来滥施刑罚是导致干旱的原因。第二年,进宫回答皇帝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三衙都是为了保护皇帝的,而统帅三衙的司马却远在几百里之外,请求下令将他们召回。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再次做户部尚书。正赶上这年干旱。请求大量买进粮食以作为储备。又请求重新追究军队中那些曾经诬陷岳飞的人的责任,以告慰岳飞九泉之下的忠魂。又因说了错话降职担任敷文阁学士。皇帝追思怀念起韩世忠的功绩,派使者开导韩彦直,并且说彦直有才能,是遭人诬陷等等的好话。韩彦直感动得哭了起来,并上书向皇帝表示感谢。不久又主管万寿观。生病了,皇帝赐给他药。提升韩彦直为显谟阁学士,主管万寿观。

曾经收集过有关宋朝的史事,分门别类,写成《水心镜》一书,共一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在纂修国史的时候,曾将此事上报朝廷,朝廷下令将此书调进宫中,光宗皇帝看过之后,认为不错。提升韩彦直为龙图阁学士,主管万寿观,调任光禄大夫,退休。死后,特别赠送给他“开府仪同三司”(开府置官,授照三司成例)的名号,赐给银饰和丝绢九百,以及蕲春郡公的爵位。

(曾雄生 译)

【原文】

〔韩〕彦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补右承奉郎,寻直秘阁。六岁,从世忠入见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书“皇帝万岁”四字。帝喜之,抚其背曰:“他日,令器也。”亲解

孝宗总角之繻，傅其首，赐金器、笔研、监书、鞍马。年十二，赐三品服。

绍兴十七年，中两浙转运司试。明年，登进士第，调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桧素衔世忠不附和议，出彦直为浙东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拜光禄寺丞。二十九年，迁屯田员外郎兼权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张浚都督江、淮军马，檄权计议军事。督府罢，奉祠。

乾道二年，迁户部郎官，主管左曹，总领淮东军马钱粮。会大军仓给粮，径乘小舆往察之，给米不如数，捕吏置于理。初，代者以乏兴罢，交承，为缗钱仅二十万，明年奏计乃四倍，且以其赢献诸朝。帝嘉之。拜司农少卿，进直龙图阁、江西转运兼权知江州。

时朝廷还岳飞家赀产多在九江，岁久业数易主，吏缘为奸。彦直搜剔隐匿，尽还岳氏。复为司农少卿，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寻兼发运副使。会时相不乐，密启换武，授利州观察使、知襄阳府，充京西南路安抚使。

七年，授鄂州驻劄御前诸军都统制。条奏军中六事，乞备器械、增战马、革滥赏，励奇功、选勇略、充亲随等，朝廷多从之。先是军中骑兵多不能步战，彦直命骑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虽统制官亦令以身帅之，人人习于劳苦，驰骋如飞。事闻，诏令三衙，江上诸军仿行之。

八年，丐归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阁侍制、知台州。丐祠养亲，提举佑神观，奉朝请。进对言：“顷自岳飞为帅，身居鄂渚，遥领荆襄，田师中继之，始分鄂渚为二军，乞复旧。”又乞并京西、湖北转运为一司，分官置司襄阳，可

一事体，帝善之。迁刑部侍郎。

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议：大辟三鞠之弗承，宜令以众证就刑，欲修立为令。彦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则善类被诬，必多冤狱。且笞杖之刑，犹引伏方决，况人命至重乎？”议卒格。以议夺吴名世改正过名，不当，降两官。

会当遣使于金，在廷相顾莫肯先。帝亲择以往，闻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问接国书事，论难往复数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书能力为主。”既至，几罹祸者数，守节不屈，金卒礼遣之，帝嘉叹。迁吏部侍郎，寻权工部尚书，复中大夫，改工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方控辞，以言罢，提举太平兴国宫，寻提举佑神观、奉朝请。

寻知温州，追捕巨猾王永年，究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间积逋，以郡余财代输之，然以累欠内帑坊场钱不发，镌一官。海寇出没大洋劫掠，势其张，彦直授将领土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贼首，海道为清。枢密奏功，进敷文阁学士，以弟彦质为两浙转运判官，引嫌易泉府。丐祠奉亲，差提举佑神观，仍奉朝请，特令佩鱼，示异数也。

入对，乞搜访靖康以来死节之士，以劝忠义。又上荐举乞选人已经关升、实历六考、无赃私罪犯者，杂试以经术法律，限其员额，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达，定为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满日，开具本州实在财赋数目，具公移与交代者，并达台省，庶可核实，以戢奸弊，帝悉嘉纳。

淳熙十年夏旱，应诏言，迺者滥刑，为致旱之由。明年，入对，论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马乃远在数百里外，乞

令归司。久之，再为户部尚书。会岁旱，乞广籴为先备。又乞追贬部曲曾经陷岳飞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阁学士。帝追感世忠元勋，遣使谕彦直，且谓彦直有才力，言者诬之。彦直感泣奏谢。寻提举万寿观，有疾，帝赐之药。进显谟阁学士，提举万寿观。

尝摭宋朝事，分为类目，名《水心镜》，为书百六十七卷。礼部尚书尤袤修国史，白于朝，下取是书以进，光宗览之，称善。进龙图阁学士，提举万寿观，转光禄大夫致仕。卒，特赠开府仪同三司，赐银绢九百，爵至蕲春郡公。

张 翥传

——《宋史》卷三七九

【说明】张翥，字柔直，福州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北宋徽宗时代。进士出身，曾为蔡京教育子女，并历任南剑州、福建、处州、虔州等地方官。张翥为人严峻，有深刻的政治眼光。他是宋代著名造船专家、对数学有较深的了解，并善于运用到实践中。晚年他曾进秘阁任修撰。

张翥，字柔直，福州人。进士出身，曾任小官吏，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当时正值蔡京任宰相，寻找善于教育孩子的人，而张翥刚好到京任职，蔡京的侄子便推荐了张翥。张翥再三推辞不过，遂应聘，因蔡京繁忙，当时没有去迎接他。张翥严厉孤傲，不同于其他老师，各位学生已不堪忍受，忽然他问学生说：“你们曾学过跑吗？”学生们吃惊地问道：“只听说老师教我们读书慢走，没有听说教跑的。”张翥说：“国家已被你们的父亲（祖父）破坏到如此地步，早晚叛军来了，必先到你们家，你们只有善于跑，才可以逃生呀！”学生们大惊，很快将这件事告诉给蔡京，说：“老师有异心。”蔡京惊慌地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事。”随即找张翥深谈，张翥

激动地说：“国家危在旦夕。”蔡京严肃地问该怎么办，张黼说：“应赶快招致有威望德义的人安置在你身边，用以广开人心。网罗天下忠勇义士安排在朝廷内外，是第一件义事。”蔡京便问他所了解的情况，张黼便推荐杨时，蔡京于是招用了杨时。

张黼后来在南剑州任职，接着又改任福建路转运判官。还未赴任，正值范汝为攻陷建州，派遣叶彻率众兵攻南剑州。当时，统制官任士安正率部队驻扎在城西，却不肯死战，张黼只有率州兵与叶彻部作战，张黼分州兵为几队，让城内杀牛羊猪作成肉串，并多做饭。将要开战，便让第一队人吃饭，吃饱后，即让投入战斗，接着让第二队人吃饭，估计所遣战士将疲劳，便派第三队人替换，第四至第五、六队皆如此轮换，更替交战，战士能吃饱而不困倦。叶彻被飞箭射死，其部撤走。张黼知道任士安害怕自己无功，便将叶彻的首级送给任士安，让他去请功，州兵对此很不满。张黼说：“贼兵肯定还要来，一定要与大部队合作才能消灭贼兵。”任士安得到叶彻的首级很高兴，遂派人飞报有关部门，说已杀了叶彻。过了不久，叶彻的二个儿子果然率领众贼兵声称要为其父报仇，身穿白色孝服来攻南剑州。这时，任士安与州兵合力夹攻，大败来犯贼兵，保全了州城。

张黼在处州任职时，曾想造一条大船，慕僚无法算出得花多少钱，张黼便教他们先造一条小船，量算它的大小尺寸，最后以十倍计算得出大船的实际费用。再有，修建绍光园神庙围墙时，让工匠计算，说得花费八万缗钱，张黼让他们先修建一丈长一段墙，以此费用折算，整个工程约值二万缗，便

以二万缗钱付给工匠。任职间，官府无所得，张翥上奏说绍兴贫困无法救济，太后便自己出钱，花费达三十二万缗。张翥以任职龙图阁的身份出任虔州知州，平定了叛军盗贼后，又晋升为秘阁修撰。去世后，葬于邵武。

(赵 荣 译)

【原文】

张翥，字柔直，福州人。举进士，为小官，不与世诡随。时蔡京当国，求善训子弟者，翥适到部，京族子应之以翥荐，翥再三辞，不获，遂即馆，京亦未暇与之接。翥严毅耸拔，意度凝然，异于他师，诸生已不能堪，忽谓之曰：“汝曹曾学走乎？”诸生骇而问曰：“尝闻先生教令读书徐行，未闻教以走也。”翥曰：“天下被而翁破坏至此，旦夕贼来，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尔。”诸子大惊，亟以所闻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见翥深语，翥慷慨言曰：“宗庙社稷，危在旦夕。”京敛容问计，翥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诸左右，以开道上心。罗天下忠义之士，分布内外，为第一义尔。”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杨时荐，于是召时。

翥后守南剑州，迁福建路转运判官。未行，会范汝为陷建州，遣叶彻拥众寇南剑，时统制官任士安驻军城西，不肯力战，翥独率州兵与之战，分为数队，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饭。将战，则食第一队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队人，度所遣兵力将困，即遣第三队人往代，第四至第五六队亦如之。更迭交战，士卒饱而力不乏。彻中流矢死，众败走。翥知士安惧无功，即函彻首与之，州兵皆愤，翥曰：

“贼必再至，非与大军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驰报诸司，谓已斩彻。未几，彻二子果引众声言复父仇，缟素来攻。于是士安与州兵夹攻，大败之，城赖以全。

再知处州，尝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计其直，甯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筑绍兴园神庙垣，召匠计之，云费八万缗，甯教之自筑一丈长，约算之可直二万，即以二万与匠者。董役内官无所得，乃奏绍兴空乏难济，太后遂自出钱，费三十二万缗。以直龙图阁知虔州，荡平余寇，进秘阁修撰。卒后，庙食邵武。

范成大传

——《宋史》卷三八六

【说明】范成大（公元 1126—1193 年），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南宋诗人、地理学家。

范成大酷爱旅游，他充分利用到各地作官的机会，沿途旅行考察，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他不仅写了三部有名的地理游记《揽辔录》、《骖鸾录》和《吴船录》，而且写了《桂海虞衡志》、《太湖石志》、《吴郡志》等地理专著。他的地理学成就主要有三项。

（1）自然地理。在他的游记和地理著作中，记载了各地的自然地理状况，如地貌、水文、气象气候，生物等。

（2）地质。在《桂海虞衡志》、《吴郡志》和《太湖石志》中，记载了不少地质现象、矿物和岩石，是中国古代比较重要的地质学文献。

（3）人文地理。在他的游记和地理著作中，记载了各地的人文地理状况，如交通路线、地名、地理环境变迁、农业、手工业、物产、水利设施、集市贸易、聚落、城市、民族风俗、人口、地方病、宗教、古迹、沿革等。

此外，范成大与陆游、杨万里、尤袤并列为南宋四大文学家，写了大量的诗词和文章，今存《石湖居士诗集》三十四卷。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公元 1154 年）考中进士。授予户部司官员，监和剂局。隆兴元年（公元 1163 年）任秘书省正字。以后又调任著作佐郎、吏部郎官。不久又升任郎中。有人议论范成大破格提拔太快了，不符合等级次序。朝廷只好罢免，让他回故乡奉祠休养。

不久，起用范成大为处州知州。与宋孝宗对策时，范成大提出要爱惜三力，即日力、国力和人力，不要让虚文空话把三力消耗了。孝宗认为讲得好，予以采纳。

处州百姓常常因谣役而打官司，成大创设义役，按各家贫富情况捐资买田，其田产收入用来帮助服役的人。这样按顺序轮流，二十年才轮到一次，方便了百姓。范成大把这种做法报告给皇帝，皇帝下令各省按这个办法做。处州多梯田，梁朝天监年间，詹、南两位司马组织民众，在松阳、遂昌之间修筑通济堰，把溪水送到四十里之外，灌溉田地二十万亩。到南宋时，由于时间久远，堰已毁坏，成大寻访遗迹，组织民众重新修筑，建造堤闸四十九处。又订立用水规则，使上、中、下的田很有秩序地得到灌溉，百姓受益。

范成大任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令》规定用绢计算赃物，这样估价轻而论罪重。成大向皇帝上书曰：“年成好时，一匹绢不到一千钱，而估价超过一倍。绍兴初年递增五分，一匹绢三千完全够了。现如今绢贵，当按时价加倍。”

皇帝听到这些话,感到吃惊,说:“这是陷百姓于深井的文字。”于是每匹绢增加到四千,而刑法轻了。

隆兴(公元1163—1164年)年间,南宋与金朝议和,“和议”约定,宋向金称侄皇帝,不再称臣。但此后宋、金使臣往来受书,仍沿用君臣礼。这是南宋朝廷的失策,是金朝对南宋的一种侮辱。对此,孝宗很懊悔。不久,决定派成大为使臣去金交涉,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礼仪。于是升任成大为起居郎、暂时代理资政殿大学士,出使金朝。国书上只讲归还洛阳巩县宋皇陵所在地,而孝宗则当面指示成大要改变受书礼。成大请求把两件事都写进国书,孝宗不准。金朝欢迎使者的人敬慕成大的名望,以至请求把头巾送给他们。到了燕山,成大秘密写奏章,请求改变受书礼。然后把奏章藏在怀里,带入金朝的宫殿。在殿上,成大先进国书,词语慷慨,金朝君臣正在倾听。忽然,成大改变内容,说:“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与叔侄不相称,臣有疏上奏。”说完,把笏插在身上,抽出奏章。金朝皇帝见此举动,非常惊骇,说:“这哪里是献书的地方呀?”左右大臣用笏端催促成大起来,成大屹然不动,必须把奏章送到皇帝手里才肯起来。金朝皇帝答应收奏章后,成大这才回国宾馆。金朝皇帝也派伴使宣旨取奏章。成大未肯起来的时候,金朝上下议论纷纷。金太子想动手杀成大,其兄越王制止了他。成大竟然不辱君命,安全而归。

成大任中书舍人。有一天孝宗手书崔寔《政论》赐给大臣,成大向孝宗进言说:“皇帝御书《政论》,意思是要整顿朝纲,除积敝。而近日大理寺议刑,递加一等。这不是以严

致太平，而是残酷。”孝宗称许为知己的言论。张说任签书枢密院事的文件送到待制范成大手中，范成大看后，觉得不妥，因为张说是奸佞外戚。他把文件扣留七日不往下发，又上疏皇帝劝阻，结果皇帝撤回任命书。

成大任静江府知府。广西贫穷落后，专靠盐利，这些盐利都被漕运部门取走了。于是州府城邑采取提高价格，抑制分配数额的办法抵制，成为敝端。朝廷下令恢复钞盐制度，漕运部门拿钞钱分给下属各部，但是钱不能按时拿到。成大入广西境，说：“利害有比这个还大的吗？”奏疏写道：“如果能裁减，抑制漕运部门强取的钱，使郡县经济宽松一点，那么郡县依法抑制的办法可以禁止。”皇帝采纳了这条建议。几年以后，广州盐商上书皇帝，要求恢复客贩。宰相认为可以恢复，并付出大量银钱帮助办理。别的大臣则认为这样做不对。皇帝要求有关机构审议，也没有改变成大说的办法。旧法规定，马以四尺三寸为限度。现在皇帝下令加到四尺四寸以上。成大说互市四十年了，不宜突然改变。

成大任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上疏给皇帝说：“吐蕃、青羌两次进犯黎州，而奴儿结、蕃列等更加凶暴狡猾，轻视中国。我准备操练士兵，在边界上修筑堡寨，对边民宣传团结、作战的方法，使边疆人人可以单独作战。然而办这三件事需要经费才行。”于是皇帝拨款四十万缗。成大说西南边疆地区，黎州最为紧要，增加军队五千。他上奏皇帝，在边疆地区按路线分都、监。吐蕃入侵的路线共有十八条，每条路线都修筑栅栏防守。奴儿结入侵安静寨，我们派飞山部队千人救援，预料三天奴儿结就会逃走，结果果然三天逃走了。白

水寨将领王文才偷偷娶奴儿结的姑娘为妻子，常常导引奴儿结入侵边疆。成大贴出重赏布告，不久，当地人就把王文才捉拿归案，处斩。蜀北边防旧有义务兵三万，为本地民兵。监司、郡守都要使用这支部队，都统司又要把这支部队跟正规部队换防。成大极力反对这种作法，上奏皇帝，皇帝下令照旧法办理。蜀知名人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刚五十九，都自动退职不做官，表示他们的气节。皇帝下令召回也不回去。蜀的有识之士从此心向宋朝。凡是可用的人才，都召到部队机关，用其所长，不究小节。那些有突出才能的人，则上奏章向朝廷推荐，让他们到中央机关作领导工作。

皇帝把成大调回京城考试，问有关政策，成大的应答使皇帝很满意。于是成大升任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个月后，成大被免职，又回老家奉祠休养。后来起用，任明州知州，上奏皇帝，请求取消每年要明州进贡海产品的规定。后又任端明殿学士，不久任金陵军事长官，适逢那年大旱，成大向皇帝打报告，请拨军粮米二十万救济饥民，减租米五万。水上居民徐五起义，号“静江大将军”，成大捕获徐五，处斩。成大后来因病请求休养，升任资政殿学士，再次担任洞霄宫的职务，享受祠禄。绍熙三年（公元11921年）升大学士。四年（公元1193年）死去。

成大一向有文学家的名望，尤其善于写诗。皇帝曾经要陈俊卿选一位文学人才掌内制，俊卿推荐成大和张震。成大大自号石湖，有著作《石湖集》、《揽轡录》、《桂海虞衡集》流行于世。

（杨文衡 译）

【原文】

范成大字致能，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擢进士第。授户曹，监和剂局。隆兴元年，迁正字。累迁著作佐郎，除吏部郎官。言者论其超躐，罢，奉祠。

起知处州。陛对，论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国力，曰民力，今尽以虚文耗之，上嘉纳。处民以争役嚣讼，成大为创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轮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后入奏，言及此，诏颁其法于诸路。处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万亩。堰岁久坏，成大访故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除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乾道《令》以绢计赃，估价轻而论罪重，成大奏：“承平时绢匹不及千钱，而估价过倍。绍兴初年递增五分，为钱三千足。今绢实贵，当倍时直。”上惊曰：“是陷民深文。”遂增为四千，而刑轻矣。

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上尝悔之。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上面谕受书事，成大乞并载书中，不从。金迎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帻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书式，怀之入。初进国书，词气慷慨，金君臣方倾听，成大忽奏曰：“两朝既为叔侄，而受书礼未称，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骇，曰：“此岂献书处耶？”左右以笏标起之，成大屹不动，必欲书达。既而归馆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纷然，太子欲杀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节而归。

除中书舍人。初，上书崔寔《政论》赐辅臣，成大奏曰：

“御书《政论》，意在饬纲纪，振积敝。而近日大理议刑，递加一等，此非以严致平，乃酷也。”上称为知言。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成大当制，留词头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说命竟寢。

知静江府。广西窘匱，专借盐利，漕臣尽取之，于是属邑有增价抑配之敝，诏复行钞盐，漕司拘钞钱均给所部，而钱不时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于此乎？”奏疏谓：“能裁抑漕司强取之数，以宽郡县，则科抑可禁。”上从之。数年，广州盐商上书。乞复令客贩，宰相可其说，成大出银钱助之。人多以为非，下有司议，卒不易成大说。旧法马以四尺三寸为限，诏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谓互市四十年，不宜骤改。

除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两犯黎州，而奴儿结、藩列等尤桀黠，轻视中国。臣当教阅将兵，外修堡寨，仍讲明教阅团结之法，使人自为战，三者非财不可。”上赐度牒钱四十万缗。成大谓西南诸边，黎为要地，增战兵五千，奏置路分都监。吐蕃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筑栅分戍。奴儿结扰安静寨，发飞山军千人赴之，料其三日必遁，已而果然。白水寨将王文才私娶蛮女，常导之寇边，成大重赏檄群蛮，使相疑贰，俄禽文才以献，即斩之。蜀北边旧有义士三万，本民兵也，监司、郡守杂役之，都统司又俾与大军更戍，成大力言其不可，诏遵旧法。蜀知名士孙松寿年六十余，樊汉广甫五十九，皆挂冠不仕，表其节，诏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归心。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用所长，不拘小节，其杰然者，露章荐之，往往显于朝，位至二府。

召对，除权吏部尚书，拜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

奉祠。起知明州，奏罢海物之献。除端明殿学士，寻帅金陵。会岁旱，奏移军储米二十万振饥民，减租米五万。水贼徐五窃发，号“静江大将军”，捕而戮之。以病请闲，进资政殿学士，再领洞霄宫。绍熙三年，加大学士。四年薨。

成大素有文名，尤工于诗。上尝命陈俊卿择文士掌内制，俊卿以成大及张震对。自号石湖，有《石湖集》、《揽辔录》、《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黄裳传

——《宋史》卷三九三

【说明】黄裳（公元 1146—1195 年），字文叔，隆庆府普成县（今四川省梓潼县东北）人。幼聪颖。乾道五年（公元 1169 年）及进士第，历任巴州通江县尉、国子博士、嘉王府翊善，起居舍人、给事中等职。他博览群书，通晓军事，并精通天文、地理。为人直言敢谏，朝野敬之。著有《王府春秋讲义》和《兼山集》等。

黄裳在嘉王府做翊善期间，为教育嘉王，曾作八幅图以献。淳祐七年（公元 1247 年），承嘉（今浙江永嘉）人王致远在四川获得其中四幅，并将摹刻在石碑上，注明为黄裳所作。至今仅存三块石碑图，即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现存于苏州文庙。

苏州石刻天文图，高 216 厘米，宽 108 厘米。上半为圆形全天星图，直径 91.5 厘米，全图以中国古代盖图方式绘制，反映出《步天歌》的三垣二十八宿系统。共绘有 1436 颗星，还画出银河界限，标出各部位相应名称等。下半为 2140 字的文字说明，概述天文基础知识，包括太极、天体、地体、南北极、赤道、日、月、黄白道、经星、土政五星、天汉、十

二辰、十二次、十二分野等。据现代天文学家研究，这是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大型石刻星图，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科学价值。

苏州石刻地理图，是一幅全国总图，高 221 厘米，宽 106 厘米，有较精确的江河、海岸等轮廓，标注山脉 120 多座，江河 60 多米，图中各要素关系的处理方法及各种符号设计等都属上乘，在宋代地图中是少见的。

此外，黄裳还制作过浑天仪和其他地图等。

黄裳，字文叔，隆庆府普城县人。幼年时聪明过人，能写文章。宋孝宗乾道五年（公元 1169 年）登进士第，调任巴州（今四川重庆）通江县尉。这时，黄裳更加努力读书学习，所作文章诗词比同辈人都高出一筹，人们见了都说：“已经不是以前的黄文叔了。”

当时，蜀中地区供应军队粮饷，名义上是用和籴的办法，实际上却是向百姓索取。黄裳写了一篇赋，名叫《汉中行》，以此劝讽总领此事的长官李繁，李繁读后，取消了和籴的办法，百姓们都感到便利。黄裳改任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录事参军。因四川制置使留正的推荐，宋孝宗召黄裳入朝答对，讨论蜀地兵民大计。迁为国子博士，后因母亲去世而离职。宰相进拟别的官吏，皇帝问黄裳在什么地方，得知黄裳的母亲去世，赐钱七十万。服丧期满后，又召黄裳入朝。

当时，宋光宗赵昀登皇帝位，黄裳入朝回答皇帝的提问，说：“我朝中兴以来（指宋室南迁）的规模和平日的守成不同，不论是出攻还是入守，都应当依据便利的形势，不可不确定国家的行都，以防万一。富裕国家，增强军队战斗力，不可

不讲求实际的功效利益，为此不能不严课吏治。安定国内，防御外面的侵略，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以应付突发事件，不可不建立经济、军事重镇。”黄裳讨论行都问题，认为就便利的形势而言，没有比建康（今江苏南京）更合适的了。谈到吏治，认为应建立一定的品级格式，以检验官吏的治民功效，计算其资历以使官吏的职务趋向稳定。谈论军事重镇，认为从东南的吴地（今江苏南部）直到西面的蜀地（今四川），东面绵延达万里，重要的城镇有汉中（今陕西汉中）、襄阳（今湖北襄阳）、江陵（今湖北江陵）、鄂渚（今湖北鄂州）、京口（今江苏镇江），为五大军事重镇，应该派将相大臣前去守卫，五镇强，则国家安固。除黄裳为太常博士，进为秘书郎。

后来，黄裳迁任嘉王府翊善（官名），讲解《春秋》经文中的“王正月”三字的意思说：“周代的王，就是现在的皇帝。王不能对诸侯发号施令，便不足以称为王。皇帝如果不能统领地方郡县城镇，则皇帝便不足以称为皇帝。现在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周代的王只因为不能号令诸侯，所以《春秋》必定要写‘王正月’，这是为了统一诸侯所应共同遵守的历法。现在我朝所统辖的国土，和祖宗相比还不到十分之四，然而仍跨有吴、蜀、荆、广、闽、越等二百个州。指挥我们的百姓的，便是这二百个州的太守；指挥国家军队的，是九个都统，如果不能统御他们，那怎么能够制驭天下？”嘉王问：“什么是九都统？”黄裳说：“唐太宗十八岁时便兴义兵，平定海内的祸乱。如今大王的年龄已超过了，却还不知道国家的九都统是怎么讲，你怎么能不加紧学习呢？”

过了些日子，嘉王提拔东宫原来的属吏吴端，吴端去向

嘉王表示感谢，嘉王在接待吴端时，行为都合于礼仪法度，黄裳乘机讲授《左传》一书中的“礼有等衰”四字，问嘉王说：“刚才接待吴端深得礼仪之道，是这样吗？”嘉王说：“是的。”黄裳说：“作为诸侯王学习新东西，正应当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现在大王在处理事务时能区别对待，这便是懂得了‘礼有等衰’的含义。嘉王听了以后，更加想学习了。于是，黄裳画了八幅图进献给嘉王。这八图是：太极图、三才本性图、皇帝王伯学术图、九流学术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最后以百官图结束，各自陈述其中要旨。黄裳总是进言说：“学习的办法，是应当用心去体验。大王应当以自己的心为严厉的教师，对自己的心有一丝一毫不安的事情，都不要去做。”而且还征引前代危亡的事情以为借鉴。嘉王对别人说：“黄翊善的话，别人接受不了，只有我可以接受。”他日，嘉王从重华宫经过，宋孝宗问他在读什么书，嘉王一一作了回答。宋孝宗说：“数量不觉得多了一些吗？”嘉王回答说：“讲官讲的非常清楚明白，我学起来很有兴趣，并不觉得多。”宋孝宗说：“黄翊善这个人非常真诚，他所说的话你要认真听取。”

黄裳长期在王府任职，每年到嘉王的生日诞辰，黄裳都要讲诗以寓讽谏。当初，黄裳曾经制作浑天仪、輿地图，加上有关的诗词文章，想使嘉王看了以后学业进步，懂得学习如同天地自然的运行一样没有停息。展开地图，就知道祖宗的疆土有一大半被异族攻占，至今还未收复。后来，又以嘉王所讲的三部经书写了三首诗，进献给嘉王，嘉王非常高兴，设酒款待，并亲手书写了黄裳的诗，然后赐给黄裳。一次，嘉王在皇宫中侍宴，在宴席上从容地为宋光宗朗诵《酒诰》，最

后说：“这是黄翊善教给我的。”宋光宗很高兴，下诏慰劳黄裳，黄裳说：“臣比不上朱熹，朱熹研究学问达四十年，如果把他召致到宫中，便会对国家政事有所裨益。”宋光宗高兴地接受了黄裳的意见。黄裳每次劝讲，必定援引古代以证今天，以事实说明道理，凡是可以开导嘉王之心的，便无所不言。

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黄裳迁为起居舍人。上奏说：“自古以来，皇帝不能听从臣下劝谏的，其原因有三个：一是有私心，二是有胜心，三是有忿心。办事情不出于公道，而固执地以自己的意见去处断，这叫私心。私心一旦产生，就对劝谏的人感到不满，便想办法要胜过他；胜人之心一产生，则劝谏的人便成了仇人，便要想办法驱逐他。因私心而生胜心，因胜心而生忿心，忿心一产生，则处理事情必然有不合于道理的。比如潘景珪这个人，本来是个平常之才，陛下本来也以平常人待他，只是因为台谏之臣不断攻击他，以致陛下更加庇护他，事情与形势相激，遂搞到这种地步。陛下应该按照事情本身做冷静的观察，使自己的心没有偏执，那样便听到台谏官吏的谏言，没有不感到高兴的，而没有想胜过对方的心思，待台谏之臣的心没有不诚恳的，这便没有加上忿心的意思了。”

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试用为中书舍人。当时，宋朝的军队和国防逐渐松弛，黄裳上疏说：“寿皇（指宋孝宗）在帝位三十年，抚恤国家将士，将士常常因为不能以死报效为恨。陛下如果能留心国防，三军将士哪个会不感激而愿为陛下所用呢？”又认为：“荆、襄一带居于吴地和蜀地的中间，地势平坦，如果金国人进攻襄阳，占据江陵，派兵驻守，则

吴地和蜀地的联系便会被切断，这是现在边境国防上最让人担忧的。应该分驻扎在鄂渚的军队一到二万人屯驻在襄阳和汉水之间，以强形势而加固该地区的防卫。”当时，南宋朝廷正安于和平，黄裳的建议多半不被采用。

不久，黄裳任给事中。赵汝愚任同知枢密院（宰相），监察御史汪义端认为按照祖宗制订的法规，宗室不能当执政大臣，并几次上书攻击赵汝愚，赵汝愚乞求离职。黄裳上奏说：“赵汝愚对父亲孝顺，对君上忠诚，在官位清廉。忧国忧民，完全是出于他的天性，有如青天白日一样，连下贱的奴隶之人人都知道他的清明。汪义端的见解，真连奴隶都比不上，他不应该居于朝中为官。”于是，汪义端被派出做地方官。

黄裳在给事中任上一个月，所封还驳回的奏折不下数十条。韩侂胄派任委官，郑汝谐当吏部侍郎，黄裳都敢对抗他们的命令。改黄裳任兵部侍郎，不上任，遂即以显谟阁侍制充翊善之职。在此之前，宋光宗因担忧疑心而患了病，不愿意从宋孝宗居住的重华宫经过，黄裳到皇中请求宋光宗每五天到重华宫朝见一次，这时黄裳又反复苦劝。宋光宗说：“内侍杨舜卿告诉我不要经过重华宫。”黄裳请求处死杨舜卿，而且以八项事上奏，有念恩、释怨、辨谗、去疑、责己、畏天、防乱、改过等。宋光宗不予理睬。

黄裳曾生过疥疮，到这时心中忧愤，旧病复发。他又上奏说：

陛下对于寿皇，没有尽孝敬之道，一定是陛下心中有所疑惑。臣暗中推测陛下起疑的原因，陛下难道是担心发生帝舜的父亲瞽叟和弟弟象焚烧仓廩、浚井以图加

害于舜那样的事情吗？焚烧仓稟，挖井口，在当时或许真有其事。寿皇的儿子只有陛下一个人，寿皇的心愿，寄托于陛下很重，爱护陛下很周到，所以为陛下担忧的心思非常真切。陛下生病，寿皇焚香祝福上天，为陛下祈祷。象这样爱护儿子，则焚烧仓稟，挖井的心思，臣以此知道必然不会有，陛下怀疑什么呢？或者陛下是担心发生唐肃宗那样的事吗？唐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境）即皇帝之位，并不是唐明皇的意思，所以不能没有疑心。寿皇在还没有对政务感到厌倦时，亲自将皇位传给陛下，揖逊廉让之风，如同尧、舜一样，很明显，这与唐明皇父子之事本不可同日而语，陛下有什么可疑呢？或者，陛下是担心发生卫辄那样的事吗？卫辄和蒯聩，父子二人争夺国家政权。寿皇年纪已老，而且有病在身，所以才在北宫安心养神，以保健康安宁，而将天下之事交付给陛下，这里并非有争夺之心，陛下有什么可疑呢？或者，陛下是担心发生孟子责人为善那样的事情吗？父子之间责之为善，本生于爱心，当儿子的能知道这个道理，怎么能至于互相压迫？寿皇愿陛下成为圣明的皇帝，要求陛下行善之心出于忠爱，而不是破坏恩爱，陛下还怀疑什么呢？

以上四个方面，也许是陛下心中起疑的原因，臣按道理推测，开始并没有一样是可以怀疑的。它来自父子之间，有些小的猜疑。这样的心思一产生，方寸便乱了。所以，天变发生了，则怀疑而不知道畏惧；百姓困顿，则怀疑而不加以抚恤；怀疑宰相执政专权，便不理睬大臣；

怀疑台谏无事生非，便不接受忠诚的劝谏；怀疑嗜好和欲望没有害处，便沉溺于酒色；怀疑君子拉帮结派，便庇护小人。事情有不需要怀疑的，却没有不加以怀疑的。陛下身为皇帝，不以尽孝闻于天下，敌对国家听说后，将会肆意轻视侮辱，这是可以怀疑的事情，陛下却不加怀疑；小人将要起来作乱，这是应该怀疑的，而陛下却不怀疑；遍布各地的官军，难道没有别的心思？这是该怀疑的，而陛下却不加怀疑。本来应该怀疑的事情，陛下却不加怀疑，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祸乱的萌发，也近在旦夕之间。陛下应从现在开始，幡然改悔，整理圣驾，拜谒两宫，与自己的父亲之间互相欢爱，那样便四夷向慕风化，而天下爱慕仁义了。

当时，正赶上宋孝宗身体不适，朝中内外忧惧，黄裳在朝堂不顾一切，高声劝谏。宋光宗听不下去，起身回宫，黄裳拉着宋光宗的衣襟一直跟到宫门口，才挥泪而出。黄裳又接连上疏，请光宗到宫外来，说：“臣有三个职务：侍制、侍讲和翊善。现在要让臣供侍制的职称吗？则臣应当从早到晚站在陛下对面，以寻找陛下的过失。现在，陛下不从重华宫经过，未尽儿子的责任，臣前后劝谏了三次而陛下不听，这样，侍制的职务可以废掉了。要让臣供侍讲的职称吗？则臣应当引经据典，援古证今，劝陛下行孝顺之道。现在陛下既不向寿皇问安，又不探视寿皇的疾病，已经丧失了大义，臣还有什么可讲的？侍讲的职务也可以废掉了。要让臣供翊善的职务吗？臣应当深究义理，以孝道教育皇子，陛下不能以孝道敬事寿皇，臣将用什么来劝教皇子呢？翊善的职务也可

以废除了。”之后，黄裳出宫，听候处理。等听说了寿皇的遗诏，才赶紧进宫供职办事。

宋宁宗即位后，黄裳有病而不能入朝，改任礼部尚书，不久又兼侍读之职。黄裳挣扎着病体，入朝表示感谢，上奏说：

孔子说：“能做到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才行吧？”又《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谓“有始有终”，是因为从始至终全神贯注专一；所谓“鲜克有终”，却是因为精神不能专一。陛下今天刚刚发布的政令固然有好的，可是，能保持以后常常象这个样子吗？臣请略略举陛下已经办过的事情谈谈自己的看法。

陛下刚开始日理万机，便委任大臣，这正得人君办事持要抓关键之道。如果以后选择大臣都象现在一样选得合适人选，则陛下即使是终身任用他们也可以了。臣恐怕几年之后，陛下也想有所作为，非要事事亲自处理，左右的人迎合陛下的心意，说陛下在外庭决断政事，权力不被臣下分去，那样陛下难道心中能不变得乖戾吗？臣恐怕那时陛下委任大臣，不会象现在这样专心一志了。朝中政务每日头绪万端，不是一个人所能理得过来的，如果不委任于大臣，则必定借助左右之人，这样小人容易得志，暗中窃得陛下的权力，引用邪党，他们带来的祸患，简直无处不在，这是臣所担忧的第一点。

陛下奖励、采纳台谏的话，他们的建议没有不听的，这正符合祖宗设置这个官职的意思。如果台谏选得合适的人选总是象现在这样，则陛下只须终身任用他们便可以了。然而臣恐怕从现在起，台谏的话每天都在陛下耳

边响起，或言谈小人的过错，使陛下想任用小人却办不到；或者暴露陛下身边的人的罪恶，使陛下想亲近这些人却办不到，逆耳的言论，听起来不可能没有厌倦，左右的人迎合陛下，乘机说陛下奖励任用台谏，是想听到正确正直的言论，而这样带来的弊病，却让陛下不能自由，陛下难道能不在心中感到不愉快吗？臣恐怕那时陛下奖励任用台谏，不会象现在这样倚重了。朝廷中所以辨别善恶的凭借，全在台谏之官，陛下如果讨厌他们话说多了，则为台谏的人，将会闭紧嘴巴，什么也不谈论。君子逐渐疏远，小人却日渐上进，天下便会陷入扰乱之中。这是臣所担忧的第二个问题。

以上两件事，是朝廷所应注意的大事。另外，臣还想讲三件与陛下切身有关的事：笃于孝敬友爱，勤于学习知识，少一些个人嗜好。陛下现在都已经实践了，不知几年之后，陛下能否象今天这样保持下去？

黄裳又援引唐代魏征对唐太宗所谈论的十渐不克终以为鉴借，非常诚恳，有几千字之多。又上奏说：“陛下近来所作的事和以前颇不相同，任官授人的事情，许多大臣都不知道，臣听说后，十分担忧，病情也加剧了。”大概当时韩侂胄已经暗中滥用权力，而宰相赵汝愚尚未发觉，所以黄裳先提了出来。等病情加重时，黄裳经常喃喃自语，说：“五年的功夫，不能在一天里就坏掉。估计我已经做不了什么事了。以后的君子之中，必定有能胜任此任的人。”便口述了一份遗表，然后去世了，年仅四十九岁。宋宁宗听说后，十分吃惊，非常悼念，诏赠黄裳资政殿学士。

黄裳为人不计小节，正直、纯洁。每次讲读，都随时随事进纳忠诚之言，上接古人之意，下度当世人情，气平而言语恳切，简练却尽于事理。又笃于孝敬友爱，和别人说话必尽心中之所想，毫无保留。以一书不读，一物不知而感到可耻。推崇贤人，乐于行善，是出自天性自然。黄裳写的文章，言语通达，条理清晰。著有《王府春秋讲义》和《兼山集》，论谈天地人伦的道理，人性运命之本源，都是以发扬光大伊、洛学派（指二程的理学）的宗旨。黄裳曾经和他的同乡人陈平父兄弟在一起研讨学问。陈平父是理学家张栻的门人，其师友渊源都有源流可寻。嘉定年间，谥黄裳号为忠文。黄裳的儿子黄瑾，任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孙子黄子敏，当过刑部郎官。

（任文坚 译）

【原文】

黄裳字文叔，隆庆府普成人。少颖异，能属文。登乾道五年进士第，调巴州通江尉。益务进学，文词迥出流辈，人见之曰：“非复前日文叔矣。”

时蜀中饷师，名为和籴，实则取民。裳赋《汉中行》，讽总领李玘，玘为罢籴，民便之。改兴元府录事参军。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荐，召对，论蜀兵民大计。迁国子博士，以母丧去。宰相进拟他官，上问裳安在，赐钱七十万。除丧，复召。

时光宗登极，裳进对，谓：“中兴规模与守成不同，出攻入守，当据利便之势，不可不定行都。富国强兵，当求功利之实，不可不课吏治。捍内御外，当有缓急之备，不可不立重镇。”其论行都，以为就便利之势，莫若建康。其论吏治，谓立品式以课其功，计资考以久其任。其论重镇，谓自吴至

蜀，绵亘万里，曰汉中，曰襄阳，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当为五镇，以将相大臣守之，五镇强则国体重矣。除太学博士，进秘书郎。

迁嘉王府翊善，读《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号令诸侯，则王不足为王；帝不能统御郡镇，则帝不足为帝。今之郡县，即古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号令诸侯，故《春秋》必书“王正月”，所以一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时不能十之四，然犹跨吴、蜀、荆、广、闽、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统也。苟不能统御，则何以服之？”王曰：“何谓九都统？”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义兵，平祸乱。今大王年过之，而国家九都统之说犹有未知，其可不汲汲于学乎？”

他日，王擢用东宫旧人吴端，端诣王谢，王接之中节。裳因讲《左氏》“礼有等衰”，问王：“比待吴端得重轻之节，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学，正当见诸行事。今王临事有区别，是得等衰之义矣。”王意益向学。于是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每进言曰：“为学之道，当体之以心。王宜以心为严师，于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为儆戒。王谓人曰：“黄翊善之言，人所难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过重华宫，寿皇问所读书，王举以对，寿皇曰：“数不太多乎？”王曰：“讲官训说明白，忧心乐之，不知其多也。”寿皇曰：“黄翊善至诚，所读须谛听之。”

裳久侍王邸，每岁诞节，则陈诗以寓讽。初尝制浑天仪、

與地图，侑以诗章，欲王观象则知进学，如天运之不息，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其后又以王所讲三经为诗三章以进。王喜，为置酒，手书其诗以赐之。王尝侍宴宫中，从容为光宗诵《酒诰》，曰：“此黄翊善所教也。”光宗诏劳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学问四十年，若召置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纳。裳每劝讲，必援古证今，即事明理，凡可以开导王心者，无不言也。

绍熙二年，迁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从谏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胜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于公，而以己见执之，谓之私心；私心生，则以谏者为病，而求以胜之；胜心生，则以谏者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胜，因胜而生忿，忿心生，则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台谏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势相激，乃至于此。宜因事静察，使心无所系，则闻台谏之言无不悦，而无欲胜之心，待台谏之心无不诚，而无加忿之意矣。”

三年，试中书舍人。时武备寢弛，裳上疏曰：“寿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将士，士常恨不得效死以报。陛下诚能留意武事，三军之士孰不感激愿为陛下用乎？”又论：“荆、襄形势居吴、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捣襄阳，据江陵，按兵以守，则吴、蜀中断，此今日边备之最可忧也。宜分鄂渚兵一二万人屯襄、汉之间，以张形势而壮重地。”时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

未几，除给事中。赵汝愚除同知枢密院，监察御史汪义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为执政，再疏丑诋汝愚，汝愚乞免官。

裳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隶知其清明。义端所见，曾奴隶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于是义端与郡。

裳在琐闼甫一月，封驳无虑十数，韩侂胄落阶官，郑汝谐除吏部侍郎，裳皆缴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显谟阁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忧疑成疾，不过重华宫，裳入疏请五日一朝，至是复苦言之。上曰：“内侍杨舜卿告朕勿过宫。”裳请斩舜卿，且以八事之目为奏，曰念恩，释怨，辨谗，去疑，责己，畏天，防乱，改过。不报。

裳尝病疽，及是忧愤，创复作，又奏：

陛下之于寿皇，未尽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窃推致疑之因，陛下母乃以焚廩、浚井之事为忧乎？夫焚廩、浚井，在当时或有之。寿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寿皇之心，托陛下甚重，爱陛下甚至，故忧陛下甚切。违豫之际，炳香祝天，为陛下祈祷。爱子如此，则焚廩、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无也，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肃宗之事为忧乎？肃宗即位灵武，非明皇意，故不能无疑。寿皇当未倦勤，亲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逊之风，同符尧、舜，与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语明矣，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卫辄之事为忧乎？辄与蒯聩，父子争国。寿皇老且病，乃颐神北宫，以保康宁，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争心也，陛下何疑焉？又无乃以孟子责善为疑乎？父子责善，本生于爱，为子者能知此理，则何至于相夷。寿皇愿陛下为圣帝，责善之心出于忠爱，非贼恩也，陛下何疑焉？

此四者，或者之所以为疑，臣以理推之，初无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间，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乱。故天变则疑而不知畏，民困则疑而不知恤，疑宰执专权则不礼大臣，疑台谏生事则不受忠谏，疑嗜欲无害则近酒色，疑君子有党则庇小人。事有不须疑者，莫不以为疑。乃若贵为天子，不以孝闻，敌国闻之，将肆轻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小人将起为乱，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中外官军，岂无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则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为疑，颠倒错乱，莫甚于此，祸乱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过，整圣驾，谒两宫，以交父子之欢，则四夷向风，天下慕义矣。

会寿皇不豫，中外忧危，裳抗声谏。上起入宫，裳挽其裾随之至宫门，挥涕而出。乃连章请外，谓：“臣职有三：曰待制，曰侍讲，曰翊善。今使供待制之职乎？则当日夕求对以裨主失。今不过宫，有亏子道，前后三谏而不加听，是待制之职可废也。将使供侍讲之职乎？则当引经援古，劝君以孝。今不问安，不视疾，大义已丧，复讲何书乎？是侍讲之职可废也。将使供翊善之职乎？当究义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寿皇，臣将何说以劝皇子乎？是翊善之职可废也。”因出关待命。及闻寿皇遗诏，乃亟入临。

宁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礼部尚书，寻兼侍读。力疾入谢，奏曰：

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又《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谓“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谓“鲜克有终”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

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请略举已行之事论之。

陛下初理万机，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则陛下虽终身守之可也。臣恐数年之后，亦欲出意作为，躬亲听断，左右迎合，因谓陛下事决外庭，权不归上，陛下能不拂然于心乎？臣恐是时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专矣。夫以万机之众，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则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阴窃主权，引用邪党，其为祸患，何所不至？臣之所忧者一也。

陛下奖用台谏，言无不听，此正得祖宗设官之意。使台谏得人，常如今日，则陛下终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台谏之言日关圣听，或斥小人之过，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习之罪，使陛下欲亲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无厌，左右迎合，因谓陛下奖用台谏，欲闻谏论，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拂然于心乎？臣恐是时奖用台谏，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恶者，专在台谏，陛下苟厌其多言，则为台谏者，将咋舌闭口，无所论列。君子日退，小人日进，而天下乱矣。臣之所忧者二也。

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于陛下之身言之：曰笃于孝爱，勤于学问，薄于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数年之后，能保常如今日乎？

又引魏徵十渐以为戒，恳恳数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为颇异前日，除授之际，大臣多有不知，臣闻之忧甚而病剧。”

盖是时韩侂胄已僭弄威柄，而宰相赵汝愚未之觉，故裳先事言之。及疾革，时时独语，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坏之，度吾已不可为，后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责者。”遂口占遗表而卒，年四十九，上闻之惊悼，赠资政殿学士。

裳为人简易端纯，每讲读，随事纳忠，上援古义，下揆人情，气平而辞切，事该而理尽。笃于孝友，与人言倾尽底蕴。耻一书不读，一物不知。推贤乐善，出乎天性。所为文，明白条达。有《王府春秋讲义》及《兼山集》，论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发明伊、洛之旨。尝与其乡人陈平父兄弟讲学，平父，张栻之门人也，师友渊源，盖有自来云。嘉定中，谥忠文。子瑾，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孙子敏，刑部郎官。

刘義叟传

——《宋史》卷四三二

【说明】刘義叟（公元1015—1058年），字仲更，山西晋城人。宋代著名天文历法家。他强记博闻，精算术，尤长于天文历算。欧阳修编写《新唐书》时，他撰写了其中的《历志》六卷，《天文志》三卷和《五行志》三卷。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时，其中的《司天考》一卷也由他执笔。

刘義叟毕生献身于天文事业，曾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文献，写下了《十三代史志》、《刘氏辑术》、《春秋灾异》等书。这些著作虽然都已散失，但留给后人的影响却很深。

阮元在《畴人传》中评论说：“義叟遍通古代步法，上起汉元，下迄五代，为长术，于是气朔及闰一一可考。其有功于史学甚巨也。”義叟作历代长术，首开其端，后为钱大昕和汪曰桢、陈垣等人所效法，先后写成《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历代长术辑要》、《中西回史日历》等，成为史学研究中一部十分有效的工具书。

刘義叟，字仲更，泽州晋城（山西晋城）人。欧阳修出

使河东的时候，向朝中推荐他的学术，试用他为大理评事的官职，并暂且担任赵州军事判官。他精通算术，并且兼通大衍等历法。在编写唐史的时候，分配他专门编写《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

不久让他担任编修官，又改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由于母亲去世在家守孝，皇帝为了发挥他的作用，就命令他在家里编书。书写成以后，升任他为崇文院检讨，还未来得及进宫叩谢，就因背上生毒疮而去世。

刘羲叟博闻强记，尤其擅长于星象，历法和术数。皇祐五年的时候，在星宿的地方发生日食，这个时候正好是胡瑗铸出一口又深又直的钟，声音沉闷不响亮。同时陕西又铸造了大的钱币，于是刘羲叟说：“这就是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所遇到的占事相同，皇帝将有心腹的疾病。”以后仁宗皇帝果然生了病，又见到月亮进到太微星宿，刘羲叟就说：“后宫里面将有丧事。”果然张贵妃死了。至和元年，在正南面发生了日食，又有客星在昴宿这个方位出现，刘羲叟又说：“契丹宗真皇帝要死了吗？”他所作的这些占事，结果都得到了验证，刘羲叟在没有生病的时候曾经说：“我到秋天的时候必死。”为自己在父亲坟旁选择了墓地，占卜墓穴的方向，并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按他的嘱咐埋葬了他。著有《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等书。

（卢莲蓉 译）

【原文】

刘羲叟字仲更，泽州晋城人。欧阳修使河东，荐其学术。试大理评事，权赵州军事判官。精算术，兼通大衍诸历。及

修唐史，令专修律历、天文、五行志。寻为编修官，改秘书省著作佐郎。以母丧去，诏令家居编修。书成，擢崇文院检讨，未入谢，疽发背卒。

羲叟强记多识，尤长于星历，术数。皇祐五年，日食心，时胡瑗铸钟^弇而直，声郁不发。又陕西铸大钱，羲叟曰：“此所谓害金再兴，与周景王同占，上将感心腹之疾。”其后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后宫当有丧。”已而张贵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阳，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验。羲叟未病，尝曰：“吾及秋必死。”自择地于父冢旁，占庚穴，以语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刘氏辑历》、《春秋灾异》诸书。

程大昌传

——《宋史》卷四三三

【说明】程大昌（公元 1123—1195 年），字泰之，宋代徽州休宁人。绍兴二十一年（公元 1151 年）进士，曾任吴县主簿、著作佐郎、国子司业兼礼部侍郎、浙东提点刑狱、江西转运副使、秘阁修撰、国子祭酒、权吏部尚书、泉州知府、明州知府等职，卒谥文简。程大昌笃好学问，对于古今之事都要考察研究。《演繁露》是他的一部笔记杂著，其内容广泛，涉及不少自然科学内容，其中对度量衡的考证，对色散现象的认识，对太阳和月亮的认识，对浑仪和浑象的区分，考证印书的起源，考证水车，玻璃的源流，及对龙门的解释等在中国科学史上都是较早和较重要的发现和认识。他的《禹贡论》是部地理学著作。

程大昌，字泰之，是徽州休宁人。他十岁就能撰写成篇文辞，绍兴二十一年登进士第。授吴县主簿，适逢他父亲故去，而未去上任，丧服除去后，他撰写了《十论》来讨论当时的国家大事，并把它奏献给朝廷，宰相汤思退看后称奇，提拔程大昌为太平州教授。第二年，调至京师任太学正，继而

参与选用馆职官的策试，因论述得当改任秘书省正字。

宋孝宗即皇帝位，程大昌迁升为著作佐郎。当时，孝宗皇帝刚刚临政，急于拓广功业，广向四方发布命令，贵臣和亲近们往往参与机密和决策。有一次，恰逢孝宗命令大小众官针对朝政得失和社会状况，提出意见，程大昌奏说：“汉代的石显知道汉元帝信任自己，就事先请求获得了夜间能开启皇宫之门的诏书。后来有一天，石显故意在夜晚归还，口称有诏书命令开启宫门，有人据此弹劾石显假托君命，汉元帝不但不重视这问题，还笑着拿出以前的诏书给人来看。自这以后，石显真的假托君命发布诏敕，人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朝颁布命令例行均由三省发出，就是为了防止此类弊病的。请求从今起凡是直接得到皇帝交办的诏令，都要送交三省审议，重行奏准，方可施行，这样才合乎祖宗的规章，才能防止象石显那样的奸诈。”此外，他还奏道：“去年，完颜亮入侵，没有一个将士拼死守卫，但是对将帅的策封授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应该重视的是，只有李宝在胶西的告捷，虞允文在采石的战胜，这两战才是打败完颜亮并最终促成其被杀的基础，可是现今李宝被免去兵权，虞允文也调知夔州，对比之下，前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就是公论所说的不平啊。”皇帝称是，将程大昌选拔为恭王府赞读，并升迁为国子司业兼权代理部侍郎、直学士院。皇帝询问程大昌道：“我掌握不好治国的原则，成效不大，怎么好？”程大昌对答道：“陛下治国的勤奋节俭超过了往古的帝王，自从女真与中原通和以后，已经知道尊敬中原了，不轻易南侵，这不能说没有成效。只要广求贤才，采纳忠谏，修明政事，那么陛下大有

作为的功业必在其中了,没有必要去另外求寻什么奇计异策,来侥幸迅速取得成功。”他又说道:“沿淮河上建筑的城池已经不少,更应考虑情势急迫的时候派什么人去守卫。设立险要还不如训练好兵卒,训练好兵卒还不如选择好将帅。”皇帝称是。

程大昌受任为浙东提点刑狱。遇到这年丰收,酒税超过了原来的额定总数,有人挟持朝廷的命令要求增加额定总数,程大昌坚决加以拒绝,说:“大昌宁可获罪免职,也不能增加酒税总额。”他又迁徙为江西转运副使,大昌说:“这可以直接去做兴有益的事,去除有弊的事,来实现我的志向了。”正遇这年歉收,程大昌从其原财政结余中,提出十多万缗钱,代吉、赣、临江、南安等地的百姓交纳夏税折帛。清江县原有破坑、桐塘两个堰坝,用来阻挡江水保护农田和人民的住房,受益面积几乎达到二千顷大,后来堰坝损坏,每年都要遭受水灾,已有四十年了,程大昌尽力主持领导,使之修复如初。

程大昌晋秘阁做修撰,被召任为秘书少监,皇帝慰劳他说:“你是我亲自选拔的。监司之内如果人人都象你一样,我还有什么忧愁呢?”接着又兼职中书舍人。六和塔寺的僧人自认为镇服潮水有功,请求皇帝许与奖赐,而且因而免除他们私买田地的课税和徭役的征调。大昌奏道:“寺庙买田业已违法,又要把他们应该提供的课税徭役转嫁给百姓,这怎么能允许它呢!况且自从修建六和塔以后,潮水果真不再侵蚀岸边了吗?”终于停止颁给这样的命令。程大昌暂代刑部侍郎之职,升侍讲兼国子祭酒。程大昌说道:“行使刑法是为了防止出现触犯刑法的事,没听说把放纵有罪的人当作施行仁政的。

现今四方各地审判定案都打算宽免死罪，我认为司法官吏应当遵守法律规定，皇帝认为可以宽免的再宽免。如果是这么作，那么法律在下面就能得到伸张实行，而爱人之德的仁都可归属于皇上了。”皇帝认为是这样的。又让他兼任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容部下无理殴打百姓，湖北守帅辛弃疾据实向朝廷上书参劾，不但没有获准，反因此而被调任江西守帅。大昌为此上奏，极力论述处置不当，还指出：“如此下去，今后所有驻有屯田戍守将的州郡，都将无法管理了。由于大昌之言深切合理，率逢原终于被削掉两级官阶，而降为本军的副将。程大昌接连升迁，升至权吏部尚书。他说：“现在的军队里，原来西北的老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子孙中刚正健壮的，应当训教他们战阵打仗，不要轻意听任这些人离开军队。况且禁卫的将士，祖先不是只用他们来作宿卫的，南北征战，都曾用他们作为前锋。现今大约三年就要抽调补充外任，所用违背他们的长处，有了征战，就没有人可以挑选了。开始作为有武略的人才来选择的人怎能后来作为庸才常人使用呢？希望还是留住他们在三衙而不要派遣他们作它用吧。”

正值中央地方更迭官制，程大昌极力请求去外任，做州郡地方官，于是他出任泉州。汀州人沈师作乱反叛，有个城池的镇守军官姓萧的统领与之交战中阵亡，整个福建地区都为之惊恐震动，泉州告警，大昌急发军书，通过海道，约请距泉州较近之军队统制裴师武率兵讨伐增援，裴师武因为没有得到地区统帅军符而没有行动，程大昌亲笔写信催促裴师武说：“事势急迫，如果守帅责问你，你可拿我的书信来解

脱自己。”当时，贼寇谋划攻城，先派间谍穿甲衣准备放火作为攻城的内应。正赶上裴师武的军队赶到，又捕捉到间谍，贼寇遂即溃散而去。程大昌迁为建宁知府。宋光宗继立嗣位，又徙调为明州知府，不久，又被任命为奉祠宫观之官，绍熙五年，程大昌告老辞官，作为龙图阁学士退休。庆元元年，程大昌亡故，终年七十三岁，被谥为文简。

程大昌笃好学问，对于古今事情没有不考察研究的。他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和《北边备对》等著作被刊行于世上。

(夏经林 译)

【原文】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人。十岁能属文，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主吴县簿，未上，丁父忧。服除，著《十论》言当世事，献于朝，宰相汤思退奇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为太学正，试馆职，为秘书省正字。

孝宗即位，迁著作佐郎。当是时，帝初政，锐意事功，命令四出，贵近或预密议。会诏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汉石显知元帝信己，先请夜开宫门之诏。他日，故夜还，称诏启关，或言矫制，帝笑以前诏示之。自是显真矫制，人不复言。国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请自今被御前直降文书，皆申省审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规，以防石显之奸。”又言：“去岁完颜亮入寇，无一士死守，而兵将至今策勋未已。惟李宝捷胶西，虞允文战采石，实屠亮之阶。今宝罢兵，允文守夔，此公论所谓不平也。”帝称善，选为恭王府赞读。迁国子司业兼权礼部侍郎、直学士院。帝问大昌曰：“朕治道不进，奈何？”

大昌对曰：“陛下勤俭过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中国，不可谓无效。但当求贤纳谏，修政事，则大有为之业在其中，不必他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筑城太多，缓急何人可守。设险莫如练卒，练卒莫如择将。”帝称善。

除浙东提点刑狱。会岁丰，酒税逾额，有挟朝命请增额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宁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转运副使，大昌曰：“可以兴利去害，行吾志矣。”会岁歉，出钱十余万缗，代输吉、赣、临江、南安夏税折帛。清江县旧有破坑、桐塘二堰，以捍江护田及民居，地几二千顷，后堰坏，岁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复其旧。

进秘阁修撰，召为秘书少监，帝劳之曰：“卿，朕所简记。监司若人人如卿，朕何忧？”兼中书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镇潮为功，求内降给赐所置田产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既违法置田，又移科徭于民，奈何许之！况自修塔之后，潮果不啮岸乎？”寝其命。权刑部侍郎，升侍讲兼国子祭酒。大昌言：“辟以止辟，未闻纵有罪为仁也。今四方谳狱例拟贷死，臣谓有司当守法，人主察其可贷则贷之。如此，则法伸乎下，仁归乎上矣。”帝以为然。兼给事中。江陵都统制率逢原纵部曲欧百姓，守帅辛弃疾以言状徙帅江西。大昌因极论“自此屯戍州郡，不可为矣！”逢原由是坐削两官，降本军副将。累迁权吏部尚书。言：“今日诸军，西北旧人少，其子孙伉健者，当教之战阵，不宜轻听离军。且禁卫之士，祖宗非独以备宿卫而已，南征北伐，是尝为先锋。今率三年辄补外，用违其长，即有征行，无人在选。奈何始以材武择之，而终以庸常弃之乎？愿留三衙勿遣。”

会行中外更迭之制，力请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贼沈师作乱，戍将萧统领与战死，闽部大震。漕檄统制裴师武讨之。师武以未得帅符不行，大昌手书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帅责君，可持吾书自解。”当是时，贼谋攻城，而先使谍者衷甲纵火为内应。会师武军至，复得谍者，贼遂散去。迁知建宁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寻奉祠。绍熙五年，请老，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庆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谥文简。

大昌笃学，于古今靡不考究。有《禹贡论》、《易原》、《雍录》、《易老通言》、《考古编》、《演繁露》、《北边备对》行于世。

秦 观 传

——《宋史》卷四四四

【说明】秦观（公元 1049—1100 年），字少游。江苏高邮人。是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也是养蚕缫丝的技术专家。该传记中对他的诗才和政治遭遇都有交代，而对他所写《蚕书》却只字未提，在《宋史·艺文志》中则把《蚕书》的作者说成是他的儿子秦湛（处度），但是经过近人的考证，《蚕书》的确实是出于秦观之手。书成于元丰六（公元 1083 年）。秦观在自序中说：“余闲居，妇善蚕，从妇论蚕，作蚕书。”书中的内容分为变种，时食，制居，化治，钱眼，琐星，添梯，车，祷神，戎治等目，记述了从蚕种保护，催青，直至结茧的有关蚕体生理和饲养技术，缫丝的操作要点和缫丝车的结构以及养蚕风俗等。据秦观所说：书中所记的是袁州人的方法，可能与吴地蚕家有所不同。但这本书出版以后，却与江南地区出现的《陈勇农书》，并行流传，对于江南地区的蚕业生产有一定的影响。今天看来，秦观《蚕书》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蚕业著作。在此之前，虽然已出现蚕经和蚕书，但都早已失传。因此，此书对于研究中国蚕业史也有重要价值。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年轻时豪爽奔放，慷慨激昂，从他所作的文词中就可以表露出来。但在进士的科举考试中却不幸落榜。秦观志气刚强、盛气凌云、而又喜欢博大，在人们的心目是非常奇特的。读军事方面的书籍与他的志气吻合。他曾经在徐州见到苏东坡，并在黄楼上赋诗，东坡读后，觉得他具有古代诗人屈原、宋玉的才华，又将他的诗作向王安石介绍，王安石看过之后，也说他是诗象魏晋时期诗人鲍照和谢朓的诗作一样清新。东坡勉励他继续走科举之路，来供养自己的亲人，这才中举为进士。调任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公元1086—1094年）初年，东坡以贤良方正的名目，向朝廷推荐秦观，秦观担任了太学博士，从事校正秘书省书籍的工作，升为正字官，同时还兼任国史院编修官。皇上每天都有砚、墨、器、币之类的东西赐给他。绍圣（公元1094—1098年）初年，因为党派斗争的缘故，出任杭州通判，又因御史刘拯根据有关政绩好坏的实际记录，贬了他的官，让他担任处州酒税监理，有人见风使舵，受人指派，专门来找秦观的茬儿，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便以他写佛书的罪名打小报告，他被罢免迁往郴州、继而在横州接受管制，又被迁往雷州。徽宗即位后，恢复了他宣德郎的职位，由雷州释放，在回归的路上来到了藤州，游览了华光亭，向他身边的客人咏诵了他梦中所作的诗词，提出想要喝水，水来了，他笑望着水，就过去了。他早已为自己逝世自作了挽词，挽词写得非常悲哀，读者为之感到悲伤。秦观享年五十三岁，有《文集》四十卷。秦观擅长于议论，文辞非常漂亮，而思想内涵却非常深刻。东坡听到了他过逝的消息

后感叹地说：“少游不幸死于路上，多么的悲伤啊！世上难道还会有这样的人吗？”秦观的弟弟秦觏，字少章；覿，字少仪，哥俩都能写出一手好文章。（曾雄生 译）

【原文】

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扬州高邮人。少豪雋，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又介其诗于王安石，安石亦谓清新似鲍、谢。轼勉以应举为亲养。始登第。调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轼以贤良方正荐于朝，除太学博士，校正秘书省书籍，迁正字，而复为兼国史院编修官。上日有砚墨器币之赐。绍圣初，坐党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刘拯论其增损实录，贬监处州酒税。使者承风望指，候伺过失，既而无所得，则以谒告写佛书为罪，削秩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复宣德郎，放还，至藤州，出游华光亭，为客道梦中长短句，索水欲饮，水至，笑视之而卒。先自作挽词，其语哀甚，读者悲伤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及死，轼闻之叹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弟觏字少章，覿字少仪，皆能文。

郭 雍 传

——《宋史》卷四五九

【说明】郭雍（公元？—1187年），字子和，号白云先生，南宋时期医学家，祖籍洛阳。他与其父郭忠孝都精通易学，他的言论收入《大易粹言》。郭雍终生隐居，朝廷旌召不仕。皇帝先后赐号冲晦处士，颐正先生。晚年对医学深有所研究，尤好张仲景之书。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著有《伤寒补亡论》十卷。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之论，又录宋肱、宠安时、常器之等各家之说，以补张仲景阙略，因此该书具有较高医学价值。

郭雍，字子和，祖上为洛阳人。父亲郭忠孝，号兼山先生。官至太中大夫，师承于程颐，著有《易说》，自有传。郭雍继承他父亲的学问，通达世务，隐居于峡州，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长杨山谷间，号称白云先生。

乾道（公元1165—1173年）中，被峡州太守任清臣、湖北帅张孝祥推荐给朝廷，征召不应，皇帝赐号冲晦处士。宋孝宗深知他的贤德，常常对大臣们称赞他，命令郭雍所在的州郡每年都要备礼慰问。后来，又改封为颐正先生，让部使

者派遣官员询问郭雍的想法，并全都记录下来上报。这时，郭雍已经八十三岁了。

淳熙（公元1174—1189年）初年，学者汇集程颢、程颐、张载、游酢、杨时及郭忠孝、郭雍共七家的言论，编成《大易粹言》，刊行于世，其中叙述郭雍的学术观点：

“周易贯通天地人三才，包括万物的道理。伏羲画八卦，得之于天而阐明天道；文王重八卦，得之于人而阐明人道。伏羲画八卦是为天，天是为君之道，所以五对人来说是君；文王重八卦是为地，地是为臣之道，所以二对人来说是臣。以上下二卦分别而言是如此。就六爻而言，那么三、四都是为人之道，所以称它们为中爻。

乾，元亨利贞，最初称为四德。后又改称乾元，万物创始，无所不利。对走远路的柔顺的母马有利，对品行端正的君子有利。因此四德也可以说具有两种含义，乾，阳的象征；坤，阴的象征。由乾这一卦而论，则元与亨为阳，利与贞为阴，犹如春夏秋冬，虽然是四季，从阴阳来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就天而论元亨利贞，就象确立天象之道，分成阴与阳两类；就地来说元亨利贞，就象确立地理之道，分成柔与刚两类；就人来说元亨利贞，就象做人的道理，分成仁与义两类。

又有坤卦的六五爻，坤卦虽为臣道，五实际上是君位，虽然有柔韧之德，不妨害其为君；就象乾卦的九二爻，虽然有为君的德行，不妨害其为臣。所以乾卦有两个君位，德却无两个君位；坤卦有两个臣位，德却无两个臣位。六五爻以柔居尊位，下下之君。江海能成为百

川之王的原因，是它善于包含、容纳。下下本来就是坤德。黄色，中正之色，是诸色中最美的；裳，下身的衣服，这是以最好的德行而甘居人之下。”

其阐述发挥到如此精辟。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去世。（郭健译）

【原文】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阳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夫，师事程颐，著《易说》，号兼山先生，自有传。雍传其父学，通世务，隐居峡州，放浪长杨山谷间，号白云先生。

乾道中，以峡守任清臣、湖北帅张孝祥荐于朝，旌召不起，赐号冲晦处士。孝宗稔知其贤，每对辅臣称道之，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更封颐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问雍所欲言，备录缴进。于是，雍年八十有三矣。

淳熙初，学者裒集程颢、程颐、张载、游酢、杨时及忠孝、雍凡七家，为《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说曰：

易贯通三才，包括万理。伏羲氏之画，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羲画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为君。文重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为臣。以上下二卦别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则三四皆人道也，故谓之中爻。

乾，元亨利贞，初曰四德。后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马贞，利君子贞。是以四德为二义亦可矣。乾，阳物也。坤，阴物也。由乾一卦论之，则元与亨阳之类，利与贞阴之类也。是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由阴阳观之，则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也。天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

天之道，阴与阳之类也。地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地之道，柔与刚之类也。人之所谓元亨利贞者，如立人之道，仁与义之类也。

又坤之六五，坤虽臣道，五实君位，虽以柔德，不害其为君，犹乾之九二，虽有君德，不害其为臣。故乾有两君，德无两君；坤有两臣，德元两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黄，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不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

其发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王处讷 王熙元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王处讷（公元 914—982 年），河南洛阳人，五代及宋初天文历法家。他自后汉初年起，就一直在司天监中任职，官至司天监等，很得当时历法家王朴的敬重。北宋初年，他受命编订了北宋第一部历法——《应天历》。《应天历》自成一家体系，其所用近点月和五星基本数据都很精密，其历法模式为以后的《乾元历》、《仪天历》所效法。王处讷还与从西域来华的阿拉伯天文学家马依泽合作，将星期的制度第一次引入中国历法的推步之中。王处讷还对五代的漏刻结构作出了改进，使测时更为精密。

王熙元，王处讷之子，幼年随父学习，也精天文历算。历任司天监监丞、同判、少监、司天监等职。曾奉皇上之命撰著《阴阳事》十卷，后皇帝赐名为《灵台秘要》，是天文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王处讷，河南洛阳人。小时候有一位老人来到他的家里，以洛河中的石煮了之后象面一样，让处讷吃了，并且对他说道：“你秉性聪明有悟性，以后定能成为人们的师长。”又曾

经梦见一个人手中拿着一面巨大的镜子，在镜子里面映照出灿烂夺目的星宿，他剖开王处讷的腹部将镜子放入。王处讷梦醒之后大汗淋漓，直到一个多月后，心胸仍感觉疼痛。由于这个原因他开始注意学习星宿、历法、占卜这类的学问，深入研究那些内容。在后晋末年的战争中，避乱于太原，后汉高祖刘知远当时担任节制官，将他收在幕府中。后汉高祖接位以后，任命他为司天夏官正，又调出京城补任许田县令之缺，再调回任国子监尚书博士，并参与司天监的领导工作。

后周太祖郭威在当皇帝前，曾与王处讷同在后汉高祖朝廷中做官，彼此交情颇深，到了周太祖从邺城起兵进至汴城后，便下令寻访王处讷，找到他之后很是高兴，于是便问起后汉刘氏国运如此短暂的事，他回答道：“这个国君在没有得到皇位的时候，为人还宽厚大度；等到他做了皇帝，就想着报仇。后汉刘氏占据中原地区，继承正统，如果用历数推测，国运应该比较长久。可是等到高祖得皇位之后，因报仇杀人，灭人家族的事太多，这样便与天下人结怨，以至国运不能长久。”听后周太祖郭威跺脚长叹。这时正好周太祖派兵包围后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家，想等天亮后抓起来杀掉他们，便马上下令制止了这件事。由于逢吉已自杀，只制止了杀刘铢，余下的人也全都保全了性命。

广顺年间（公元951—953年），调任司天少监。周世宗柴荣因行用的旧历出了差错，命令王处讷详细审定。新历制成，还未来得及送上，便遇到枢密使王朴作钦天监献上，经过检查后还相当精密，这时王处讷私下对王朴说：“这部历法还是可以使用的，但不久就会出现差错。”于是便给王朴指出

其缺点，王朴深表同意。

到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由于《钦天历》的差错，宋太祖命令王处讷另造新历。经过三年新历编成，共计六卷，宋太祖亲自写序，并命名为《应天历》。王处讷又因漏刻不准确，便重新审定水秤、观测中星、划分五鼓时刻。不久又调任少府少监。到了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初年，改任司农少卿，并参与司天监的领导工作。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又献上新历二十卷，被任命为司天监。担任司天监后一年多去世，享年六十八岁，他的儿子叫做熙元。

王熙元，幼年时便跟随父亲学习，开宝（公元968—976年）年间，在司天监中补为司天历算。到了端拱（公元988—989年）初年，升任监丞，又多次调任太子洗马兼掌春官正，并加任殿中丞的官。景德（公元1004—1007年）年间，担任司天监同判。等到政府东封泰山的时候，跟随经度制置使来到祭祀的地方，礼节完毕，暂时让他担任司天少监。汾阴祠庙拜礼的时候，便正式任命他为少监。他又奉皇上的命令于后苑撰写《阴阳事》十卷，献上之后，真宗亲自为它写序，并赐名为《灵台秘要》，又作诗记载了这件事。

开始时，有人编造《仪天历》献上，秋官正赵昭益说，此历二年以后定出差错，另外推得的火星度数也稍有出入，以后果然验证。熙元很为他精湛的学识所折服。皇上常对宰相提起历算之事，说道：“历象是阴阳家这些人的重要工作，是以推算天体的行度，准确预报季节为主要目的的。并且又说：“赵昭益能专心做他的工作，他的才干学识是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玉清昭应宫建造完毕，因熙元工作勤勉，升任他为司天监。由于为皇家选择祭祀日期出现差错，被贬为少监，改任将作监直到退休。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岁。

（卢莲蓉 译）

【原文】

王处讷，河南洛阳人。少时有老叟至舍，煮洛河石如面，命处讷食之，且曰：“汝性聪悟，后当为人师。”又尝梦人持巨鉴，星宿灿然满中，剖腹纳之，觉而汗洽，月余，心胸犹觉痛。因留意星历、占候之学，深究其旨。晋末之乱，避地太原，汉祖时领节制，辟置幕府。即位，擢为司天夏官正，出补许田令，召为国子尚书博士，判司天监事。

周祖尝与处讷同事汉祖，雅相厚善，及自邺举兵入汴，遂命访求处讷，得之甚喜，因问以刘氏祚短事。对曰：“人君未得位，尝务宽大；既得位，即思复仇。汉氏据中土，承正统，以历数推之，其载祀犹永。第以高祖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周祖蹶然太息。适发兵围汉大臣苏逢吉、刘铢等家，待旦将行孥戮，遂命止之。逢吉已自杀，止诛刘铢，余悉全活。

广顺中，迁司天少监。世宗以旧历差舛，俾处讷详定。历成未上，会枢密使王朴作《钦天历》以献，颇为精密，处讷私谓朴曰：“此历且可用，不久即差矣。”因指以示朴，朴深然之。

至建隆二年，以钦天历谬误，诏处讷别造新历。经三年而成，为六卷，太祖自制序，命为《应天历》。处讷又以漏刻

无准，重定水秤及候中星、分五鼓时刻。俄迁少府少监。太平兴国初，改司农少卿，并判司天事。六年，又上新历二十卷，拜司天监。岁余卒，年六十八。子熙元。

熙元，幼习父业，开宝中，补司天历算。端拱初，改监丞，累迁太子洗马兼春官正，加殿中丞。景德中，同判监事。东封，随经度制置使诣祠所，礼毕，授权知司天省监。祠汾阴，真拜少监。奉诏于后苑缵《阴阳事》十卷上之，真宗为制序，赐名《灵台秘要》，及作诗纪之。

初，上所修《仪天历》，秋官正赵昭益言其二年后必差，又荧惑度数稍谬，后果验。熙元颇伏其精一。上常对宰相言及历算事，曰：“历象，阴阳家流之大者，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时为功。”且言：“昭益能专其业，人鲜及也。”

玉清昭应宫成，以祇事之勤，授司天监。坐择日差谬，降为少监。以目疾，改将作监，致仕。天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苗 训 苗守信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苗训，生卒年不详，享年七十余岁。由于掌握天文知识，擅长占星术，宋太祖赵匡胤即帝位后受到重用。历任翰林天文、光禄大夫、工部尚书等官职。据《畴人传四编》说，其著作有《太平乾元历》共九卷、太平兴国七年（公元 982 年）著《新修历经》共三卷。

苗守信（公元 954—1000 年），苗训之子，少年时代跟随其父学习天文知识和占星术，先被补充做历书推算工作，也任过江安县主簿，不久又改任天文主簿，后来升为冬官正、太子洗马、殿中丞、少监等官职。苗守信在天文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参与由吴昭素主持的《乾元历》的制定工作，公元 981 年完成，行用于公元 983—1000 年。

苗训，河中人，善于以天象变化进行占卜的占星术。先是在后周任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的官职。显德末年（公元 959 年），跟随宋太祖赵匡胤征伐北方，苗训看到太阳上还有另一个太阳（按：实为影像）长时间在幌动，好象是在争斗的样子，就指着对楚昭辅说：“这是上天意志的反映。”

傍晚抵达陈桥驿，出征的军队拥护宋太祖做皇帝，苗训都已经事先预告这些事要发生。宋太祖接受后周皇帝让给的帝位后，提拔苗训为翰林天文，不久又加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活到七十余岁而死。他的儿子名叫守信。

苗守信，少年时代跟随父亲学习天文知识和占星术等，补在历法机构做历书推算工作，不久被授予江安县主簿，又改任司天台主簿，主持历书编纂工作。太平兴国（公元977—984年）年间，由于发现《应天历》出现了误差，宋太宗下诏书要苗守信与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刘内真一起制定新的历法。新历完成后，太宗命令卫尉少卿元象宗，与懂得历法的其他人一起进行校对审定，赐给新历法《乾元历》的称号，因《乾元历》精确度高，太宗对参与制定新历的人都赏赐给丰厚的绸缎。雍熙（公元984—987年）年间升任冬官正，端拱初年（公元988—989年）改任太子洗马、司天监判官。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守信向太宗上书说：“正月一日为一岁的开始。每月八日，是天帝下到人间巡视、察看善与恶。干支日名和干支年名相同的日子归木星主管，是君主的形象。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是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是各自分别主持记录人的善与恶的日子。另外，春季的戊寅日、夏季的甲午日、秋季的戊申日、冬季的甲子日，分别为上天大赦的日子。还有皇上的生日诞辰，都不要处理判处死刑的事务。”这份报告被下达给官吏们讨论执行。过了不长时间，转任殿中丞，暂时代理少监之职的事务，品级在少监之下，不久就赏赐给紫衣金鱼袋表示器重。

至道二年（公元 996 年），皇帝因为梁州、雍州一带地方屯有重兵，连年由于农业灾害严重歉收，忧心重重，命令宰相把守信召来，问他是否有证据说明这是上天的责备。对此守信上奏折说：“我仰观特殊玄奥的天象，推算和验证到天龙星座内的太一星所经过的位置，所对应于地面上的荆楚、吴越、交广等地都是安宁的。长期以来，水、金、火、土五大行星互相侵犯彗星出现在水神太一星和临近井宿、鬼宿之间时，对应于地面上的分野属秦、雍和梁、益等地，老百姓会遭到灾害的忧患。水神太一星明年进入燕地分野的位置，明年又是主房心星之年，正是对应于京城这地方，从此以后全国上下都有值得祝贺的事。”这分奏折被批示交给史馆。明年（公元 997 年），正式授予少监的官衔。咸平三年（公元 1000 年）去世，终年六下四岁。他的儿子是苗舜卿，担任国子博士的官职。（李维宝 译）

【原文】

苗训，河中人，善天文占候之术。仕周为殿前散员右第一直散指挥使。显德末，从太祖北征，训视日上复有一日，久相摩荡，指谓楚昭辅曰：“此天命也。”夕次陈桥，太祖为六师推戴，训皆预白其事。既受禅，擢为翰林天文，寻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年七十余卒。子守信。

守信，少习父业，补司天历算。寻授江安县主簿，改司天台主簿，知算造。太平兴国中，以《应天历》小差，诏与冬官正吴昭素、主簿刘内真造新历。及成，太宗命卫尉少卿元象宗，与明律历者同校定，赐号《乾元历》，颇为精密，皆优赐束帛。雍熙中，迁冬官正。端拱初，改太子洗马、判司

天监。淳化二年，守信上言：“正月一日为一岁之首。每月八日，天帝下巡人世，察善恶。太岁日，为岁星之精，人君之象。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又，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为天赦日。及上庆诞日，皆不可以断极刑事。”下有司议行。未几，转殿中丞、权少监事，立本品之下，俄赐金紫。

至道二年，上以梁、雍宿兵，弥岁凶歉，心忧之，令宰相召守信问以天道咎证所在。守信奏曰：“臣仰瞻玄象，及推验太一经历宫分，其荆楚、吴越、交广并皆安宁。自来，五纬陵犯，彗星见及水神太一临井鬼之间，属秦、雍分及梁、益之地，民罹其灾。水神太一来岁入燕分，岁在房心，正当京都之地，自兹朝野有庆。”诏付史馆。明年，真授少监。咸平三年卒，年四十六。子舜卿，为国子博士。

韩显符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韩显符（公元 939—1013 年），少年时代学习过天文仪器制作、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等知识，进入天文机构工作后，历任监生、灵台郎、冬官正、春官正、太子洗马、殿中丞兼翰林天文等官职。韩显符在天文科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研究浑天仪的原理及其制作。公元 990 年，他开始主持制造铜铸浑仪，历经五年时间，由九大部件组成的浑仪才得以完成。晚年，受命收学生传授浑仪制作等天文知识。撰写有浑仪制作方面的专著——《铜浑仪法要》，十卷，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历法基本数据要以实测进行修正。这种观点确是继承了前人的真知灼见。

韩显符，其家世不了解，也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少年时代学习天文仪器制作、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等，擅长于观测日月星辰，被补在天文历法机构——司天监任监生，后升任灵台郎，直至升任冬官正。显符专门研究浑天的学问，淳化初（公元 990 年），上表请求制造铜质的浑天仪、候风地动仪。皇帝指示给予所需要的费用，以便于显符进行策划，选

择工匠铸造。至道元年（公元 995 年），浑仪的制造完成，在司天监内建筑平台置放，显符为此得到各种彩色的绸缎五十匹的赏赐。显符向皇上呈递了他著的《铜浑仪法要》共十卷，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说到：

伏羲氏建立浑仪，测量北极星距离地平线的高度，测量太阳照射竹杆影子的长短变化，定出南北东西方向，观测星星之间的相对距离。帝尧继位后，羲氏、和氏建立浑仪，观测确定历法中所需的日、月和星星的位置数据，编出历书让老百姓掌握时日季节变化，使他们知道生产中的事要按轻重缓急进行计划安排。到了虞舜时代，则是用璇玑玉衡观测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行变化。《通占》对此解释说：“使用浑仪观测天象，宇宙间万千的变化现象都算不得多了。”由此可知浑仪这种仪器，实在是天地间一切自然创造的准则，阴阳变化和历法所用数据都要从这里开始。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都毫不例外地用它来精确详尽地观测天象，预先得知差错。浑仪的制作或是用铜铸成，或者还用玉石装饰，放置在房子的庭院中，派遣负责观测的日官和皇上身边的大臣一同进行观测。

从伏羲时代的甲寅年至本朝大中祥符三年即庚戌年（公元 1010 年），积累共有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从古代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五个帝王开始直至今日，能明白天象变化的玄妙、知道浑天学说的奥秘的人，大约先后分布在十余个朝代，若再进一步考察讨论，能达到神奇精通程度的只不过四、五个人，其余的仅只注重于

眼前的夸夸其谈，并不考虑长远的实际观测计划，才造成了推算天象的数据不准，历法逐渐出现误差，与季节变化不同步，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视运动速度的快慢难以确定。皇上说到要求废弃象装饰品一样无用的仪器，于是才制造浑仪。用漏刻定时间来观测天体的运行周期，自然是很容易辨别判断，如果人的眼睛在下面看，测量的铜管在上面运转，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运行的快慢程度，从它们距离其他恒星位置的远近，就可以测出它们是在逆行还是在顺行，明了是吉还是凶，然后修福而使之顺其自然，反省所做的事而避开天象所诉灾难，这一切都可用浑仪来进行观测验证。

过去汉朝的洛下闳制作浑仪，测定《太初历》所用的基本数据，就曾经说：“五百年后必须重新进行实测来制定历法。”到了唐朝的李淳风时，果然符合前面的说法。贞观初年（公元627年），李淳风总结了以前各朝代所造浑仪的优缺点及其误差，考虑到精确度的要求而提出用铜铸造。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唐太宗在皇宫之中修建起凝暈阁，使身边的大臣用造好的浑仪进行检验。但浑仪既是放置在宫中，一般人见不到，后来便不知移到什么地方去了。唐玄宗命一行和尚制定《大衍历》，都是以浑仪实测的数据作为依据。对浑仪的制造，先是由梁令瓚设计（黄道游仪）并制成木模，一行说它做得精密，其构思超过了古人，便以铜铸造。今天在文德殿在鼓楼下面还有一架按古人方法用铜铸的浑仪，制作极为粗糙简陋，不能使用。况且为了编订历法而用来观测的仪器，

不用浑仪就不能考察数据的真伪。编算历书的人，不以实测检验就不知道数据是否准确。浑仪制成用来观测，则历法机构可以推算编定出包括各项内容的年历使用，其好处是可以使历书详细而又精密。

浑仪共有九大部件组成（按：双规、游规、直规二个、窥管、平准轮、黄道、赤道、龙柱四个、水臬），从此显符专门从事浑仪的实测试验研究，多次升官至春官正，又转任太子洗马。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皇帝命显符从在职官吏或子孙中选择可传授浑仪制造和使用方法的人。显符说：“大儿子监生承矩，善于观测天体运行周期，二儿子保章正承规，已懂得历法的推算，还有主簿杜贻池、保章正杨惟德，都是可以传授这门学问的人。”皇帝又命显符和贻范等人参加进行考察验证。显符后来改任殿中丞兼翰林天文的官职。六年（公元1013年）去世，终年七十四岁。皇帝又命监丞丁文泰继承他的事业。（李维宝 译）

【原文】

韩显符，不知何许人。少习三式，善察视辰象，补司天监生，迁灵台郎，累加司天冬官正。显符专浑天之学，淳化初，表请造铜浑仪，候仪。诏给用度，俾显符度，择匠铸之。至道元年，浑仪成，于司天监筑台置之，赐显符杂彩五十匹。显符上其《法要》十卷，序之云：

伏羲氏立浑仪，测北极高下，量日影短长，定南北东西，观星间广狭。帝尧即位，羲氏、和氏立浑仪，定历象日月星辰，钦授民时，使之缓急。降及虞舜，则璇

玑玉衡以齐七政。《通占》又云：“抚浑仪，观天道，万象不足以为多。”是知浑仪者，实天地造化之准，阴阳历数之元。自古圣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详天象，预知差忒。或铸以铜，或饰以玉，置之内庭，遣日官近臣同窥测焉。

自伏羲甲寅年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岁，积三千八百九十七年。五帝之后迄今，明历象之玄，知浑天之奥者，近十余朝，考而论之，臻至妙者不过四五，自余徒夸重于一日，不深图于久要，致使天象无准，历算渐差，占候不同，盈虚难定。陛下讲求废坠，爰造浑仪，漏刻星躔，晓然易辨。若人目窥于下，则铜管运于上，七曜之进退盈缩，众星之次舍远近，占逆顺，明吉凶，然后修福俾顺其度，省事以退其灾，悉由斯器验之。

昔汉洛下闳修浑仪，测《太初历》。云：“后五百年必当重制。”至唐李淳风，果合前契。贞观初，淳风又言前代浑仪得失之差，因令铜铸。七年，太宗起凝晖阁于禁中，俾侍臣占验。既在宫掖，人莫得见，后失其处所。玄宗命沙门一行修《大衍历》，盖以浑仪为证。又有梁令瓚造浑仪木式，一行谓其精密，思出古人，遂以铜铸。今文德殿鼓楼下有古本铜浑仪一，制极疏略，不可施用。且历象之作，非浑仪无以考真伪。算造之士，非占验不能究得失。浑仪之成，则司天岁上细行历，益可致其详密。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显符专测验浑仪，累加春官正，又转太子洗马。

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诏显符择监官或子孙可以授浑仪法者。显符言：“长子监生承矩，善察躔度，次子保

章正承规，见知算造，又，主簿杜贻范、保章正杨惟德，皆可传其学。”诏显符与贻范等参验之。显符后改殿中丞兼翰林天文。六年（公元 1013 年）卒，年七十四。又诏监丞丁文泰嗣其事焉。

史 序 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史序（公元 934—1010 年），字正伦，宋代京兆人。因懂得历法的推算而进入国家天文机构工作。历任司天主簿、监丞、太子洗马、殿中丞、少监等官职。

史序在天文科学上的主要成绩，是主持制定了《仪天历》。宋真宗继承帝位，指示史序考查研究前代历法的基本数据，准备制定新的历法。史序在前代历法的基础上，主持制定出《仪天历》，公元 1000 年完成，即开始行用，至公元 1023 年为止。在制定新历法的任务完成后，又编辑《天文历书》，共完成了十二卷。

史序，字正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因他擅长于天文历法的计算，太平兴国（公元 977—984 年）年间，被补为司天学生。宋太宗亲自对考卷进行比较，提升他为主簿，稍后又升为监丞，赏给绯鱼袋，隶属翰林天文院领导。雍熙二年（公元 985 年），朝廷进行考试后入选者二十六人，而史序在入选的人中是第一名，被任命为主持历书的推算工作，并负责监督其事。

淳化三年（公元 992 年），司天郑昭宴说：“我推算金星和火星运行的度数位置必定会很靠近在一起，今天进行观测验证，实际情况是火星逐渐往南运行，金星逐渐向北移动，好象在互相回避，于是没有相遇在一起。”对此史序进一步解释说：“木、火、金三大行星天刚黑时在天顶的子午圈附近，木星在东侧，火星在中间，金星的位置最西，金星逐渐向北运行而与火星相距一尺多远的视距离，这是因为我们国家敬仰尊重天道，被皇上的贤明德行感动所致。”

史序后来多次升官，相继任夏官正、河西和环庆二路的随军转运使、太子洗马等。他主持制定的《仪天历》上报朝廷，又把曾经编辑成的《天文历书》共有十二卷贡献出来，从而任殿中丞的官职，得到紫色官服和金鱼袋的赏赐，不久又暂时代理监事。景德二年（公元 1005 年），又暂时主持少监的职务，大中祥符初（公元 1008 年）正式担任少监。三年（公元 1010 年）去蕊，终年七十六岁。史序在任职期间谨慎而又尽责，做官三十年，不曾有过过失，颇受众人的称赞。

（李维宝 译）

【原文】

史序，字正伦，京兆人。善推步历算，太平兴国中，补司天学生。太宗亲较试，擢为主簿。稍迁监丞，赐绯鱼，隶翰林天文院。雍熙二年，廷试中选者二十六人，而序为之首，命知算造，又知监事。

淳化三年，司天郑昭宴言：“臣测金、火行度须有相犯，今验之天，而火行渐南，金度渐北，有若相避，遂不相犯。”序又言：“木、火、金三星初夜在午，木在东，火在中，金最

西，渐北行去火尺余。此国家钦崇天道，圣德所感也。”

序后累迁夏官正，河西、环庆二路随军转运，太子洗马。修《仪天历》上之，又尝纂《天文历书》为十二卷以献，改殿中丞，赐金紫，俄权监事。景德二年，迁权知少监，大中祥符初即真。三年卒，年七十六。序慎密勤职，在监三十年，未尝有过，众颇称之。

刘 翰 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刘翰（公元 919—990 年），沧州临津（今河北临津）人，世代医学家出身。后周显德（公元 954—959 年）初年，以高明的医术和因献《经用方书》等医药书籍而被授予翰林医官。宋太祖北征，曾命刘翰从行，后任命为朝散大夫等职。公元 963 年，皇帝令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的医学水平，以刘翰为优，被淘汰者达 26 人。刘翰由于和马志一起为宋太宗诊病有功升任尚药奉御。开宝六年（公元 973 年），宋太祖诏刘翰、马志、翟煦、张素、吴复珪、王光佑、陈昭遇等详定《新修本草》，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二十卷，书成后又经李昉、王佑、扈蒙等勘定，由国子监印行。不久，宋王朝又命李昉等重加校订，增加新药，并改进药物分类方法，书成后定名为《开宝重订本草》，有二十一卷，共收药 983 种，较唐本草增加新药 139 种。此书由政府“广颁天下，传而行焉”。刘翰由于领衔修订本草有功，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被任命为当时的医学最高学府——翰林医官院使，相当院长。

刘翰，沧州临津（今河北临津）人，世代以行医为业。刘翰起初在护国军节度使下代理巡官。周显德初（公元954—960年）年，刘翰赴朝廷献上《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治世集》二十卷。此举获世宗嘉奖，他被任命为翰林医官，所献书籍交付史馆收藏，又加官卫尉寺主簿。

宋太祖向北出兵征讨，指派刘翰随从行军。建隆（公元960—963年）初年，刘翰加官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其时太祖力求政治清明安定，事事都要审核属实，因此要求有医药养生等技能的人必须精强干练。乾德（公元963—967年）初年，宋太祖命太常寺考核评比翰林医官的学术技艺，以刘翰为最优，淘汰医术不精者二十六人。此后，朝廷又诏告各州访求医术高超有专长的人，将他们的姓名进行登记，并依常规酌量发给置装费，所经驿站负责供应饮食，派遣他们赴朝廷。开宝五年（公元972年），宋太宗在王府生病，指派刘翰和马志为其诊治。太宗病愈后，刘翰升为尚药奉御，赏赐银器、贯钱和鞍辔俱全的马。

刘翰曾奉诏详细校定《唐本草》，在刘翰和道士马志、医官翟煦、张素、吴复珪、王光佑、陈昭遇的共同主持下，校定药物总起来有《神农本经》三百六十种，《名医录》一百八十二种，《唐本草》原先增加的一百一十四种，有名称而无用法的一百九十四种，刘翰等人又检验确定新增加一百三十三种。工作完成后，宋太祖诏命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造王佑、左司员外郎知制造扈蒙详细校勘后献上。李昉等人此书作序说：

撰写《三坟》之书，神农是作者之一。神农辨别各种药

物的性味之后，写《神农本草经》加以著录，故旧有古经书三卷在世间流传。后来的《名医别录》，是与《神农本草经》相对独立地编辑成书。直至梁时的陶弘景才用《名医别录》补充《神农本草经》，他将两书内容用红字和黑字相间书写，在当时可称得上清楚准确了。陶弘景还考证了各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为《神农本草经》作注解。此书编成七卷，在南方流传。到了唐代，又一次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补充校正，新增药物八百多种，并添加注释，编为二十卷。《唐本草》对《神农本草经》中的遗漏和缺失作了补充，对陶弘景的错误说法进行了检查纠正。虽然如此，但随年岁的交替，又过了四百年，到现在红字和黑字，没有刊本予以统一；新旧注释，文字上各自存在着错误。如果不是圣明君主把握天下大同的国运，拥有永久无边的喜庆，怎么能对此加以改正呢！

于是太祖就下令全面校勘流传下来的错误，刻印成标准的版本。分类标准不恰当的现象，从此得到了改正。至于象笔头灰，原是兔毫，却分在了草部，现改放在兔头骨的下面；半天河、地浆都是水，也分在了草部，现改放在土石类中；败鼓皮改放在兽类；胡桐泪移归木类；紫矿，也是属于木类，被从玉石类中改正过来；伏翼，其实是禽类，由虫鱼部移至其下；橘柚归在果实下面；食盐放在光盐之后；生姜、干姜全都划归一类；至于鸡肠、繁菱、陆英、蒴藋，就根据相近的种类，将它们随附其后。本书编纂过程中，大量摘录陈藏器的《本草拾遗》、李含光的《本草音义》，有的问题从其它典籍中穷根究源，

有的问题则广泛征求于医学名家,将各种意见参照比较,辨别其中的对错得失。至于象突屈白,过去说是灰类,现在定为木根;天麻根,以前解释说象赤箭,如今更全然不同。本书还剔去错误,选择正确,特别单独设立新条目。此外,其它的校勘纠正,不可胜数。

本书广泛征求下面各家意见,审核无误后刻版印刷。于是用白字表示《神农本草经》的内容,用黑字表示《名医别录》的内容,唐代和宋代修订所加内容,分别用‘唐附’、‘今附’加以明确标注,使药物的解释更加详尽,形态性味更加明确。书中凡为证明内容错误而加以讨论的文字,题名为‘今注’,凡为考察文句意义而加以阐述的文字,又题名为“今按”,将内容意义辨别清楚后,道理也就审察明白了。现在将新旧药物共九百八十三种,加上目录为二十一卷,向天下广为颁布,使它传布流行。

刘翰后来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任命刘翰为翰林医官使,又加官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滑州刘遇生病,诏命刘翰疾驱前往诊视。刘翰回来说刘遇一定会痊愈,但不久刘遇便死了。刘翰因负有责任而获罪,降职为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公元988—989年)初年,刘翰被起用为尚药奉御。淳化元年(公元990年),刘翰恢复为医官使。刘翰去世时享年七十二岁。

(屈宝坤 译)

【原文】

刘翰,沧州临津人。世习医业,初摄护国军节度巡官。周显德初,诣阙献《经用方书》三十卷、《论候》十卷、《今体

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付史馆，再加卫尉寺主簿。

太祖北征，命翰从行。建隆初，加朝散大夫、鸿胪寺丞。时太祖求治，事皆核实，故方技之士必精练。乾德初，令太常寺考较翰林医官艺术，以翰为优，绌其业不精者二十六人。自后，又诏诸州访医术优长者籍其名，仍量赐装钱，所在厨传给食，遣诣阙。年宝五年，太宗在藩邸有疾，命翰与马志视之。及愈，转尚药奉御，赐银器、缗钱、鞍勒马。

尝被诏详定《唐本草》，翰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煦、张素、吴复珪、王光佑、陈昭遇同议，凡《神农本经》三百六十种，《名医录》一百八十二种，唐本先附一百一十四种，有名无用一百九十四种，翰等又参定新附一百三十三种。既成，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昉、户部员外郎知制诰王佑、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详覆毕上之。昉等序之曰：

《三坟》之书，神农预其一。百药既辨，《本草》序其录。旧经三卷，世所流传。《名医别录》，互为编纂。至梁陶弘景乃以《别录》参其《本经》，朱墨杂书，时谓明白。而又考彼功用，为之注释，列为七卷，南国行焉。逮乎有唐，别加参校，增药余八百味，添注为二十卷。《本经》漏缺则补之，陶氏误说则证之。然而载历年祀，又逾四百，朱字墨字，无本得同；旧注新注，其文互阙。非圣主抚大同之运，永无疆之休，其何以改而正之哉！

乃命尽考传误，刊为定本。类例非允，从而革焉。至如笔头灰，兔毫也，而在草部，今移附兔头骨之下；半天河、地浆，皆水也，亦在草部，今移附土石类之间；败

鼓皮，移附于兽名；胡桐泪，改从于木类；紫矿，亦木也，自玉石品而改焉；伏翼，实禽也，由虫鱼部而移焉；橘柚，附于果实；食盐，附于光盐；生姜、干姜，同归一类；至于鸡肠、繁菱、陆英、蒴藋，以类相似，从而附之。仍採陈藏器《拾遗》、李含光《音义》，或穷源于别本，或传效于医家，参而较之，辨其臧否。至如突屈白，旧说灰类，今是木根；天麻根，解似赤箭，今又全异。去非取是，特立新条。自余刊正，不可悉数。

下采众议，定为印板。乃以白字为神农所说，墨字为名医所传，唐附今附，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审其形性。证谬误而辨之者，署为今注；考文意而述之者，又为今按。义既判定，理亦详明。今以新旧药合九百八十三种，并目录二十一卷，广颁天下，传而行焉。

翰后加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滑州刘遇疾，诏翰驰往视之。翰还，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责授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起为尚药奉御。淳化元年，复为医官使。卒，年七十二。

王怀隐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王怀隐，宋代宋州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原是道士，因精通医药，后成为医学家。太平兴国初年（约公元977年），朝逢诏令他还俗，到翰林医官院任职，先后任尚药奉御、翰林医官使。太平天国七年至淳化三年（公元982—992年）奉诏参与编辑《太平圣惠方》，该书共一百卷，分一千六百七十门，汇集药方一万六千八百三十四首，是宋代的一部医方巨著，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和研究价值。

王怀隐，宋州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初为道士，住在京城的建隆观，善于诊病用药。宋太宗在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为京都开封府尹时，王怀隐恭敬地用汤药为其侍奉。太平兴国初年（约公元977年），诏令王怀隐还俗，任命为尚药奉御，后来三次升迁，官至翰林医官使。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田王派遣儿子惟濬入朝，惟濬患病，诏令王怀隐诊视医治。

起初，太宗赵匡义（后改光义）为晋王时，住在京城开封的藩王府，闲暇时多注意关心医术，收藏名家医方一千余

首，都是经过临证检验有效药方。是年（即太平兴国三年），诏命翰林医官院征集各家所传经验方，奉献的医方达一万余首，并诏王怀隐与副使王祐、郑奇、医官陈昭遇四人参校编类，共分一千六百七十部，各部中都首引录隋代太医令巢元方著《病源候论》的理论作为总论，然后汇集药方，全书编成一百卷。太宗亲自作序，赐名为《太平圣惠方》，便令刊刻颁行全国，各州郡均备置以书，由医学博士掌握。此后数年王怀隐去世。

（赵慧芝 译）

【原文】

王怀隐，宋州睢阳人。初为道士，住京城建隆观，善医诊。太宗尹京，怀隐以汤剂祇事。太平兴国初，诏归俗，命为尚药奉御，三迁至翰林医官使。三年，吴越遣子惟濬入朝，惟濬被疾，诏怀隐视之。

初，太宗在藩邸，暇日多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皆尝有验者。至是，诏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又万余首，命怀隐与副使王祐、郑奇、医官陈昭遇参对编类。每部以隋太医令巢元方《病源候论》冠其首，而方药次之，成一百卷。太宗御制序，赐名曰《太平圣惠方》，仍令镂板颁行天下，诸州各置医博士掌之。怀隐后数年卒。

（赵慧芝 译）

陈昭遇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陈昭遇，生卒年不详，宋代医学家。原籍岭南（今广东），后迁居开封（今河南）。出生于世代名医家庭，他继承家学，对医药无所不究，医术精湛，诊脉辨证多奇验，用药谨慎有效，著述精博。宋太祖开宝（公元968—976年）初年任翰林医官，领温水主簿，后加官光禄寺丞。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奉诏与刘翰、马志、翟煦等九人负责详定本草著作，撰成《开宝新详定本草》二十卷。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初，又与王怀隐等编类《太平圣惠方》一百卷。

陈昭遇，原是岭南人，医术精湛，经验丰富，初为医官，后奉命任温水县（今广西玉林县境内）主簿，以后又升任光禄寺丞，并赐给金饰紫衣。（张慧芳 译）

【原文】

昭遇本岭南人，医术尤精验，初为医官，领温水主簿，后加光禄寺丞，赐金紫。

赵自化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赵自化（公元949—1005年），北宋名医。祖籍德州平原（今属山东），后避乱寓居洛阳。父知岩，兄自正，均以医术闻名。自化长期任宫廷太医，为帝王贵胄诊治疾病。曾治愈秦国王公主之病而获提升。自化诊断技术高超，尤精于望诊。陈州隐士万适，素称“强力无疾”，自化从色诊看出万适实已病入膏肓，预言万适“将死”，果然言中。他对养生、食疗之学也深有研究，撰有《四时养颐录》，宋真宗改名为《调膳摄生图》。又撰有《名医显秩传》，这是我国早期医史人物传记著作之一。

赵自化，原籍德州平原人。其高祖赵常，为景州刺史。后全家身陷契丹占领区。其父赵知岩脱身来到南方，居住在洛阳，学习经方名药等医术，又将医术传授给两个儿子自正、自化。后周显德（公元954—960年）年间，全家来到京城，都以医术高明著称。赵知岩去世后，赵自正通过方技考试，补授翰林医学。

正值秦国公主患病，有人推荐赵自化诊治，结果治愈，被

表著为翰林医学，又加授尚药奉御官职。淳化五年（公元994年），授职为翰林医官副使。当时皇帝召陈州隐士万适到京，住在赵自化家。正值万适补授慎县主簿，万适平素身体强壮无病，皇帝下诏书之日，赵自化觉得万适气色异常，给他诊脉，说：“您将要死了！”不几天，万适果然死去。

至道（公元995—997年）年间，有平民郑元辅，依附赵自化的姻亲吏部令史张崇敏家。郑元辅经常向赵自化求索钱物，得不到满足，便心中怀恨。于是去监察机关上书，告赵自化走漏宫廷机密，及发泄怨言等事。宋太宗开始十分惊讶，命王继恩在御史府审问，结果都无事实依据，于是将郑元辅在法场斩首。赵自化因结交行为不轨的人，被贬为郢州团练副使。不久，恢复原职。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升为正使。

景德（公元1004—1007年）初年，雍王赵元份及晋国长公主共同上书：赵自化医疗有功，请求给予增加俸禄，提升官职。皇帝以赵自化位居太医之首，不应当再为请求增加官爵，命令枢密院召赵自化予以训诫。雍王死后，自化以诊治不当，降为副使。第二年，又恢复旧职。这一年冬，赵自化去世，享年五十七岁。遗表以撰《四时养颐录》上献，宋真宗改名为《调膳摄生图》，并为之撰写序言。

赵自化颇为喜欢诗文写作，他在被贬到郢州时，撰有《汉沔诗集》五卷，宋白、李若拙为此书作序。又曾汇集自古以来以方技医术而至高官显贵者，撰为《名医显秩传》三卷。

（张慧芳 译）

【原文】

赵自化，本德州平原人。高祖常，为景州刺史，后举家陷契丹。父知岩脱身南归，寓居洛阳，习经方名药之术，又以授二子自正、自化。周显德中，偕来京师，悉以医术称。知岩卒，自正试方技，补翰林医学。

会秦国长公主疾，有荐自化诊候者，疾愈，表为医学，再加尚药奉御。淳化五年，授医官副使。时召陈州隐士万适至，馆于自化家。会以适补慎县主簿，适素强力无疾，诏下日，自化怪其色变，为切脉曰：“君将死矣。”不数日，适果卒。

至道中，有布衣郑元辅者，尝依自化之姻吏部令史张崇敏家。元辅时从自化丐索，无所得，心衔之，乃诣检上书，告自化漏泄禁中语，及指斥非所宜言等事。太宗初甚骇，命王继恩就御史府鞠之，皆无状，斩元辅于都市。自化坐交游非类，黜为郢州团练副使。未几，复旧职。咸三年，加正使。

景德初，雍王元份泊晋国长公主并上言：自化药饵有功，请加使秩，领遥郡。上以自化居太医之长，不当复为请求，令枢密院召自化戒之。雍王薨，坐诊治无状，降为副使。二年，复旧官。是冬卒，年五十七。遗表以所撰《四时养颐录》为献，真宗改名《调膳摄生图》，仍为制序。

自化颇喜为篇什，其贬郢州也，有《汉沔诗集》五卷，宋白、李若拙为之序。又尝缀自古以方技至贵仕者，为《名医显秩传》三卷。

冯文智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冯文智（公元 953—1012 年），北宋医家，并州（今山西太原）人。世代以医疗为业。太平兴国（公元 976—983 年）年间，至都城应试，及格后补翰林医学，加授乐源县主簿。端拱（公元 988—989 年）初年，授少府监主簿。次年转任翰林医官，加授少府监丞。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治愈折御卿病，御卿上表举荐，皇帝赐给五品官绯服，加授光禄寺丞。咸平三年（公元 1000 年）明德太后有病，经冯文智医治痊愈，皇帝加封冯文智尚药奉御，赐三品官金紫之服。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任翰林医官院直院。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转任医官副使，后又加授检校主客员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 1012 年）卒，终年六十岁。冯文智一生侍奉宫廷，为帝王服务，以屡有治验，累加提擢，是御医中之佼佼者。

冯文智，并州人。世代以医疗为业。太平兴国年间，到都城汴京，自陈效命帝王。皇帝诏令考试，及格后补翰林医学，加授乐源县主簿。端拱初年，授少府监主簿。次年转任

翰林医官，加授少府监丞。曾隶属镇守并州、代州长官折御卿。淳化五年，府州观察使折御卿有病，经冯文智诊疗痊愈，折御卿上表推荐之，皇帝赐给绯服，加授光禄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患病，由冯文智治疗。痊愈后，加授尚药奉御，赐给紫色饰金的官服。咸平六年，任翰林医官院直院。宋真宗东封泰山，冯文智转任医官副使。真宗赴汾阴祭祀，又加授冯文智检校主客员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冯文智去世，终年六十岁。

(张慧芳 译)

【原文】

冯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为业。太平兴国中诣都自陈，召试补医学，加乐源县主簿。端拱初，授少府监主簿，逾年转医官，加少府监丞。尝隶并代部署。淳化五年，府州折御卿疾，文智诊疗获愈，御卿表荐之，赐绯，加光禄寺丞。咸平三年，明德太后不豫，文智侍医，既愈，加尚药奉御，赐金紫。六年，直翰林医官院。东封，转医官副使。祀汾阴，又加检校主客员外郎。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

刘 赞 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刘赞，北宋时外科医生，生卒年不详，以擅治外科创伤著名。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晟于征战中被弩矢贯穿左髀，箭头不出近三十年。景德初年（公元1004年），真宗皇帝派刘赞诊治。刘赞用药物外敷，结果使箭头得出，韩晟从此步履如常。皇帝赏赐他白银，并升迁为医官。史书记述刘赞事迹语焉不详，但从刘赞不用手术方法，仅外敷药物而令箭头得出，可见其医术之高超。

医家刘赞也擅长外科医术。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晟随宋太祖出征晋阳，被对方射箭贯穿左髀，箭头在髀内近三十年未出。景德初年（公元1004年），皇帝派刘赞为韩晟诊治。刘赞在外部敷药，使箭头得出，韩晟从此步履如常。韩晟请见皇帝，陈述感激之情，表示愿誓死为皇帝效力，又极力称赞刘赞医术之高妙。皇帝特赐给刘白银，提升为翰林医官。

（张慧芳 译）

【原文】

……医学刘赞亦善此术。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晟从太祖

征晋阳，弩矢贯左髀，鏃不出几三十年。景德初，上遣赞视最，赞傅以药出之，步履如故。最请见，自陈感激，愿得死所，又极称赞之妙。特赐赞白金，迁医官。

沙门洪蕴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沙门洪蕴（公元 936—1004 年），潭州长沙（今属湖南）人。宋代医僧，俗姓蓝。十三岁时，从开福寺僧智岳出家，学习医术。后来去京城游历，以医术高明知名。宋太祖召见他，赐给三品官服紫方袍，并赐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公元 976—984 年）年间，皇帝下诏购求医方，洪蕴献出数十首古方。宋真宗未登基前在蜀邸时，洪蕴也曾以方药拜见。曾任补右街首座，左街副僧录。洪蕴医术以诊断切脉最为精通，能预言人的死期。他临床经验丰富，疗效甚高。洪蕴作为一名僧人，一生主要从事医疗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是难能可贵的。

沙门洪蕴，俗姓蓝，潭州长沙人，母亲姓翁，早年无子，专心诵念佛经，后来怀孕，生子洪蕴。洪蕴十三岁那年，拜见本地开福寺僧智岳，请求出家，学习医术，后来到京城游历，以医术闻名于时。宋太祖召见他，赐给三品官服紫方袍，赐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公元 976—984 年）年间，皇帝下诏书购求医方，洪蕴辑录古方数十首献出。真宗皇帝在

蜀邸时，洪蘊曾经以方药拜见。咸平（公元998—1003年）初年，补授右街首座，多次提升后转任左街副僧录。洪蘊尤其精通诊断切脉，往往能预言人的生死，没有不应验的。他处方精审，贵族大臣们有病，皇帝多下令派他去诊治。洪蘊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去世，享年六十八岁。

（张慧芳 译）

【原文】

沙门洪蘊，本姓蓝，潭州长沙人。母翁，初以无子，专诵佛经，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诣郡之开福寺沙门智岳，求出家，习方技之书。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太祖召见，赐紫方袍，号广利大师。太平兴国中，诏购医方，洪蘊录古方数十以献。真宗在蜀邸，洪蘊尝以方药谒见。咸平初，补右街首座，累转左街副僧录。洪蘊尤工诊切，每先岁时言人生死，无不应。汤剂精至，贵戚大臣有疾者，多诏遣诊疗。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法 坚 传

——《宋史》卷四六一

【说明】法坚（公元？—1005年），北宋庐山僧人。是一位精于医术的医僧。长期在京城行医。因医术高明，宋太祖赐以三品官服紫方袍，并赐号“广济大师”。后来返回庐山。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雍王赵元份患病久治不愈，真宗皇帝召法坚进宫诊治。待法坚赶到，赵元份已死，法坚乃返回庐山，不久去世。

庐山和尚法坚，以擅长医药著名，长期在京城行医，宋太祖曾赐以紫方袍，赐号“广济大师”。后来返回庐山。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雍王赵元份患病久治不愈，法坚被召进宫里诊治。待法坚赶到时，赵元份已死去。于是法坚又返回庐山，不久死去。

（张慧芳 译）

【原文】

庐山僧法坚，亦以善医著名，久游京师，尝赐紫方袍，号广济大师，后还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阙，至则元份已薨。法坚复归山而卒。

僧怀丙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怀丙，僧人，河北正定人，真实姓名和生卒年月不详，活动于 11 世纪中期。宋代杰出的工程力学家。

怀丙曾用巧妙的方法修复真定木塔和赵州桥，因史载不详，后人无法得知其所用方法，为科学史上一件憾事。

怀丙在打捞蒲津浮桥的镇桥铁牛时，据史载，用了浮力和杠杆的原理，其设计巧妙，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发明，较西方早了近五个世纪，对当今的工程力学仍有启发。

僧人怀丙，是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他生性巧思绝顶，不是一般人通过学习所能达到的。真定地区有一座木质佛塔，共十三层，高不可及。因时代久远，中级大柱损坏了，渐渐地朝向西北方向倾斜，别的工匠都不能修复它。怀丙量出它的长度，另做了一个大柱，命令工匠们把它维系在塔上。然后辞退工匠们，只让一人跟随，关闭塔门很长时间，就把坏柱子换了下来，塔外却听不见一点儿斧、凿等工具的声音。

赵州（今河北赵县）洨河上用开凿的石头建筑了一座桥（即安济桥，俗称赵州桥），把熔化的铁灌入桥的石孔中以加

固桥。自从隋代建桥以来已数百年了，即使发大水也冲不坏它。年代长久了，附近的乡民中有些人凿桥偷铁，于是桥身倾斜，即使用几千人的力量也不能使桥身再端正过来。怀丙却没有使用多少工人，而是靠巧妙的技术使桥身端正过来，恢复了原样。

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的浮桥（即蒲津桥）用八只大铁牛系着，每只牛重达几万斤。后来河水暴涨，冲断桥身，并且牵带着铁牛沉入河中，地方官府招募能打捞出铁牛的人。怀丙用两只大船装满土夹着铁牛，然后慢慢地去掉船上所装的土，随着船的上浮，牛也被带出水面了。当时任转运使的张焘听说这件事，赐给怀丙紫色的衣服。不久以后怀丙就去逝了。

（单瀚清 译）

【原文】

僧怀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学所能至也。真定构木为浮图十三级，势尤孤绝。既久而中级大柱坏，欲西北倾，他匠莫能为。怀丙度短长，别作柱，命工维而上。已而却众工，以一介自从，闭门良久，易柱下，不闻斧凿声。

赵州洹河凿石为桥，铁贯其中，自唐〔隋〕以来相传数百年，大水不能坏。岁久，乡民多盗凿铁，桥遂欹倒，计千夫不能正。怀丙不役众多，以术正之，使复故。

河中府浮梁用铁牛维之，一牛且数万斤。后水暴涨绝梁，牵牛没于河，募能出之者。怀丙以二大舟实土，夹牛维之，用大木为权衡状钩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转运使张焘以闻，赐紫衣。寻卒。

许 希 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许希，河南开封人。宋代医学家，以医为业，补医学翰林。北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患病，屡经御医进药治疗无效，冀国大长公主推荐许希诊治。面对帝王之尊，许希大胆而果断地提出，应针刺心下包络之间。果然治愈，显示了许希的高超医术和胆识。因此被任命为翰林医官，并获得皇帝丰厚的赏赐。还撰有《神应针经要诀》一书，未传。

许希，开封人，以医为业，补授翰林医学。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宋仁宗患病，御医多方医治不效，人心忧虑恐慌。冀国大长公主推荐许希诊治，许希诊后说：“针刺心下包络之间，可很快治愈。”皇帝左右的人争相认为不能这样做，宫中宦官请求以身试针，试针后安然无害。于是给皇帝扎针，皇帝的病痊愈了。皇帝任命许希为翰林医官，赐给绯衣、银鱼、器物、金钱。许希拜谢之后，又向西方拜谢，皇帝问他是什么缘故，回答说：“扁鹊，是臣下的老师。今日之事不是臣下的功劳，实是臣下老师的赐与，怎么敢忘记老师呢？”于

是请求把获赐的金钱用来兴修扁鹊庙。皇帝为之在城西修建了扁鹊庙，册封扁鹊为灵应侯。其后扁鹊庙日益完备，学医者聚集庙内，于是在庙旁设立太医局。

许希后来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而卒。著有《神应针经要诀》行于世。其子许宗道被录用为内殿崇班。

(张慧芳 译)

【原文】

许希，开封人。以医为业，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医数进药，不效，人心忧恐。冀国大长公主荐希，希诊曰：“针心下包络之间，可亟愈。”左右争以为不可，诸黄门祈以身试，试之，无所害。遂以针进，而帝疾愈。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器币。希拜谢已，又西向拜，帝问其故，对曰：“扁鹊，臣师也。今者非臣之功，殆臣师之赐，安敢忘师乎？”乃请以所得金兴扁鹊庙。帝为筑庙于城西隅，封灵应侯。其后庙益完，学医者归趋之，因立太医局于其旁。

希至殿中省尚药奉御，卒。著《神应针经要诀》行于世。录其子宗道至内殿崇班。

庞安时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庞安时（公元1043—1100年），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人。宋代医学家。世代医家出身，其父授以脉诀，以为浅近不足取。复钻研黄帝、扁鹊脉书，及《太素》、《甲乙经》诸书，通贯百家之说，尤推崇《难经》。重视向具有实践经验者求教。后耳聋，与人交谈须助以纸笔。诊脉重视人迎、寸口并用。以《内经》诸书理论指导临床，擅治伤寒，认为治伤寒是从病因、发病着手，强调体质因素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温病与伤寒分治，疗效卓著。著述甚多，有《难经解义》、《主对集》（论药性配伍）、《本草拾遗》、《庞氏家藏秘宝方》、《验方书》等，均佚。唯存《伤寒总病论》六卷。此书经三十余年广寻诸家之说，结合实际经验加以编次而成。书中提出温病治法不能全以伤寒汗下法等新见解，是一部研究《伤寒论》较早的专著，对后世影响很大。

庞安时，字安常，蕲州蕲水人。少年时很爱读书，看过的书就能记而不忘。父亲是位世医，教他学脉诀，安时学后

认为：“单学《脉诀》是不够的”，所以，他就自己钻研《黄帝内经》和扁鹊《难经》中有关脉学理论，不久，他已能掌握书中全部内容，而且常有自己的体会和新见解，和同行辩论时，讲得有条有理而不屈服。他父亲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当时庞安时还不到二十岁。后来，因患病而耳聋，于是他更加刻苦研究《灵枢》、《太素》、《甲乙经》等珍贵罕见的医书，凡是经史百家涉及医学内容的，都能融汇贯通。庞安时会说：“世上的许多医书，我基本上都看过，唯有扁鹊的《难经》一书比较深奥。概括地说《难经》，是扁鹊将其医学要旨隐藏在书中，讲述得并不详细，意思是让后人自己从书中去学习领会，我的医术就是来自扁鹊的《难经》之中。按照该书所言来诊断病患的深浅，诊断生与死，就象符节一样的切合。观察脉象的变化，最关紧要的是人迎脉和寸口脉。这两脉象阴阳相应，犹如两条引绳，阴阳平衡，则引绳大小相等。所以，可从喉部呼吸，手部左右寸口，可知阴阳盛衰，从脉上鱼际和脉入尺部知覆（内关外格）溢（外关内格）。通过手指举按轻重，以辨别寸、关、尺三部的浮、中、沉脉象。将中风、热病、湿温、温病四种病从伤寒中分出，所有这些论述都是从扁鹊《难经》开始，并经我参考《内经》等书，从中考索研究书中内容和理论而得出的。经过检查以后才应用，顺阴阳而治之，所有疾病都逃不出这一范围。”他愿意将自己的医术告知后世，所以编著《难经辨》数万言。通过察看药物性味与五脏之宜忌，按药物的性能排列次序，分清药性主治寒病；还是主治热病，是用奇方还是偶方，以治疗各种疾病，著成《主对集》一卷。由于古今的区别，相宜的不同，方术脱落遗

漏失传较多，为了完备阴阳的变化，他补充张仲景《伤寒论》而成《伤寒总病论》。本草药物有后来增加的，古书又未见记载，今人又难辨别的，经过尝试，确有功效的不应该遗漏，故写了《本草补遗》一书。

庞安时为人治病，往往是十有八九痊愈，登门求医的病人很多，庞安时主动腾出房间，让他们居住，并且亲自给患者煮厚粥熬汤药，一定要等病人治好，才让回家，对于已经无法救治的病人，也将病情如实告诉病人，不再为他治疗。这样，被他治好的病人无其数，患者持金钱、布帛来感谢，他都拒绝不收。

有一次，庞安时去舒州的桐城，有位民家妇女生产，已七天胎儿还没有生下来，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效。正巧庞安时的学生李百全家是他家邻居，于是邀请庞安时前往治疗。刚刚看见产妇，就连声说不会死的，并告诉产妇家人用热水温敷产妇的腰腹部，并亲自为产妇上下按摩，产妇感到胃肠部一阵微痛，呻吟间，一个男孩子就出生了。其家人既惊且喜，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庞安时说：“婴儿已出了胎胞，而一手误抓着母肠不能脱出来，故不是符药所能治疗的，我隔腹抚摸胎儿手所在的位置，然后针刺其合谷穴，胎儿觉痛就会缩手，所以马上就生了下来，并没有别的技术。”取来孩子观察，右手合谷穴针眼痕迹还在。其治疗奇妙都类似与此。

有人问他有关华佗的事，他说：“华佗医术如此高明，不是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医术是史书出于常规记载！”五十八岁时，庞安时疾病发作，他的学生请他给自己诊脉，他笑着说：“我已仔细的切过自己的脉，而且呼吸出入也是脉，我的胃气

已绝，该死了。”于是，他不再服用药饵。几天后，他正坐着与客人谈话时死去。

(王亚芬 译)

【原文】

庞安时，字安常，蕲州蕲水人。儿时能读书，过目辄记。父，世医也，授以《脉诀》。安时曰：“是不足为也。”独取黄帝、扁鹊之脉书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说，时出新意，辨诘不可屈，父大惊，时年犹未冠。已而病聩，乃益读《灵枢》、《太素》、《甲乙》诸秘书，凡经传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贯。尝曰：“世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言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言之不详，意者使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术盖出于此。以之视浅深，决死生，若合符节。且察脉之要，莫急于人迎、寸口。是二脉阴阳相应，如两引绳，阴阳均，则绳之大小等。故定阴阳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温于伤寒。此皆扁鹊略开其端，而予参以《内经》诸书，考究而得其说。审而用之，顺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术告后世，故著《难经辨》数万言。观草木之性与五脏之宜，秩其职任，官其寒热，班其奇偶，以疗百疾，著《主对集》一卷。古今异宜，方术脱遗，备阴阳之变，补仲景《论》。药有后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尝试有功，不可遗也，作《本草补遗》。

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门求诊者，为辟邸舍居之，亲视飧粥药物，必愈而后遣；其不可为者，必实告之，不复为治。活人无数。病家持金帛来谢，不尽取也。

尝诣舒之桐城，有民家妇孕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术

无所效。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拊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时曰：“儿已出胞，而一手误执母肠不复能脱，故非符药所能为。吾隔腹扪儿手所在，针其虎口，既痛即缩手，所以遽生，无他术也。”取儿视之，右手虎口针痕存焉。其妙如此。

有问以华佗之事者，曰：“术若是，非人所能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门人请自视脉，笑曰：“吾察之审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气已绝，死矣。”遂屏却药饵。后数日，与客坐语而卒。

钱 乙 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钱乙（公元 1032—1113 年），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宋代儿科学家。由于医术高超，被人们誉为儿科圣人。父亲钱颖为针灸医生，幼随姑父学医，后以善用《颅囟方》，闻名于山东。钱乙为方不偏执一家，不拘泥古法，时出新意，又与古法相合。尤精通《本草》诸书，辨正阙误。能言异药之生本末、名称、形态。以擅治儿科病闻名。元丰（公元 1078—1085 年）年间至京师治愈长公主之女疾，授翰林医学。又以黄土汤治愈皇子瘕疝，擢为太医丞，赐金紫。他著的《小儿药证直诀》三卷，以脏腑辨证立说，强调五脏病变在诊治方面相互影响。提出小儿“脏腑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对儿科学及整个中医基础理论之发展影响很大。

钱乙著作很多，有《伤寒指微论》五卷，《婴童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惟有《小儿药证直诀》经阎季忠整理得以流传下来，余均散佚。

钱乙，字仲阳，本吴越王俶支属，到他祖父时北迁，遂为郓州（今山东东平）人。钱乙的父亲钱颖，是个医生，然

而嗜酒喜欢游玩，一日，东游海上不返。这时钱乙才三岁，母亲又早死，姑姑出嫁到吕家，可怜钱乙，于是收养钱乙为子，长大后便教他学医，并告诉他家庭的世业和父亲的情况。钱乙听了即难过地哭泣，于是向姑父请求，前往寻找父亲下落。钱乙出外寻父八、九次，数年后终于将父亲找了回来，那年他已三十岁。当地的人为他这种孝心所感动，写诗传颂他寻父的事迹。钱乙对抚养他成人的姑父母和父亲一样孝顺。姑父母没有儿女，他们死后，钱乙披麻带孝，为老俩口送葬。

钱乙很早以研究应用儿科名著《颅囱经》治病而闻名。到京师，因治好长公主女儿的疾病，被授为翰林学士。一位皇子患病抽风，钱乙用黄土汤给治好了。神宗皇帝问他黄土为什么能治病，钱乙回答说：“土可以胜水，水土保持平静，则风自然停。”皇帝听他讲得有道理，便将他提升为太医院的医官，并赏赐穿紫色有金饰的三品官服。于是京师的皇亲国戚、达官贵人都纷纷找他治病。

广亲王的长子患病，钱乙诊治后说：“此病可以不用药而痊愈。”当时，广亲王幼子在旁边，钱乙指说：“此小儿旦夕间将患使人惊恐的急病，第三日的午后，可以痊愈。”病人家属不高兴，也没答理他。次日，果然发病甚急，请钱乙医治，三日痊愈。问钱乙这是什么原因，回答说：“两目直视，而两腮赤，是心与肝都受邪。过午后愈，是根据疾病转变规律推算得出的痊愈时间。”一位王子患病上吐下泄，别的医生诊断后，处以刚燥之药剂，反而增加了气喘。钱乙诊后说：“病本来就受热邪所致，脾将伤，怎么能用燥药再使津液受伤？将出现不能大小便症状。”处方用石膏汤，王不信，婉言将钱乙

辞去。次日，病情加重，王子派人去请钱乙，果然如钱乙所言用石膏汤方治愈。

有一位儒士患咳嗽，面色青而眇白，气喘呼吸困难，钱乙诊治后说：“肝乘肺，此是正虚邪盛之症候。这病如果在秋天得的话，可治；今已春天不可治。”病人哀求，钱乙勉强给他一些药。第二天，钱乙对病人说：“我给你这药一再泻肝火，但症状未见减轻，再三的给予补肺而肺虚症越益严重。再加上病人唇色淡白，气血两虚。按一般规律当三日即死。现在还能够喝粥，应该能多活几天。”果然过了五天而死。

某孕妇患病，一位医生给她诊治，认为将要流产。钱乙诊断后说：“妊娠时五脏六腑经脉轮流护养胎儿。六十天更换表里一组脏腑，如果能按其月而用补药，哪里一定会流产呢？”后来经过服药，果然母子都安全无恙。又有乳妇惊悸而病，治愈后目张不能入睡。钱乙说：“煮郁李酒让她饮醉即能痊愈。所以这样是因为眼珠内连肝胆，恐惧则气结，胆气横阻不下，郁李能去气结、随酒可入胆，结去胆下，则目能闲而睡了。”服后，果然有效。

钱乙本有羸疾，每当病发作时都按自己意志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叹息说：“这就是所谓周痹的病。此病传入脏者死，看样子我的生命将终止了。”既而他又说：“我能将病移到手足末梢。”因此，自己制药日夜饮用。一天，钱乙左侧手足痉挛不能运用自如，他倒高兴地说：“行了。”有亲属登东山，挖得茯苓大如斗，他全部吃掉。从此他虽然半身瘫痪，但是风骨坚硬如无病者一样。后来他以病辞去太医院医官之职，归家，不再出来做官。

钱乙不墨守一家之学，凡医书无所不读，又不严格拘守古法。治疗每能超越常规，但最终都能符合大法。尤其精通《本草》诸书，辨别正误很有心得，人们得到不常见的药拿来问他，他都能说出该药的产地本末，药物的颜色、形态、名称和差别所在。问者回去核查，都与钱乙所说相符。钱乙晚年挛痹逐渐加剧，自知不可救治，请亲戚来和他告别，更换了衣服，等待死亡的到来，终年八十二岁。

(王亚芬 译)

【原文】

钱乙，字仲阳，本吴越王俶支属，祖从北迁，遂为郢州人。父颖善医，然嗜酒喜游，一旦，东之海上不反。乙方三岁，母前死，姑嫁吕氏，哀而收养之，长诲之医，乃告以家世。即泣，请往迹寻，凡八九反。积数岁，遂迎父以归，时已三十年矣。乡人感慨，赋诗咏之。其事吕如事父，吕没无嗣，为收葬行服。

乙始以《颅囟方》著名，至京师视长公主女疾，授翰林医学。皇子病瘕疝，乙进黄土汤而愈。神宗召问黄土所以愈疾状，对曰：“以土胜水，水得其平，则风自止。”帝悦，擢太医丞，赐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无虚日。

广亲宗子病，诊之曰：“此可母药而愈。”其幼在傍，指之曰：“是且暴疾惊人，后三日过午，可无恙。”其家恚，不答。明日，幼果发病甚急，召乙治之，三日愈。问其故，曰：“火色直视，心与肝俱受邪。过午者，所用时当更也。”王子病呕泄，他医与刚剂，加喘焉。乙曰：“是本中热，脾且伤，奈何复燥之？将不得前后溲。”与之石膏汤，王不信，谢去。

信宿浸剧，竟如言而效。

士病咳，面青而光，气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人祈哀，强予药。明日，曰：“吾药再泻肝，而不少却；三补肺，而益虚；又加唇白，法当三日死。今尚能粥，当过期。”居五日而绝。

孕妇病，医言胎且堕。乙曰：“娠者五脏传养，率六旬乃更。诚能候其月，偏补之，何必堕？”已而母子皆得全。又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乙曰：“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即愈。所以然者，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衡不下。郁李能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则目能瞑矣。”饮之，果验。

乙本有羸疾，每自以意治之，而后甚，叹曰：“此所谓周痹也。入脏者死，吾其已夫。”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末。”因自制药，日夜饮之。左手足忽挛不能用，喜曰：“可矣！”所亲登东山，得茯苓大逾斗，以法啖之尽，由是虽偏废，而风骨悍坚如全人。以病免归，不复出。

乙为方不名一师，于书无不窥，不靳靳守古法。时度越纵舍，卒与法会。尤邃《本草》诸书，辨证阙误。或得异药，问之，必为言生出本末、物色、名貌差别之详，退而考之皆合，末年挛痹浸剧，知不可为，召亲戚诀别，易衣待尽，遂卒，年八十二。

僧智缘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僧智缘，随州（今湖北省随县）僧人，精通医术，擅诊脉。嘉祐（公元 1056—1063 年）末，被召入京师，为人治病多验。他通过诊脉，能知道患者病情轻重，能治与否，愈与不愈。还能从诊父亲之脉而知其之子体质强弱吉凶，非常神奇，人有非之者。

僧智缘，随州人，精于医学。嘉祐（公元 1056—1063 年）末，被召到京师河南开封，住在相国寺内。每当他给病人诊脉，就能知道患者的富贵、贫贱、祸福、吉凶。还能通过诊父亲的脉象而知道他孩子的吉凶，所说的都很正确，犹如神仙一样，官僚大臣们争相前去请他看病。王珪与王安石在翰林院相见，王珪怀疑古代没有诊父之脉就能知其孩子体质强弱之类的事。王安石回答说：“过去医和给晋侯诊脉，知道晋侯的一个好臣子活不了多久。这位好臣子的命运能见于晋侯的脉象上。那么，诊父亲的脉能知道孩子的情况，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熙宁中（公元 1068—1077 年），王韶计划占领青唐，上

书给皇帝说蕃族人重视僧人，而僧人在结吴叱腊统帅下很多，请僧智缘与他一起去边防。于是神宗召见了智缘，给了他很多白金，派他乘车向西方去，于是当地人称他为“经略大师”。僧智缘善于辩论，口才好，径直进入西蕃地区，说服结吴叱腊归化宋朝，而其他如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族也都上书表示愿意归化。王韶对于智缘的行动很嫉妒，说他妨碍了边境的事情。因此，智缘被召还，任命为总管开封城右街功德使，成为禅堂中居上座的僧人，后死去。

（王亚芬 译）

【原文】

僧智缘，随州人，善医。嘉祐末，召至京师，舍于相国寺。每察脉，知人贵贱、祸福、休咎，诊父之脉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争造之。王珪与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无此，安石曰：“昔医和诊晋侯，而知其良臣将死。夫良臣之命乃见于其君之脉，则视父知子，亦何足怪哉！”

熙宁中，王韶谋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请智缘与俱至边。神宗召见，赐白金，遣乘传而西，遂称“经略大师”。智缘有辩口，径入蕃中，说结吴叱腊归化，而他族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皆因以书款。韶颇忌恶之，言其挠边事，召还，以为右街首坐，卒。

皇甫坦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皇甫坦，字履道，人尊为“皇甫先生”。南宋医生。原籍临淄（今属山东）。后避乱入蜀，遂家夹江（今属四川）。生活于12世纪。善医术。绍兴年间（公元1131—1162年），显仁太后患目疾，临安守臣张称推荐皇甫坦入宫诊治，太后目病迅速痊愈。皇帝很高兴，赏赐丰厚，皆拒绝不受。他擅养生术，曾为高宗论述养生要旨，“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深得皇帝赏识，为之题菴名“清静”，并画像挂宫中。

皇甫坦，蜀之夹江（今属四川）人，善医术。一次，显仁太后患目疾，经太医局许多医生治疗都不能愈，于是下诏请别的医生诊治，临安守臣张称向朝廷推荐皇甫坦。高宗亲自召见了皇甫坦，并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病，皇甫坦回答说：“一个人能顺应自然，则能身心安定，一个皇帝能顺应民心，则天下太平。”然后带皇甫坦到慈宁殿给显仁太后治病，治疗不久，显仁太后的病就好了。皇帝很高兴，赐给皇甫坦很多礼物，他一件也没收下。皇帝命令带着香去青城山祈祷，回

到京城，皇帝又召问皇甫坦长寿养生的医术。皇甫坦说：“首先禁示各种不良欲望，不要放纵，读万卷炼丹的书，不如洁身守一。”（道家的得一精神）皇帝很佩服皇甫坦的见解，还为他书写“清静”二字，以名其菴，而且绘其像挂于皇宫中。

荆南帅李道也尊敬皇甫坦，皇甫坦每年都去拜谒李道。隆兴初年（公元1163—1164年），李道入朝，高宗、孝宗都问候皇甫先生而不称呼名字。坦还善于为人看相，曾为李道的女儿看相，说她必为国母，后果然为光宗皇帝的皇后。

（王亚芬 译）

【原文】

皇甫坦，蜀之夹江人。善医术。显仁太后苦目疾，国医不能愈，诏募他医，临安守臣张称以坦闻。高宗召见，问何以治身，坦曰：“心无为则身安，人主无为则天下治。”引至慈宁殿治太后目疾，立愈。帝喜，厚赐之，一无所受。令持香裱青城山，还，复召问以长生久视之术，坦曰：“先禁诸欲，勿令放逸。丹经万卷，不如守一。”帝叹服，书“清静”二字以名其菴，且绘其像禁中。

荆南帅李道雅敬坦，坦岁谒道，隆兴初，道入朝，高宗、孝宗问之，皆称皇甫先生而不名。坦又善相人，尝相道中女必为天下母，后果为光宗后。

王克明传

——《宋史》卷四六二

【说明】王克明（公元 1112—1178 年），字彦昭。祖籍饶州乐平（今属江西），后迁居湖州乌程（今浙江吴兴）。南宋医家，以医术闻名于绍兴、乾道间（公元 1131—1173 年）。自幼得脾胃疾，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病日益加重，当时许多医生说他的病无法治好，于是自学《难经》、《素问》，专心研习医学，自疗获愈。行医于长江、淮河一带，尤精针灸。治病多效，其治风湿病、便秘腹胀、风禁不语等验案，为时人传扬。在苏州治愈金使黑鹿谷伤寒重症，此后名闻北方。绍兴末年（公元 1162 年），赴军中救治疫病，救活数万人。临诊颇有特点，或病有数症，投一药除病之本，诸症自去；或预知病当自愈日期，不以药治，辨证审因，言多应验。初试礼部中选，累任医官。后迁至额内翰林医痊局，并赐金紫官服。卒年六十七岁。

王克明，字彦昭，祖籍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后迁居湖州乌程县（今浙江吴兴）。是南宋绍兴（公元 1130—1162 年）、乾道（公元 1165—1173 年）时期的名医。他生下

来后，因母亲乳少，靠米粥喂养，因而患了消化系统疾病，随着年龄增长，他的病日益加重，当时很多医生说他的病已无法可治。于是，王克明决心自学《难经》、《素问》等医学经典以求治疗的方法。他用尽心思研究方药，终于治愈了自己的病。从此，他开始行医于长江、淮河流域，后来又于苏州、湖州等地为人治病，尤精于针灸。若遇疑难病症，必须反复思考，力求找出病人疾病辨证要领，然后再给药物治疗。对于症状繁杂的病人，或用药先治其主要病症，主症既除，其它病也就随之而愈了。也有些病他并不用药，告诉病人何日会自愈。还有些病人，治不好，不是药物的过错，是因为遇到某些悲痛或气愤之事而生病，应当尽量想办法，帮助病人消除思想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治疗无有不效的。官僚阶层，都降低自己身份和他交往。

魏安行的妻子因风邪导致痿症，躺在床上已十年不起，经克明用针灸治疗后，能如以往一样步履自如。胡秉的妻子患大便干燥而腹胀，痛苦号叫已有十几天了，王克明诊病的时候，正赶上胡秉家中宴会，王克明对胡秉说：“我治愈你妻子的病，让她参加宴会好吗？”用半硫圆碾生姜调乳香一起服，一会儿胡秉妻子起床，食欲恢复正常。庐州的地方官王安道患风禁不能语言已十日，别的医生都不知怎么治疗，王克明叫人用烧红了的炭烧地，然后洒上药，将安道放置到药上面熏，一会儿安道病体就复原了。金朝派遣到南宋的特使黑鹿谷路过苏州时，患伤寒重症病危，经王克明诊治后，第二天就好了。后来徐度访金，王克明跟随徐度到金人管辖的北方去，正好黑鹿谷任接待官，他待王克明如上宾，王克明很惊

讶，黑鹿谷告诉他缘故，于是名闻北方。后来他又跟随南宋吕正己出使金朝，金朝接待的官员得了重病垂危，又被王克明救治而愈，于是送来许多礼品感谢，王克明都谢绝了。张子盖带兵援救海州，许多战士都患了传染病，这时王克明正在部队中，救治兵士近万人。张子盖要为他记功上报，王克明竭力推辞之。

王克明平生读书颇多，讲义气肯舍己助人，常数千里奔波去解救他人危急。他在礼部考试中选，历任医官之职。王炎宣抚四川时，征召克明随从，克明未去。王炎发怒，弹劾克明逃避公事，被贬官。后来又升官至额内翰林医痊局，赐穿紫色饰金的官服。绍兴五年（公元1135）^①去世，卒年六十七岁。

（王亚芬 译）

【原文】

王克明，字彦昭，其始饶州乐平人，后徙湖州乌程县。绍兴、乾道间名医也。初生时，母乏乳，饵以粥，遂得脾胃疾，长益甚，医以为不可治。克明自读《难经》、《素问》以求其法，刻意处药，其病乃愈。始以术行江、淮，入苏、湖，针灸尤精。诊脉有难疗者，秘沉思得其要，然后予之药。病虽数证，或用一药以除其本；本除而余病自去。亦有不予药者，期以某日自安。有以为非药之过，过在某事，当随其事治之。言无不验。士大夫皆自屈与游。

^① 该传上文记王克明为“绍兴、乾道间名医”，王氏曾参与张子盖援救海州之役，张氏救海州系在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疑“绍兴五年”误。

魏安行妻风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针，而步履如初。胡秉妻病内秘腹胀，号呼逾旬，克明视之，时秉家方会食，克明谓秉曰：“吾愈恭人病，使预会可乎？”以半碗圆碾生姜调乳香下之，俄起对食如平常。卢州守王安道风禁不语旬日，他医莫知所为。克明令炽炭烧地，洒药。置安道于上，须臾而苏。金使黑鹿谷过姑苏，病伤寒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及从徐度聘金，黑鹿谷适为先排使，待克明厚甚。克明讶之，谷乃道其故，由是名闻北方。后再从吕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起之，却其谢。张之盖救海州，战士大疫，克明时在军中，全活者几万人。子盖上其功，克明力辞之。

克明颇知书，好侠尚义，常数千里赴人之急。初试礼部中选，累任医官。王炎宣抚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贬秩。后迁至额内翰林医痊局，赐金紫。绍兴五年卒，年六十七。

直鲁古传

——《辽史》卷一〇八

【说明】直鲁古（公元 915—1005 年），辽代医官。吐谷浑（今青海省及四川松潘县）人。世代善医，其父能在马上视疾，并提出合理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直鲁古襁褓时，于战乱中为父所弃，被辽太祖的淳钦皇后收养。长大之后习医，精通针灸。辽太宗时（公元 927—947 年）任太医给侍。曾经撰有《脉诀》、《针灸书》，今佚。卒年九十岁。

直鲁古，吐谷浑人。最初，辽太祖破吐谷浑，有一个骑士扔下一个袋子，回头射袋子不中而去。追兵解开口袋一看，里面有一个婴儿，即后来的直鲁古。因此，询问被俘的人为什么丢弃婴儿？才知道射袋子的人，是直鲁古的父亲。他是一个世传医生，虽然在马上诊病，也同样能知道疾病的表现及其病根而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别人所得，所以想杀死他。

于是将直鲁古送到辽太祖处，由淳钦皇后收养。长大后也会看病，专门从事针灸。辽太宗时，以太医身份侍奉皇帝。

曾撰有《脉诀》、《针灸书》，流传于后世。卒年九十岁。

(王亚芬 译)

【原文】

直鲁古，吐谷浑人。初，太祖破吐谷浑，一骑士弃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开橐视之，中得一婴儿，即直鲁古也。因所俘者问其故，乃知射橐者，婴之父也。世善医，虽马上视疾，亦知标本。意不欲子为人所得，欲杀之耳。

由是进于太祖，淳钦皇后收养之。长亦能医，专事针灸。太宗时，以太医给侍。尝撰《脉诀》、《针灸书》，行于世。年九十卒。

耶律敌鲁传

——《辽史》卷一〇八

【说明】耶律敌鲁，字撒不椁。生活于10—11世纪间。辽代医生，契丹族。他精通医术，尤善观察病者外表形色以知其病源。枢密使耶律斜軫妻患重病久治不愈，经敌鲁诊视，说此人心有蓄热，不是用药能治好的，应当以心理疗法来治疗。因其耳聋，遂大击钲鼓，由于声音震动，病人果然发狂，大声呼喊怒骂，直到力竭乃止，病也得愈。耶律敌鲁认为此法可泄其毒。他治病的方法皆类似于此。卒年八十岁。

耶律敌鲁，字撒不椁。其祖上本属五院部族，辽太祖开始将宫卫骑军分为十二宫时，即隶属于宫卫骑军下。

敌鲁精于医学，经过观察人的形色，就能知道发病的病因，虽然不问症诊脉，仍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统和初（约公元984年），经大丞相韩德让推荐，官至节度使。

最初，枢密使耶律斜軫妻患重病久治不愈，更换了许多医生治疗，都没治好，于是请敌鲁诊治，他仔细观察病人之后说：“心有积热，不是用药物能治好的，应当选用心理疗法来进行治疗。因为病人症状是耳聋，可以用噪声来扰乱他，使

病人发狂，用来泄出其热毒就可以了。”于是就命令在病人面前大敲钲鼓。第二天，病人果然发狂，大声呼喊怒骂，直叫喊到力竭了才停止，于是病愈。他的治疗方法都类似这样，都是人们意想不到的。卒年八十岁。（王亚芬 译）

【原文】

耶律敌鲁，字撒不椁。其先本五院之族，始置宫分，隶焉。

敌鲁精于医，察形色即知病原。虽不诊候，有十全功。统和初，为大丞相韩德让所荐，官至节度使。

初，枢密使耶律斜轸妻有沉痾，易数医不能治。敌鲁视之曰：“心有蓄热，非药石所及，当以意疗。因其聩，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则可。”于是令大击钲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骂，力极而止，遂愈。治法多此类，人莫能测。年八十卒。

张中彦传

——《金史》卷七九

【说明】张中彦（公元？—1166年？），字才甫，原籍安定州（今甘肃定西）。宋金时代的技术专家。他历任金彰武军承宣使，秦凤经略使。后南归任宋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靖海军节度使。又北去任金靖难军节度使，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吏部尚书，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后在任所病故，享年七十五岁。

张中彦生当宋金对峙时期，他长期参与了宋金战争，虽然并非决策者，却也是一个重要人员。长期战争的结果使女真与南宋两败俱伤，筋疲力尽。他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长官，刚正不阿，能主持公道，聪明机智而又细心负责，做过一些好事，得到百姓的爱戴。

他曾建筑架空道路用以运输巨木，又开通关洛水道，作浮桥；创“鼓子卯”结构制作船模，创制简易的船舶下水滑道等等，这些都表现出他的聪明和才智，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一定意义。综观他的一生确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其中部份原因固然是当时的环境所造成，而他本人终究不能辞其责，但在历史上不失为一个能为政府和百姓办事的地方

长官，一位有名望的造船专家和道路桥梁专家。

张中彦，字才甫，是张中孚的弟弟。少年时以父荫在宋朝为官，任泾原副将、知德顺军事。金睿宗进军陕西，中彦投降，授职招抚使。侍从睿宗攻下熙、河、阶、成等州，升任彰武军承宣使，兼本路兵马钤辖，其后又升任本路兵马都总管。

宋将关师古围攻巩州，中彦与驻守于秦凤的李彦琦部联合进攻。金兵攻破驍风关，获得金、洋等州。朝廷简派中彦为兴元尹，安抚新归附的各州。后来金兵撤回北方，中彦代李彦琦任秦凤经略使。秦州地当交通要冲，易攻难守，中彦将治所迁移到北山，就地势险要处建筑城堡，这就是今日的秦州。又建筑腊家等城以控制进入四川的通道。中彦担任秦凤部队的统帅共十年，以后调任泾原路经略使、知平凉府事。

金邦将河南、陕西归还宋朝，张中彦照例应当以当地地方官身份留守关中。熙河经略使慕洵图谋叛归西夏，将伺机侵犯关中、陕西，中彦与怀庆的赵彬会合两路兵马进行讨伐，洵兵战败逃入西夏。中彦与兄中孚都来到临安，被宋朝慰留，并任命中彦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靖远军承宣使、佑神观提举、靖海军节度使。

皇统（公元1141—1149年）初年，金兵恢复河南，金邦皇帝下诏书命中彦兄弟北归，并任命中彦为靖难军节度使，后任彰化军节度使、凤翔尹，又调任庆阳尹，兼任庆原路兵马都总管、宁州刺史。其时金朝的宗室宗渊打死了部属梁郁，梁郁是远方的穷苦人，没有人能为他上告；中彦秉公力争，终

于将宗渊定罪，依法予以惩处。其后调任彰德军节度使，在任上实施有利于平均赋调的征收制度，使土豪劣绅都不能逃避赋税，人们都很佩服他的公正廉明。

正隆年间金朝在汴京营建新宫，中彦负责采运关中木材。巨大的木材以青峰山为最多，但山高壑深，道路阻绝，唐、宋以来都无法采运，中彦命人在崖边凿道，壑上驾桥，建造了十几里长的道路和桥梁，这样，用车运送木材，如同在平地运送一般。他又开辟了六盘山航道，由水路通到洛阳，于是西北山区的航运得以直达汴梁。明年，在黄河上建设浮桥，又是中彦领导这项工程。开始造船时，工匠不能掌握制造桥船的办法，中彦亲手制作的船舶模型只有几寸大，不用胶漆粘连，而构件的头尾自相连接，这种结构方法称为“鼓子卯”，工匠们看了无不惊骇叹服，他的聪明智巧就是这般高超。当架设浮桥用的大船建造完成时，承办人就准备调用邻县的民工来拖船下水。这时，中彦召来几十名壮工，就着地势整修河岸，使其成为斜坡直达水面，然后用新秫秸密密地排在地面上，再用大木从旁边压住，督率众工匠乘凌晨霜滑，拖船滑行，不费多大的力气，船舶便顺利下水了。

不久，中彦调任平阳。其时，海陵将进攻宋朝，派使者乘驿马急驰召中彦进京，授予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官职，赐给细铠，令中彦先攻取散关，再等候命令决定进止。

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大赦天下的诏书送到凤翔，众将官都十分惶惑，不能决定动向，中彦多方晓喻譬解，诸将感动领悟，才决定接受诏书。皇上命中彦入朝，中彦将军队交付统军合喜。中彦入见世宗时，世宗将其佩戴的通犀带赐给中

彦，并进封为宗国公。不久，就任命他为吏部尚书。中彦上书道：“古时候关市只查察而不收税；如今却命掌管关市的人征收税而不查察。对过往行旅客商都苛求留难，甚至打开行囊箱篋，任意搜刮，比抢劫还要厉害，实在有伤国家的大体和朝廷的法度，祈请圣上明令予以禁止。”世宗批准所请。

一年以后，朝廷简派中彦任南京（今开封）留守。当时正是淮楚地区进行军事行动之际，土民和戍守的兵卒混杂居住，下面送上来的诉讼状纸头绪纷繁，经管的官员都不知道对这些状纸如何处理。中彦查得戍兵有偷盗行为的，一概依法判处。当地的地区司令怪他专断，上奏章进行弹劾，朝廷也留中不发，不加闻问。中彦任满以后调任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不久，中彦退休，回到京兆府。

过了一年，朝廷又重行起用中彦为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当巩州刘海作乱失败以后，民众从乱被拘留的达几千人，中彦仅杀为首的人。西羌的吹折、密藏、陇逋、庞拜四族依仗着当地地势奇险，不服从金人的管辖，朝廷命侍御史沙醇之与中彦讨论处置方略，中彦道：“这些羌人服叛无常，中彦须得亲自去，否则难以妥善处理。”立即亲自到积石达南寺，到达以后，四名酋长来求见，中彦立刻与他们约定招降办法，事情就这样平定下来了。中彦赏赐他们以后随即遣返。沙醇之回朝奏闻招降经过。皇帝大喜，派张汝王驰驿慰劳中彦，赐给中彦球文金带，赏用郊迎礼，并加“仪同三司”称号。其后因病在任上逝世，享年七十五岁。逝世以后，当地百姓罢市哀悼，并立像祭祀。

（周世德 译）

【原文】

张中彦字才甫，中孚弟。少以父任仕宋，为泾原副将，知德顺军事。睿宗经略陕西，中彦降，除招抚使。从下熙、河、阶、成州，授彰武军承宣使，为本路兵马钤辖，迁都总管。

宋将关师古围巩州，与秦凤李彦琦会兵攻之。王师下饶风关，得金、洋诸州，以中彦领兴元尹，抚辑新附。师还，代彦琦为秦凤经略使。秦州当要冲而城不可守，中彦徙治北山，因险为垒，今秦州是也。筑腊家诸城，以扼蜀道。帅秦凡十年，改泾原路经略使，知平凉府。

朝廷以河南、陕西赐宋，中孚以官守随，例当留关中。熙河经略使慕容洵谋入夏，将闚关、陕，中彦与环庆赵彬会两路兵讨之，洵败入于夏。中彦与兄中孚俱至临安，被留，以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清远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靖海军节度使。

皇统初，恢复河南，诏征中彦兄弟北归，为静难军节度使，历彰化军、凤翔尹，改尹庆阳，兼庆原路兵马都总管、宁州刺史。宗室宗渊殴死僚佐梁郁，郁、远人家贫无能赴告者。中彦力为正其罪，竟置于法。改彰德军节度使，均赋调法，奸豪无所蔽匿，人服其明。

正隆营汴京新宫，中彦采运关中材木。青峰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绝，唐宋以来不能致。中彦使构崖驾壑，起长桥十数里，以车运木，若行平地，开六盘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复领其役。舟之始制，匠者未得其法，中彦手制小舟才数寸许。不假胶漆而首尾自相钩带，谓之“鼓子卯”，诸匠无不骇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舰毕功，将发旁

郡民曳之就水。中彦召役夫数十人，治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稽密布於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俄迁平阳。海陵将伐宋，驿召赴阙，授西蜀道行营副都统制，赐细铠，使先取散关俟后命。

世宗即位，赦书至凤翔，诸将惶惑不能决去就，中彦晓譬之，诸将感悟，受诏。上召中彦入朝，以军付统军合喜。及见，上赐以所御通犀带，封宗国公。寻为吏部尚书。上书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今使掌关市者征而不讥。苛留行旅，至披剔囊笥甚於剽掠，有伤国体，乞禁止。”从之。

逾年，除南京留守。时淮楚用兵，土民与戍兵杂居，讼牒纷纭，所司皆依违不决。中彦得戍兵为盗者，悉论如法，帅府怒其专决，劾奏之，朝廷置而不问。秩满，转真定尹兼河北西路兵马都总管。未几，致仕，西归京兆。明年，起为临洮尹兼熙秦路兵马都总管。巩州刘海构乱，既败，籍民之从乱者数千人，中彦惟论为首者戮之。西羌吹折、密臧、陇逋、庞拜四族恃险不服，使侍御史沙醇之就中彦论方略，中彦曰：“此羌服叛不常，若非中彦自行，势必不可。”即至积石达南寺，酋长四人来，与之约降，事遂定，赏赐遣之。还奏，上大悦，遣张汝王驰驿劳之，赐以球文金带，用郊恩加仪同三司。以疾卒官，年七十五。百姓哀号辍市，立像祀之。

耶律履传

——《金史》卷九五

【说明】耶律履（公元 1130—1191 年），又作移剌履，辽代天文历法家。辽国东丹王七世孙，金朝荫补为承奉班祗候，累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尚书右丞。耶律履精通历法推算。大定年间（公元 1161—1189 年），当时行用的《大明历》年久积差，日食预报连续失误。公元 1180 年，他编撰了《乙未元历》，受到广泛称赞，但未能被朝廷采用。

耶律履（又作移剌履），字履道，辽国东丹王耶律突欲的七世孙。父亲耶律聿鲁早年亡故。聿鲁的族兄兴平军节度使耶律德元无子，以耶律履为后。五岁时，夜间睡在窗下，看见薄云在天空中飘荡，忽然对奶妈说：“这就是所谓‘卧看青天行白云’吧？”德元得知很吃惊，说：“这孩子将以文学而著名于世。”长大后，耶律履博学多才，善长文学。参加科举考试时，厌恶烦琐严密的搜检制度而罢考。因前辈的官位得以出任承奉班祗候、国史院书写。

金世宗完颜雍当时提倡儒术，下令编译经史。耶律履被提拔为国史院编修官，兼任笔砚直长。一天，世宗问他：“我

常读《贞观政要》，见魏征足智多谋，忠心耿耿，实在值得称赞。如今为何没有象魏征这样的人？”耶律履说：“忠诚能干的人，哪个朝代没有？只看当权的人用不用。”世宗说：“您不见刘仲诲、张汝霖吗？我重用这两个人，是因为他们曾任谏官，多次提出忠言。怎么说当权者不用？实在是人材难得呀。”耶律履说：“我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忠言。况且海陵王当政时闭塞言路。天下人都闭口不言，习以为风。希望陛下以前事为戒，广开言路，接受意见，那可就是天下幸事了。”当初有人提议以时务（即治国方法）策论作为女真进士科目。礼部认为与一般科举所学不同，不应同称为进士。皇上和耶律履商量，他说：“进士科目，起自隋朝大业年间。开始时以策论为考试方法。唐初沿用，到唐高宗时才加杂箴、铭、赋、诗等文体的考试，到唐文宗时才专门用赋来考试。进士考试，本来专门考试策论。如今女真诸生以策论考试称进士，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世宗很高兴，于是得以施行。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任应奉翰林文字，兼任过去的职务。不久又任修撰。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奉命负责衍庆宫画功臣像事。误期，降为应奉。过了一年，又复任修撰，转任尚书省礼部员外郎。

金章宗完颜璟即位前为金源郡王，爱读《春秋左氏传》。听说耶律履博学，召他去答疑。耶律履说：“《左氏传》多权诈，杂而不纯。《尚书》、《孟子》都是古代圣贤完美无缺的道理，希望您用心学习。”郡王很赞成。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升为礼部郎中，兼任同修国史、翰林修撰。送给皇帝宋朝司马光的《古文孝经指解》说：“我看近世，都以兵、刑、

财、赋税为重，而司马光却写这本书献给他的国君。当政的人按照这本书中的精神统治国家，老百姓就幸运了。”不久，因病请求外任。世宗说：“耶律履多病，可以派他去近便的地方。”于是任命为蓟州刺史。没多久又召回，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第二年，升为尚书省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

世宗去世，遗言将棺材移置寿安宫。章宗召百官商议，大家都同意遵命，唯独耶律履说：“这样不合礼节。天子死后，经七个月下葬，各国都要来吊。哪能让万国使臣在行宫祭奠皇上呢？”章宗说：“我日思夜想，舍正殿而在行宫祭奠，感情上不忍心，礼节上也不合。”于是在大安殿停灵。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三月，升任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赐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孟崇献榜下进士及第，七月任参知政事，负责编修《辽史》。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升任尚书右丞。

当初黄河于曹州决口。皇帝问：“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记载黄河决口，这是为什么？”耶律履说：“春秋只是鲁国的历史，所以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事。”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六月，耶律履去世，时年六十一岁。这一天正是他的生日。死后赠谥号文献。

耶律履聪明广博，精通历法计算，书法绘画。当初旧时使用《大明历》错误很多，他编《乙未历》献上，因金朝受命于乙未年而命名。乙未历受到广泛赞扬。当初耶律德元没有儿子，过继了耶律履，后来生了儿子耶律震。德元死后，耶律履将家产全部给了耶律震。他从礼部尚书兼任翰林直学士执掌政事时，以前代光院故事为例，将五十万钱送给学士院，

受到学界的称赞。

(刘次沅 译)

【原文】

移刺履字履道，辽东丹王突欲七世孙也。父聿鲁，早亡。聿鲁之族兄兴平军节度使德元无子，以履为后。方五岁，晚卧庑下，见微云往来天际，忽谓乳母曰：“此所谓‘卧看青天行白云者’耶？”德元闻之，惊曰：“是子当以文学名世。”及长，博学多艺，善属文。初举进士，恶搜检烦琐，去之。荫补为承奉班祗候、国史院书写。

世宗方兴儒术，诏译经史，擢国史院编修官，兼笔砚直长。一日，世宗召问曰：“朕比读《贞观政要》，见魏征嘉谋忠节，良可称叹。近世何故无如征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无之，但上之人用与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见刘仲诲、张汝霖耶，朕超用二人者，以尝居谏职，屡有忠言故也。安得谓之不用，第人材难得耳。”履曰：“臣未闻其谏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缄口，习以成风。愿陛下惩艾前事，开谏诤之门，天下幸甚。”

初议以时务策设女直进士科，礼部以所学不同，未可概称进士，诏履定其事，乃上议曰：“进士之科，起于隋大业中，始试以策。唐初因之，高宗时杂以箴铭赋诗，至文宗始专用赋。且进士之初，本专试策，今女直诸生以试策称进士，又何疑焉。”世宗大悦，事遂施行。十五年，授应奉翰林文字，兼前职，俄迁修撰。二十年，诏提控衍庆宫画功臣像，过期，降应奉。逾年，复为修撰，转尚书礼部员外郎。

章宗为金源郡王，喜读《春秋左氏传》，闻履博洽，召质

所疑，履曰：“左氏多权诈，驳而不纯。《尚书》、《孟子》皆圣贤纯全之道，愿留意焉。”王嘉纳之。二十六年，进本部郎中，兼同修国史、翰林修撰，表进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曰：“臣窃观近世，皆以兵刑财赋为急，而光独以此进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辞施诸宇内，则元元受赐。”俄以疾，乞补外，世宗曰：“履多病，可与便州。”

遂授蓟州刺史。无几，召为翰林待制，同修国史。明年，擢尚书礼部侍郎，兼翰林直学士。

世宗崩，遗诏移梓宫寿安宫。章宗诏百官议，皆谓当如遗诏，履独曰：“非礼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其可使万国之臣朝大行于离宫乎？”上曰：“朕日夜思之，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忍，且于礼未安。”遂殡于大安殿。二十九年三月，进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赐大定三年孟崇献榜下进士及第。七月，拜参知政事，提控刊修《辽史》。明昌元年，进尚书右丞。

初，河溢曹州，帝问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河决，何也？”履曰：“《春秋》止是鲁史，所以鲜及他国事。”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谥曰文献。

履秀峙通悟，精历算书绘事。先是，旧《大明历》舛误，履上《乙未历》，以金受命于乙未也。世服其善。初，德元未有子，以履为后，既而生子震，德元歿，尽推家资与之。其自礼部兼直学士为执政，乃举前代光院故事，以钱五十万送学士院，学者荣之。

杨云翼传

——《金史》卷一一〇

【说明】杨云翼（公元 1169—1228 年），平定乐平人（今山西昔阳县）。天文历算家。金明昌五年（公元 1194 年），考取进士第一名。历任太学博士，太常寺丞，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等职。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任提点司天台，礼部、吏部郎中，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等职。官至礼部、吏部尚书、御史中丞，太常卿、翰林学士。司天台有人进《太乙新历》，杨云翼奉命参订，摘出其中二十余条不合适的，历法专家都很信服。他的著作中有《五星聚井辩》一篇，《悬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都是与天文历算有关的。

杨云翼，字之美，祖先是赞黄檀山人。六代祖先杨忠迁至平定州乐平县，从此定居。曾祖父杨青、祖父杨郁、父亲杨恒都得追赠官职。杨云翼天资聪颖，刚学会说话就在地上画字，每天能诵读几千字的文章。金章宗明昌五年（公元 1194 年）考取进士第一名，词赋考试也得中乙科。特别任命为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公元 1199 年），出任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公元 1201 年）任太学博士，

又任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任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受到皇帝召见。章宗询问治国的方法，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卫绍王大安元年（公元1209年），翰林承旨张行简推荐他才能出众，精通历法计算，因而被任命为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不久又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公元1212年）因病退休。宣宗贞祐二年（公元1214年），有关部门进呈官员名册，皇上阅读时记起他的名字，又重新授予从前的职位，兼吏部郎中。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转任礼部侍郎，兼任提点司天台。

贞祐四年（公元1216年），元朝和西夏兴兵入侵鄜延地区，潼关失守。朝廷计划派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出征御敌。杨云翼说该人言过于实，必误大事。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后来果然失败。

兴定元年（公元1217年）六月，升任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仍兼前职。皇帝下诏说：“官阶达到三品，按惯例派往外地任职。因为你遇事敢言，忠诚正直，所以特地将你留下。”当时右丞相高琪当权，有人请求油由政府专卖，高琪极力赞成，召集百官商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赞成，唯独杨云翼和赵秉义、时戡等几个人认为不可行，事情因而搁置。高琪后来借故打击，杨云翼并不害怕。兴定二年（公元1218年），任礼部尚书，兼职如故。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兴建京城的子城，服役的军民数万人。夏秋之交时疾病流行。杨云翼负责医药，亲自治疗，治好了许多人。兴定四年（公元1220年）改任吏部尚书。自从金朝建立以来，捐钱买官或以战功升职的人，有关当局考核苛刻，稍

有小毛病就罢官。杨云翼向皇上建议：“赏罚有关国家的信誉。对这些人应该从宽处理，以鼓励后人。”

当年九月，皇上在内殿召见杨云翼和户部尚书高夔、翰林学士赵秉文，赐他们坐位，商议讲和的事。有人极力主战，皇上低头不悦。杨云翼慢慢地用《孟子》中“事大、事小”的道理来讲解，说：“如今只要想办法，能使人民得以解脱，才是国家的幸福。”皇上于是缓和脸色。

十一月，杨云翼改任御史中丞。皇亲完颜承立任暂任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京兆府路，大臣揭发他行为不法。杨云翼奉命审查，罪案成立，报告说：“承立所犯的都是小事，不足以治罪。然而上次大兵入侵平凉以西，几个州被破，承立带领重兵，畏缩不前。輓延统帅完颜合达以孤城承当强敌，屡立战功。合达立这样的大功，而承立犯那样的罪过，望皇上判明其功罪。赏罚分明，则天下都知道努力了。至于承立的那些小过，不足以追咎。”于是承立被免官，合达被重用。

哀宗完颜守绪即位，先命杨云翼任太常卿，又任翰林学士。哀宗正大二年（公元1225年）二月，又担任礼部尚书兼侍读。朝廷商议尚书省费用。杨云翼说：“尚书省费用事小，户部司农就可以办了。如今枢密院专管军事，蔑视尚书省。尚书省是总管国家大事的地方，不管什么政务都应由这里领导。军队大事，国家命运所系。宰相却无法干预，怎么能权衡利弊总管全局呢？”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

第二年，设益政院，杨云翼首先入选，每次皇上召见的时候都赐坐而不唤他的名字。为皇帝讲解《尚书》时，杨云翼认为皇帝学习不必象一般学生那样逐章逐句地研究，只要

体会其中治国的基本精神就行了。于是举出“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几条，全都本着“正心诚意”的精神，详细讲解发挥。皇上听得忘记疲倦。然后又献上《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等二十篇文章。

当时的朝臣，当朝议政时常常左顾右盼，吞吞吐吐，不能畅所欲言，以致形成坏风气。一天，给皇帝上完课，杨云翼说：“作为臣子，有事奉君王的礼节，也有事奉君王的道理。礼节而言，不可问皇上的马有多大年龄，践踏了马吃的草要罚，进入皇上的门要疾行而过，见到皇上的几杖要起立致敬，皇上召唤时不等马备好就赶快动身，做皇上托付的重要事情不能回家过夜。这些都是事君的礼节，做大臣的应该遵守。然而，国家的利害，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向皇上报告。比较起来，上述的礼就太虚了。皇上说可行的事，有反对的理由也要提出；皇上不行的事，认为可行也应建议。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应象前人引裾、折槛、断鞅、轂轮那样无所畏惧。象如今这样，虚演事君的礼节，不顾事君的大义，国家还有什么依靠呢？”皇上大受感动说：“不是您，我哪能听到这样的话呢！”

杨云翼曾患风痹症，这时刚刚治愈。皇上亲自探问，问他治愈的方法。杨云翼说：“只要治心。心情和谐邪气就不能入侵。治国也是这样，做皇上的先正心，则朝廷百官都会树立正气。”皇上豁然明白，这是以医来劝谏。

西夏与金通好后，派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商议互通贸易事，但往返不能达成协议。杨云翼奉命前往，办成了这件

事。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杨云翼去世，享年五十九岁，赠谥号“文献”。

杨云翼性格庄重，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与人交友，名分一定，生死祸福都不改变。对于国家大事，知无不言。贞祐年间（公元1213—1217年），主管军事的人不能抵抗北方侵略，却想以侵略宋朝来获得补偿，因而连年征伐南方。有提不同意见的人，不是说为宋朝着想，则诬为与宋朝有勾结。至于宰相，别的事都敢管，唯独不敢说南征的事。杨云翼说：“国家目前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不在于攻取淮南之前，而在于得到淮南之后。淮南攻占后，长江以北成为战场。我军若进攻，则进入水乡，劲弓良马不得驰骋，对方如果扼守长江，偷袭淮河以断我粮道，或决开河堤水淹淮南，我军如何守得住呢？”时全倡议南征，宣帝征求朝臣意见。杨云翼说：“朝臣们所说的都是阿谀奉承之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如今只讲治不讲乱，只说强不说弱，只言胜不言败，都是偏颇的说法。我想从两方面分析。我们要攻打宋朝，并非贪其土地。主要是恐怕西北方敌人入侵时南方有牵制，那就三面受敌了。因而我们打算先下手，以阻止其进攻。假使宋人丢失淮南，且不敢反攻，这仗就胜利了。即使这样，也不一定对我有利。宋朝在长江之南尚有广大的领域，即使失了淮南也不难聚集数万人马，等我国有事时伺机出击。战胜了尚且如此，战败了又怎么办呢？况且我们以骑兵攻打宋朝的步兵，我看也并没有完全的优势。如今情况与泰和年间不同。泰和时冬天出击，如今要夏天去，这是天时不同。冬天水干陆地多，夏天水多泥烂，这是地利不同。泰和时举全国的军

力，以纥军（即边地部落）为前锋，如今纥军已降蒙古，这是人事不同。主战的人只看到泰和时之易，不知道今日之难。再请以西夏人为例。过去防守西边的弓箭手，一遇敌人就英勇作战，西夏人逃避北方。如今攻陷我城池，俘虏我官员，战败我军队，生擒我主将。过去那样怕我，今天如此欺侮我，只因夏人已非前日。既如此，怎知宋人就和过去一样呢？但愿陛下想想胜利有哪些好处，战败有什么坏处，别光听好听的话，做下后悔的事。”杨云翼的主张不被采纳。随后，时全果然大败于淮上，全军覆没。宣宗责备诸将说：“我有什么脸看见杨云翼呢！”

河朔一带为骑兵所迫，十分之一的人泅黄河向南逃亡。按法律应治死罪。杨云翼说：“法律严惩私渡的人，是为了防止奸细，如今平民百姓为兵匪所迫，逃奔过河，只是为了避死。如今不死于敌人而死于法律，那以后就只好投靠敌人了。”宣宗顿时醒悟，下令把百姓全部释放。河南旱灾，哀宗派官员处理冤狱，不管陕西。杨云翼说：“天、地、人是一样的道理。人的一条肢体生病则四体也会随之不舒服，哪能专治生病的地方而不管其余呢？”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

司天台有人进上《太乙新历》，尚书省交给杨云翼审阅。他找出其中错误二十多条。历法家都很信服。杨云翼著文集若干卷，校勘《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子》、《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玄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作收藏在家中。

（刘次沅 译）

【原文】

杨云翼字之美，其先赞黄檀山人，六代祖忠客迁平定之乐平县，遂家焉。曾祖青、祖郁、考恒皆赠官于朝。云翼天资颖悟，初学语辄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登明昌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特授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承安四年，出为陕西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泰和元年，召为太学博士，迁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七年，签上京、东京等路按察司事，因召见，章宗咨以当世之务，称旨。大安元年，翰林承旨张行简荐其材，且精术数，召授提点司天台，兼翰林修撰，俄兼礼部郎中。崇庆元年，以病归。贞祐二年，有司上官簿，宣宗阅之，记其姓名，起授前职，兼吏部郎中。三年，转礼部侍郎，兼提点司天台。四年，大元及西夏兵入酈延，潼关失守，朝议以兵部尚书蒲察阿里不孙为副元帅以御之。云翼言其人言浮于实，必误大事。不听，后果败。

兴定元年六月，迁翰林侍讲学士，兼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兼前职，诏曰：“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议论忠谏，故特留之。”时右丞相高琪当国，人有请椎油者，高琪主之甚力，诏集百官议，户部尚书高夔等二十六人同声曰可。云翼独与赵秉文、时戡等数人以为不可，议遂格。高琪后以事谴之，云翼不衅也。二年，拜礼部尚书。兼职如故。三年，筑京师子城，役兵民数万，夏秋之交病者相籍，云翼提举医药，躬自调护，多所全济。四年，改吏部尚书。凡军兴以来，入粟补官及以战功迁授者，事定之后，有司苟为程式，或小有不合辄罢去。云翼奏曰：“赏罚国之大信，此辈宜从宽录，以劝将来。”

是年九月，上召云翼及户部尚书夔、翰林学士秉文于内殿，皆赐坐，问以讲和之策，或以力战为言，上俯首不乐，云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说解之，且曰：“今日奚计哉，使生灵息肩，则社稷之福也。”上色乃和。

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事于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诏云翼就鞠之，狱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细事，不足问。向大兵掠平凉以西，数州皆破，承立坐拥强兵瞻望不进。鄜延帅臣完颜合达以孤城当兵冲，屡立战绩。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愿陛下明其功罪以诛赏之，则天下知所劝惩矣。自余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合达遂掌机务。

哀宗即位，首命云翼摄太常卿，寻拜翰林学士。正大二年二月，复为礼部尚书，兼侍读。诏集百官议省费，云翼曰：“省费事小，户部司农足以办之。枢密专制军政，蔑视尚书。尚书出政之地，政无大小皆当总领。今军旅大事，社稷系焉，宰相乃不得预闻，欲使利病两不相蔽得乎？”上嘉纳之。

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当时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言，顾望依违，寝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

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陈之，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献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献其可。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轹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姑徇事君之虚礼，则不知事君之大义，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言。”

云翼尝患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愈之方，对曰：“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

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云翼往议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谥文献。

云翼天性雅重，自律甚严，其待人则宽，与人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其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御而欲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翼乃建言曰：“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饕道，或决水以潞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云翼曰：“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

利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敢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纥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貽后悔。”章奏不报。时全果大败于准上，一军全没。宣宗责诸将曰：“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云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兵所迫，奔入于河，为追死之计耳。今使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后唯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旱，诏遣官理冤狱，而不及陕西。云翼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宁，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哉。”朝廷是之。

司天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云翼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辩》一篇，《悬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藏于家。

刘完素传

——《金史》卷一三一

【说明】刘完素（公元 1120—1200 年），字守真，金代著名医学家。河北河间人，又名刘河间。是金元四大家之一，因母病失治而亡，立志学医。自二十五岁开始研读《内经》，常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经三十余年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成为一名既具渊博学识，又有丰富临诊经验，著述颇多的医学家。刘完素曾三次谢绝金章宗之征召，专心致力于医学。他触类旁通，学术见解颇多独创。其立论依据多本于《内经》，尤其对运气学说及“亢则害，承乃制”等阴阳五行学说有精辟见解，临床上宗张仲景及各家理论而有所发挥。

刘完素著述颇多，计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一卷、《宣明论方》三卷、《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要旨论》等等。

刘完素，字守真，河北河间人。他曾经遇一奇异之人，名陈先生，陈氏给刘完素进酒，完素酒后大醉，酒醒之后顿觉洞晓医术，好似有人传授一般。随后撰写《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他又担心庸医乱谈医理，而著《素问玄机原病式》，从《素问》中摘取二百八十八字作纲领，全书达二万

余言。然而刘完素喜好用寒凉药物，其方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元处士”。（郝恩恩 译）

【原文】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尝遇异人陈先生，以酒饮守真，大醉，及寤洞达医术，若有授之者。乃撰《运气要旨论》、《精要宣明论》，虑庸医或出妄说，又著《素问玄机原病式》，特举二百八十八字，注二万余言。然好用凉剂，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自号“通元处士”云。

张从正传

——《金史》卷一三一

【说明】张从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河南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金代著名医学家，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他出身于医学世家，久居宛丘，因此又有人把他称作张宛丘。张氏从年轻时代起就好读《内经》，学术上私淑刘完素。他精于医术，名擅中州。金廷曾召入太医院供职，由于过不惯官府生活，不久便谢官还乡。

张从正的主要学术观点集中在《儒门事亲》一书中。他以张仲景汗、下、吐三法为宗，结合刘河间所谈之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称为“三法六门”，即用三法六门囊括了疾病分类及治疗总则，并分别归纳为九类适用的方剂。以六气加内伤、外伤、内积、外积，称为“十形”，分别归纳为十类病征。他所掌握的汗、下、吐三法，立病“凡在上者皆可吐，凡在表者皆可汗，凡在下者皆可下”三式，以此三法包括一切治法。另外，汗、下、吐三法各有禁忌，宜辩证施治。《儒门事亲》除阐述汗、下、吐三法外，对儿科斑疹伤寒的症状有较详细的描述，对妇女病与口眼喎斜的诊断方法，亦有新的见解，在临床上有参考价值。

张从正在医学界独树一帜，用汗、下、吐三法极精，号称“张子和汗、下、吐法。”他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获效。后人将宗其学者统称为“攻下派”。其著述除《儒门事亲》之外，还有《三复指迷》、《子和心法》、《张氏经验方》、《三法六门》等。

张从正，字子和，河南睢州考城人。他精于医术，通晓《难经》、《素问》的理论，治疗效法刘守真，多采用寒凉药物，治病救人每多获起死回生之效。古代医书有汗、下、吐法，然而有不应该用发汗剂发汗而死的，有不应该用攻下、泻下剂妄下而亡的，亦有不应该用催吐剂吐后弊命的，汗、下、吐法各有其理论，世人相传为黄帝、岐伯所著。张从正正确使用汗、下、吐三法，人们称之为“张子和汗、下、吐法”。那些庸医只知沿用张子和的方剂，而不知细察其脉、推求病原，往往将病人致于死地，此为庸医没有真正掌握汗、下、吐法造成的。张子和有《六门、二法》之书刊行于世。

（郝恩恩 译）

【原文】

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李庆嗣 纪天锡传

——《金史》卷一三一

【说明】李庆嗣，金代医家，洺（今河北永年、肥乡间）人。少习举子业，后学医。读《素问》诸书，洞晓其义。天德年间，河北广平大疫，他携药与米分送百姓，救活许多人。其著作有《伤寒纂类》四卷、《考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等，均流传于世。卒年八十余。

纪天锡，金代医家，字齐卿，山东泰安人。生活于12世纪。早年弃儒学医，精其技，遂以医名。集注《难经》五卷。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进献该书，授医学博士。

李庆嗣，洺（今河北永年、肥乡一带）人。他少年考进士没被录取，故放弃仕途转而学医，研读《素问》等医学书籍，深明其意。天德年间，瘟疫流行，尤以河北为重，穷人往往全家卧病不起，李庆嗣将药和粮食分赠给他们，使许多人起死回生。李氏享年八十余岁，无病而亡。著有《伤寒纂类》四卷、《考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均流传于世。

纪天锡，字齐卿，泰安人。他早年放弃仕途之道，学习医学，精于医术，故以医为业，且有医名。他集注《难经》五卷，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6年）将其集注的《难经》进献朝廷，朝廷授予他医学博士（掌教授生员）。

（郝恩恩 译）

【原文】

李庆嗣，洺人。少举进士不第，弃而学医。读《素问》诸书，洞晓其义。天德间，岁大疫，广平尤甚，贫者往往阖门卧病，庆嗣携药与米分遗之，全活者众。庆嗣年八十余无疾而终。所著《伤寒纂类》四卷、《改证活人书》三卷、《伤寒论》三卷、《针经》一卷，传于世。

纪天锡，字齐卿，泰安人。早弃进士业，学医，精于其技，遂以医名世。集注《难经》五卷，大定十五年上其书，授医学博士。

张元素传

——《金史》一三一

【说明】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今河北易县）人。金代医学家，生活于 12 世纪。他二十七岁考进士因犯庙讳落第而立志学医，经过多年勤学苦思，终有所成。据载，当时名医刘完素病伤寒八日不愈，元素为之精确诊断而获痊愈，名声大噪。

他的著作有《医学启源》两卷、《洁古珍珠囊》一卷、《脏腑标本药式》一卷、《洁古注叔和脉诀》十卷、《药注难经》等以及有关针灸的论述。其子张璧，继父业，著名于时。张元素的学生李东垣继承他的脏腑辨证用药学说，以《脾胃论》著称于世。张氏私淑者众，世称“易水学派”。

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他八岁时通过童子举考试，在二十七岁考经义进士时，因犯皇帝名讳而落榜。他转而学医，但在当时没有什么名气。有一天夜里做梦，梦见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开他的心窍，将数卷书放入心中，从此张元素茅塞顿开，精通医术。河间刘完素患伤寒八天，头痛脉紧，呕逆不思饮食，不知什么原因所致。张元素前去诊视，刘完素瞧不

起他，面墙壁而坐，张元素说：“你何故如此对待我？”随即为刘完素诊脉，并对他说：“脉病如此如此，”刘完素答道：“是这样的。”他又问：“初服的药剂有没有某味药？”完素答道：“有的。”张元素说：“您错了，所入的那味药性寒，下降入太阴脾经，亡阳而汗不能出。察此时的脉，应服另一味药才能奏效。”刘完素听后心悦诚服，按张元素所开的药服下，很快痊愈了。从此以后张元素名声大振。

张元素治病不泥于古方，他说：“古今运气不同，用古方治疗今病不相符合。”自成一家理论。（郝恩恩 译）

【原文】

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人。八岁试童子举，二十七试经义进士，犯庙讳下第。乃去学医，无所知名。夜梦有人用大斧长凿凿心开窍，纳书数卷于其中，自是洞彻其术。河间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不知所为。元素往候，完素面壁不顾，元素曰：“何见待之卑如此哉？”既为诊脉，谓之曰：“脉病云云，”曰：“然。”“初服某药，用某味乎？”曰：“然。”元素曰：“子误矣。某味性寒，下降走太阴，阳亡汗不能出。今脉如此，当服某药则效矣。”完素大服，如其言遂愈，元素自此显名。

平素治病不用古方，其说曰：“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为家法云。

耶律楚材传

——《元史》卷一四六

【说明】耶律楚材（公元 1190—1244 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世居中都（今北京）。金元之际契丹族人，辽皇族子孙。楚材年轻时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佛、道、医、卜等学问，因父荫在金朝做官。元太祖十年（公元 1215 年），北京被蒙古军队攻陷，当时成吉思汗为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曾寻访辽宗室近族。公元 1218 年，耶律楚材应召，随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占卜星象，兼行医术。

在拖雷监国和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耶律楚材是掌握汉文的必闾赤（书记）长，汉人称为中书令，受到重用，参与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他曾奏请军民分治；反对以汉地为牧场，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推行赋税制；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印儒家典籍，渐兴文教；施用儒术，开科取士；废止屠城旧制，等等。对于“汉地”（指原金朝管辖的北方农业地区）经济和文化的恢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元代立国规模多由其奠定。窝阔台汗死，乃马真皇后称制，宠信回回人奥都剌合蛮等，耶律楚材受到排挤，抑郁而死。

耶律楚材崇信佛教，多与僧人往来。著有《湛然居士集》、《西游录》、《西征庚午元历》、《皇极经世义》、《麻荅把历》、《五星秘语》、《先知大数》等书。

在公元1220年成书的《西征庚午元历》中，他创立了“里差”概念，并以此计算因东西两地距离差异而造成的月食时刻和食分不同的时间改正，这是地理纬度概念在中国的首次应用。他还研究过西域的《回纥历》，认为《回纥历》推算行星运动比中原历法精密，于是著《麻荅把历》，可惜具体内容已失传。《西游录》成书于公元1228年，这是一部最早记录天山以北与楚河、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他在西域楚河及阿姆河一带居住过五年左右，因此在他的《湛然居士集》中也有记述西域风土人情的大量诗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耶律楚材在历史著作中一直被视为“名臣”。清朝乾隆皇帝曾下令在北京西郊瓮山脚下（今颐和园内）为耶律楚材立祠。以示纪念，至今该祠尚存。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父亲耶律履，因学问品行出众得以奉事金世宗，特别受到亲近和信任，去世时官至尚书右丞。

楚材三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杨氏教他读书。长大后，博览群书，兼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以及佛、道、医、卜等学问，下笔写文章，好象早就做好似的。金朝制度，宰相之子可以按惯例通过考试担任尚书省属官。耶律楚材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章宗诏令按原有的制度办。考官用几个疑难案

件进行提问，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有十七个人，唯独楚材的回答特别好，于是被征召为尚书省属官。此后又担任过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公元 1214 年），金宣宗迁都汴梁，完颜福兴为行尚书省事，留守燕京，征召耶律楚材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成吉思汗攻取燕京，听说楚材的名字，于是召见他。耶律楚材身高八尺，胡须漂亮，声音宏亮，太祖很看重他，说：“辽和金是世代的仇敌，我为你报仇雪恨。”楚材回答说：“我的父亲和祖父都曾委身奉事金朝，既然做了金朝的臣民，怎敢仇恨自己的君主呢？”太祖很敬重他这番话，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于是称呼楚材为“吾图撒合里”而不叫他的名字，“吾图撒合里”，在蒙语中意思是胡须很长的人。

己卯年（公元 1219 年）夏六月，太祖向西讨伐回回国。祭旗的那一天，雪下了有三尺厚，太祖心中疑惑，耶律楚材说：“盛夏季节出现水气，这是战胜敌人的预兆。”庚辰年（公元 1220 年）冬天，雷声很大，太祖又问他，他回答说：“回回国王将死在野外。”以后这些话都灵验了。西夏人常八斤，因为善于制造弓箭，得到太祖的赏识，所以经常自夸道：“国家正在兴兵打仗，耶律楚材这个书生有什么用！”楚材说：“造弓尚且要用弓匠，取天下的人怎能不用治理天下的工匠呢？”太祖听到后十分高兴，越来越信任和重用他。西域懂得历法的人上奏说五月十五日晚将出现月蚀。楚材说：“不对。”果然没有出现月蚀。第二年十月，耶律楚材说将有月蚀，西域人说没有，到时间果然月蚀八分。壬午年（公元 1222 年）八月，彗星出现在西方，楚材说：“女真将改换皇帝了。”第

二年，金宣宗果然去世。太祖每次出师征讨，必定要让耶律楚材占卜吉凶，太祖自己也炙烧羊胛骨，判断天意和人事是否相符。指着楚材对太宗说：“这个人是上天赐给我家的。以后军国大事都要交给他处理。”甲申年（公元1224年），太祖到达东印度，驻扎在铁门关，有一只头上长角的野兽，形状象鹿却长着马的尾巴，绿颜色，会讲人话，对侍卫说：“你的主人应早点回去。”太祖向耶律楚材询问这件事，楚材回答说：“这是吉祥的动物，名叫角端，能说各个地方的语言，喜欢生灵而厌恶杀戮，这是上天降下符瑞以告诫陛下。陛下是上天的大儿子，天下的人都是陛下的子女，希望陛下顺应上天的心意，保全百姓的生命。”太祖当天就班师回去了。

丙戌年（公元1226年）冬天，跟随太祖攻克灵武，将领们都争着掠取子女金帛，唯独耶律楚材专门收集失落的书籍和大黄等药材。不久士兵们染上疫病，用大黄一治就好了。太祖亲自经营西方的疆土，来不及制定有关制度，州郡长官，任意生杀，甚至把老百姓的妻子强迫变为奴隶，掠夺财物，兼并土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其贪婪暴虐，杀人满市。楚材听说后流下眼泪，随即向太祖上奏，请求向各州郡发布禁令，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不得随便向百姓征税调役，囚犯应处死刑的必须上报，违反者处以死罪，于是贪暴的风气有所收敛。燕京一带有许多厉害的盗贼，光天化日之下就拉着牛车到富人家索取财物，不给就杀人。当时睿宗拖雷以皇子的身份监理国事，听说这些情况，便派遣宫中使臣和耶律楚材一起前去严厉查办。楚材查问到盗贼的姓名，都是留后长官的亲属和有权势人家的子弟，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盗

贼的家里贿赂宫中使臣，使臣企图拖延处理，楚材向他讲明这样做将带来的后果，使臣惧怕，听从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定案后，在集市上处死十六人，燕京的百姓才安定下来。

己丑年（公元1229年）秋天，太宗将要即位，宗室皇亲都聚集在一起，讨论还没有作出决定。当时睿宗拖雷是太宗窝阔台的亲弟弟，所以耶律楚材对睿宗说：“这是宗庙社稷的大事，应该尽早确定。”睿宗说：“事情还没有完结，另外选个日子怎么样？”楚材说：“过了今天就没有吉日了。”于是确定下来，耶律楚材建立礼仪制度，进而对亲王察合台说：“亲王虽然是兄长，但地位则是臣子，按礼节应当跪拜皇帝。您跪拜了，那么就没人敢不拜了。”察合台很赞同他的意见。等到太宗即位，察合台率领全体皇族成员和大臣们在宫帐下跪拜。礼毕退下，察合台手抚着耶律楚材说：“您真是安邦定国的大臣啊！”蒙古国君臣间有跪拜之礼从这时候开始。当时朝会迟到应处死刑的人很多，楚材上奏道：“陛下刚刚即位，应该赦免他们。”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

中原刚刚平定，老百姓误犯法律的人很多，而国家法令中没有赦免的说法。耶律楚材请求对他们宽大处理，众人都认为不切实际，唯独楚材严肃地向皇帝建议。皇帝发布诏令，凡是庚寅年（公元1230年）正月初一以前犯的事情都不予追究。他还拟订了十八项应办的事情，建议颁行天下。大致是说：“州郡要设置长官以管理百姓，设置万户以统率军队，使文、武双方势均力敌，以防止骄横的作风。中原地区，是国家财赋的来源，应该保存和照顾这里的百姓，州县如果没有上司的命令，胆敢擅自科征赋税的要判罪。借贷官府财物做

买卖的，也要判罪。蒙古、回鹘、河西等地的人，种地不交税的处以死刑。负责管理的官员自己盗窃官府财物的也要处死。凡是犯死罪的，要将理由上奏朝廷等待批复，然后行刑。各地上贡和进献礼物，为害不小，必须严禁。”太宗全部同意，只有禁止贡献礼物这件事不答应，说：“那些自愿贡献的，应该允许。”楚材说：“腐败的祸端，必然从这里开始。”太宗说：“凡是你奏请的事情，我没有一件不答应，你难道不能顺从我一件事吗？”

太祖在世的时候，每年都要用兵西域，没有时间来经营治理中原，很多官吏都聚敛财物为自己打算，家中财物多得不得了，而官府却没有什储备。近臣别迭等人说：“汉人对国家没什么用处，可以把他们的土地全部空出来做牧场。”耶律楚材说：“陛下即将向南征伐，军需物资要有来源，如果能均衡地确定中原地区的田税、商税以及盐、酒、铁冶和山林河湖等业的赋税，每年可以得到五十万两白银、八万匹绢帛和四十多万石粟子，足以供给军队需要，怎能说没什么用处呢？”太宗说：“你为我试着办。”于是奏请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正、副长官都任用读书人，如陈时可、赵昉等都是宽厚长者、天下第一流的人物，属官都用金朝尚书省六部的原班人员。辛卯年（公元1231年）秋天，太宗来到云中，十路都送来储存粮食的簿册和黄金、绢帛，陈列在廷中，太宗笑着对楚材说：“你没有离开过我的身边，却能使国家经费充裕，南方金国还有象你这样的大臣吗？”楚材回答说：“在那里的人都比我贤明能干，我没什么本事，所以才留在燕京，为陛下所用。”太宗赞赏他的谦虚，赐酒给他。当即任命他为

中书令，事无大小，都要先跟他通报商议。

耶律楚材上奏：“凡是地方州郡应该让行政长官专门管理民事，万户统管军政，凡是地方所掌管的征收赋税的事务，权贵不能干预。”又推荐镇海、粘合二人，与他共同工作，权贵都不服气。咸得卜因为过去跟耶律楚材有仇，尤其忌恨他，在宗王面前诬陷道：“耶律中书令专门任用自己的亲信故旧，必定怀有叛逆之心，应该奏请皇帝杀掉他。”宗王派人告诉皇帝，太宗觉察到这是诬陷，就斥责了来人，把他打发回去。接着有人控告咸得卜有犯法行为，太宗命楚材审理此事，耶律楚材上奏说：“此人骄傲自大，因而容易招来别人的攻击。现在正要对方南用兵，以后再作处理也不晚。”太宗私下对侍臣说：“楚材不计较私仇，真是宽厚长者，你们应当效法他。”宫中显贵可思不花奏请召募采金银的役夫以及到西域种田、栽葡萄的人户，太宗下令在西京宣德迁移一万多户来充当。楚材说：“先帝遗诏中说，山后的百姓质朴，和蒙古人没有区别，遇到危难时可以利用，不应轻易迁移他们。如今即将征讨河南，请不要分散山后百姓，以便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使用他们。”太宗同意了他的请求。

壬辰年（公元1232年）春天，太宗南下征讨，将要渡黄河，诏令逃难的百姓，前来投降的可以免死。有人说：“这些人危急的时候就投降，没事的时候就逃走，只对敌人有好处，不能宽大处理。”耶律楚材请求制作几百面旗子，发给投降的难民，让他们返回乡里，很多人因此得以保全性命。按照蒙古传统的制度，凡是攻打城池，敌人用弓箭和石块袭击的，就是违抗命令，攻克之后，必定将城中军民全部杀死。汴梁将

要攻下，大将速不台派人来说：“金人抗拒了很长时间，我军死伤很多，汴梁攻克之日，应该屠城。”耶律楚材急忙进去上奏道：“将士们辛苦了几十年，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得到了土地而失去了人民，又有什么用呢？”太宗犹豫不决，楚材又说：“能工巧匠，富裕人家，都集中在这里，如果将他们全部杀死，将会一无所获。”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诏只处罚完颜氏一族，其余都不追究。当时躲避打仗而住在汴梁的有一百四十七万人。

耶律楚材又请求派人进城，寻求孔子的后代，找到孔子的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请由他继承“衍圣公”的封号，将孔林、孔庙的土地交付给他，命令他收集金朝的太常礼乐生。又征召著名的儒生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人，让他们将《九经》译成口语，讲给太子听。又率领大臣们的子孙，拿着经书讲解其中的含义，使他们知道圣人的学说。在燕京设置编修所，在平阳设置经籍所，从此文明教化开始兴盛。

当时河南地区刚刚攻下，俘虏很多，蒙军返回，俘虏逃跑的有十分之七、八。皇帝下令：凡是收留和资助逃亡者的，处死全家，同村邻里也要连坐。因此，逃亡者没有人敢收留，大多饿死在路上。耶律楚材平心静气地对太宗说：“河南已经平定，这里的百姓都是陛下的儿女，还会走到哪里去呢！何必因为一个俘虏，而使几十个上百个人牵连受死呢？”太宗醒悟，下诏解除了这个禁令。金朝灭亡后，只有秦、巩等二十多个州很久没有投降，楚材上奏道：“过去我们的百姓逃避罪罚，有的集中在这些地方，所以拼死抵抗，如果答应不杀他们，将不攻自破。”赦免死罪的诏令一下，这些城池都投降了。

甲午年(公元1234),讨论将中原百姓登记编户,大臣忽都虎等人建议以成年男子为征税对象。耶律楚材说:“不行。成年男子逃走,那么赋税就征收不到了,应当以户为征收对象。”争论多次,终于确定以户为征收对象。当时将相大臣获得的俘虏,往往寄存在地方州郡,楚材利用登记户口的机会,下令将俘虏全部登记为平民,凡是隐藏私占的处以死刑。

乙未年(公元1235),朝廷讨论将四处征伐没有归附的地方,假如派遣回回人征讨江南,汉人征讨西域,那么就能有效地控制他们,耶律楚材说:“不行。中原和西域相距遥远,还没有到达敌人的边境,就已经人马疲乏了,加上水土不服,容易生传染病,应该各从其便。”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丙申年(公元1236)春天,宗王们大聚会,太宗亲自拿起酒杯赐给耶律楚材说:“我之所以推心置腹地任用你,是因为先帝的命令。没有你,中原地区就没有今天。我之所以能够高枕无忧,都是因为你的努力。”西域各国以及宋朝、高丽的使者前来朝见,说的话大多不可信,太宗指着耶律楚材对他们说:“你们国家有这样的人才吗?”使者们都老实地说道:“没有。他简直是神人啊!”太宗说:“你们只有这句话不假,我也觉得你们国中一定没有这样的人才。”有个叫于元的人奏请发行纸币,耶律楚材说:“金章宗时开始推行纸币,与铜钱同时使用,官府以发行纸币来谋利,不愿意回收,称为‘老钞’,甚至一万贯纸币只能买一张饼。百姓穷困,国家经费短缺,应该引以为戒。现在印制纸币,不能超过一万锭。”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

秋七月,忽都虎送来了户口簿,太宗打算分割州县赏赐

给亲王、功臣。耶律楚材说：“分割土地和人民，容易发生冲突和纠纷。不如多赐给他们金帛财物。”太宗说：“已经答应了，怎么办呢？”楚材说：“如果朝廷设置官吏，征收上交给诸王功臣的赋税，到年底分给他们，不让他们自行征收，这样就可以了。”太宗同意他的想法，于是确定全国的赋税，每两户出丝一斤，以供国家使用；五户合出丝一斤，作为诸王和功臣封地的收入。地税：中等田每亩交二升半，上等田交三升，下等田交二升，水田每亩交五升；商税征收三十分之一；盐价，白银一两可买四十斤。正常的赋税额确定后，朝廷讨论认为太轻，楚材说：“赋税从轻，仍会产生贪污的弊端，以后将会有人以增加国家收入为升官的途径，那样的话现在的赋税额就已经够重的了。”

当时工匠制造物品，随意浪费官府的物资，十之八、九被他们私自占有，耶律楚材请求全部加以考核，建立起固定的制度。当时侍臣脱欢奏请在天下没有出嫁的女子中挑选美女，诏令已经颁发，耶律楚材拦住不执行，太宗发怒。楚材进谏道：“以前挑选了二十八个美女，已经足够用来使唤。现在又要挑选，我担心骚扰百姓，正想再向陛下汇报。”太宗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取消这件事。”又打算征收民间的母马，楚材说：“耕种养蚕的地方，不出产马，现在如果推行收马之法，以后必定成为百姓的祸害。”太宗又接受了他的意见。

丁酉年（公元1237），耶律楚材上奏说：“制造器具必须用好的工匠，要保持国家已取得的成就必须任用儒臣。儒臣的事业，不进行几十年的积累，是难以成功的。”太宗说：“果真是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些人做官。”楚材说：“请加以考

试选拔。”于是命令宣德州宣课使刘中到各郡去主持考试，分为经义、词赋、论三个科目，被俘为奴的读书人，也让他们参加考试，主人隐藏不让他们应试的处以死刑。共选拔了四千三百名读书人，免去奴隶身份的占四分之一。

以前，州郡官吏中有很多人借商人的银钱来偿还欠官府的债务，利息累计为本钱的好几倍，称为“羊羔儿利”，甚至妻子儿女都被变卖为奴隶，还是还不清。耶律楚材上奏，下令利息与本钱相等后不许再增加，永远成为固定的制度，民间所欠的债务，由官府代为偿还。直至统一度量衡、颁发符印、建立钞法、制定统一的贸易法规、设置邮政系统、明确驿站的使用凭证，各种政务大致齐备，百姓稍微能够休养生息。

有两个道士争当道长，彼此都聚集了一批党羽，其中一个道士诬陷对手党羽中的两个人是逃兵，勾结宫中侍从和通事杨惟忠，将那两人抓起来残酷杀死。耶律楚材将杨惟忠拘留审问，宫中侍从却说楚材违反朝廷制度，太宗发怒，逮捕楚材。随即又很后悔，下令释放他。楚材不肯松绑，对太宗说：“我身为宰相，关系到国家大政。陛下开始时下令逮捕我，是因为我有罪，应当在百官面前公开宣布我的罪行不可饶恕。现在释放我，是因为我无罪，怎么能这样随便翻来覆去，像戏弄小孩一样呢？如果国家有大事，也能这样干吗？”众人吓得脸色都变了。太宗说：“我虽然是皇帝，难道就没有错误的举动吗？”于是好言安慰了他一番。楚材乘机陈述了十条处理当今时务的措施，这十条措施是：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

运。都切合当今时务，太宗全部同意施行。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因为贪污而获罪。太宗责备耶律楚材说：“你讲过孔子的教导可行，读书人是好人，为什么还有这种人？”楚材答道：“君主、父亲教导臣属、子女，也不想让他们去做不讲道义的事情。三纲五常是圣人的教导，管理国家的人没有不遵循的，好比是天上太阳和月亮一样。怎能因为一个人的过失，而使得万世经常奉行的学说单单在我们这个朝代被废止呢？”太宗的恼怒这才缓解。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和刘廷玉等人用银一百四十万两承包天下赋税，楚材说：“这些都是贪图财利的家伙，欺骗朝廷坑害百姓，为害很大。”奏请皇帝取消这种做法。他经常说：“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任尚以为班超的话平淡无奇，但是千年之后，自有定论。以后遭到谴责的人，才知道我的话不假。”太宗素来喜欢喝酒，每天与大臣们开怀畅饮，楚材多次劝阻，太宗不听，于是就拿着酒槽的铁口对太宗说：“酒能够使东西腐烂，铁尚且如此，何况是人的五脏呢？”太宗醒悟，对近臣说道：“你们这些人爱护君王，为国忧虑的心意，难道能比得上吾图撒合里吗？”于是赐给他金帛财物，下令侍从们每天进酒以三钟为限。

自从庚寅年（公元1230）确定征税规则，到甲午年（公元1234年）平定河南，税额每年都有增加，到戊戌年征收的白银达一百一十万两。有个翻译名叫安天合，讨好镇海，率先招引奥都剌合蛮包买赋税，又增加到二百二十万两白银。耶律楚材极力争辩劝阻，以至于声色俱厉，一边说一边哭。太宗说：“你想打架呀？”又说：“你想为百姓哭泣吗？姑且让他

们试着做做再说。”楚材无法阻止，于是叹息道：“百姓困穷，将从此开始了！”

耶律楚材曾与宗王一起吃饭，喝醉后躺在车中，太宗在原野上看见了，直接来到他的营盘里，登上车用手推他。楚材睡得正香，正为别人打扰自己而恼怒，忽然睁开眼睛一看，才知道是皇帝来了，慌忙起身谢罪，太宗说：“有酒一个人喝醉，不想跟我一起快活快活吗？”笑着走了。楚材来不及穿戴好衣冠，赶紧骑马前往皇帝的行宫，太宗为他摆开酒席，尽兴而罢。

耶律楚材主持政务很长时间，把得到的俸禄分给自己的亲族，从来没有徇私情让他们做官。行省刘敏严肃认真地向他提起此事，楚材说：“使亲族和睦的道理，只应是用财物资助他们。我不能为了照顾私人感情而让他们去做官违法。”

辛丑年（公元1241）二月三日，太宗病危，医生说脉搏已经不动了。皇后不知所措，把耶律楚材召来询问，楚材回答说：“现在任用的官员不合适，出卖官职，打官司要贿赂，囚禁无辜的人很多。古人一句好话就可以使火星退到原来的位置，我请求赦免天下的囚徒。”皇后想立即去做，楚材说：“没有皇帝的命令不行。”过了一会，太宗稍微苏醒过来，于是上奏请求赦免囚犯，太宗已不能说话，点头表示同意。当天夜里，医生测到脉搏重新跳动，正好是宣读赦免令的时候，第二天病就好了。冬十一月四日，太宗将出去打猎，楚材用太乙数来推算，赶紧说不能打猎，左右侍从们都说：“不骑马射箭，就谈不上快乐。”打猎五天，太宗在行营中去世。皇后乃马真氏行使皇帝权力，重用和信任奸邪之人，政务都被搞

乱。奥都剌合蛮因为包买赋税而执掌大权，朝廷里的人都害怕他、依附他。楚材当面斥责，在朝廷中争辨，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人们都为他担心。

癸卯年（公元 1243）五月，火星侵犯房星区域，耶律楚材上奏说：“将有惊扰发生，但最后会没事的。”没过多久，朝廷用兵，事情仓猝发生，群情纷扰，皇后于是下令将靠得住的人武装起来，甚至想向西迁移以躲避面临的危机。楚材说：“朝廷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一旦动摇，天下将会动乱。我观察天象，肯定没有灾难。”过了几天就安定下来。皇后将盖有皇帝大印的空白纸张交给奥都剌合蛮，让他自行填写办事。楚材说：“天下是先皇帝的天下。朝廷自有法律规章，现在要搅乱，我不敢遵从命令。”这件事因而中止。又有旨令说：“凡是奥都剌合蛮提出的建议，令史如果不记录下来，就砍断他的手。”楚材说：“国家的典章制度，先帝都托付给老臣我来维护，跟令史有什么关系呢？事情如果合理，自然应当奉命执行，如果不能照办的，死都不怕，何况是断手呢！”皇后很不高兴。楚材仍然争辨不已，并大声说：“老臣我奉事太祖、太宗三十多年，没有辜负国家，皇后又怎么能没有罪名而处死我呢！”皇后虽然恨他，也因为他是先朝的有功旧臣，对他既尊敬又畏惧。

甲辰年（公元 1244）夏五月，耶律楚材死在官位上，终年五十五岁。皇后哀悼，赠赐非常丰厚。后来有人诬陷楚材，说他当宰相时间很长，天下进贡的赋税有一半都落到他的家中。皇后命令侍从大臣麻里扎前去查看，只有十几张琴、阮以及几千卷古今书画、金石和遗文。至顺元年（公元 1330

年)，赠官号为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为广宁王，谥号“文正”。

耶律楚材有两个儿子，名分别为铉、铸。

(江小涛 译)

【原文】

耶律楚材，字晋卿，辽东丹王突欲八世孙。父履，以学行事金世宗，特见亲任，终尚书右丞。

楚材生三岁而孤，母杨氏教之学。及长，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者。金制，宰相子例试补省掾。楚材欲试进士科，章宗诏如旧制。问以疑狱数事，时同试者十七人，楚材所对独优，遂辟为掾。后仕为开州同知。

贞祐二年，宣宗迁汴，完颜福兴行尚书事，留守燕，辟为左右司员外郎。太祖定燕，闻其名，召见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声。帝伟之，曰：“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对曰：“臣父祖曾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帝重其言，处之左右，遂呼楚材曰“吾图撒合里”而不名。“吾图撒合里”，盖国语长髯人也。

己卯夏六月，帝西讨回回国。禡旗之日，雨雪三尺，帝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克敌之征也。”庚辰冬，大雷，复问之，对曰：“回回国主当死于野。”后皆验。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见知于帝，因每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闻之甚喜，日见亲用。西域历人奏五月望夜月当蚀。楚材曰：“否。”卒不蚀。明年十月，楚材言月

当蚀，西域人曰不蚀，至期果蚀八分。壬午八月，长星见西方，楚材曰：“女真将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果死。帝每征讨，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合。指楚材谓太宗曰：“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甲申，帝至东印度，驻铁门关，有一角兽，形如鹿而马尾，其色绿，作人言，谓侍卫者曰：“汝主宜早还。”帝以问楚材，对曰：“此瑞兽也，其名‘角端’，能言四方语，好生恶杀，此天降符以告陛下。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愿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师。

丙戌冬，从下灵武，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辄愈。帝自经营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长吏，生杀任情，至孥人妻子，取货财，兼土田。燕蓟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贪暴，杀人盈市。楚材闻之泣下，即入奏，请禁州郡，非奉玺书，不得擅征发，囚当大辟者必待报，违者罪死，于是贪暴之风稍戢。燕多剧贼，未夕，辄曳牛车指富家，取其财物，不与则杀之。时睿宗以皇子监国，事闻，遣中使偕楚材往穷治之。楚材询察得其姓名，皆留后亲属及势家子，尽捕下狱。其家赂中使，将缓之，楚材示以祸福，中使惧，从其言，狱具，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

己丑秋，太宗将即位，宗亲咸会，议犹未决。时睿宗为太宗亲弟，故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计，宜早定。”睿宗曰：“事犹未集，别择日可乎？”楚材曰：“过是无吉日矣。”遂定策，立仪制，乃告亲王察合台曰：“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王深然之。及即位，王率皇族

及臣僚拜帐下，既退，王抚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时朝集后期应死者众，楚材奏曰：“陛下新即位，宜宥之。”太宗从之。

中原甫定，民多误触禁纲，而国法无赦令。楚材议请肆宥，众以之迂，楚材独从容为帝言。诏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条便宜一十八事颁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贡献礼物，为害非轻，深宜禁断。”帝悉从之，唯贡献一事不允，曰：“彼自愿馈献者，宜听之。”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于此。”帝曰：“凡卿所奏，无不从者，卿不能从朕一事耶？”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货至钜万，而官无储待。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税使，凡长贰悉用士人，如陈时可、赵昉等皆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参佐皆用省部旧人。辛卯秋，帝至云中，十路咸进廩籍及金帛陈于廷中，帝笑谓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国用充足，南国之臣，复有如卿者乎？”对曰：“在彼者皆贤于臣，臣不才，故留燕，为陛下用。”帝嘉其谦，赐之酒。即日拜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

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又举镇海、粘合，均与之同事，权贵不能平。咸得卜以旧怨，尤疾之，谮于宗王曰：“耶律中书令率用亲旧，必有二心，宜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帝察其诬，责使者，罢遣之。属有讼咸得卜不法者，帝命楚材鞠之，奏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谤。今将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谓侍臣曰：“楚材不较私仇，真宽厚长者，汝曹当效之。”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役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蒲萄户，帝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之。楚材曰：“先帝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今将征河南，请无残民以给此役。”帝可其奏。

壬辰春，帝南征，将涉河，诏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或曰：“此辈急则降，缓则走，徒以资敌，不可宥。”楚材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汴梁将下，大将速不台遣使来言：“金人抗拒持久，师多死伤，城下之日，宜屠之。”楚材驰入奏曰：“将士暴露数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无民，将焉用之？”帝犹豫未决，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帝然之，诏罪止完颜氏，余皆勿问。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

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奏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由是文治兴焉。

时河南初破，俘获甚众，军还，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资给者，灭其家，乡社亦连坐。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楚材从容进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复何之！奈何因一俘囚，连死数十百人乎？”帝悟，命除其禁。金之亡也，唯秦、巩二十余州久未下，楚材奏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战。若许以不杀，将不攻自下矣。”诏下，诸城皆降。

甲午，议籍中原民，大臣忽都虎等议，以丁为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则赋无所出，当以户定之。”争之再三，卒以户定。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为民，匿占者死。

乙未，朝议将四征不廷，若遣回回人征江南，汉人征西域，深得制御之术，楚材曰：“不可。中原、西域，相去辽远，未至敌境，人马疲乏，兼水土异宜，疾疫将生，宜各从其便。”从之。

丙申春，诸王大集，帝亲执觞赐楚材曰：“朕之所以推诚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则中原无今日。朕所以得安枕者，卿之力也。”西域诸国及宋、高丽使者来朝，语多不实，帝指楚材示之曰：“汝国有如此人乎？”皆谢曰：“无有。殆神人也！”帝曰：“汝等唯此言不妄，朕亦度必无此人。”有于元者，奏行交钞，楚材曰：“金章宗时初行交钞，与钱通行，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谓之‘老钞’，至以万贯唯易一饼。民力困竭，国用匱乏，当为鉴戒。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从之。

秋七月，忽都虎以民籍至，帝议裂州县赐亲王功臣。楚

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帝曰：“已许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可也。”帝然其计，遂定天下赋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以给国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汤沐之资。地税，中田每亩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亩五升；商税，三十分而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既定常赋，朝议以为太轻，楚材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时工匠制造，糜费官物，十私八九，楚材皆考核之，以为定制。时侍臣脱欢奏简天下室女，诏下，楚材尼之不行，帝怒。楚材进曰：“向择美女二十有八人，足备使令。今复选拔，臣恐扰民，欲覆奏耳。”帝良久曰：“可罢之。”又欲收民牝马，楚材曰：“田蚕之地，非马所产，今若行之，后必为人害。”又从之。

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先是，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至一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庶政略备，民稍苏息焉。

有二道士争长，互立党与，其一诬其仇之党二人为逃军，结中贵及通事杨惟忠，执而虐杀之。楚材按收惟忠。中贵复诉楚材违制，帝怒，系楚材，既而自悔，命释之。楚材不肯解缚，进曰：“臣备位公辅，国政所属。陛下初令系臣，以有罪也，当明示百官，罪在不赦。今释臣，是无罪也，岂宜轻易反复，如戏小儿。国有大事，何以行焉？”众皆失色。帝曰：“朕虽为帝，宁无过举耶？”乃温言以慰之。楚材因陈时务十策，曰：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皆切于时务，悉施行之。

太原路转运使吕振、副使刘子振，以赃抵罪，帝责楚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为好人，何故乃有此辈？”对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义。三纲五常，圣人之名教，有国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岂得缘一夫之失，使万世常行之道独见废于我朝乎！”帝意乃解。

富人刘忽笃马、涉猎发丁、刘廷玉等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楚材曰：“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奏罢之。常曰：“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为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论。后之负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进曰：“麴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帝悟，语近臣曰：“汝曹爱君忧国之心，岂有如吾图撒合里者耶？”赏以金帛，敕近臣日进酒三钟而止。

自庚寅定课税格，至甲午平河南，岁有增羨，至戊戌课银增至一百一十万两。译史安天合者，谄事镇海，首引奥都

刺合蛮扑买课税，又增至二百二十万两。楚材极力辩谏，至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帝曰：“尔欲搏斗耶？”又曰：“尔欲为百姓哭耶？姑令试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叹息曰：“民之困穷，将自此始矣！”

楚材曾与诸王宴，醉卧车中，帝临平野见之，直幸其营，登车手撼之。楚材熟睡未醒，方怒其扰己，忽开目视，始知帝至，惊起谢，帝曰：“有酒独醉，不与朕同乐耶？”笑而去。楚材不及冠带，驰诣行宫，帝为置酒，极欢而罢。

楚材当国日久，得禄分其亲族，未尝私以官。行省刘敏从容言之，楚材曰：“睦亲之义，但当资以金帛。若使从政而违法，吾不能徇私恩也。”

岁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笃，医言脉已绝。皇后不知所为，召楚材问之，对曰：“今任使非人，卖官鬻狱，囚系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荧惑退舍，请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顷，帝少苏，因入奏，请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医者候脉复生，适宣读赦书时也，翌日而瘳。冬十一月四日，帝将出猎，楚材以太乙数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骑射，无以为乐。”猎五日，帝崩于行在所。皇后乃马真氏称制，崇信奸回，庶事多紊。奥都刺合蛮以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

癸卯五月，荧惑犯房，楚材奏曰：“当有惊扰，然讫无事。”居无何，朝廷用兵，事起仓卒，后遂令授甲选腹心，至或西迁以避之。楚材进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摇，天下将乱。臣观天道，必无患也。”后数日乃定。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

刺合蛮，使自书填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事遂止。又有旨：“凡奥都刺合蛮听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楚材曰：“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与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后不悦。楚材辩论不已，因大声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后虽憾之，亦以先朝旧勋，深敬惮焉。

甲辰夏五月，薨于位，年五十五。皇后哀悼，赙赠甚厚。后有谮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贡赋，半入其家。后命近臣麻里扎覆视之，唯琴阮十余，及古今书画、金石、遗文数千卷。至顺元年，赠经国议制寅亮佐运功臣、太师、上柱国，追封广宁王，谥“文正”。子铉、铸。

张文谦传

——《元史》卷一五七

【说明】张文谦（公元 1215—1283 年），邢州沙河人（今河北邢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张文谦任其王府书记并随之出征，深受信任。世祖即位后，张文谦先后任左丞，大司农卿，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张文谦早年与刘秉忠同学，学习研究历法计算。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因《大明历》使用日久，误差累积，决定改制新历。于是任命张文谦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负责改历。在许衡、王恂、郭守敬等人努力下，完成了《授时历》。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小时聪明，善于记忆、背诵。和太保刘秉忠同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受封于邢州，刘秉忠向他推荐张文谦。丁未年（公元 1247 年），张文谦受到召见，对答合意，被任命为王府的书记，逐渐得到信任。邢州地处交通要道，当初分二千户为功臣的食邑。这些人只知每年派人来征索，全不管治理。租税沉重，老百姓苦不堪言。有人向王府诉苦，张文谦和刘秉忠对世祖说：“如今老百姓困苦，以邢州为甚。应当选派人员去治理，考察政绩，让四方

效仿，这样全天下都受益不浅。”于是选派近侍脱兀脱、尚书刘肃、侍郎李简前往。三人到了邢州，同心协力，惩治贪暴，革除弊政，逃亡的人民纷纷归来。没几个月，户口增加了十倍。从此世祖更加重视儒士，委以重任，这都是从张文谦开始的。

辛亥年（公元1251年），宪宗即位。张文谦、刘秉忠多次向世祖建议应当优先施行的政策，都得到采纳。世祖征大理国，国主高祥拒不从命，杀了使者后逃走。世祖大怒，将要屠城。张文谦与刘秉忠、姚枢劝道：“杀使拒命的是高祥，并非老百姓的罪过，请宽恕他们。”因此大理百姓得以存活。己未年（公元1259年），世祖率领大军伐宋。张文谦、刘秉忠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对老百姓应当一视同仁，不可杀害无辜。”世祖说：“我们共同遵守这一诺言。”攻入宋境，分头命令诸将不可妄杀无辜，不烧毁房屋，捉到的俘虏都放掉。

中统元年（公元1260），元世祖即位，立中书省，任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建立法纪，讲明利弊，以安定国家，便利人民为宗旨。诏令一出，天下可望获得太平。但王文统素来心胸狭窄，工作之间常有意见不合，久积成怨。张文谦要求外任，被委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临行前对王文统说：“百姓长期遭受战乱之苦，又遇上大旱。若不当减少税赋，百姓如何喘得过气来？”王文统说：“皇上刚刚即位，国家的费用全指望赋税。若再减免，如何供给国家的需用？”张文谦说：“百姓富足了，皇帝还能不富？等到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时再索取也不晚。”于是蠲免一般赋税十分之

四，免商酒税十分之二。

中统二年（公元1261）春，张文谦回到朝廷。建立左右部，各种大小事务，出力最多。中统三年（公元1262），阿合马负责左右部，主管财务，想独立主张，不经过中书省。命令廷臣会议，张文谦说：“专管财政机构，古代有这样的道理。不让中书管理，没有这样的道理。中书不管，难道要皇上亲自管吗？”皇帝说：“仲谦说得对。”

至元元年（公元1264），张文谦受命以中书左丞的身份巡视西夏中兴等路。羌地民俗粗野，办事缺乏规矩。张文谦找到五、六个沦为俘虏的四川士人，让他们学习书吏的公事。没多久，他们写的公文已经很有规矩了。青年人也知道读书，风气为之一变。还疏浚了唐来、汉延两条水渠，灌溉了农田十几万顷。百姓得到许多好处。

至元三年（公元1266），回到朝廷。有权有势者声称有几千户人家应当属于他们的私奴，朝廷久议不决。张文谦主张以乙未年（公元1235）的户口为准。当时为奴，没报户口的，归富家为奴，其余良民不应该为奴。于是作为法律定了下来。至元五年（公元1268），淄州妖人胡王煽惑众，案发后逮捕百余人。丞相安童转达张文谦的意见：“愚民无知，受骗上当，诛杀首恶就行了。”皇上命令张文谦审理此案，结果只有三个判处弃市，其余的都释放了。

至元七年（公元1270），任大司农卿。奏请在各道设立劝农司，巡行各地督促农业生产。又请求建立籍田制度，行祭祀先农、先蚕的礼仪。又和窦默一起请求建立国子学。皇帝任命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族子弟加以教育。当时阿合马提

议收缴民间铁器，官方铸为农具，再高价卖给农民；在东平、大名创立行户部印制钞票；还有各路转运司，扰乱地方政府，祸害人民。张文谦都在皇帝面前极为反对，加以纠正。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升任御史中丞。阿合马害怕宪台（御史台）发现他干的坏事，劝皇帝取消诸道按察司以便削弱御史台的力量。张文谦劝皇帝恢复，但知道自己得罪了奸臣，坚决要求辞职。正好元世祖认为大明历年久误差，命令许衡等人造新历，于是任命张文谦为昭文馆大学士，领导太史院。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任枢密副使。因病死于任上，享年六十八岁。

张文谦早年跟随刘秉忠，深入研究历法数学；晚年与许衡交往，特别精通理学。为人刚直稳重，在皇帝面前提倡的，全是尧舜的仁义之道。多次得罪权贵，但个人得失全不在意。家中只有藏书万卷。尤其以引荐人材为己任，受到当时舆论的赞许。历赠官推诚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号忠宣。张文谦长子张宴，官至御史中丞，赠官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号文靖。

（刘次沅 译）

【原文】

张文谦，字仲谦，邢州沙河人。幼聪敏，善记诵，与太保刘秉忠同学。世祖居潜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荐文谦可用。岁丁未，召见，应对称旨，命掌王府书记，日见信任。邢州当要冲，初分二千户为勋臣食邑，岁遣人监领，皆不知抚治，征求百出，民弗堪命。或诉于王府，文谦与秉忠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弊，莫邢为甚。盍择人往治之，责其成效，使四方

取法，则天下均受赐矣。”于是乃选近侍脱兀脱、尚书刘肃、侍郎李简往。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皆自文谦发之。

岁辛亥，宪宗即位。文谦与秉忠数以时务所当先者言于世祖，悉施行之。世祖征大理，国主高祥拒命，杀信使遁去。世祖怒，将屠其城。文谦与秉忠、姚枢谏曰：“杀使拒命者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赖以全活。己未，世祖帅伐宋，文谦与秉忠言：“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世祖曰：“期与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诸将毋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立中书省，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文谦为左丞。建立纲纪，讲明利病，以安国便民为务，诏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统素忌克，谟谋之际屡相可否，积不能平，文谦遽求出，诏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临发，语文统曰：“民困日久，况当大旱，不量减税赋，何以慰来苏之望？”文统曰：“上新即位，国家经费止仰税赋，苟复减损，何以供给？”文谦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俟时和岁丰，取之未晚也。”于是蠲常赋什之四，商酒税什之二。

二年春，来朝，复留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讲行庶务，巨细毕举，文谦之力为多。三年，阿合马领左右部，总司财用，欲专奏请，不关白中书。诏廷臣议之，文谦曰：“分制财用，古有是理，中书不预，无是理也。若中书弗问，天子将亲莅之乎？”帝曰：“仲谦言是也。”

至元元年，诏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羌俗

素鄙野，事无统纪，文谦得蜀士陷于俘虏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习吏事，旬月间簿书有品式，子弟亦知读书，俗为一变。浚唐来、汉延二渠，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

三年，还朝。诸势家言有户数千，当役属为私奴者，议久不决。文谦谓以乙未岁户帐为断，奴之未占籍者，归之势家可也。其余良民无为奴之理。议道定，守以为法。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众，事觉，逮捕百余人。丞相安童以文谦言奏曰：“愚民无知，为所诳诱，诛其首恶足矣。”诏即命文谦往决其狱，惟三人坐弃市，余皆释之。

七年，拜大司农卿，奏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请开籍田，行祭先农先蚕等礼。复与窦默请立国子学。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选贵胄子弟教育之。时阿合马议拘民间铁，官铸农器，高其价以配民，创立行户部于东平、大名以造钞，及诸路转运司，干政害民，文谦悉于帝前极论罢之。十三年，迁御史中丞。阿合马虑宪台发其奸，乃奏罢诸道按察司以撼之，文谦奏复其旧。然自知为奸臣所忌，力求去。会世祖以大明历岁久寢差，命许衡等造新历，乃授文谦昭文馆大学士，领太史院，以总其事。十九年，拜枢密副使，岁余，以疾薨于位，年六十八。

文谦蚤从刘秉忠，洞究术数；晚交许衡，尤粹于义礼之学。为人刚明简重，凡所陈于上前，莫非尧、舜仁义之道。数忤权倖，而是非得丧，一不以经意。家惟藏书万卷。尤以引荐人材为己任，时论益以是多之。累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魏国公，谥忠宣。

长子晏，仕至御史中丞，赠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文靖。

李 冶 传

——《元史》卷一六〇

【说明】李冶（公元 1192—1279 年），原名李治，元代数学家和著名学者。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李冶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在文学、史学、哲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数学方面，李冶对于宋元之际创立的天元术（中国古代建立一元高次方程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从而对代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测圆海镜》中通过勾股容圆问题全面地论述了设立未知数和列方程的步骤、技巧、运算法则，以及文字符号表示法等，使天元术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新阶段。《益古演段》则是他为天元术初学者所写的一部简明易晓的入门书。李冶的著作有《测圆海镜》十二卷（公元 1248 年），《益古演段》三卷（公元 1259 年），《敬斋古今註》四十卷。另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等，已失传。

李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曾考取金朝进士，被派往高陵担任主簿，但未赴任，后又 被征召为钧州知州。壬辰年

(公元1232年), 钧州城被攻破, 李冶改扮成平民, 北渡黄河, 流落在忻县、崞县一带。他的居室很狭小, 四周又放置许多书籍, 一般人难以忍受, 而李冶却觉得挺宽绰。

元世祖忽必烈尚未即位时听到李冶的贤名, 于是派遣使臣召见他, 并且说: “曾听说仁卿博学多才, 有美德而鲜为人知, 早就想见上一见, 望勿推辞。”李冶到来后, 世祖问他金国官员中哪些人是好官, 李冶回答道: “就善恶而言, 只有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合答及蒲瓦如何, 答道: “这二人缺少统兵的才略, 却毫不犹豫地使用他们, 这就是金国所以灭亡的原因。”又问魏徵、曹彬如何, 答道: “魏徵所讲的话都是忠诚正直的, 而且知无不言, 在唐代敢于直言规谏的大臣中, 当属第一。曹彬征伐江南, 未曾妄杀一人, 可与方叔、召虎相比, 至于汉代的韩信、彭越、卫青、霍去病, 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又问在当今的大臣中有没有像魏徵这样的人, 答道: “如今吹牛拍马成风, 要想找到魏徵这样的贤臣, 实在是太难了。”又问现在的人材是否真正有德行有才干, 答道: “天下并不缺乏人材, 求则得之, 舍则失之, 其中的道理只不过如此而已。现在的知识分子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等, 都是有用之材, 又都是您曾经请来咨询过的人, 为什么不可以进行选拔而加以任用呢, 只恐怕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而已。况且天下之大, 又岂止这几个人。只要到外面去广招贤才, 那么朝廷之上就会人材济济了。”

又问怎样治理天下, 答道: “治理天下, 难则难于登天, 易则易于反掌。可以说有法度则治, 名副其实则治, 进君子退小人则治, 象这样要使天下安定, 岂不是易如反掌吗! 无

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象这样要使天下安定，岂不是难于登天吗！况且治理之道，只不过是立法度、正纪纲而已。所谓纪纲，就是维护君臣上下之间的关系，所谓法度，就是通过赏罚而示惩劝。如今的大官小吏，以至平民百姓，大都毫无顾忌，以私害公，这就是没有法度。有功者未必受到奖赏，有罪者未必受到惩罚，甚至有功者反而受到污辱，有罪者反而受到宠信，这也就是没有法度。法度废弛，纪纲败坏，天下不发生变乱，那已经是大幸了。”

又问昨日的地震是怎么回事，答道：“天裂是由于阳不足，地震是由于阴有余。地的性质属阴，阴太盛，就会发生异常现象。如今的地震，或因朝廷奸臣当道，或因内宫后妃获宠弄权，或因谗言恶念惑乱人心，或因刑罚过于严苛，或因突然发动战争，五者之中必居其一。上天爱护君王，如爱其子，故以此示警。如果能辨明奸邪，去除女宠，排斥谗言恶念，减免刑罚，不轻易征伐，上遂天心，下如人意，那么就可以逢凶化吉了。”元世祖对李冶的见解非常赞赏。

李冶晚年隐居于元氏县，在封龙山下购置了田产，他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元世祖即位以后，又聘请他去，打算给予他清高而显要的官职，但李冶以年老多病为由，恳请还家。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再征聘他为翰林学士，但仅就职一年，又以老病辞归，后在家中逝世，享年八十八岁。所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古今䟽》四十卷，《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何绍庚 译）

【原文】

李冶字仁卿，真定栾城人。登金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辟知钧州事。岁壬辰，城溃，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聚书环堵，人所不堪，冶处之裕如也。

世祖在潜邸，闻其贤，遣使召之，且曰：“素闻仁卿学优才瞻，潜德不耀，久欲一见，其勿他辞。”既至，问河南居官者孰贤，对曰：“险夷一节，惟完颜仲德。”又问完颜合答及蒲瓦何如，对曰：“二人将略短少，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问魏徵、曹彬何如，对曰：“徵忠言谏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徵为第一。彬伐江南，未尝妄杀一人，拟之方叔、召虎可也，汉之韩、彭、卫、霍，在所不论。”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对曰：“今以侧媚成风，欲求魏徵之贤，实难其人。”又问今之人材贤否，对曰：“天下未尝乏材，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理势然而。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鹗、李献卿、兰光庭、赵复、郝经、王博文辈，皆有用之材，又皆贤王所尝聘问者，举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尽耳。然而四海之广，岂止此数子哉。王诚能旁求于外，将见集于明廷矣。”

又问天下当何以治之，对曰：“夫治天下，难则难于登天，易则易于反掌。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且为治之道，不过立法度、正纪纲而已。纪纲者，上下相维持；法度者，赏罚示惩劝。今则大官小吏，下至编氓，皆自纵恣，以私害公，是无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赏，有罪者未必被罚，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获宠，是无

法度也。法度废，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

又问昨地震何如，对曰：“天裂为阳不足，地震为阴有余。夫地道，阴也，阴太盛，则变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侧，或女谒盛行，或谗慝交至，或刑罚失中，或征伐骤举，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爱君，如爱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耳。苟能辨奸邪，去女谒，屏谗慝，省刑罚，慎征讨，上当天心，下协人意，则可转咎为休矣。”世祖嘉纳之。

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及世祖即位，复聘之，欲处以清要，冶以老病，恳求还山。至元二年，再以学士召，就职期月，复以老病辞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斋文集》四十卷，《壁书丛削》十二卷，《泛说》四十卷，《古今𩇑》四十卷，《测圆海镜》十二卷，《益古演段》三卷。

李 谦 传

——《元史》卷一六〇

【说明】李谦（公元1233—1312年），郓州东阿人（今山东东阿），教书为业，生徒甚众，以学识著称于世。后被征召，先后任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直学士、学士、承旨、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等职，多次担任储君的教师，很受器重。至元二十年（公元1273年），任翰林直学士，太子左谕德的李谦为《授时历》写了《历议》。《历议》详细阐明了《授时历》的各项改进及其原理，对历史上各种历法进行了对比，以客观事实说明该历的精度远胜于其他各历。《历议》中列出了《授时历》编制过程中所作的许多天文观测记录，如至元十五至十六年的冬、夏至观测数据及折算方法，二十八宿距度，冬至点位置等，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历议》中列出了49条冬至时刻的历史记录以及历史上各种历法的部分数据，其中许多信息和数据赖此得以流传至今。李谦《授时历历议》是中国天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尽管《元史·李谦传》没有提到他的天文工作，但现存于《元史·历志》的《历议》表明了李谦对中国天文学的重大贡献。

李谦，字受益，郢州东阿人。祖父李元，以医术著名。父亲李唐佐，性情恬淡，不喜欢做官。

李谦小时就有成人的风格。刚开始进学，每天写上千字的文章，写的赋很有名声，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以李谦为首。做过东平府教授，四方学生云集。官做到万户府经历，又任东平府教授。当时，教授没有俸禄，地方官让儒生集资白银百两做为学费。李谦不肯接受，说：“幸好我家还不是很贫穷，哪能给自己谋利呢？”

翰林学士王磐以李谦的名声上奏，皇上召他做应奉翰林文字。这一期间，皇帝的文书多是出自他的手。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升为待制。随驾到上都，受赐银壶、藤枕。至元十八（公元1281），升为直学士，太子左谕德，在东宫跟随裕宗（当时的太子）。给裕宗讲十件事：正心、睦亲、崇俭、几谏（纳谏）、戢兵（停止战争）、亲贤、尚文、定律、正名、革弊。裕宗死后，世祖又让他辅佐成宗（太子），走到哪里都要李谦跟随。又任侍读学士。世祖十分器重。有一次在偏殿与群臣饮酒聚会。世祖说：“听说您不喝酒，但是能为我勉强喝一杯吗？”赐葡萄酒一杯，说：“这酒极醉人，恐怕您经不起。”于是让三个侍从扶他退下。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因为脚有病而辞职回家。

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成宗即位。召李谦到上都，见面慰问说：“我知道先生有病，但京师离家不远，又有许多良医，能为您治病。您为我谋画国家大事，别的事就不麻烦您了。”升为翰林学士。元贞初年，因病辞职回家。大德六年（公元1302），召见任命为翰林承旨。以年纪七十一岁为

由请求退休。大德九年(公元1305),又征召,至大元年(公元1308),发给半俸。仁宗做太子时,请他做太子少傅,李谦极力推辞。

元仁宗即位,召见十六人,以李谦为首。李谦勉强支撑去行宫拜见皇帝,上书说了九件事,大意:“以正心术要求百官,以崇孝道鼓励天下,选拔贤能的人做辅佐大臣,调查研究掌握上下全面的情况,爱护百姓把他们当做国家的根本,督促鼓励农业生产保证衣食,兴办学校以培养选拔人才,颁布法令并教育百姓守法,操练军队做到居安思危。至于整顿风纪,惩治违法行为的台宪官员,更应当选用名声好,有经验,不纠缠细节的人来当。”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任命为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退休,加赐银一百五十两,金织币和帛各三匹。回家后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李谦文章醇厚有古风,不崇尚浮巧,许多读书人学习他的文风,号称野斋先生。儿子李偁,官至大名路总管。

(刘次沅 译)

【原文】

李谦字受益,郢之东阿人。祖元,以医著名。父唐佐,性恬退,不喜仕进。

谦幼有成人风,始就学,日记数千言。为赋有声,与徐世隆、孟祺、阎复齐名,而谦为首。为东平府教授,生徒四集,累官万户府经历,复教授东平。先时,教授无俸,郡敛儒户银百两备束修,谦辞曰:“家幸非甚贫者,岂可聚货以自殖乎!”

翰林学士王磐以谦名闻,召为应奉翰林文字,一时制诰,

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升待制，扈驾至上都，赐以银壶、藤枕。十八年，升直学士，为太子左谕德，侍裕宗于东宫。陈十事：曰正心，曰睦亲，曰崇俭，曰几谏，曰戢兵，曰亲贤，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裕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于潜邸，所至以谦自随。转侍读学士。世祖深加器重，尝赐坐便殿，饮群臣酒，世祖曰：“闻卿不饮，然能为朕强饮乎？”因赐葡萄酒一钟，曰：“此极醉人，恐汝不胜。”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二十六年，以足疾辞归。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驿召至上都。既见，劳曰：“朕知卿有疾，然京师去家不远，且多良医，能愈疾。卿当与谋国政，余不以劳卿也。”升学士。元贞初，引疾还家。大德六年，召为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九年，又召，至大元年，给半俸。仁宗为皇太子，征为太子少傅，谦皆力辞。

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谦居其首。乃力疾见帝于行在，疏言九事，其略曰：“正心术以正百官，崇孝治以先天下，选贤能以居辅相之位，广视听以通上下之情，恤贫乏以重邦家之本，课农桑以丰衣食之源，兴学校以广人才之路，颁律令使民不犯，练士卒居安思危。至于振肃纪纲、纠察内外，台宪之官尤当选素著清望、深明治理、不事苛细者为之。”帝嘉纳焉。迁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加赐银一百五十两，金织币及帛各三匹。归，卒于家，年七十九。

谦文章醇厚有古风，不尚浮巧，学者宗之，号野斋先生。子偁，官至大名路总管。

杨恭懿传

——《元史》卷一六四

【说明】杨恭懿（公元1225～1294年），陕西奉元（今陕西西安）人，元代天文历算家。他一生好学，甘于澹泊，不求名利。五十岁时，太子真金以礼聘为相当于现今顾问性质的人员，他入京才一年就回去了。这时，由于金代遗留下来的《大明历》预报天象不准确。忽必烈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命王恂、郭守敬与许衡等共同编制新的历法，杨恭懿再度被邀到燕京，参与订立新历的工作。下一年，新历告成，四人曾共同进奏忽必烈，详细作了汇报。杨恭懿对学术有很深的造诣，改历完成后他的奏言指出，必须每年进行实测，作出修改，要积三十年方能趋于完美，是道出了古代制订历法的关键性的要点，表明他精通天文历法，不仅是谙熟经书的儒士，也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对中国最精良的古历《授时历》的制订，有相当重要的贡献。

杨恭懿，字元甫，陕西奉元人。他读书勤奋，记性很好，每天能背几千字。即使是随家人躲避战乱，但也未曾荒废学业。十七岁时，从西部归来，由于贫穷，从事劳动养家。一

有空他就学习，见书就读。对《易经》、《礼记》和《春秋》，领会特别深刻，后来得到了朱熹集注的《四书》，赞赏说：“日常的人际关系，天理人性的奇妙，都包含在这些书中了。”父亲去世，他一连五天不进汤水，完全按礼节办丧事。当地宣抚司和陕西行省征召他去当书记官，他都推辞了。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朝廷召用杨恭懿与许衡二人，他没有去。许衡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经常在右相安童面前称颂杨恭懿，安童亦奏报给皇帝忽必烈。至元十年朝廷派人带诏书去召用他，他以生病而未应召。十一年（公元1274年），太子真金命中书省，仿照历史上汉惠帝聘请四位贤德老翁的事例去聘请他。丞相还派郎中张元智写信致意，他方同意到京城去。入朝后，皇帝先派国王和童慰劳他的远道而来，又亲自详细面谈，问他的家乡、家族情况和学术渊源等。下一年正月初二，皇帝因大军南征，一直没有消息，在香殿上让杨恭懿占卜，结果秘不告人。这时有侍读学士徒单公履申请设立录用士人的科目，皇帝让他跟杨恭懿商量。杨恭懿道：“皇帝说过，有些读书人不研习经书和孔孟之道，老是做诗和空文，这话确实点出了国家长治久安的道理。现在要录用士人，可以通令有关部门，要保举品行好并且通达经史的人。不要让他们自己来投请。然后以经书和论议作考试。大家从事实际的学问，风气和习俗就会清纯，国家就会得人才。”上报后，皇帝认为很不错。但不久又北征，杨恭懿回家去了。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朝廷又派安西王的相把杨恭懿请到京师去。进见后请他去太史院共改历法。十七年（公元1280年）二月，他们上奏时，恭懿说：“我们查核了汉

朝以来的四十多种历法，仔细作了研究和计算。现今旧的天文仪器难以运用，新的又未全部制成，所以太阳、月亮的运行快慢，还有五星在天上的运动等，未能作精密的测定。现姑且应用新仪器的木表，与用旧仪器所测作比照，得到该年冬至日的日影长度和太阳在天上的位置，二十八宿恒星宿度的改正数，京师大都北极的出地高度以及昼夜的时刻数等，同时参阅前人的方法，用以创立了新的历法，已推算得了辛巳年（公元1281年）的新历。虽然也许还不够精密，但是比起以前的改历者，他们拉扯一个历日的起点，改变一下一年长度，做法仍跟过去一般，那末我们的历法亦可告无愧。但每年一定要做实测加以修正，总要达三十年，方法才能够趋于完善。可以像夏、商、周三代掌天文的官员那样，世代专职承继，长期测验，就可不致于经常改历了。”在《合朔议》内，他道：

四个季节中太阳在众星间走动一圈，称为一年。月亮则每走了一圈，又与太阳相遇，称为一月。因而每一个月的开始，日月两相会合，称为合朔。自从废除秦历后，汉代的《太初历》只用平朔法，大月与小月间隔出现，亦有两个大月相连的。日食常在月末晦日或初二日出现，其时刻的测量也很难准确。刘宋的何承天作了四十多年实测，上报了《元嘉历》，方才依月球运行的快慢定出以十二个月为一年后多出的余分，以此来订定每个月初一与十五的日子，使日食须在朔日发生，叫做定朔法。这种安排会有连续三个大月接两个月。当时认为跟旧法相异而未采用。梁代虞翻作《大同历》，隋代刘焯

作《皇极历》，都采用定朔，也都受到阻挠。至唐代傅仁钧作《戊寅历》，开始实行了定朔。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一连四个大月，大家都觉得奇怪，竟又改用以前的平朔法。李淳风作的《麟德历》，虽然不用平朔，然而遇到接连四个大月时，为了避免闲言碎语，就用平朔隔开。又为了符合世俗，作出进朔法，使正月初一无日食。到一行作《大衍历》时，他说过：“天上的事理是周密的，四个大月与三个月月相连有什么妨碍呢。”确实说得很对，然而他亦照往常一样，并没有改过来。

我们改作新历，都依照前代贤德学者是的论点，遵照实际计算所得。现在的至元十九年新历，从八月以后，连续四个大月，是太阳与月亮在天上相合的实际现象。以上详细的有关记载见《郭守敬传》。那天，正排了队跪见忽必烈皇帝。奏章还未吟读，皇帝就叫许衡与杨恭懿起来。他说：“你二人年纪大，别太累了。”于是任命杨恭懿为集贤学士，兼任太史院事。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杨恭懿辞职还乡。以后，朝廷在二十年（公元1283年）以太子宾客名义召他进京，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以昭文馆学士、领太史院事召他，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又曾以议中书省事召请他，他都没有去。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杨恭懿于七十岁高龄时去世了。

（潘鼎译）

【原文】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学强记，日数千言。虽从亲逃乱，未尝废业。年十七，西还，家贫，服劳为养。暇则就

学，书无不读，尤深于《易》、《礼》、《春秋》，后得朱熹集注《四书》，叹曰：“人伦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书矣。”父没，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居丧尽礼。宣抚司、行省以掌书记辟，不就。

至元七年，与许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书左丞，日于右相安童前称誉恭懿之贤，丞相以闻。十年，诏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书，俾如汉惠聘四皓者以聘恭懿，丞相遣郎中张元智为书致命，乃至京师。既入见，世祖遣国王和童劳其远来，继又亲询其乡里、族氏、师承、子姓，无不周悉。十二年正月二日，帝御香殿，以大军南征，使久不至，命筮之，其言秘。侍读学士徒单公履请设取士科，诏与恭懿议之。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奏入，帝善之。会北征，恭懿遂归田里。

十六年，诏安西王相敦遣赴阙。入见，诏于太史院改历。十七年二月，进奏曰：“臣等编考自汉以来历书四十余家，精思推算，旧仪难用，而新者未备，故日行盈缩，月行迟疾，五行周天，其详皆未精察。今权以新仪木表，与旧仪所测相较，得今岁冬至晷景及日躔所在，与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极之高下，昼夜刻长短，参以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虽或未精，然比之前改历者，附会历元，更立日法，全踵故习，顾亦无愧。然必每岁测验修改，积三十年，庶尽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专其职，测验良久，无改岁之事矣。”

又《合朔议》曰：

日行历四时一周，谓之一岁；月逾一周，复与日合，谓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谓合朔。自秦废历纪，汉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间，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测验时刻亦鲜中。宋何承天测验四十余年，进《元嘉历》，始以月行迟速定小余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时以异旧法，罢之。梁虞门造《大同历》，隋刘焯造《皇极历》，皆用定朔，为时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历》，定朔始得行。贞观十九年，四月频大，人皆异之，竟改从平朔。李淳风造《麟德历》，虽不用平朔，遇四大则避人言，以平朔间之。又希合当世，为进朔法，使无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历》，谓“天事诚密，四大三小何伤。”诚为确论，然亦循常不改。

臣等更造新历，一依前贤定论，推算皆改从实。今十九年历，自八月后，四月并大，实日月合朔之数也。详见《郭守敬传》。是日，方列跪，未读奏，帝命许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劳也。”授集贤学士，兼太史院事。

十八年，辞归。二十年，以太子宾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馆学士、领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议中书省事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 恂 传

——《元史》卷一六四

【说明】王恂（公元 1235—1281 年），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元代天文历算家。少时聪颖过人，被路过中山的刘秉忠赏识，将其带到磁州紫金山学习。1253 年，刘秉忠将王恂推荐给元世祖，世祖命他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公元 1261 年）升做太子赞善。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因元初行用的金《大明历》不准，世祖任命王恂、郭守敬等进行改历。并设立太史局，“官属悉听恂辟置。”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太史局改为太史院，王恂为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至元十七（公元 1280 年），《授时历》颁行天下。《授时历》是中国历法史上水平最高的一部传统历法，这部历法本身以及为编历而进行的天文观测、为观测而制造的天文仪器等，均有许多创新和进步。由于王恂精于算术，《授时历》中计算方面的工作应与王恂有很大关系。王恂故世后，皇室因其在制历等方面的功绩，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他的父亲王良，金末任中山府掾，其时百姓在遭战乱后，很多人因受连累被捕入狱，王

良前后救了数百人，随后又放弃官职，潜心研究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年九十二卒。

王恂生性聪颖，三岁时，家人拿书给他看，就能识风、丁二字。母亲刘氏教他《千字文》，他再看一次，就能诵读。王恂六岁上学，十三岁学九教，立即理解得非常透彻。己酉年（公元1249年），太保刘秉忠北上，途经中山，见了王恂，认为是个奇才，等他返回南方时，王恂即随秉忠到磁州紫金山学习。

癸丑年（公元1253年），秉忠将王恂推荐给元世祖，世祖在六盘山召见了王恂，指派他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公元1260年），王恂升为太子赞善，时年二十八岁。中统三年（公元1261年），裕宗被封为燕王，担任中书令，并兼管枢密院，世祖嘱咐两府大臣，凡有公文禀告，一定要让王恂知道。中书左丞许衡，搜集了唐、虞以来的嘉言善政，装订成册，呈给世祖，世祖曾让王恂给他讲解，并命太子随王恂学习。又诏令王恂仔细地调养护理太子的起居饮食，不适宜接近的人，不要让其任太子左右侍候。王恂说：“太子是国家的根本，责任极重，应当延请名德高尚的人与他在一起，况且他还兼管中书、枢密院的政务，应当遍览各种诏令，也应经常检查各项杂务。官吏因犯罪被罢免的不能再用。有的军官害人，所以改用的时候尤其不可以用不适当的人，老百姓很愚昧，但是力量很大，对战乱之后生存下来的百姓，我们不要怀疑。这样他们慢慢就会变得忠厚，世祖认为很对。

王恂很早就以算术方面的才能闻名。裕宗曾经问及此事。王恂说：“算术，六艺之一；它可以使国家稳定，使人民生活

安乐，是件大事啊。”王恂每当陪伴裕宗时，一定要阐发三纲五常和做学问的道理，以及历代统治迅速兴亡的原因。又以辽代、金代的一些重要事件，分别其善恶，论述其得失，呈给裕宗。裕宗问王恂，人的思想应当遵守什么，王恂说：“许衡曾经说过：人的思想如同印版，只要版本不错，那么印千万张纸都不会错；如果版本错了，那么印在纸上，没有不错的。”裕宗认为说得很对。于是命令挑选文武官员、王亲贵戚的子弟，向王恂学习。王恂传授学问，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王恂跟随裕宗到称海抚慰军队时，诸生就被交与许衡管辖，许衡告老还乡后，又命王恂兼任国子祭酒。国学的制度，实际上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世祖因本朝承用金大明历，年代久了而不准确，想进行改历。知道王恂对算术很精通，就把这件事交给他。王恂推荐许衡，说他能够明了治历的原理，于是世祖令驿使召许衡赴任，负责领导改历，官员们都听王恂的征召安排。王恂与许衡及杨恭懿、郭守敬等，查考历书四十余种，昼夜测验，参考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极为精密。其详情记在郭守敬传中。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授予王恂嘉议大夫、太史令。十七年，新历修成，皇上赐名《授时历》，年终，颁行天下。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王恂为父亲守孝，由于过度悲伤毁坏了自己的身体，每日只喝一勺水。皇上派内侍安慰劝解他。不久，王恂故世，年四十七岁。王恂生病时，裕宗多次派遣医生为他诊治，埋葬时，又送钱二千贯为其办丧事。后帝念王恂制定历书的功劳，拿钱五千贯赐给他的家人。延佑二年（公元1315年），追赠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

徒、上柱国、定国公，谥号文肃。

王恂有二子：王宽、王宾，兄弟俩同时跟随许衡学习，有关星历的知识得于家学。裕宗曾经召见他们俩，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书生出身，很贫穷，没有积蓄，现在我赐你们五千贯，用完可以再来告诉我。”由此可见裕宗对王恂恩恤之深厚。王宽由保章正，历任兵部郎中，蠡州知府。王宾由保章副，累迁至秘书监。

（胡铁珠 译）

【原文】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人。父良，金末为中山府掾，时民遭乱后，多以诖误系狱，良前后所活数百人。已而弃去吏业，潜心伊洛之学，及天文律历，无不精究，年九十二卒。

恂性颖悟，生三岁，家人示以书帙，辄识风、丁二字。母刘氏授以《千字文》，再过目，即成诵。六岁就学，十三学九数，辄造其极。岁己酉，太保刘秉忠北上，途经中山，见而奇之，及南还，从秉忠学于磁之紫金山。

癸丑，秉忠荐之世祖，召见于六盘山，命辅导裕宗，为太子伴读。中统二年，擢太子赞善，时年二十八。三年，裕宗封燕王，守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敕两府大臣：凡有咨禀，必令王恂与闻。初，中书左丞许衡，集唐、虞以来嘉言善政，为书以进。世祖尝令恂讲解，且命太子受业焉。又诏恂于太子起居饮食，慎为调护，非所宜接之人，勿令得侍左右。恂言：“太子，天下本，付托至重，当延名德与之居处。况兼领中书、枢密之政，诏条所当遍览，庶务亦当屡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更进，军官害人，改用之际尤不可非其人。民

至愚而神，变乱之余，吾不之疑，则反复化为忠厚。”帝深然之。

恂早以算术名，裕宗尝问焉。恂曰：“算数，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左右，必发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忽兴亡之所以然。又以辽、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区别其善恶，论著其得失，上之。裕宗问以心之所守，恂曰：“许衡尝言：人心如印板，惟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裕宗深然之。诏择勋戚子弟，使学于恂，师道卓然。及恂从裕宗抚军称海，乃以诸生属之许衡，及衡告老而去，复命恂领国子祭酒。国学之制，实始于此。

帝以国朝承用金《大明历》，岁久浸疏，欲厘正之，知恂精于算术，遂以命之。恂荐许衡能明历之理，诏驿召赴阙，命领改历事，官属悉听恂辟置。恂与衡及杨恭懿、郭守敬等，遍考历书四十余家，昼夜测验，创立新法，参以古制，推算极为精密，详在守敬传。十六年，授嘉议大夫、太史令。十七年，历成，赐名《授时历》，以其年冬，颁行天下。

十八年，居父丧，哀毁，日饮勺水。帝遣内侍慰谕之。未几，卒，年四十七。初，恂病，裕宗屡遣医诊治，及葬，赙钞二千贯。后帝思定历之功，以钞五千贯赐其家。延祐二年，赠推忠守正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国、定国公，谥文肃。

子宽、宾，并从许衡游，得星历之传于家学。裕宗尝召见，语之曰：“汝父起于书生，贫无貲蓄，今赐汝钞五千贯，

用尽可复以闻。”恩恤之厚如此。宽由保章正，历兵部郎中，知蠡州。宾由保章副，累迁秘书监。

郭守敬传

——《元史》卷一六四

【说明】郭守敬（公元 1231—1316 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从小好学不倦，受祖父郭荣熏陶，致力于水利、机械、天文、数学等多种学术的钻研，是著名的元代科学家。

郭守敬青年时期曾就学于磁州紫金山著名学者、后出仕元廷为重臣的刘秉忠、张文谦等人。他对科学技术有着很深的造诣。他出仕稍晚，三十岁时方随张文谦在家乡附近治理河道，发展生产，从而开始了他一生的科技生涯。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地形测量上高程概念的创立早于国外。仪器制造上简仪为世界上最早的赤道仪。数学方法上三次差内插法比欧洲早四个世纪。法国的拉普拉斯（P. S. Laplace）曾高度评价郭守敬测定的黄赤交角值并以此为他的黄赤交角值逐渐变小的理论作证明。他参加编订的《授时历》是中国古历中最优良的历法，行用时间也最长，历三百六十四年之久；还东传朝鲜和日本，影响深远。所开浚的通惠河，接通了直达北京的京杭大运河。他完成通惠河后晚年作为较少。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世界科学史上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郭守敬，字若思，是顺德路邢台人。他的志趣从小就跟别人不同，不喜欢耍玩游戏。他祖父郭荣熟悉五经，精通数学与水利。当时正好有刘秉忠、张文谦、张易与王恂等人，一起在磁州西部紫金山学习，郭荣就让郭守敬去跟刘秉忠学习。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时，张文谦向朝廷推荐郭守敬是位擅长水利工程的人才，并且思想灵巧，胜过平常人。元世祖忽必烈命他进见时，他当面陈述了应该兴办的六项水利事业如下：

第一，金代中都原有的水运河道，东面可到通州。如果引西郊玉泉山的水流入，使舟船能通行，每年可节省雇车的运输费六万缗。通州南面，在蒹榆河口直向开引河道，从蒙村跳梁务至杨村回到原有河道，可以避免浮鸡洶一段河浅湾多路长有风浪的害处。第二，将顺德府达活泉的水引进到城里，分为三支，可用以灌溉城东的土地。第三，顺德府的泮河，本来向东通往古任城。现在原有河道已淤没，水流漂淹百姓土地一千三百余顷。如果将它开通，这些田就可以耕种。从小王村经滹沱河会合入御河，还可通行船舶。第四，从磁州东北滏河与漳河会合处，引水由滏阳、邯郸、洺州、永年，往下经鸡泽而流入泮河，可以灌溉土地三千余顷。第五，怀、孟路的沁河，虽然灌溉了农田，但还有穿过土堰的余水，向东与丹河的余水相会合。如果引此水向东流送至武陟县北，合流入御河，可以灌溉土地二千余顷。第六，从孟州西部开渠引黄河的水，穿过新旧孟州之间，再沿黄河的古岸边东下到

温县南面重新进入大河。这一段亦可灌溉良田二千余顷。

每奏报一项，皇帝总是赞赏道：“像这样去办事的人，方才不是白吃饭的。”于是派他担任提举诸路河渠的官职。中统四年（公元1263年），升任佩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郭守敬随从张文谦去到已改为行省的前代西夏国地方去任职。那里的中兴州本来有两处古代的河渠。一条名唐来渠，长四百里；另一条名汉延渠，长二百五十里。其它各州还有正渠十条，都长二百里；大大小小的支渠有六十八条。一共灌溉着九万余顷的土地。发生战乱以来，渠道废坏，河也淤积了。郭守敬修复了水坝水闸，整治了河身，恢复了原状。

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郭守敬升任都水监。他上奏说：“从中兴州乘船沿黄河而行，四昼夜可抵达东胜。这一段能够开辟水运，应该加以修治。”又说：“金朝时，从燕京西面的麻峪村，引卢沟河一条支流穿过西山向西，叫做金口河。它灌溉着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的一大片土地，利益是极大的。自从进军燕京以来，守卫人员惧怕发生失误，用大石块将它填塞了。现在如查察原有河道，仍使水道畅流，上游段可把西山的货物运出来，下游段可以沟通燕京的水运。”他又道：“还应该金口西面预先开挖一条分水渠，从西南方回归到主流道，要深一些和宽一些，以防涨水时洪水冲入京师。”皇帝认为都是很好的意见。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伯颜丞相进军南宋，需要设立水路驿站，派郭守敬去视察河北、山东一带可以行船的河道，绘图上报。

早年，刘秉忠鉴于从辽、金两代沿用到元初的《大明

历》，已经二百多年了。历法上的天象渐渐地落后于实际上的天象，曾议修改历法。随即他去世了。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时，江东的南宋已攻灭，皇帝想到了刘的改历意见。于是就委派郭守敬与王恂，率领原有的以及来自亡宋的天文官员，进行具体的天文测量并作计算；又委派张文谦和枢密张易为主管，裁夺奏报，左丞许衡共同参与工作。郭守敬首先指出道：“治历的根本在于作测量，作测量的工具首先在于仪器。现在司天台上的浑仪，是故宋皇祐（公元1049—1054年）年间制作于汴京开封府，跟这里的天文度数并不相合。测量天球上南北二极，相差约四度多。圭表的基石，因年久亦已倾斜。”郭守敬于是考查缺点，重新作了安顿。接着，又另外选找高爽的地段，搭设并列的木棚，创制简仪和高表，用以测量校比。他又认为，天枢星在北极旁边转动，以前有人用窥管观测，未能测定北极位置，于是制作了候极仪。北极位置测定了，其余天体的位置就能正确标定，又制作了浑天象。浑天象形状虽很像，但还不太适用，再制作玲珑仪。圭表象矩尺，是方的，要测圆形的天，不如以圆求圆，他又创制了仰仪。古代有经纬制度，结合成固定的网格形，不能转动，郭守敬变更一下，制作了立运仪。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分别有黄道和九行道，他合起来作了证理仪。高表虽然高，但所得表影端部模糊不够真切，他制作了景符。月虽然明亮，观测它照射出的影子时则较困难，他作了窥几。检验历法的正确性在于日月食观测，又作了日月食仪。天球上的赤道，可用圆轮置于相当的位置来表示，南北极方向的高低可用标杆指明，按此而制作了星晷定时仪。另又作正方案、丸表、悬

正仪和座正仪，都是为到外地去作测量时使用的。此外还制作了《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和《日出入永短图》，可以同以上各种仪器测量互相参照使用。

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太史局改为正式机构太史院，发给公章，设立官署。王恂当太史令，郭守敬任副职为知太史院事。在上呈并汇报各种仪器式样时，郭守敬在皇帝面前解释使用方法及其原理，一直到天晚，皇帝并不厌倦。郭守敬随而奏报：“唐代一行在开元（公元 713—741 年）年间命南宫说到各地去测量日影，书上记载有十三处地方。现在疆土比唐代还要广大，如果不到远方去作测量，怎知日月食时刻与食分的不同、昼夜长短的不同以及日月星辰在天上位置高低的不同？现今作测量的人员较少，可以先在南北若干地方立表杆，测定准确的日影长度。”皇帝同意他的意见，设置了十四个监候官，分路到各地去。东方去到高丽，西方直至滇池，南方超越朱崖，北方达到铁勒，作四海测验场所的总共有二十七个地方。

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 年），新历完成了。郭守敬同其他负责人一起上奏说：

我们知道帝王最重要的事情要算治历。自从黄帝观测太阳，记录并作推算，帝尧设立闰月定四季作为一年，帝舜用仪器窥管测量日月五星以来，到夏、商、周三代，治历还没有固定的方法。周、秦之间，以闰月调整一年长度，仍有差错。西汉制订《三统历》，三十年之后方才是非分明，确认其正确。东汉作《四分历》，经七十多年方才比较完整。又过一百二十年，刘洪造《乾象历》，方

领悟月亮的运行有快有慢。又一百八十年，姜岌作《三纪甲子历》，方懂得以月食时对冲的星宿来推定太阳的位置。又过五十七年，何承天作《元嘉历》，方知晓朔日、望日及上、下弦的月亮位置，时间上还有余分。六十五年后，祖冲之作《大明历》，方发现太阳运动中冬至点有岁差，北极星离天球北极还有一度多。又隔五十二年，张子信方了解日月食同它们在黄道与白道交点附近的位置有关，五个行星的速度有快慢变化，并有留和逆行现象。又过三十三年，刘焯作《皇极历》，方明了太阳的运动也有快慢。又隔三十五年，傅仁钧作《戊寅元历》，较多采用旧的仪制，方才采用定朔。又过四十六年，李淳风作《麟德历》，鉴于古历中的章、蔀和元起首日期取数不同，改用总法一个数据，用进朔法避开月末晦日早晨出现月亮。又过六十三年，一行作《大衍历》，应用定朔，得连续四个大月和三个小月，定出不同地区日月食时刻和食分的差别。又经九十四年，徐昂作《宣明历》，方知道日食有气差、刻差和时差这三种差数。以上共计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历法改了七十次，有创造的计十三家。

此后又一百七十四年，本朝命我们专们改制新历。我们于是用新创制的简仪和高表实测所得的数据，考证了七项内容：

一为冬至。自丙子年（公元1276年）立冬日之后，每天测得太阳表影长度，依冬至前后日子相差数前后相同者，每日取以对比。得丁丑年（公元1277年）冬至时刻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定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

刻；己卯年（公元 1279 年）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半；庚辰年（公元 1280 年）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半。都比《大明历》减少十八刻，远近相合，前后应该是准确的。

二为岁余。自《大明历》以来，经测表影和验节气，得到冬至时刻准确数的共有六次。按照它们的时间差数，分别可得到那时合用的一年长度所余的尾数。现经过四年校验，其数值是符合的。从刘宋大明壬寅年到今八百年，每年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这二十五分是现今新历法内通用为岁余的数值。

三为日躔。应用至元丁丑年（公元 1277 年）四月癸酉日望月食食既时的位置，推求太阳的位置；得到冬至日太阳位置依赤道宿度计算是箕宿十度，按黄道宿度计算为箕宿九度余。再按凭星测月，凭月测日或直接凭星度测日等方式，每日测量太阳位置，依法作了计算。从丁丑年（公元 1277 年）正月到己卯年（公元 1279 年）十二月，三年内共得一百三十四项数据，都跟按月食所得结果一样，冬至日太阳位于箕宿。

四为月离。自丁丑年（公元 1277 年）以来至今日，从每天所测得的月亮连续的经行度数，计算出月亮运行中速度最快、最慢位置以及相对于恒星的月平行度，前后共十三个周期，五十一项。除去其中不太真切的以外，共有三十项，得知《大明历》落后于天象。又据考验日月交食所得，对《大明历》数据加上三十刻，就与天象相合。

五为入交。从丁丑年（公元1277年）五月以来，依每日所测月亮距北极的度数，比照黄道上的去极度数，求得了白道与黄道的相交点，共得八项数据。依日食法式推算，可算得食分，并可算得月亮过白道与黄道交点的时刻。这同按《大明历》所算相差不多。

六为二十八宿距度。自从汉代《太初历》以来，二十八宿的二十八距度，曾有所增减，并不完全相同。《大明历》在度的单位以下附有尾数，分为太、半、少三种。但这并非经过实测而得，是以个人意见牵强附合的。现在的新仪器都详细地刻有全天度、分的刻度。每度分为三十六分；采用结线作瞄准来代替原有的窥管。宿度下的分数都是实测结果，不是牵强地配合上去的。

七为日出入昼夜时刻。《大明历》按太阳出没时刻而定的昼夜时间，都根据汴京开封府地理位置所定，它的刻度跟大都不相同。现另依本地北极出地高度，黄道距赤道内外的度数，计算出每天太阳出没及昼夜时间长短的刻度。得知夏至日最长，日出于寅正二刻，日入于戌初二刻，昼长六十二刻，夜长三十八刻。冬至日最短，日出于辰初二刻，日没于申正二刻，昼长三十八刻，夜长六十二刻。这是永远可取以为依据的。

所创制的方法有五项内容：

一是太阳盈缩。按定气的冬、夏至和春、秋分四正日期，立出加速和减速的区段，依招差术方法求得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时，每天的快慢情况及经行距离，比古代要精确。二是月行迟疾。古历以“限”作为时间区分单

位，都采用二十八个限。现在改以一日的一万分之八百二十作为一限，一个月分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叠招差法求得月亮运行速度的变化，得到逐时不同的快慢速度，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三是黄赤道差。以前是以一百零一度相减相乘而得。现在依勾股弧矢方圆斜直关系的计算方法，求出黄道与赤道上两种度数的差数和积差，它的差额跟天上的实际情况都相符合。四是黄赤道内外度。根据数年实际测量，黄道内外距赤道二十三度九十分。用以圆容方直矢接勾股的计算方法，求得太阳每日的去极度，跟实测所得均相符合。五是白道交周。旧法从黄道推求白道位置的方法是以斜求斜；现在用立浑法计算，得月亮白道与赤道的交点，距黄、赤两道交点即春分点和秋分点为十四度六十六分，作为定法。再按月推算月亮距二十八宿的度分，在理论上这是正确的。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王恂去世了。这时，新历虽然已经颁发，可是计算的方式方法以及有关的数据表，都还没有正式的定稿。于是，郭守敬就整理各种数据和资料，分门别类，加以编纂。共编成《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他正式继任太史令，于是上表章呈进历法资料。上述以外，又有《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测验用书有《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影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都收藏在官府中。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有人向朝廷上报说，滦河河道上，如从永平行船，拉○越山而上可抵开平。另有人说，滦沟河如经麻峪村通船，可至寻麻林。朝廷派郭守敬去视察。他回来汇报说，滦河不能通行，滦沟河亦不能通舟。他就此陈报关于水利的十一项工作。其中之一为，大都城的运粮河，可不再采用一亩泉原有的水源，另外开引北山白浮泉的水，先向西行，再折而向南，通过瓮山泊，从西水门流入城内，汇集于积水潭。然后再往东，转向南面出南水门，使它流入原有的运粮河。每隔十里设置一道水闸，通往通州共设水闸七道。离闸一里余，再加设双道式斗门，配合作开闭，以便调整河水而通船。皇帝看了奏章，高兴地说，应该赶快就办。就此又重新设立了都水监机构，使郭守敬为主管。皇帝命令，开工时自丞相以下百官，都亲自拿起畚鍤等工具，等待郭守敬安排，带头参加劳作。

原先，运河只到通州，通州到大都是改从陆路运送官粮的。每年运来几万石，正值秋天霖雨时节，拉车的驴子等牲畜不知要累死多少。这时都可免除了。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皇帝从上都回朝，路过积水潭，只见船头接连船尾，把水面都遮没了。他大为高兴，把它起名为通惠河，赐给郭守敬钱钞一万二千五百贯，仍任太史令，兼任提调通惠河漕运事。郭守敬又上言，在通惠河澄清闸稍东处，引水跟北坝河相接，在丽正门西边设立闸门，则舟船可环绕大都城护城河通行。这件事并没有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他被任命为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朝廷召郭守敬到上都，商议

有关开挖铁幡竿渠的工作。郭守敬汇报说：“山洪常年暴发，渠道一定要宽广，并加设土坝，宽度非五十步到七十步不可。”办事人员不愿多化工资费用，认为郭守敬所说太过头了，缩小了三分之一。第二年大雨，山水暴发，渠不能容，浸没了人畜及庐帐，差点危及行宫。元成宗对负责官员说：“郭太史真是个神奇的人物！可惜没有听从他的话。”大德七年（公元1303），朝廷下诏书，内外官员年纪到了七十岁的，都可退休，唯独没有同意郭守敬的请求。从此以后，翰林、太史、司天官员都不退休，成为一项规定。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郭守敬八十六岁时去世了。（潘 鼐 译）

【原文】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大父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时刘秉忠、张文谦、张易、王恂，同学于州西紫金山，荣使守敬从秉忠学。

中统三年，文谦荐守敬习水利，巧思绝人。世祖召见，面陈水利六事：其一，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通州以南，于蒹榆河口径直开引，由蒙村跳梁务至杨村还河，以避浮鸡洶盘浅风浪运转之患。其二，顺德达泉引入城中，分为三渠，灌城东地。其三，顺德泮河东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没民田千三百余顷。此水开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种，自小王村经滹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东北溢、漳二水合流处，引水由溢阳、邯郸、洺州、永年下经鸡泽，合入泮河，可灌田三千余顷。其五，怀、孟沁河，虽浇灌，犹有漏堰余水，东与丹河余水相合。引东流，至武陟县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余顷。其六，黄河

自孟州西开引，少分一渠，经由新、旧孟州中间，顺河古岸下，至温县南复入大河，其间亦可灌田二千余顷。每奏一事，世祖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授提举诸路河渠。四年，加授银符、副河渠使。

至元元年，从张文谦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兴者，一名唐来，其长四百里，一名汉延，长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长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万余顷。兵乱以来，废坏淤浅。守敬更立闸堰，皆复其旧。

二年，授都水少监。守敬言：“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至东胜，可通漕运，及见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宜加修理。”又言：“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庐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兵兴以来，典守者惧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视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又言：“当于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以防涨水突入之患。”帝善之。十二年，丞相伯颜南征，议立水站，命守敬行视河北、山东可通舟者，为图奏之。

初，秉忠以《大明历》自辽、金承用二百余年，浸以后天，议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遂以守敬与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而命文谦与枢密张易为之主领裁奏于上，左丞许衡参预其事。守敬首言：“历之本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复欹侧。”守敬乃尽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别图高爽地，以木为重棚，创作简仪、高表，用相比覆。又

以为天枢附极而动，昔人尝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极仪。极辰既位，天体斯正，作浑天象。象虽形似，莫适所用，作玲珑仪。以表之矩方，测天之正圆，莫若以圆求圆，作仰仪。古有经纬，结而不动，守敬易之，作立运仪。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证理仪。表高景虚，罔象非真，作景符。月虽有明，察景则难，作闚几。历法之验，在于交会，作日月食仪。天有赤道，轮以当之，两极低昂，标以指之，作星晷定时仪。又作正方案、丸表、悬正仪、座正仪，为四方行测者所用。又作《仰规覆矩图》、《异方浑盖图》、《日出入永短图》，与上诸仪互相参考。

十六年，改局为太史院，以恂为太史令，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给印章，立官府。及奏进仪表示，守敬当帝前指陈理致，至于日晏，帝不为倦。守敬因奏：“唐一行开元间令南宫说天下测景，书中见者凡十三处。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远方测验，日月交食分数时刻不同，昼夜长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目测验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测景。”帝可其奏。遂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

十七年，新历告成，守敬与诸臣同上奏曰：

臣等窃闻帝王之事，莫重于历。自黄帝迎日推策，帝尧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舜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爰及三代，历无定法，周、秦之间，闰余乖次。西汉造《三统历》，百三十年而后是非始定。东汉造《四分历》，七十余年而仪式方备。又百二十一年，刘洪造《乾象历》，始悟月行有迟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纪甲子历》，始

悟以月食冲检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余。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历》，始悟太阳有岁差之数，极星去不动处一度余。又五十二年，张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五星有迟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刘焯造《皇极历》，始悟日行有盈缩。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历》，颇采旧仪，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风造《麟德历》，以古历章部元首分度不齐，始为总法，用进朔以避晦晨月见。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衍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异。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历》，始悟日食有气、刻、时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辅造《纪元历》，始悟食甚泛余差数。以上计千一百八十二年，历经七十改，其创法者十有三家。

自是又百七十四年，圣朝专命臣等改治新历，臣等用创造简仪、高表，其测实数，所考正者凡七事：

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后，依每日测到晷景，逐日取对，冬至前后日差同者为准。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八十一刻半。各减《大明历》十八刻，远近相符，前后应准。

二曰岁余。自《大明历》以来，凡测景、验气，得冬至时刻真数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时合用岁余。今考验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岁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

二十五分为今历岁余合用之数。

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黄道箕九度有奇。仍凭每日测到太阳躔度，或凭星测月，或凭月测日，或径凭星度测日，立术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与月食相符。

四曰月离。自丁丑以来至今，凭每日测到逐时太阴行度推算，变从黄道求入转极迟、疾并平行处，前后凡十三转，计五十一事。内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历》入转后天。又因考验交食，加《大明历》三十刻，与天道合。

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来，凭每日测到太阴去极度数，比拟黄道去极度，得月道交于黄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时刻，与《大明历》所差不多。

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汉太初历》以来，距度不同，互有损益。《大明历》则于度下余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牵就，未尝实测其数。今新仪皆细刻周天度分，每度为三十六分，以距线代管窥，宿度余分并依实测，不以私意牵就。

七曰日出入昼夜刻。《大明历》日出入昼夜刻，皆据汴京为准，其刻度与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极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术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得夏至极长，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昼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极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

昼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为定式。

所创法凡五事：一曰太阳盈缩。用四正定气立为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极差积度，比古为密。二曰月行迟疾。古历皆用二十八限，今以万分日之八百二十分为一限，凡析为三百三十六限，依垛叠招差求得转分进退，其迟疾度数逐时不同，盖前所未有的。三曰黄赤道差。旧法以一百一度相减相乘，今依算术句股弧矢方圆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积差，差率与天道实吻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据累年实测，内外极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圆容方直矢接句股为法，求每日去极，与所测相符。五曰白道交周。旧法黄道变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浑比量，得月与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拟以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理为尽。

十九年，恂卒。时历虽颁，然其推步之式，与夫立成之数，尚皆未有定稿。守敬于是比次篇类，正齐分秒，裁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继为太史令，遂上表奏进。又有《时候笺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测验书，有《仪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细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测二十八舍杂座诸星入宿去极》一卷，《新测无名诸星》一卷，《月离考》一卷，并藏之官。

二十八年，有言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山而上，可至开平；有言泸沟自麻峪可至寻麻林。朝廷遣守敬相视，滦河既不可行，

泸沟舟亦不通，守敬因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运粮河，不用一亩泉旧原，别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比至通州，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闕，以过舟止水。帝览奏，喜曰：“当速行之。”于是复置都水监，俾守敬领之。帝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

先是，通州至大都，陆运官粮，岁若干万石，方秋霖雨，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至是皆罢之。三十年，帝还自上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悦，名曰通惠河，赐守敬钞万二千五百贯，仍以旧职兼提调通惠河漕运事。守敬又言：于澄清闸稍东，引水与北坝河接，且立闸丽正门西，令舟楫得环城往来。志不就而罢。三十一年，拜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

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议开铁幡竿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可。”执政吝于工费，以其言为过，缩其广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庐帐，几犯行殿。成宗谓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七年，诏内外官年及七十，并听致仕，独守敬不许其请。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为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齐履谦传

——《元史》卷一七二

【说明】齐履谦（公元？—1329年），从小随父亲学习天文历法，并善长经学，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以星历生进入太史局，先后任星历教授，保章正，授时郎秋官正兼冬官正，佾院，太史院使。齐履谦一生从事天文，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初入太史局时，太史王恂考察历算知识，其他同学都是司天台官员的子弟，竟一无所知，唯独齐履谦对答如流。在太史院的工作中，他对各种理论、实践问题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很受同事们的敬重。齐履谦早年曾参与制定《授时历》的工作，后来又主持改制铜漏，重建鼓楼，设立郊祀钟鼓更漏制度。他还用了两年时间观测晷影和五星宿度，发现《授时历》与实际天象的时间相差二刻，并有《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等天文历法书传世。齐履谦还是一位有成就的教育家，曾任国子监丞、国子司业等职，为国子监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考核、升级制度。此外，他对音乐理论也很有研究。

齐履谦，字伯恒。父亲齐义，擅长数学。齐履谦六岁随

父亲到京师，七岁读书，看一遍就能记住。十一岁，父亲教他天文历法计算，学会了所有的方法。十三岁跟老师学习圣贤之学，从此后以精通儒学理论为目标，非孔子、孟子、程氏兄弟和陆九渊诸儒之书不读。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太史局刚刚成立，改编新历法，齐履谦成为星历生。同学都是司天台官吏的子弟，太史王恂考问算术，他们都答不上来。只有齐履谦有问必答，王恂大为惊奇。新历修成后，又参与编写《历经》、《历议》。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担任星历教授。都城的漏刻，过去用木制成，形状如碑，所以叫做碑漏。里面设有曲折的管道，用铜铸成球，从碑顶部辗转滚下，打击铜铎报时。这个漏刻年久失修，陈旧损坏，计时误差很大。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中书让齐履谦察看。他看到漏刻旁有四个宋朝的旧铜壶，于是按照图书考订莲花、宝山等漏刻制度，让工匠改制。又申请重建鼓楼，增加负责更鼓和守候漏刻的军卒，建立了一套制度。

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齐履谦升任保章正，开始专门负责历算。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八月朔日巳时，按历法计算应该有二分多的日食。到时候日食并未发生。众人都很害怕。齐履谦说：“当食不食的情况古代就有。这次日食时近中午，阳盛阴衰，所以当食不食。”于是考证唐朝开元以来当食不食的例子十条上报。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六月朔日戌时，按历法应当日食五十七秒。众人认为交食很浅，太阳又快要落山，接近尘雾，想要隐匿不报。齐履谦说：“我们所掌握的，是一般的规律。至于最终食与不食，则是天意。”

于是独自上报。到时候果然发生了日食。众人曾为“没日”的事争论不休。齐履谦说：“一气本来是十五日。有时间有十六日，那是余数积累所致。历法把积累所致的日命名为没日，是出本气的意思。”众人都信服他的说法。

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八月戊申夜里，发生大地震。皇帝问发生灾害的原因和弥补的办法。齐履谦引证《春秋》答道：“地代表阴，静止，是妻、臣、子的象征。这三者失道，因而地不得宁静。弥补的办法，大臣应反思检查自己的过失，收敛专断的作风，以回答天变所示的警告。光是祈祷是没有用的。”当时元成宗病重，执政大臣专权独断，因而齐履谦这样说。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冬，在首都南郊建立了祭台，祭祀天帝，齐履谦代理司天台官。过去祭祀时，司天台虽掌管时刻，但没有钟鼓更漏。往往天亮了才开始行事。齐履谦报告宰相，请求用钟鼓更漏，以便时间早晚有规律，他的建议得到采纳。

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太常寺请求修整社稷坛。清理太庙院中水井时，有人说这是岁君的驻地，不敢动土。齐履谦说：“国家大至四海，岁君哪会专在这里！”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升任授时郎秋官正。兼领冬官正事。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仁宗即位，提倡儒学。御史大夫说齐履谦有学问，可以教国学学生。于是升任国子监丞。又改任奉直大夫、国子司业，与吴澄同时任职，当时号称用人得当。他每天五鼓去国学工作。风雨寒暑，从不松懈。他教育得法，学生都很信服。没多久，又以齐履谦兼太史院事。

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春，彗星出现于东井星宿。齐

履谦报告皇上，应多做善事报答天意。并对国事提出八条意见。皇帝很感动，命令宰相赶快执行。自从齐履谦离开国学，吴澄也因病离开，国学的制度渐渐松弛。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皇上命令挑选善教的人，齐履谦又被任命为国子司业。他律己更加严格，规章制度更加严密。每个学斋置伴读一人为斋长，即使助教缺员，学生也不松懈学习。当初国学每年提拔六人，以入学先后为序。齐履谦说：“不考察功课，如何能提倡好风气，培养出人才？”于是对旧制度进行改进，订立升斋、积分等方法；每季考察学习成绩和品行，作为升级的依据。升入上斋过一年再考试。每季度第一、二月考试经疑、经义，第三月考试古代各种文体。蒙古、色目人考试明经、策问。文章、道理都好的得一分，文章平常、道理好的得半分。年底累积到八分的为高等，名额四十人。然后集贤院、礼部考察其学生，取六人。三年通不过一门功课或在学不满一年的除名。皇帝批准了他的办法。于是人人努力，出了许多博学之士。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任命为滨州知州，因母亲去世，未能赴任。

至治元年（公元1312年），任太史院使。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九月，奉使宣抚江西、福建，罢黜贪官污吏四百余人，免除虚加的粮赋数万石，州县有以先贤子孙充苦役的全都免除。福建宪司的职田（国家分给官吏，以租代俸的田地），每亩每年租米三石，百姓不堪其苦。齐履谦命令按照国家规定的数缴纳，因而招致怨恨。回京后，宪司以其他事诬陷。没多久，诬陷他的人犯案被撤，齐履谦才得以申冤，复职为太史院使。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去世。

齐履谦学习勤奋。家中贫，没有书。后来选为星历生，在太史局，正值秘书监运送宋朝灭亡之后缴获的图书，堆放在太史局院内。齐履谦昼夜阅读，深入研究，因而学问博大精深。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直到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所不通。尤其精通儒学经典。著作有《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旨略》二卷，《易本说》四卷，《春秋诸国统纪》六卷。他认为，“皇极”的说法始自《尚书·洪范》，“皇极”的数字始于邵雍的《经世书》。数并不是极，只是用数字的方法来表达极。于是著《经世书入式》一卷。此外，《经世书》有内、外篇，内篇由极的概念而推导出数字方法，外篇则由数字归纳出极的思想，于是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时历》行用五十年，没有认真验证过。齐履谦自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冬至，到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夏至，天天测量太阳影长和晨昏时五星位置，发现按《授时历》计算的各种天象的时刻，应该减去二刻才能与实际天象相符。因而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时历》虽有“经”，“串”，但经只讲编历的方法，串只记各种天文数据。然而其方法的道理怎样，数据又是如何得来，历中没有载出。齐履谦因而著《经串演撰八法》一卷。

元代立国一百余年，而皇帝祭祀天地祖宗时所用的音乐都是沿袭宋、金，没人能加以改正。齐履谦认为乐以律为本，律以气为本，而气候（历法）的方法，历代都有记载。可以找僻静的地方置密室，取金门的竹，河内的葭莩，进行测验。这样，上可以建立雅乐，用于祭祀天地，勾通神人，下可以

统一度量，平准物价，端正民风。这些意见报告了上级。齐履谦又得到黑色石制古代律管一只，长一尺八寸，外方内圆，空心。中间有隔，隔中有小孔，用来通气。隔上部九寸，直径约三分，圆直匀称，应黄钟之数，隔上部九寸，直径约二寸多，自小孔至管底逐渐收缩，用来向上聚气。这个黑石律管的样式与律家所说不同，正是古代所谓的玉律。齐履谦正巧改任别处，建礼乐的事也没做起来。内行的人都很惋惜。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五月，赠齐履谦为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为汝南郡公，谥号文懿。

（刘次沅 译）

【原文】

齐履谦字伯恒，父义，善算术。履谦生六岁，从父至京师；七岁读书，一过即能记忆；年十一，教以推步星历，尽晓其法；十三，从师，闻圣贤之学。自是以穷理为务，非洙、泗、伊、洛之书不读。

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历，履谦补星历生。同辈皆司天台官子，太史王恂问以算数，莫能对，履谦独随问随答，恂大奇之。新历既成，复预修历经、历议。二十九年，授星历教授。都城刻漏，旧以木为之，其形如碑，故名碑漏，内设曲筒，铸铜为丸，自碑首转行而下，鸣铙以为节，其漏经久废坏，晨昏失度。大德元年，中书俾履谦视之，因见刻漏旁有宋旧铜壶四，于是按图考定莲花、宝山等漏制，命工改作；又请重建鼓楼，增置更鼓并守漏卒，当时遵用之。

二年，迁保章正，始专历官之政。三年八月朔，时加巳，依历日蚀二分有奇，至其时不蚀，众皆惧。履谦曰：“当蚀不

蚀，在古有之，矧时近午，阳盛阴微，宜当蚀不蚀。”遂考唐开元以来当蚀不蚀者凡十事以闻。六年六月朔，时加戌，依历日蚀五十七秒。众以涉交既浅，且复近浊，欲匿不报。履谦曰：“吾所事掌者，常数也，其食与否，则系于天。”独以状闻，及其时，果蚀。众尝争没日不能决，履谦曰：“气本十五日，而间有十六日者，余分之积也。故历法以所积之日，命为没日，不出本气者为是。”众服其议。

七年八月戊申夜，地大震，诏问致灾之由，及弭灾之道，履谦按春秋言：“地为阴而主静，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则地为之弗宁。弭之之道，大臣当反躬责己，去专制之威以答天变，不可徒为禳祷也。”时成宗寝疾，宰臣有专威福者，故履谦言及之。九年冬，始立南郊。祀昊天上帝，履谦摄司天台官。旧制，享祀，司天虽掌时刻，无钟鼓更漏，往往至旦始行事。履谦白宰执，请用钟鼓更漏，俾早晏有节，从之。

至大二年，太常请修社稷坛，及浚太庙庭中井。或以岁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谦曰：“国家以四海为家，岁君岂专在是！”三年，升授时郎秋官正，兼领冬官正事。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术。台臣言履谦有学行，可教国学子弟，擢国子监丞。改授奉直大夫、国子司业、与吴澄并命，时号得人。每五鼓入学，风雨寒暑，未尝少怠，其教养有法，诸生皆畏服。未几，复以履谦佥太史院事。

皇庆二年春，彗星出东井。履谦奏宜增修善政以答天意，因陈时务八事。仁宗为之动容，顾宰臣命速行之。自履谦去国学，吴澄亦移病归，学制稍为之废。延祐元年，诏择善教

者，于是复以履谦为国子司业。履谦律己益严，教道益张，每斋置伴读一人为长，虽助教阙员，而诸生讲授不绝。当初命国子生岁贡六人，以入学先后为次第，履谦曰：“不考其业，何以兴善而得人！”乃酌旧制，立升斋、积分等法：“每季考其学生，以次第升，既升上斋，又必踰再岁，始与私试；孟月仲月试经疑经义，季月试古赋诏诰章表策，蒙古、色目试明经策问；辞理俱优者一分，辞平理优者为半分，岁终积至八分者充高等，以四十人为额；然后集贤、礼部定其艺业及格者六人，以充岁贡；三年不通一经，及在学不满一岁者，并黜之。帝从其议，自是人人励志，多文学之士。五年，出为滨州知州，丁母忧，不果行。

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抚江西、福建，黜罢官吏之贪污者四百余人，蠲免括地虚加粮数万石，州县有以先贤子孙充房夫诸役者悉罢遣之。福建宪司职田，每亩岁输米三石，民不胜苦，履谦命准令输之，由是召怨，及还京，宪司果诬以他事。未几，诬履谦者皆坐事免。履谦始得直，复为太史院使。天历二年九月卒。

履谦笃学勤苦，家贫无书。及为星历生，在太史局，会秘书监掣亡宋故书，留置本院，因昼夜讽读，深究自得，故其学博洽精通，自六经、诸史、天文、地理、礼乐、律历，下至阴阳五行、医药、卜筮，无不淹贯，尤精经籍。著《大学四传小注》一卷，《中庸章句续解》一卷，《论语言仁通旨》二卷，《书传详说》一卷，《易系辞旨略》二卷，《易本论》四卷，《春秋诸国统纪》六卷。以皇极之名，见于洪范，皇极之数，始于邵氏《经世书》，数非极也，特寓其于极耳，著《经世书

入式》一卷。《经世书》有内、外篇，内篇则因极而明数，外篇则由数而会极，著《外篇微旨》一卷，《授时历》行五十年，未尝推考，履谦日测晷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时真数，各减见行历书二刻，著《二至晷景考》二卷。《授时历》虽有经、串，而经以著定法，串以纪成数，然求其法之所以然，数之所从出，则略而不载，作《经串演撰八法》一卷。

元立国百有余年，而郊庙之乐，沿袭宋、金，未有能正之者。履谦谓乐本于律，律本于气，而气候之法，具载前史。可择僻地为密室，取金门之竹，及河内葭莩，候之，上可以正雅乐、荐郊庙、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货、厚风俗。列其事上之。又得黑石古律管一，长尺有八寸，外方，内为圆空，中有隔，隔中有小窍，盖以通气；隔上九寸，其空均直，约径三分，以应黄钟之数；隔下九寸，其空自小窍迤邐杀至管底，约径二寸余，盖以聚其气而上之。其制与律家所说不同，盖古所谓玉律是也。适迁他官，事遂寝，有志者深惜之。至顺三年五月，赠翰林学士、资善大夫、上护军，追封汝南郡公，谥文懿。

贾 鲁 传

——《元史》卷一八七

【说明】贾鲁（公元 1297—1353 年），字友恒。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人。元代水利专家。贾鲁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在二十多岁时就以明晓儒家经义步入仕途，相继担任过行省掾、县尹、中书省检校、都漕运使、监察御史、工部郎中、工部尚书等官职，并以治理黄河有功擢升为荣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贾鲁在三十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对时政多有建议，表现了兴利除弊的经国之志。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 1344 年），黄河多处决口酿成大灾，洪水波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诸省、民不聊生，国计艰危。贾鲁在丞相脱脱的支持下，主持治河工程。他跋涉数千里，深入考察，绘制成河防图形，提出两个行之有效的治河方案，即：一是修筑北堤，制止横溃，使水不再蔓延；二是疏塞并举，导使黄河东引，恢复旧日河道。并直接指挥黄河南北十三路的民工、军工十七万人，开展治理黄河的工作。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使泛滥横流的黄河回归故道，舟船复通。后来欧阳玄根据贾鲁的治河方略写成《至正河防记》，详细记载了这次治河的经过及其治河经验，成为世界第

一本有系统有价值的水利工程著作。尽管这次大兴河工成了黄河两岸农民起义反元的导火线，并最后由起义军推翻了元王朝，但贾鲁作为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位出色的水利工程专家，他的业绩仍是不可磨灭的。

贾鲁，字友恒，河东高平（山西高平）人。幼年时代，贾鲁就胸怀远大的志向，追求高尚的节操；成年以后，更表现出超过常人的智谋和韬略。元仁宗延祐和英宗至治年间，他两次参加明经乡试被选为贡士。元泰定帝即位初，贾鲁被授东平路（治所在今山东省东平县）儒学教授；后任命为宪史，担任过行省掾，被委任为潞城县（今山西省潞城）县尹，又选拔充任丞相东曹掾。后来，元王朝提升他做户部主事，还没有正式上任，突然有一天觉得心跳，不久得到他父亲的来信，信上的笔迹颤抖潦草，他立即辞官赶回家去。等他回到家中，父亲已经患了风瘫病，不久就去世了。

贾鲁按规定在家中服丧守灵后，被起用担任太医院都事。这时恰适元顺帝下令编修辽、金、宋三朝历史，他又被征召担任《宋史》局官。此书完成后，贾鲁被选拔出任燕南山东道宣抚使的幕僚官，经考核政绩他最为优秀，于是又升迁为中书省检校官。贾鲁上奏折建议说：“官府储运公粮的十八处河仓，近几年损失公粮达一百三十万斛，造成这种弊病是由于豪强富裕之家大肆兼并土地，贫苦百姓被迫流亡，应该采取先划定田地分界的办法来制止兼并。不过，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不能使处置的办法周到完善，就不能轻率行动。”他的奏折共计好几万字，确切地打中了时弊的要害。不久，贾

鲁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首先就建议：御史有密封上呈给皇帝的奏章，应该专门送给皇帝本人审处，而不应由朝中台臣事先就拿出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见。贾鲁被提升为御史台御史，转任山北廉访副使。不久，他又被召回朝中担任工部郎中，并提出有关科技工程方面的十九条建议。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五月，黄河先在白茅堤（在今江苏省境内）决口，随后又冲决了金堤（在今河南省滑县东），沿河的许多郡县城乡受灾惨重，老百姓的房屋都被洪水淹没，壮年人也被迫离乡背井四出流亡。元顺帝对此十分忧虑。专门派遣使臣去察看灾情，同时又督促朝中大臣商议提出整治黄河的方案，并特别指令贾鲁兼任都水监的职务。贾鲁沿黄河流经之地巡视，认真考察地理形势，来回行程几千里，详尽地掌握了整治黄河的关键所在。他绘出黄河形势图上呈给元顺帝，并同时提出了两种治河方案：一种方案，建议在黄河北岸修筑大堤，制止河水横向泛滥，这样做需用的人工财物能比较节省；另一种方案，建议疏浚河道和堵塞决口同时进行，引导黄河直向东流，使河水回到黄河故道之中，这样做效果能高几倍。这时，恰巧贾鲁被提升为左司郎中，他提出的建议没有能最后作出决策。贾鲁在司郎中任职期间，曾对当时的国家大政先后提出二十一条建议，都被采纳实行了。后来贾鲁高任都漕运使，他又对有关漕运的事务提出了二十条建议，其中的八条被朝廷采纳：一是在京城附近的地方实行由官府出钱收购民粮供给军饷的办法；二是对漕运司衙门原来管辖的漕运船户给予优厚的待遇；三是漕运司的官员应连续委派避免职事中断无人负责；四是应由通州（今河北省

通县)漕运总管府事先确定委任漕运官员的人选。五是沿河管水坝的人员困扰运粮船户和破坏海运的情况应该改变;六是要疏浚从通州至杭州的大运河便利漕运;七是设在临清(今山东省临清县南)的运粮万户府应隶属漕运司统一管辖;八是临时征募参加漕运的宣忠船户应交给各地漕运司衙门统一调度管理。这些建议后来没能全部实现。不久,黄河又向北泛滥危及安山(今山东省东平西南),洪水灌入运河,一直蔓延到济南(今山东济南)、河间(今河北省河间)一带,将要毁坏两地漕运司所辖的盐场,确实严重损害国家的经济状况。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一度被免去丞相官职的脱脱又由太傅重新出任丞相。在谈论到黄河决口成灾的情况时,脱脱想要解救百姓的艰难困苦,用这个行动来表示尽职并报答皇帝的信托,于是召集朝中大臣一起商议对策。可是,议论中大臣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只有贾鲁坚决倡议说:“黄河一定要治好。”他又把原先提过的两种治河方案提请脱脱考虑。脱脱采纳了他的后一种方案,同他一起研究作出最后决定,并把实施方案治河的任务交给他负责。贾鲁坚决推辞。脱脱说:“这件事不由你来负责绝对不行。”于是进宫向元顺帝报告了这个决定,结果完全符合皇帝的心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四月,朝廷颁布命令:委任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晋升官阶为二品,授给银质的官印,让他享有统领黄河南、北路军民的权力。征调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大名(今河北省大名)等十三路的民夫十五万人和庐州(今安徽省合肥)等地十八处驻军二万人共同担负治河的差役,所

有承担治河事务的兵士、百姓和大小文武官员，一律都要听从贾鲁的统一指挥，为兴工修缮黄河提供便利。就在这个月，治河工程正式动工；七月，挖掘疏通河床的工作完成；八月，开挖渠道引导泛滥横流的洪水回归黄河故道；九月，黄河上恢复了船运交通；十一月，沿河各处的护堤设施和堤坝相继修成，水、陆两部分的工程全部结束，黄河又重新按照原来的老路东流。治河完工后，元顺帝专门派遣使臣祭祀河伯，向河神报告治河成功的喜讯。并下令召贾鲁返回京城。贾鲁回京，绘制了《河平图》呈献给皇帝。这时，元顺帝正在审阅台臣的奏章，奏章中请求褒奖脱脱治理黄河的业绩，并随后评论了贾鲁的功劳。于是，顺帝越级提升贾鲁为荣禄大夫、集贤殿大学士，赏赐给他大量的金银，绸缎。顺帝又命令翰林院承旨欧阳玄撰写《河平碑碑文》，表彰脱脱的劳绩，全面记载贾鲁的功劳，并且下令将碑文交付国史馆永远保存，同时给贾鲁的祖先三代追赠了官爵。

不久，贾鲁被任命为中书左丞，跟从脱脱去征讨占据徐州（治所彭城，在今江苏省铜山县）的农民起义军。脱脱攻下徐州城，凯旋回京，命令贾鲁继续追击余党。贾鲁分兵前去攻打濠州（治所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和总兵官、平章月可察儿一起指挥部队，贾鲁誓师说：“我奉皇帝的命令统领八卫汉军，在濠州城外已经驻扎了七个月。各位将士应该齐心协力，一定要在今天的巳、午（按：现在的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两点之间）时刻攻下州城，等攻下州城后再进餐。”说完，贾鲁就率先上马指挥前进，部队到了城边，他却突然头晕被迫下马。当时，贾鲁还约束将士们不准队伍解散。可是，他

的病越来越严重，吃药也不起作用，竟死在军营中，时年五十七岁。贾鲁病逝的时间，是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五月壬午日。月可察儿亲自为贾鲁操办丧事，然后挑选将士护送贾鲁的灵柩回到高平。元顺帝闻讯后，亲自下令赏赐了交钞五百锭，用来供给安葬贾鲁的费用。贾鲁有一个儿子，名稹。

（刘荣汉 译）

【原文】

贾鲁字友恒，河东高平人。幼负志节，既长，谋略过人，延祐、至治间，两以明经领乡贡。泰定初，恩授东平路儒学教授，辟宪史，历行省掾，除潞城县尹，选丞相东曹掾。擢户部主事，未上。一日觉心悸，寻得父书，笔势颤缩，即辞归。比至家，父已有风疾，未几卒。

鲁居丧服阕，起为太医院都事。会诏修辽、金、宋三史，召鲁为《宋史》局官。书成，选鲁燕南山东道奉使宣抚幕官，考绩居最，迁中书省检校官。上言：“十八河仓，近岁沦没官粮百三十万斛，其弊由富民兼并，贫民流亡，宜合先正经界。然事体重大，非处置尽善，不可轻发。”书累数万言，切中其弊。俄拜监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专达圣聪，不宜台臣先有所可否。升台都事，迁山北廉访副使。复召为工部郎中，言考工一十九事。

至正四年，河决白茅堤，又决金堤，并河郡邑，民居昏垫，壮者流离。帝甚患之，遣使体验，仍督大臣访求治河方略，特命鲁行都水监。鲁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复数千里，备得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一，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

倍。会迁右司郎中，议未及竟。其在右司，言时政二十一事，皆见举行。调都漕运使，复以漕事二十事言之。朝廷取其八事：一曰京畿和籴；二曰优恤漕司旧领漕户；三曰接连委官；四曰通州总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户困于坝夫，海运坏于坝户；六曰疏浚运河；七曰临清运粮万户府当隶漕司；八曰宣忠船户付本司节制。事未尽行。既而河水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隰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

九年，太傅、右丞相脱脱复相。论及河决，思拯民艰，以塞诏旨，乃集廷臣群议。言人人殊，鲁昌言：“河必当治。”复以前二策进。丞相取其后策，与鲁定义。且以其事属鲁。鲁固辞。丞相曰：“此事非子不可。”乃入奏，大称帝旨。十一年四月，命鲁以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进秩二品，授以银章，领河南、北诸路军民，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万，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官，咸禀节度，便宜兴缮。是月鸠工，七月凿河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诸埽诸堤成，水土工毕，河复故道。事见《河渠志》。帝遣使报祭河伯，召鲁还京师，鲁以《河平图》献。帝适览台臣奏疏。请褒脱脱治河之绩，次论鲁功，超拜荣禄大夫、集贤大学士，赏赉金帛。敕翰林丞旨欧阳玄制《河平碑》，以旌脱脱劳绩，具载鲁功，且宣付史馆，并赠鲁先臣三世。

寻拜中书左丞，从脱脱平徐州。脱脱既旋师，命鲁追余党。分攻濠州，同总兵官平章月可察儿督战。鲁誓师曰：“吾奉旨统八卫汉军，顿兵于濠七月矣。尔诸将同心协力，必以今日巳、午时取城池，然后食。”鲁上马麾进，抵城下，忽头

眩下马。且戒兵马弗散。病愈亟，却药不肯汗，竟卒于军中，年五十七。十三年（公元 1353 年）五月壬午也。月可察儿躬为治丧，选士护柩还高平。有旨赐交钞五百錠以给葬事。子稹。

李好文传

——《元史》卷一八三

【说明】李好文，字惟中，生卒年不详，元朝大名府东明县（今山东东明）人，元代地理家。于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进士及第，历翰林院编修、太常博士、国子博士、监察御史、河东、湖北等道廉防使，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他曾参与编修辽、金、宋史。著作有《长安志图》、《端本堂经训要义》、《大宝录》、《大宝龟鉴》等。

《长安志图》原名《长安图记》。清人将其与宋人宋敏求撰《长安志》合刊为一书时，改为《长安志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城市官场图，包括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宫图、唐宫城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市图、唐城市制度图、奉元城图、唐骊山宫图。中卷为古迹陵墓图，包括城南名胜古迹图、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唐肃宗建陵图、唐高宗乾陵图、唐陵图说、图志杂说。下卷是农田水利，包括泾渠图说序、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图、泾渠图说、渠堰历革、洪堰制度、用水则利、设立屯田、建言利病和泾渠总论。下卷尤为详实，记载了历代兴修水利简况，元代灌溉渠系布置，灌区主要工程设施及维修施工技术、管

理制度及屯田组织形式等。因此,《长安志图》和《长安志》是我国城市历史地理著作中的珍品,对后世地理志的撰写具有重要影响。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府东明县(今山东东明)人。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进士及第,授为大名路浚州(今河南浚县)判官。后入朝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监助教。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被任为太常博士。一次,盗贼偷窃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庙中的神主(牌位),李好文上言说:“按照古代的礼制,神主应当用木头制作,用金银玉石制成的祭祀用具,应当另外用一间屋保管起来,以免被盗。”又说:“自我朝先祖建国以来,已有七八十年,每次遇到大的礼节,都是临时将祭祀用具取来使用,太常博士不过是按照惯例应答用事而已。以前,诏令臣下纂修《集礼》一书,而令各省和地方各郡县设置专门部门进行纂修工作,这样做自然长久难以修成。礼乐之事应以朝廷所制订为标准,地主郡县哪里有什么礼乐!”李好文又告知掌管太常仪礼院的长官,请上级从部下属吏中选择了几个人,又请求调用书库中的各种有关文字材料,以采录选择。三年之后,该书纂集完成,共五十卷,起名为《太常集礼》。

后来,李好文被迁升为国子监博士。赶上父母去世,解职归家。守丧完毕之后,又被起用为国子监丞,升任监察御史。当时。朝中又用“至元”年号纪年,和以前重复。李好文上书说:“年号袭用过去已经用过的,自古以来也未曾听说。袭用过去的名字,却没有当时的实际,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

并且谈了现在比不上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的情况十几条。到河东（今山西南部）去检录审验狱中的囚犯，有一个叫李拜拜的囚犯，犯的是杀人罪，却未找到凶器和足够的证据，押了十四年还没有决断。李好文说：“哪里有判决不了的案子拖延这么久的！”下令立即将其释放。诸侯王的师傅撒都剌用脚把别人踢死，许多人都说：“撒都剌不是用兵器杀人，以杖打处罚就行了。”李好文说：“依仗王爷的势力而杀人，比使用凶器还恶劣，况且是在向别人勒索时而杀了人家，其情节尤为严重。”下令将撒都剌处以死刑。消息传出，河东为之震动。之后，李好文又受命主持河南和浙东两道廉访司之事。

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皇帝亲自在太庙中举行祭祀，召令李好文主管太常礼仪院之事。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拜为国子监祭酒，后改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为河东道廉访使。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朝廷兴行郊祀之礼，又召李好文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元顺帝亲自主持祭祀，到元宁宗的庙中时，派阿鲁问李好文说：“哥哥可以向弟弟行拜礼吗？”李好文和博士刘闻回答说：“即帝位在别人的后面，就应该行后代之礼。”元顺帝便行了拜礼。从此以后，元顺帝每次亲自主持祭礼，必定命李好文充任礼仪使之职以辅助祭祀。至正四年，除为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李好文还未出发，又改任为礼部尚书，参与编修《辽史》、《金史》和《宋史》，除为治书侍御史后，仍然参与修史的工作。不久，命李好文参议中书省之事。工作十天后，因编修史书工作繁忙，仍回原职任治书。后来，又任命李好文为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当时，行台之中官吏人员不够，李好文一人独自处理行台中的

各种政务。朝廷派使者出巡西蜀（今四川成都），使者官报私仇，污蔑西蜀廉访使曾文博、佥事兀马儿和王武等人犯罪。曾文博被迫害致死；兀马儿忍受不了拷打而被迫承认有罪，王武不屈服，被处以轻君侮上之罪。李好文闻听人说：“奉使代替天子巡行四方，应当察问民间百姓的疾苦，处罚邪恶，伸张正气。而现在，从行者到各郡县，不曾听说举劾过一个人，惟独有关的官吏，却没一个能够幸免的，这怎么符合正大光明的原则呢？”李好文便率领御史极力辩解王武等人的冤枉之情，并谈了十几件奉使不法的事情。至正六年，任李好文为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然兼任国子监祭酒的职务。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李好文出朝任参知湖广行省政事，改任湖北道廉防使，不久，又召任为太常礼仪院使。这时，元顺帝因为皇太子年令逐渐长大，为加强教育，开设了端本堂，令皇太子入学其中，令右丞相脱脱、大司徒牙不花二人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教育皇太子之事。李好文极力推辞，上书宰相说：“古代三代的圣明君王，莫不把教育太子放在优先的位置上，盖帝王君主治理天下之术以道为根本，古代圣贤的道保存在经书之中，而传习经书是为了明习治天下之道，出京师治理民政事务是为了锻炼能力，关系重大，关键在于要选得合适的人。如果自身的品德行为不足为人模范，便不能胜任养育太子德行的重任。如果自身学问不是臻于高深的境界，便不足以启发太子的聪明才智。应该选求品学兼优的鸿儒，以辅助养育有关国家兴衰的盛事。而我李好文天资本来就低下，在别人心目

中的地位素来就很轻，草野乡村的习气已积久成习，难以去除，章句学问的功夫又因忙于俗事而耽误已久。突然肩负这样的重托，实在是难以担当。请一定选择比我更好的人，这样国家可以因得人而兴盛，而我也免于被别人讥刺妨碍贤人进身之路。”丞相把李好文的书信呈献给了元顺帝，元顺帝赞叹了他，却不答应李好文的请求。李好文说：“要想求得古代圣贤的二帝三王之道，必须由孔子的儒学入门，这些书有《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等。”李好文又将这些书的要点摘出来，按照经书的意思加以注释。又博取历史传记和前代学者的论说中那些有关治理国家的纲领，并和经书的意旨相契合的，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观点，仿照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的体例，写成本十一卷的书，书名为《端本堂经训要义》，写上奏章，奉献给元顺帝。元顺帝诏令将此书送到端本堂，命皇太子学习。

李好文又集历代帝王的故事。总共有一百零六篇，将其分成几类：一是圣慧，象西汉昭帝、东汉明帝从小就聪明过人之类；第二类是孝友，比如舜、周文王和唐玄宗等帝王孝敬亲长、友爱兄弟之类；第三类是恭俭，如汉文帝退千里马、停止修建露台之类的节俭故事；第四类是圣学，比如殷宗喜欢学术，而陈朝、隋朝的皇帝不喜欢学习之类。将这些故事收集在一起，以便皇太子在有空闲时阅读，消磨时光。李好文又广泛采集古史，从夏、商、周三代到金朝、宋代的几千年中，各个朝代的更替、统治时间的长短，以及国家的治乱兴废等。集成一书，起名为《大宝录》。又采取前代帝王行为中的是、非、善、恶之事，哪些应当学习，哪些应当戒鉴等，

集为一书，起名为《大宝龟鉴》。书成后，都抄录以进献给元顺帝。过了一段时间，李好文被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职阶为荣禄大夫。

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李好文又上书皇太子说：“臣所要说的，就是以前进献的经典中所讲的，殿下应以臣所进的各书，参考《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书，如果真能够一一参悟并推广应用，则日理万机，以致天下太平，实在也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皇太子非常肃敬地接纳了李好文的话和书。以后，李好文屡次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引退，一而再，再而三，遂被拜为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的俸禄以终其身。

（雒后坤 译）

【原文】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东明人。登至治元年进士第，授大名路浚州判官。入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国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会盗窃太庙神主，好文言：“在礼，神主当以木为之，金玉祭器，宜贮之别室。”又言：“祖宗建国以来，七八十年，每遇大礼，皆临时取具，博士不过循故事应答而已。往年有诏为《集礼》，而乃令各省及各郡县置局纂修，宜其久不成也。礼乐自朝廷出，郡县何有哉！”白长院者，选僚属数人，仍请出架阁文牍，以资采录。三年，书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礼》。

迁国子博士。丁内忧，服阙，起为国子监丞，拜监察御史。时复以至元纪元，好文言：“年号袭旧，于古未闻，袭其名而不蹈其实，未见其益。”因言时弊不如至元者十余事。录

囚河东，有李拜拜者，杀人，而行凶之仗不明，凡十四年不决。好文曰：“岂有不决之狱如其久乎！”立出之。王傅撒都刺，以足踢人而死，众皆曰：“杀人非刃，当杖之。”好文曰：“怙势杀人，其于用刃，况因有所求而杀之，其情为尤重。”乃置之死，河东为之震肃。出金河南、浙东两道廉访司事。

六年，帝亲享太室，召金太常礼仪院事。至正元年，除国子祭酒，改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迁河东道廉访使。三年，郊祀，召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帝之亲祀也，至宁宗室，遣阿鲁问曰：“兄拜弟可乎？”好文与博士刘闻对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帝遂拜。由是每亲祀，必命好文摄礼仪使。四年，除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未行，改礼部尚书。与修《辽》、《金》、《宋史》，除治书侍御史，仍与史事。俄除参议中书省事，视事十日，以史故，仍为治书。已而复除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时台臣皆缺，好文独署台事。西蜀奉使，以私憾摭拾廉访使曾文博、金事兀马儿、王武事，文博死，兀马儿诬服，武不屈，以轻侮抵罪。好文曰：“奉使代天子行事，当问民疾苦，黜陟邪正。今行省以下，至于郡县，未闻举劾一人，独风宪之司，无一免者，此岂正大之体乎！”率御史力辨武等之枉，并言奉使不法者十余事。六年，除翰林侍讲学士，兼国子祭酒，又迁改集贤侍讲学士，仍兼祭酒。

九年，出参湖广行省政事，改湖北道廉访使。寻召为太常礼仪院使。于是帝以皇太子年渐长，开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学，以右丞相脱脱、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好文以翰林学士兼谕德。好文力辞，上书宰相曰：“三代圣王，莫不以教世子为先务，盖帝王之治本于道，圣贤之道存于经，而

传经期于明道，出治在于为学，关系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范模，则不足以辅成德性。自非学致阃奥，则不足以后迪聪明。宜求道德之鸿儒，仰成国家之盛事。而好文天下资本下，人望素轻，草野之习，而久与性成；章句之学，而寝以事废，骤膺重托，负荷诚难。必别加选抡，庶几国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贤之讥。”丞相以其书闻，帝嘉叹之，而不允其辞。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于孔氏，其书则《孝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释以经义，又取史传，及先儒论说，有关治体而协经旨者，加以所见，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为书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经训要义》。奉表以进，诏付端本堂，令太子习焉。

好文又集历代帝王故事，总百有六篇：一曰圣慧，如汉孝昭、后汉明帝幼敏之类；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及唐玄宗友爱之类；三曰恭俭，如汉文帝却千里马、罢露台之类；四曰圣学，如殷宗缉学，及陈、隋诸君不善学之类，以为太子问安余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历代授受、国祚久速、治乱兴废为书，曰《大宝录》。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恶之所当法当戒者为书，名曰《大宝龟鉴》。皆录以进焉。久之，陞翰林学士承旨，阶荣禄大夫。

十六年，复上书皇太子，其言曰：“臣之所言，即前日所进经典之大意也。殿下宜以所进诸书，参与《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篇，果能一一推而行之，则万几之政、太平之治，不难致矣。”皇太子深敬礼而嘉纳之。后屡引年乞致仕，辞至再三，遂拜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录终其身。

朱震亨传

——《元史》卷一八九

【说明】朱震亨（公元 1281—1358 年），字彦修，义乌（今属浙江）人。元代著名医学家。世居丹溪边，人称丹溪翁。为金元四大家之一，“滋阴派”的代表人物。早年业儒，三十岁时因母患脾病，久治不愈，遂有志于医，研习《素问》，后读《局方》等书，深感《局方》盛行，医者滥用温热香燥，乃四处求学，以订正缺误。曾游历江、浙、皖等地，皆无所获。遂返回杭州，得知罗知悌传刘完素之学，便登门拜师，态度极其诚恳，罗知悌传以学医之要，并授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王好古等金元大家之医书，由衷体会到“湿热相火，为病最多”，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著名论点，认为相火虽为人生之动气，但易于妄动，煎熬真阴，且变化莫测，提倡节饮食、戒色欲，使气血冲和、阴平阳秘，以防病延年。治病善用滋阴降火之剂，创用大补阴丸、琼玉膏、越鞠丸等，遂成一家之说，为后世所推重。

上述见解，出自朱氏代表作《格致余论》。书中还对气、血、痰、郁证治有独到的见解与卓越的成就。朱氏重视辩证论治，反对不加辨证，盲目滥用《局方》温燥辛香之剂，著

《局方发挥》予以澄清。尚有《本草衍义补遗》一卷存世。另有《素问纠略》、《外科精要新论》、《伤寒辨疑》、《宋论》、《风水问答》等书，均佚。由其学生整理而成的医著有《丹溪心法》、《丹溪手镜》、《金匱钩玄》各三卷等。此外，书目著录题为朱丹溪所撰医书还有《脉因证治》、《丹溪先生治法心要》、《怪疴单》、《丹溪医案》、《产宝百问》、《胎产秘书》等二十几种。朱氏三十六岁曾从朱熹四传弟子许谦习性理之学，故《明史·许谦传》后附及朱震亨。学生颇多，如戴原礼、王履等，对医学都有贡献，故丹溪学派对后世影响很大，丹溪滋阴降火学说与河间寒凉论对清温病学说的形成有重大影响。朱氏之学，流传日本后影响甚大，如日本曾成立丹溪学社。由于学术观点之对立，明代温补医家张介宾多评丹溪学说之非。

（许谦）同乡朱震亨，字彦修，是许谦的得意门生。朱氏清修的品行，真象上古执着追求真理的人士，所到之处人们多被他的品德操行所感化。

（朱建平 译）

【原文】

（许谦）同郡朱震亨，字彦修，谦之高第弟子也。其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贍 思 传

——《元史》卷一九〇

【说明】贍思（公元1277—1351年），字得之，大食国后裔，元代著名学者，在科学上也颇有建树。贍思自幼聪颖，博览群书，曾为应奉翰林文字，任陕西行台监察御史，以及云南、浙江等地司法部门的官职。贍思为政清廉，一生平了许多冤案，为整顿吏制作了许多具体工作。贍思知识渊博，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水利等，无所不通，而尤擅长于经学和地学，对《易》学也有很深的研究。曾参加了《经世大典》的修撰工作，还著有《帝王心法》、《四书阙疑》、《五经思问》、《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镇阳风土记》等著作十多种。

贍思，字得之，他的祖先是大食国人。大食国内附后，贍思的祖父鲁坤，便东迁丰州。元太宗时，鲁坤以其才能被任命为真定、济南等路的监榷课税使，因此便定居真定。贍思的父亲斡直开始跟随汉族的知识分子学习，他看轻钱财而重义气，不关心仕途上进。

贍思九岁时，已能每天记诵古代经典文章达千言。到二

十岁左右时，他的学业得到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的指导，由此得以阅读大量图书，学习众多学问，并付之实践，这些全是扎实有用的学问。所以，他虽然还年轻，但已为大家所推崇器重。

延祐（公元1314—1320年）初年，皇帝下令通过考试录用人才，有人便劝赡思去应试，而赡思只是笑笑而已。不久，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赓、参知政事王士熙同时推荐了他。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皇帝因征问遗逸将他诏至上都，在龙虎台见了皇帝，皇帝对他礼遇极厚。当时由倒刺沙主持国务，许多西域人都依附于他，而独有赡思不去巴结他，倒刺沙多次让人去请赡思，赡思都以奉养父母而告归。

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皇帝诏赡思入京任应奉翰林文字，在奎章阁，文宗皇帝问他：“你有著作吗？”第二天，他向文宗进呈了自己写的《帝王心法》一书，文宗称赞他写得好。下令让他参予修撰《经世大典》，后因意见不合而要求离开，皇帝让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去挽留他，赡思却以母亲年老而坚决要求回家，于是，皇帝给他馈赠了金银而同意他离开。但又让虞集告诉他说：“你暂回去，不久皇帝将召见你。”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授予国子监博士，因母亲去世而没有去就职。

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赡思被任为陕西行台监察御史，随即，他向皇帝上奏密章十条，内容为：效法祖宗、综揽权政、厚待宗室、优待功臣、珍重制度、广开言路、恢复科举、统一军队、统一法规、宽以待民。当时奸臣破坏国家制度，皇帝正在听取各方意见，赡思所说各条，都是大臣们

不敢说的。侍御史赵承庆见到贍思，感叹地说：“你说到这些，是国家的福呀！”贍思的亲戚中，有人在陕西行省任职，恣意忘为，贍思揭发他的罪行并要追究责任，那人随即离职夜逃，刚巧皇帝有令，可以不追究此人，但贍思还是杖责了那人的亲信。到贍思巡察云南时，凡发现违法的省臣官吏，即令他们解职离去，这种作法，使周边藩属大为震惊。

襄阳、汉中地区的流民，会聚在宋代的绍熙府故地，达到数千户，他们私开盐井，自己管理自己，常常劫持囚徒，杀死巡逻士卒。贍思便逮捕他们的头领，而释放了其他人。又向皇帝上奏说：“绍熙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厚，流民逐日聚增，若将他们遣返回乡，恐怕将为边境地区的隐患，应在此设立统治机构安抚管理他们。”皇帝即下令在那里设置了绍熙宣抚司。

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贍思在浙西肃政廉访司任职，追究处理了都转运盐使、海道都万户、行宣政院等官吏的贪污罪，使浙西地区郡县官吏不敢再有贪赃枉法的人。浙西地区的寺庙私藏奸猾之人，所谓道人、道民、行童等，都是些违犯道德人伦的人。逃避徭役，使国家民力日损，查证嘉兴地区，即有二千七百多人。因此，贍思又建议将他们遣归回家，让他们供纳国家赋役，以减少其他民众负担。朝廷认为他的话很对，便将之作为命令执行。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贍思改在浙东肃政廉司任职。后因病而回。

贍思历任司法部门官职，所至各地以伸冤昭雪为己任，先后平反纠正死罪案多起，但却从不故意轻判人罪以谋取别人对自己的感谢。他曾与五府官员在咸宁县办案，有一名叫宋

娥的妇女，与邻居通奸，那位邻居告诉宋娥说：“我要杀了你丈夫。”宋娥说：“张子文将要杀我丈夫。”第二天，宋娥的丈夫果然死了。官府追查多日，宋娥才将张子文要杀他丈夫的事情告诉了她姑姑。五府官员认为这不是共同杀的，而且已经过大赦，应释放宋娥。贍思说：“张子文是以为宋娥同意他这么干的。而且，宋娥的丈夫已死了近十天，宋娥才说出这件事，这说明宋娥与张是同谋，宋娥估计不能隐瞒到底，所以才说了出来，这岂能释放？”枢密判官说：“为活人平反是积阴德，你不要违背常理。”贍思说：“这是故意使人逃脱罪责，不是平反。而且，您要给活人积阴德，那对死人将如何交待？！”便独自上书刑部，最终为宋娥定了罪。贍思处理刑狱大多类似处理宋娥这样的事。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贍思任江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召回京任秘书少监，命参予讨论治理黄河事，都因病推辞未去。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在家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皇太子在冀宁治军，受皇帝命令前往封拜追赠贍思为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为恒山郡侯，追谥为文孝。

贍思精通经学，对《易》学尤为熟悉，其他天文、地理、钟律、算术、水利，以及外国著作，他都认真学习研讨。贍思家庭贫寒，有时饭都吃不上，但却常以考订研究经传学问为乐趣。他所著著作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旨》、《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以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中。

(赵 荣 译)

【原文】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国人。国既内附，大父鲁坤，乃东迁丰州。太宗时，以材授真定、济南等路监榷课税使，因家真定。父幹直，始从儒先生问学，轻材重义，不干仕进。

贍思生九岁，日记古经传至千言。比弱冠，以所业就正于翰林学士承旨王思廉之门，由是博极群籍，汪洋茂衍，见诸践履，皆笃实之学，故其年虽少，已为乡邦所推重。

延祐初，诏以科第取士，有劝其就试者，贍思笑而不应。既而侍御史郭思贞、翰林学士承旨刘廌、参知政事王士熙，交章论荐之。泰定三年，诏以遗逸征至上都，见帝于龙虎台，眷遇优渥。时倒剌沙柄国，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独不往见，倒剌沙屡使人招致之，即以养亲辞归。

天历三年，召入为应奉翰林文字，赐对奎章阁，文宗问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进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称善。诏预修《经世大典》，以论议不合求去，命奎章阁侍书学士虞集谕留之，贍思坚以母老辞，遂赐币遣之。复命集传旨曰：“卿且暂还，行召卿矣。”至顺四年，除国子博士，丁内艰，不赴。

后至元二年，拜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条，曰：法祖宗，揽权纲，敦宗室，礼勋旧，惜名器，开言路，复科举，罢数军，一刑章，宽禁网。时奸臣变乱成宪，帝方虚己以听，贍思所言，皆一时群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赵承庆见之，叹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戚里有执政陕西行省者，恣为非道，贍思发其罪而按之，辄弃职夜遁，会有诏勿

逮问，然犹杖其私人。及分巡云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以去，远藩为之震悚。

襄、汉流民，聚居宋之绍熙府故地，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贍思乃擒其魁，而释其党。复上言：“绍熙土饶利厚，流户日增，若以其人散还本籍，恐为边患，宜设官府以抚定之。”诏即其地置绍熙宣抚司。

三年，除金浙西肃政廉访司事，即按问都转运盐使、海道都万户、行宣政院等官赃罪，浙右郡县，无敢为贪墨者。复以浙右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谓道人、道民、行童者，类皆读常伦，隐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兴一路，为数已二千七百。乃建议请勒归本族，俾供王赋，庶以少宽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为令。四年，改金浙东肃政廉访司事，以病免归。

贍思历官台宪，所至以理冤泽物为己任，平反大辟之狱，先后甚众，然未尝故出人罪，以市私恩。尝与五府官决狱咸宁，有妇宋娥者，与邻人通，邻人谓娥曰：“我将杀而夫。”娥曰：“张子文行且杀之。”明日，夫果死，迹盗数日，娥始以张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为非共杀，且既经赦宥，宜释之。贍思曰：“张子文以为娥固许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与张同谋，度不能终隐，故发之也，岂赦可释哉？”枢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阴德也。御史勿执常法。”贍思曰：“是谓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种阴德于生者，奈死者何！”乃独上议刑部，卒正娥罪。其审刑当罪多类此。

至正四年，除江东肃政廉访副使。十年，召为秘书少监，议治河，皆辞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二十

五年，皇太子抚军冀宁，承制封拜，赠嘉议大夫、礼部尚书、上轻车都尉，追封恒山郡侯，谥曰文孝。

贍思邃于经，而《易》学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钟律、算数、水利，旁及外国之书，皆究极之。家贫，饘粥或不继，其考订经传，常自乐也。所著述有《四书阙疑》、《五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老庄精旨》、《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重订河防通议》、《西国图经》、《西域异人传》、《金哀宗记》、《正大诸臣列传》、《审听要诀》，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杜 瑛 传

——《元史》卷一九九

【说明】杜瑛，字文玉，金末元初人，祖籍霸州信安（今河北霸县），一生以教书为业，活动于山西、河南、河北一带。多次谢绝朝廷征诏，不愿为官。杜瑛学识渊博，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对音律和历法有独到的研究，特别推崇邵雍的《皇极经世》历法。他的主要著作有《春秋地理原委》、《语孟旁通》、《皇极引用》、《皇极疑事》、《极学》、《律吕律历礼乐杂志》等。

杜瑛，字文玉，祖先是霸州信安人。父亲杜时昇，在《金史》中有传。杜瑛身高七尺，胡须美，相貌魁伟。金朝将要灭亡时，读书人还在按科举旧例求取功名，杜瑛独自躲到河南缙氏山中。大动乱之后，书籍散失。杜瑛尽力寻找各种书籍，尽力阅读，过目不忘，深入研究。从古至今的历史了如指掌。他到处流浪，在汾、晋一带教书为生。中书粘合珪在相州建立衙署，自选僚属。杜瑛应聘，在那里安了家。给他良田千亩，他推辞不要。算命的说他所住的房下藏有财宝，家里人想要挖，他制止了。后来住的人果然挖得黄金百斤。杜

瑛就是这样不取非份之物。

己未年(公元1259年),元世祖忽必烈南征经过相州,向杜瑛请教。杜瑛说:“汉唐以来,君王立国所依赖的支柱是法律、军队和粮食这三样。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如今宋朝对这三样都轻视,当然该灭亡了。国家的兴旺全靠您。若进军襄樊,沿江而下,从背后猛击,大业可建立了。”皇帝很高兴,说:“书生中也有这样的人!”杜瑛又劝皇帝若干事,说如果不这样,后果会如何。皇帝都接受了,心里佩服杜瑛,准备重用他,让他随行,但因病未能成行。

中统(公元1260—1264年)初年,朝廷征召杜瑛。当时王文统正当权。杜瑛推辞不去。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推荐他任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又推辞。写信给丞相,大意是:“古代贤明行先王的治国之道不能推行,是因为异端邪说为害。尽管邪恶横行,但天理不绝如线。如今皇上英明,贤良辈出,言听计从,正是恢复光大先王的礼乐教化的大好时机。至于登记簿籍、定期开会,及文法末节,汉唐君臣犹不屑为。而当今当政者,只知注意这些事情,真是可惜!善始者未必善终,如今虽然建立了政权,若不逆流求源,建立法制,端正风俗,教育人材,广施教化,从而拯救数百数千年来的灾祸,我恐怕将来的恶果,是一言难尽的。”有人劝他做官,他说:“如今距古代虽远,但先王的所作所为,还可以考察出来。当政者最重要的莫过于复古。如果因袭旧弊不求改革,怎么能合先王的道理呢?我又不会察颜观色投机取巧,做官有什么用!”于是杜门谢客,专心著书,从不以贫富得失而动摇信念。悠闲自得,终其一生。七十岁对儿子杜

处立、杜处愿立下遗言：“我快要死了。死后在墓碑上写上缙山杜处士。”天历（公元1328—1330年）年间，追赠为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号文献。

杜瑛著的书有《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对于律学，杜瑛研究其本质，探讨其含义。声音的长短清浊，律管的周径容积，都进行分类，引经据典地加以说明，并加入自己的评论。对于历学，他认为过去造历者都寻找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作为历元，唯独邵雍认为天地起始于子，取日月为甲子，星辰为甲子，发明“元会运世”的方法，既无月的日余数，也无年的日余数，直接取三百六十天为一年。因而，每年每月的日数等天象的长短变化，一年中自然界百物的生灭循环，都包括在其中了。论及“闭物开物”（百物生灭循环），则认为开始于己（月），结束于戊（月）。五是天的中数，六是地的中数。戊月、己月，十个月的中间。又分配八卦来纪年。金朝的大定庚寅年，是小过初六卦；本朝的甲寅年三月二十三日寅时，是小过九四卦。这些观点，都是前代学者没有提过的。在书中记载了其论点。（刘次沅 译）

【原文】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时昇，《金史》有传。瑛长七尺，美须髯，气貌魁伟。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地河南缙氏山中，时兵后，文物凋丧，瑛搜访诸书，尽读之，读辄不忘，而究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诸掌。间关转徙。教授汾、晋间。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瑛赴其聘，遂家

焉。与良田千亩，辞不受。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发现，辄止之。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

岁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兴之在圣主。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掬其背，大业可定矣。”帝悦，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复劝帝数事，以谓事不如此，后当如彼。帝纳之，心贤瑛，谓可大用，命从行，以疾弗果。

中统初，诏征瑛。时王文统方用事，辞不就。左丞张文谦宣抚河北，奏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又辞，遗执政书，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异端邪说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绝如线。今天子神圣，俊乂辐凑，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才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则曰：“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末先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俛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仕！”于是杜门著书，一不以穷通得丧动其志，优游道艺，以终其身。年七十，遗命其子处立、处愿曰：“吾即死，当表于墓曰‘缙山杜处士’”。天历中，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文献。

所著书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

《皇极引用》八卷、《皇极疑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于律，则究其始，研其义，长短清浊，周径积实，各以类分，取经史之说以实之，而折衷其是非，其于历，则谓造历者皆从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为历元，独邵子以为天开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为元会运世之数。无朔虚，无闰余，率以三百六十为岁，而天地之盈虚，百物之消长，不能出乎其中矣。论闭物开物，则曰开于己，闭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己，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纪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过之初六；国朝之甲寅三月二十三日寅时，交小过之九四。多先儒所未发，掇其要著于篇云。

李 杲 传

——《元史》卷二〇三

【说明】李杲（公元 1180—1251 年），字明之，号东垣，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元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为“补土派”代表人物。

李杲幼年爱好医学，曾拜当时名医张元素为师。张元素精通《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擅长脏腑寒热虚实标本辨证用药。不数年，尽得张氏之传，遂通医药，尤精伤寒、痈疽、眼病治疗。元壬辰（公元 1232 年），避兵东平（今属山东），甲辰（公元 1244 年）返回故里，将医术传授给元好问。撰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各三卷。李氏根据《内经》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的精神，强调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人以胃气为本。指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重在调治脾胃，且以升发脾阳为主，故提出“甘温除热”法治疗内伤脾胃发热，自制补中益气、升阳益胃诸汤方。因此，后世誉李杲为“补土（脾胃）派”的开山祖，称宗李杲之学的后世医家为“补土派”。李氏还精于辨药制方，所制方剂味多而不杂，君臣佐使，相制相用，条理井然。撰有《用药法象》一卷、《东垣试效方》九卷。李杲脾胃学说对

明清医学影响很大，受到多数医家的赞扬，但亦有加以批评和补充的。如明代张介宾曾批评李氏相火论，清代叶天士提出养胃阴之说，对李氏重治脾阳而忽略胃阴作了补充。

李杲，字明之，真定人。世代都以资产富厚雄居乡里。李杲幼年爱好医药，当时易州人张元素医术名闻燕赵一带，李杲捐千金巨款跟他学习，没有几年，就学到张元素的全部医术。李氏家资富厚，无意专事医业，只不过持有一技以提高自己的价值，人们也不把他当作专职医生。为官者有的担心他生性高傲耿直，难以降志接诊，不是危急病症，不敢拜求他。李氏医术，尤长于伤寒、痛疽、眼目病的证治。

北京人王善甫，任京城酒官，患小便不利，眼珠突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疼痛欲裂，而且饮食不进，曾用甘淡渗泄药物治疗，都没有效果。李杲对那些医生说：“病加重了。《内经》有这样的话，膀胱乃津液之府，必赖气化，才能排出尿液。现在使用渗泄之剂而疾病加重，这是由于气化不利。后玄子王冰曾说过：‘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甘淡渗泄都是阳药，有阳无阴，它怎么能化得呢？”第二天，用许多阴药投服，一剂而愈。

西台掾萧君瑞，二月中旬患伤寒发热，前医配给白虎汤，病人服后面黑如墨，原来热证不再出现，脉沉细，小便不禁。李杲开始不知用了何药？等诊病后说：“这是立夏前误用白虎汤的过失。白虎汤药性大寒，不是行经通化之药，只能使脏腑变寒，不善用它，则伤寒本病被冰伏隐曲于经络之间。如果用大热药去解救，以治阴邪，则其它变证必然会产生，不

是解救误用白虎汤的良法。只有升阳行经的温药，我可以使用。”有人发难说：“白虎汤是大寒之剂，不用大热药用什么来救治呢？您的疗救又有什么用呢？”李杲说：“病邪隐伏在经络之间，阳气不升则经气不行，而经气运行则伤寒本病诸症就会表现出来。本证治疗又有什么难的呢？”果然象李杲所说的那样，服温药而愈。

魏邦彦的妻子，眼睛突然生翳，由下而上，呈绿色，肿痛难忍。李杲认为：“目翳从下而上，这是病邪由阳明而来。绿不是五色（青、赤、白、黑、黄）之正色，大概是肺（白）与肾（黑）两脏合邪引起的疾病。”于是处方，以泻肺肾之邪药为主，配引诸药入阳明经的药味为使，治疗有效。后来，病又复发三次，根据传来病邪的经脉，与第一次“肾翳”的颜色都各不相同。李杲便说：“诸脉都归属于目，脉有病则会影响目。这一定是经络不调，经络不调则眼病痊愈。”询问病情，果然如此。按照上述论述而处方施治，眼病痊愈，才不再发作。

冯叔献的侄儿冯栎，十五六岁，患伤寒，目赤，突然口渴，呼吸一次，脉跳七八次，医生想用大承气汤峻下，已经煎好了药。这时，李杲正好从外进来，冯叔献把病孩情况告诉李杲。李杲切脉后，非常惊骇，说：“这孩子差一点被药杀死。《内经》有言：‘脉象，跳得快的多为热病，跳得慢的为寒病’。现在脉搏一呼吸间跳九次，这是热盛的表现。但《会要大论》说：‘病证有脉与证看起来相吻合而实质上却正相反，这是为什么？阳病，见洪大浮滑的阳脉是脉证相从，但按之不鼓而无力，就不是真正的阳脉，各种阳证阳脉都是这样。’

这病孩病邪传变已成阴证。叫拿干姜、附子等热药来，我要根据寒证用热药法来治疗他”。药未配好，病人指甲变色，令病人一次服姜附剂八两，旋即汗出而痊愈。

陕西军帅郭巨济患半身不遂，用二指触他的足底，无知觉，足不能伸。李杲用长针刺他委中穴，深至骨而病人仍不知痛，放出一二升瘀血，血色如墨，又用缪刺法，针刺对侧穴位。如此针刺六七次，服药三个月，偏瘫病果然痊愈。

裴择妻子患恶寒发热病，月经不来已有数年，后来气喘咳嗽。医生大多使用蛤蚧、肉桂、附子之类的药物。李杲说：“不对。患阴病又为阳邪所犯，温剂太过，所以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有害。而用凉血药则月经畅行。”后来，果然如此。

李杲治病设法施疗大多象上述所讲的。当时人们都把他看成神医。他撰著的医书，现在大部分流传于世。

(朱建平 译)

【原文】

李杲字明之，镇人也。世以赏雄乡里。杲幼岁好医药，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家既富厚，无事于技，操有余以自重，人不敢以医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资性高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不敢谒也。其学于伤寒、痼疽、眼目病为尤长。

北京人王善甫，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饮食且不下，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杲谓众医曰：“疾深矣。《内经》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乃出焉。今用渗泄之剂而病益甚者，是气不化也。后玄子云‘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甘淡渗泄皆

阳药，独阳无阴，其欲化得乎？”明日，以群阴之剂投，不再服而愈。

西台掾萧君瑞，二月中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汤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之药，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以苦阴邪，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升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本证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妻，目翳暴生，从下而上，其色绿，肿痛不可忍。杲云：“翳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来也。绿非五色之正，殆肺与肾合而为病邪。”乃泻肺肾之邪，而以入阳明之药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翳色各异。乃曰：“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目从之。此必经络不调，经不调，则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因如所论而治之，疾遂不作。

冯叔献之侄栎，年十五六，病伤寒，目赤而顿渴，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汤下之，已煮药，而杲适从外来，冯告之故。杲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儿。《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而《会要大论》云‘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传而为阴证矣。令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法处之。”药未就，而病者爪甲变，顿服者八两，汗寻出而愈。

陕帅郭巨济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长针刺骨

骭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谬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药三月，病良已。

裴择之妻病寒热，月事不至者数年，已喘嗽矣。医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药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阴为阳所搏，温剂太过，故无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药，则经行矣。”已而果然。

杲之设施多类此。当时之人，皆以神医目之。所著书，今多传于世云。

阿老瓦丁传

——《元史》卷二〇三

【说明】阿老瓦丁，生年不详，卒于 1312 年（元皇庆元年）。回族。元代著名制炮专家。

元世祖忽必烈（公元 1215—1294 年）在 1271 年（至元八年）定国号为元，随后发动对南宋的进攻。这年，忽必烈派遣使臣征募炮匠，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应征到达京师，并在那里造炮。在元灭南宋的战争中，他们作为制炮能手，所造的大炮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平章阿里海牙率领元军攻打潭州、静江等地时，曾遭到有力的抵抗，而阿老瓦丁制造的大炮在这些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阿老瓦丁因军功被授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后元帅府改为回族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上万户府统兵七千以上），阿老瓦丁任副万户职。

阿老瓦丁的儿子马哈马沙和亦思马因的儿子亦不剌金也制造大炮。

阿老瓦丁，回族，西域木发里人。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使臣到宗王阿不哥那里征募制炮的能工巧匠，宗王阿不哥响应皇帝的命令因而推荐了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他们两人带着各自的家眷乘了车马很快到达京师（元大都，即今北京），住进了政府提供的房舍。他们最先制造的大炮架设在五门前，皇帝命令试放，并赏赐给他们衣料。至元十一年（公元 1274 年），元兵渡长江，平章阿里海牙派人恳请得到炮手工匠的支援，阿老瓦丁受命前往。在攻破潭州（今湖南长沙）、静江（今广西桂林）等郡的战斗中，都依赖了他制造的大炮的效能。至元十五年（公元 1278 年），阿老瓦丁被授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至元十七年（公元 1280 年），皇帝召见阿老瓦丁，赐钱五千贯。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受命在南京驻军种地。至元二十二年（公元 1285 年），枢密院奉皇帝的命令，将元帅府改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阿老瓦丁任副万户。元成宗大德四年（公元 1300 年）阿老瓦丁因年老告退，由他的儿子富谋只承袭副万户职。元仁宗皇庆元年（公元 1312 年），阿老瓦丁去世，儿子马哈马沙承袭了他的官职。

（王 冰 译）

【原文】

阿老瓦丁，回回氏，西域木发里人也。至元八年，世祖遣使征炮匠于宗王阿不哥，王以阿老瓦丁、亦思马因应诏，二人举家驰驿至京师，给以官舍，首造大炮竖于五门前，帝命试之，各赐衣段。十一年，国兵渡江，平章阿里海牙遣使求炮手匠，命阿老瓦丁往，破潭州、静江等郡，悉赖其力。十五年，授宣武将军、管军总管。十七年，陛见，赐钞五千贯。

十八年，命屯田于南京。二十二年，枢密院奉旨，改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以阿老瓦丁为副万户。大德四年告老。子富谋只，袭副万户。皇庆元年卒，子马哈马沙袭。

亦思马因传

——《元史》卷二〇三

【说明】亦思马因（公元？—1274年），回族。元代制炮能手。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和阿老瓦丁一同应征到达京师并在那里造炮，后来他们随元军南下。在元军攻打襄阳的战斗中，亦思马因用他所造的大炮轰击，迫使镇守襄阳的南宋将领吕文焕在该城被攻破后投降。后来吕文焕为元军招降沿江州郡，又为向导引元军东下。亦思马因因有功被任命为回族炮手总管。

亦思马因的儿子布伯承袭了他的官职。在元军渡长江的战斗中，布伯使用大炮重创南宋的军队和舟船。因屡战有功，不断加官晋级。他的弟弟亦不剌金和阿老瓦丁的儿子马哈马沙也制造大炮。

亦思马因，回族，西域旭烈人。擅长制造大炮。元世祖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他和阿老瓦丁一起到京师（元大都，即今北京）。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跟随元兵攻打襄阳，襄阳城没能攻打下来。亦思马因察看了地势，把大炮架设在城的东南角。大炮重一百五十斤，扣动机关，发射出炮弹，声

音震天动地，轰击的目标没有不被摧毁破坏的，能深入地下七尺。南宋安抚吕文焕很惊恐，献城投降。亦思马因因为造炮有功而得到赐银二百五十两，被任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戴虎符。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亦思马因病逝。儿子布伯承袭了他的官职。

当时元兵渡长江，南宋的军队在长江南岸列阵，围集着舟船迎战元兵。布伯在长江北岸架设大炮轰击它们，南宋的舟船都被击沉。以后每次战役均用大炮，都有战功。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佩戴三珠虎符，加授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的职务。第二年，改授军匠万户府万户。又改任刑部尚书，他的弟弟亦不剌金为万户，佩戴元降虎符，官职为广威将军。布伯不久又晋升为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皇帝赐钱二万五千贯，给他用以养老。（王冰译）

【原文】

亦思马因，回回氏，西域旭烈人也。善造炮，至元八年与阿老瓦丁至京师。十年，从国兵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抚吕文焕惧，以城降。既而以功赐银二百五十两，命为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十一年，以疾卒。子布伯袭职。

时国兵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布伯于北岸竖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十八年，佩三珠虎符，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明年，改军匠万户府万户。迁刑部尚书，以弟亦不剌金为万户，佩元降虎

符，官广威将军。布伯俄进通奉大夫、浙东道宣慰使，赐钞二万五千贯，俾养老焉。

阿尼哥传

——《元史》卷二〇三

【说明】阿尼哥，十三世纪时人，生卒年不详。原籍尼泊尔。元代著名科学技术专家。阿尼哥自幼聪慧，胆识过人。他不到二十岁时，就率领数十尼泊尔工匠到西藏建造佛塔，且任监工。工程结束之后，在朝见皇帝时毫无惧色、从容答对。阿尼哥心灵手巧，在绘画、妆塑和金属铸造方面技艺高超。他虽然来自尼泊尔，但来华后很快掌握了中国的织锦技术，织出历代圣人帝王的像比绘画更为生动。他能炼制精铁，并用来说来制造器物。阿尼哥原来只熟悉佛像的铸造，但他勇于试验，根据铸造佛像的经验，把残缺损坏的针灸铜人修整如新，铸造出了关节脉络都齐全的新的针灸铜人。

阿尼哥曾任人匠总管职，又管理将作院的工作。后被授予光禄大夫，大司徒。去世后被封典，谥号敏慧。

阿尼哥，尼波罗（今尼泊尔）国人。尼波罗国人称他为八鲁布。阿尼哥自幼聪敏颖悟，和一般儿童不一样。稍微长大一点，他诵读和学习佛教著述，一年就能通晓其中的意思和道理。一起学习的同伴中有从事绘画妆塑行业的，读《尺

寸经》，阿尼哥一听就能记住。年长以后，阿尼哥擅长于绘画妆塑以及铸造金属佛像。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命令帝师八合斯巴在吐蕃（今西藏）建造黄金塔。尼波罗国打算选派一百名工匠前往建造，选出了八十人，可是没有选出送这些工匠去的统领。当时阿尼哥十七岁，请求前往；但众人因为他年幼，而盘问为难他。阿尼哥回答说：“我年纪虽小，但心可不小。”于是派遣阿尼哥率领工匠们前往。帝师见了很奇怪，命令他监督工程的进行。第二年，黄金塔建成，阿尼哥请求回国。帝师劝勉鼓励他入朝觐见，于是阿尼哥剃去了头发接受戒律而成为弟子，跟从帝师觐见皇帝。皇帝审视阿尼哥许久，问他：“你来到大国，难道不害怕吗？”阿尼哥回答：“圣人培育的孩子在四面八方，孩子来到父亲面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皇帝又问：“你来做什么呢？”回答说：“我的家在西域，奉命到吐蕃建塔，两年建成了。我看到那里有战争，百姓无法生活，因此请求陛下平定战事。我不远万里，是为了百姓而来。”皇帝又问：“你有什么技能？”阿尼哥回答：“我以心中的想法为指导，很熟悉绘画、妆塑和金属铸造的技艺。”皇帝命令把明堂针灸铜像拿来给他看，说：“这铜像是宣抚王楫出使宋国时得到的礼物，年数多了已有残缺和损坏，但没人能把它修理完好，你能把它修整如新吗？”阿尼哥说：“虽然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请求试一试。”元世祖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新的铜像铸成，关节脉络都齐全。从事金属加工的工匠们都赞叹阿尼哥巧夺天工，没有不佩服他的。北京和南京两地寺院庙宇中的佛像，大多出自阿尼哥之手。他

又制七宝鍱铁法轮，在皇帝的车驾出行时用作前导。阿尼哥还将原来庙堂里供奉的历代圣人和帝王的像，织成织锦，其生动的程度是绘画不能相比的。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阿尼哥被授予人匠总管职，佩银章虎符。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皇帝命令阿尼哥辞去原官职，授予他光禄大夫、大司徒职，管理将作院的工作。阿尼哥深得皇帝的宠遇和赏赐，没有人能与他相比。阿尼哥去世后，皇帝给予他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和上柱国的封典，谥号敏慧。

阿尼哥有儿子六人。阿僧哥，任大司徒职；阿述腊，任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王冰译）

【原文】

阿尼哥，尼波罗国人也，其国人称之曰八鲁布。幼敏悟非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妆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铸金为像。

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巴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人往成之，得八十人，求部送之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师勉以入朝，乃祝发受具为弟子，从帝师入见。帝视之久，问曰：“汝来大国，得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辑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

以心为师，颇知画塑铸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灸铜像示之曰：“此（安）〔宣〕抚王襪〔襪〕使宋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完之者，汝能新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寺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鍱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锦为之，图画弗及也。

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授光禄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比。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子六人，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刘元传

——《元史》卷二〇三

【说明】刘元，字秉元，宝坻县（今属天津市）人。他起初为道士，后向阿尼哥学艺。他长于泥塑、金属铸像和漆帛塑像，尤其是漆帛塑像，堪称一绝。元朝西京的寺庙佛像，大都出自刘元之手。他的作品，栩栩如生、神态生动，备受时人赞誉。因此，他很受元世祖和元仁宗的赏识，曾两度赐宫女为妻。官至昭文馆大学士。

有一位叫刘元的人，曾向阿尼哥学习铸造佛像的技术，被人称为绝艺。刘元字秉元，蓟州宝坻县人。他起初作道士，拜青州把道录为师，学会了多种技艺。至元（公元1264—1294年）年间，两京著名寺庙里的佛像，不论是泥塑的或是金属铸造的，或是转换而成的，凡是出自刘元之手，都神色栩栩如生，符合人们心目中佛祖的神态，得到天下人的称赞。其中上都的三皇像尤其古色古香，行家认为，刘元的塑艺把三位圣人的神态表现得细致入微。因此，皇帝两次把宫女赏给他为妻，让他统领各种工匠，皇帝出外，必令他随从。

仁宗曾命令刘元，没有圣旨准许，不许替别人造其他的

神像。后来大都的南城建造东岳庙，刘元为该庙创作仁圣帝塑像，塑像气宇轩昂，有帝王的气度，旁边侍候他的臣子像，表现出深思熟虑的神情。起初刘元想塑侍臣像，长时间没有动手，他在翻阅内府藏画时，看到唐朝魏征的画像，眼睛为之一亮说道：“有办法了，若不似魏征这样神情，就与宰相的身份不相称。”马上去庙里动手制作，当天就完成了，看到塑像的官员和读书人，都赞叹不已。他所创作的西番佛像，大都秘不示人，人们很少能见到。

刘元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长寿而死。所谓“搏换”这种工艺，即在泥塑像上遍缠绢帛，每用漆涂，然后把泥塑像挖去，漆过的绢帛，就形成栩栩如生的塑像。

（任文坚 译）

【原文】

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始为黄冠，师事青州把道录，传其艺非一。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抔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由是两赐宫女为妻，命以官长其属，行幸必从。

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他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征像，瞿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者。”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大夫观者，咸叹异焉。其所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见者。

元官为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卿，以寿终。转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成像云。

朱 棣 传

——《明史》卷一一六

【说明】朱棣（公元 1360—1425 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洪武三年（公元 1371 年）封为吴王，十一年（公元 1378 年）改封周王，十四年（公元 1381 年）归藩府开封。《明史》本传说朱棣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开封一带自然灾害较多，那里野生植物生长繁茂，朱棣偕同一些幕僚收集并经考核可以用于人们渡饥荒用的植物四百多种，撰写成《救荒本草》一书。朱棣卒于洪熙元年（公元 1425 年），谥号定。所以《明史》也题《救荒本草》为“周定王撰”。

《救荒本草》是以救荒为宗旨的，因而实用性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经过广泛调查，把民间利用野生植物救饥的方法和经验都记录入书中，供人们作参考。本书是十五世纪初的中国第一部关于植物的科学记录，对植物特性的描述相当细致和准确。《救荒本草》原书二卷，共收录记载植物 414 种，其中已见于历代本草书的 138 种，新增加的 276 种，分为草部、木部、米谷部、果部和菜部五大类。《救荒本草》很早就流传国外，在日本先后有刊刻和手抄本多种传世。德国植物

学家 E · Brest Sohneider 在 1851 年就研究了本书,并对其中的 176 种植物定了学名。美国植物学家 A · S · Lead 在 1942 年出版的《植物学小史》一书中盛赞本书插图之精确程度超过当时欧洲的。

周定王朱橚,是明太祖的第五个儿子。洪武三年(公元 1371 年)封吴王。七年(公元 1374 年),有关部门请为他在杭州设置监领卫所,太祖说:“钱塘是国家财赋收入的重地。不可以。”十一年(公元 1378 年),改封周王,命他和燕、楚、齐三王一起驻居在凤阳。十四年(公元 1381 年),就归藩国开封,即在北宋王宫旧址上建立王府。二十二年(公元 1389 年),朱橚放弃封国而来到凤阳。太祖大怒,想把他迁封到云南去,接着放弃原有打算,让他留住在北京,由他的儿子有燾代管理藩国的事务。建文帝(公元 1399—1402 年)初年,因朱橚是燕王的同母兄弟,对他有所疑忌。朱橚当时确实也有不轨图谋,长史王翰曾几次直言规劝,都没被采纳,于是装疯而离去。朱橚第二个儿子汝南王有燾告发朱橚有非常举动。建文帝派李景隆防守边境,在赴边途中经过开封,突然领兵包围王宫,捉拿朱橚。朱橚逃到蒙化,几个儿子也分别逃到其他地方。自后,又复召他回京城,把他关押起来。明成祖兵出南京称帝后,恢复了他的爵位,加俸禄为五千石。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正月,下诏归还给旧有的封地。朱橚献上颂词九章和佾舞。第二年,入朝晋见,献上驹虞之乐。皇帝很高兴,宴请赏赐丰厚。因开封有黄河水患,要改封他到洛阳去。朱橚说,开封河堤坚固,不要劳烦民力。于是停止

改封。十四年（公元1416年），上疏辞谢皇帝赏赐的开封城税收。十八年（公元1420年）十月，有人告发朱棣谋反。成祖派人调查实有其事。第二年二月，召朱棣到京城，把告发信给他看。朱棣以头叩地承认有死罪的错误。成祖怜悯他，不再加追问。朱棣回归到藩国，把自己的护卫武装还给皇帝。仁宗即位，朱棣每年的俸禄增加到二万石。朱棣喜欢读书学习，擅长词赋，曾写作过《元宫词》一百章。因其封国土地平坦空旷，各种野生植物生长繁茂，考核其中可以供贫民渡荒用的四百多种，绘画成图像，并加文字说明，书名《救荒本草》。专门开辟东书堂为他长子读书的地方，长史刘淳为老师。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逝世。（范楚玉 译）

【原文】

周定王棣，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王。七年，有司请置护卫于杭州。帝曰：“钱塘财赋地，不可。”十一年改封周王，命与燕、楚、齐三王驻凤阳。十四年就藩开封，即宋故宫地为府。二十二年，棣弃其国来凤阳。帝怒，将徙之云南，寻止，使居京师，世子有燬理藩事。二十四年十二月敕归藩。建文初，以棣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棣亦时有异谋，长史王翰数谏不纳，佯狂去。次子汝南王有燬告变。帝使李景隆备边，道出汴，猝围王宫，执棣，窜蒙化，诸子并别徙，已，复召还京，锢之。成祖入南京，复爵，加禄五千石。永乐元年正月诏归旧封，献颂九章及佾舞。明年来朝，献驹虞。帝悦，宴赐甚厚。以汴梁有河患，将改封洛阳。棣言汴堤固，无重劳民力，乃止。十四年疏辞所赐在城税课，十八年十月有告棣反者，帝察之有验。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棣

顿首谢死罪。帝怜之，不复问。棣归国，献还三护卫。仁宗即位，加岁禄至二万石。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以国土夷广，庶草蕃庑，考核其可佐饥馑者四百余种，绘图疏之，名《救荒本草》。辟东书堂以教世子，长史刘淳为之师。洪熙元年薨。

朱载堉传

——《明史》卷一一九

【说明】朱载堉（公元 1536—1611 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谥号端清。祖籍安徽凤阳。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郑恭王朱厚烷的长子，十一岁时册封为郑王世子。精通音律、数学、天文、历法、物理、文学、艺术，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和艺术家。

朱载堉从小就聪颖好学，尤其酷爱音律。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因皇族宗室间内部矛盾和权益斗争，恭王朱厚烷受诬告陷害，被削爵废为庶人而囚禁于凤阳，朱载堉也被除去世子桂冠。他因父亲无故致罪而深以为恨，从此筑小土屋于宫门外，卧睡草茎，独居十九年之久，潜心研究音律、数学、天文等学问。隆庆元年（公元 1567 年），其父昭雪恢复郑恭王爵位，朱载堉也随之复世子冠带。但他生性淡泊，不重地位和享受，辞爵让国，热衷学术研究，终于在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被誉为明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科学和艺术的巨星。

在音律方面，他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即将八度音程分为十二个半音的定律规则，可使相邻二律间的音分差恒等于

100 音分。并用数学方法阐释了十二平均律的原理,从而彻底解决了旋宫变调及和声演奏的问题。他还发明了律管管口校正方法及其计算公式,并为现代音乐家所验证。这些都是世界音乐史上了不起的创举。他的这些成就,使他成为现代乐器定音法的奠基者。

在数学方面,朱载堉首创的“新法密律”(即十二平均律),实际上就是以 $\sqrt[12]{2}$ 为公比的等比数列。他在世界上最早地给出了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而求解其他各项的方法;为了解决繁重的数学演算,最早地应用算盘(珠算)进行开方计算,给出了开方程序和口诀;为了统一历代音高标准,深入研究了度量衡史,考察了历代尺度的变化;最早地找到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方法,用算盘演示了九进位和十进位的小数换算,并归纳出其换算口诀,较西方不同进位制的换算早一百余年。

在天文历法方面,他在研究古代历法和天文观测的基础上,精确地计算了回归年的长度值(每年稍长 0.00000175 日,其精确度超过宋、元时代);精确地测量了北京的地理纬度(为 $40^{\circ}16'$)和地磁偏角(为 $4^{\circ}48'$,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磁偏角的定量记录);编制了两种历法——《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制作简易模具进行天象演示,例如以泥丸进行日月食成因的演示实验,并获得“日大而月小”的科学结论等。

此外,他还精确地测定了水银的密度;研究了音乐史、乐器史,制造了许多乐器,探讨不少乐器的发音规律和物理功能;谱写了大量乐谱、操漫谱、旋宫谱;撰写了不少充满激情的歌词;他还擅长白描画,详尽地设计和描绘了许多舞图

和舞谱，是中国历史上舞谱的集大成者。

朱载堉著有《琴谱》、《律学新说》、《算学新说》、《嘉量算经》、《圆方勾股图解》、《历学新说》、《乐学新说》、《律吕精义》、《醒世词》等，共六十余卷、百万余字。其中大部分收集在他的《乐律全书》中。他的科学成就，于17世纪传至西方，18—19世纪已传遍欧洲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

郑恭王朱厚烷世子朱载堉，爱好学习，又具有刚毅的性格，他的父亲无罪而被诬告入狱为囚，他对此十分气愤和痛恨。于是在王宫的门外用土砌了简陋的房屋，以枯草为席子，独自居住十九年之久。朱厚烷被平反昭雪回到王府后，他才以世子身分回到宫中。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朱厚烷逝世。朱载堉说：“郑恭王宗室的次序，盟津王年龄最大。以前的王朱见潋，既然已封赐了谥号、恢复了爵位，这个爵位应当仍归盟津王为好。”此后他又多次上疏恳求辞去继承郑王之位，但都没有被皇帝批准。礼部大臣说：“朱载堉虽然诚恳执意让位，然而他继承郑恭王爵位已经是第三代了，没有中间更换继承者的理由，应当让朱载堉的儿子朱翊锡继承王位。”朱载堉仍和原来一样执意上奏辞让，于是就由朱祐檣（朱见潋之子）的孙子朱载堉继位，而令朱载堉及其子朱翊锡仍以世子、世孙的地位终身享受俸禄，其后世子孙仍封为东垣王。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正月，朱载堉向皇帝上疏，请其要求皇族宗室的人在应试时都要穿上儒士的服装，无论宫内宫外什么官职，凡考试录用者，都要符合要求，视其才

能、品行而任用。皇帝颁发诏书，同意施行。第二年又向朝廷进献历法中计算岁差的方法，以及他所撰写的《乐律全书》，该书考辨论证详细精确，有其学识的人都很称赞。

朱载堉去世后赐谥号“端清”。崇祯（公元1628—1644年）年间，朱载堉的儿子朱翊钟因犯罪过而被赐死，于是其封国也被取消了。

（赵慧芝 译）

【原文】

〔郑恭王朱厚烷〕世子载堉笃学有致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厚烷还邸，始入宫。万历十九年，厚烷薨。载堉曰：“郑宗之序，盟津为长。前王见蒞，既锡谥复爵矣，爵宜归盟津。”后累疏恳辞。礼臣言：“载堉虽深执让节，然嗣郑王已三世，无中更理，宜以载堉子翊锡嗣。”载堉执奏如初，乃以祐橧之孙载堉嗣，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祿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二十二年正月，载堉上疏，请宗室皆得儒服就试，毋论中外职，中式〔试〕者视才品器使。诏允行。明年又上历算岁差之法，及所著《乐律书》，考辨详确，识者称之。卒谥端清。崇祯中，载堉子翊钟以罪赐死，国除。

吴伯宗传

——《明史》卷一三七

【说明】吴伯宗，江西金溪人，活动于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生卒年代不详。明代天文历算家，参与修《大明历》。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廷对进士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与翰林李翀和回回大师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受诏，组织翻译《明译天文书》和《回回历法》。书成，吴伯宗作序记载其翻译经过。后因其弟荐举不实而降职，卒于官。

吴伯宗，名祐，依字行，江西金溪县人。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的时候，参加朝廷面试，获得第一名。当时正是明朝政府刚刚推行科举制度的时候，皇帝亲自出试题考问，发现伯宗这一人才时很高兴，赏赐给他冠带袍笏，让他当礼部员外郎的官，并参与编撰明朝每年的历书。当时正逢胡惟庸当政，想使人依附自己，伯宗不被其势力所屈服。胡惟庸憎恨他，找个借口将他贬职去凤阳做官。吴伯宗上书给皇帝评论时政，就说胡惟庸专横跋扈，不守国法，不适于让他单独负责一方面工作，如此长期以往必然成为国家的后患。

言辞十分恳切。皇帝看到奏折后，把他召回京都，赏赐给他衣服和金钱。他接受皇帝命令到安南国办事情，圆满完成。回来后任命他担任国子监助教，同时到东宫去讲学，于是他首先陈述做人心要正意要诚的观念。又改任翰林典籍。皇帝出了十道题让他作赋，他拿起笔立即写成，而且用词和内容十分雅洁，皇帝赏赐给他织金锦衣。并封他担任太常司丞，他推辞了。又改封他为国子司业，他再一次推辞。由于惹恼了皇帝，被贬为金县教谕。还未到任，又被任命为翰林检讨官。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升任武英殿大学士。第二年的冬天，其弟吴仲实在三河当知县，推荐人才不确实，他因此而受到牵连，又降为翰林检讨。

伯宗为人表面忠厚温和，然而骨子里却刚烈，不轻易阿附人意，所以屡次遭受挫折。被贬后的第二年，死在任上。吴伯宗考中进士的时候，考试官是宋濂和鲍恂。

（卢莲蓉 译）

【原文】

吴伯宗，名祐，以字行，金溪人。洪武四年，廷试第一。时开科之始，帝亲制策问，得伯宗甚喜，赐冠带袍笏，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己，伯宗不为屈。惟庸衔之，坐事谪居凤阳。上书论时政，因言惟庸专恣不法，不宜独任，久之必为国患。辞甚恺切。帝得奏召还，赐衣钞。奉使安南，称旨。除国子助教，命进讲东宫，首陈正心诚意之说。改翰林典籍。帝制十题命赋，援笔立就，词旨雅洁，赐织金锦衣。除太常司丞，辞。改国子司业，又辞。忤旨，贬金县教谕。未至，召还为翰林检讨。十五年进武英

殿大学士。明年冬，坐弟仲实为三河知县荐举不实，词连伯宗，降检讨。

伯宗为人温厚，然内刚，不苟嬖阿，故屡蹶。逾年，卒于官。伯宗成进士，考试官则宋濂、鲍恂也。

胡 俨 传

——《明史》卷一四七

【说明】胡俨，字若思，南昌人。生卒年未详。明初著名学者。他从小好学上进，博览群书，学识渊广，精通天文、历法、地理、医学等学问。他生长的时代，正是朱明王朝初建时期。太祖一方面取消宰相制，加强中央集权，使皇权至上；另一方面也采取均平赋役、兴修水利、推行屯田、抑制豪绅贪吏等措施，使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较长的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承平时期。胡俨在这种环境下，得以专心致力教育和著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胡俨在科学上的成就在于：他任桐城知县时，领导兴建水利工程，引水灌溉农田。执掌明王朝最高学府国子监二十多年，破除陈规陋习，发展教育事业，造就了大批人才；他任《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等巨著的重修和编撰的总裁官，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胡俨治学严谨，注重操守，清廉俭朴，为人忠厚，是难得的大家鸿儒。

胡俨，字若思，南昌人。他从小好学，对天文、地理、乐

律、历法、医学、占卜等方面的书都很爱研读。洪武（公元1368—1398年）年间，他考取举人，被授华亭教谕，能克尽师道。母亲去世后，他服丧期满便奉派到长垣。他提出要求，在离家近一些的地方为官，以便照顾长辈和家庭。于是，他被改派到馀干。作为掌管教育的官吏，允许就近作官是从胡俨开始的。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胡俨被委任为桐城知县。他兴建水利工程，引来桐陂水以灌溉农田，为民谋利。桐城出现了老虎伤人的事。胡俨斋沐以祭告神灵，老虎便逃遁了。桐城人祭祀他于朱邑祠。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副都御史练子宁向朝廷举荐道：“胡俨饱学明理，可以通达天人之际。他足智多谋，可以运筹帷幄。”朝廷将胡俨召进京城时，燕王的军队已打过了长江。

明成祖即位后，下了一道命令：“听说胡俨懂得天文，让钦天监考考他。”钦天监对胡俨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回奏明成祖说他确实懂得天文学、气象学。不久，由于解缙的举荐，胡俨被授以翰林检讨，与解缙等人一起在文渊阁任职。后来，又任侍讲，晋升为左庶子。父亲亡故后，胡俨服丧期满又出来作官。他仍在文渊阁任职，接受皇帝的垂询，提供咨询，但他常常不抢先发表意见，显得忠厚诚朴。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九月，胡俨任国子监祭酒，就不再参予政务了。当时，国子监订了些很严厉的规矩，如将借故退学的国子生发往边疆服役。胡俨上任后，奏经皇帝批准，把这类规定废除了。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皇帝到北京，把胡俨召到行宫。次年，明成祖北征，命胡俨以祭酒兼侍讲的身份，执掌翰林院，

同时辅佐皇太孙留守北京。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即明成祖迁都北京那年），胡俨又改任北京国子监祭酒。

当时，国家统一，承平时期已长达五十年之久。皇帝得以在国内修明政治，大兴教化，对偏远的地方则实行安抚、整治，公卿大夫们都是些满腹经纶、彬彬有礼的文人。胡俨是当时文坛上一位老成博学的大文豪，朝廷许多重要著作大都出自他手。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时，他都任总裁官。他在最高学府任职二十多年，总是率先垂范，成为人们学习的楷模。明仁宗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他因病请求退休。仁宗颁布命令嘉奖他的劳绩，晋升为太子宾客，仍兼任祭酒，还让他的子孙也作了官。明宣宗即位，召见胡俨，任他为礼部侍郎，他辞谢后返回家乡。他在家住了二十年，四方的大官重臣都尊他为老师。他与他们的交往中，却很少谈及自己。他淡泊明志，从不追名逐利，节衣缩食，十分俭朴，但求温饱而已。以前，担任湖广主考官时，看到杨溥的文章，他十分惊讶，在文章上批道：“定能像董仲舒说一样正道直言，绝不会如公孙弘一样逢迎巧言。”大家认为，胡俨是一位慧眼识才的长者。正统八年（公元1444年）八月胡俨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赞说：明朝初年不设宰相，由六部分掌权力。明成祖时，才命文臣主持文渊阁，处理政务。仁宗和宣宗都沿用了这个制度。而且，文渊阁的权势日益膨胀，实际上行使了宰相的职权。解缙为首的五大臣，是最先入阁的文士。处在这样的权重而机密的位置上，一定要保持一个公正的态度，更要深谋远虑，言行都不可轻率。解缙年轻气盛，才高志大，胸怀

治国韬略。太祖让他归乡潜心学习十年，对他可谓爱护备至了。他常受到毁谤，难得善始善终，这当然也不能说全是那些嫉贤害能之辈造成的。黄淮的功劳在于他能很尽心地辅佐君王，胡广和金幼孜紧随皇帝很有劳绩。而胡俨的功绩则在于他长期从事教育和著述。可以看出，这些大臣都是谨慎勤劳，和衷共事，事事都能尽忠报国，并不是仅仅因为他们学问渊博著述精深而造就功业的。（刘荣汉 译）

【原文】

胡俨，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学，于天文、地理、律历、医卜无不究览。洪武中以举人授华亭教谕，能以师道自任。母忧，服除，改长垣，乞便地就养，复改馀干，学官许乞便地自俨始。

建文元年荐授桐城知县。凿桐陂水，溉田为民利。县有虎伤人。俨斋沐告于神，虎遁去。桐人祀之朱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练子宁荐于朝曰：“俨学足达天人，智足资帷幄。”比召至，燕师已渡江。

成祖即位，曰：“俨知天文，其令钦天监试。”既试，奏俨实通象纬，气候之学。寻又以解缙荐，授翰林检讨，与缙等俱直文渊阁，迁侍讲，进左庶子。父丧，起复。俨在阁，承顾问，尝不欲先人，然少戇。永乐二年九月拜国子监祭酒，遂不予机务。时用法严峻，国子生托事告归者坐戍边。俨至，即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俨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讲，掌翰林院事，辅皇太孙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国子监祭酒。

当是时，海内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内兴礼乐，外怀要

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学之士。俨馆阁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天下图志》皆充总裁官。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师法。洪熙改元，以疾乞休，仁宗赐敕奖劳，进太子宾客，仍兼祭酒。致仕，复其子孙。

宣宗即位，以礼部侍郎召，辞归。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师礼。俨与言，未尝及私。自处淡泊，岁时衣食才给。初为湖广考官，得杨溥文，大异之，题其上曰：“必能为董子之正言，而不为公孙之阿曲。”世以为知人。正统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赞曰：明初罢丞相，分事权于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渊阁，予机务。沿及仁、宣，而阁权日重，实行丞相事。解缙以下五人，则词林之最初入阁者也。夫处禁密之地，必以公正自持，而尤贵于厚重不泄。缙少年高才，自负匡济大略，太祖俾十年进学，爱之深矣。彼其动辄得谤，不克令终，夫岂尽嫉贤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欤。黄淮功在辅导，胡广、金幼孜劳著扈从，胡俨久于国学。观诸臣从容密勿，随事纳忠，固非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已也。

徐有贞传

——《明史》卷一七一

【说明】徐有贞，原名理，后因政坛不得志而易名为有贞，字元玉，吴地（今江苏）人。他才华横溢，精通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善观天象，笃信天命。在治理黄河水患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他生活在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多事之秋。他对名利看得极重，一生都在刻意追求。明宣德八年（公元1434年）考取进士后，只做到编修一类小官。十几年后好不容易晋升为侍讲，却又因主张南迁险些丢官。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徐有贞奉命督治黄河水患。他深入实地考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力排众议，躬亲施行，仅用五百五十五天就把七年治理不成的水患治好了。充分展示了他的学识渊博，机断果敢。他因治水有功而获重赏，升任左副都御史。

徐有贞积极参与权贵宦官们的政争，数度大起大落，最终被排除政坛，抱憾而死。在1457年明英宗复辟的军事政变中，徐有贞扮演了主要角色，他的政治胆略和才干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段。他虽权倾当朝，名噪一时，但他却位高而骄固。终于在权臣宦官的夹击下，很

快沦为阶下囚。他虽大难不死，但终不得大用，满腹经纶未得施展。

徐有贞对马士权赖婚一事，充分说明他追名逐利，却不注重操守德行。

徐有贞，字元玉，原名理，吴地（今江苏）人。明宣德八年（公元1434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之职。他身材矮小，精明强悍，足智多谋，刻意追求功名利禄。大凡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等类书籍，他无不深究谙熟。

当时，天下已安定了很长时间，边防有所疏忽，而西南部却常有战事，徐理很为担忧。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他上书提出有关军事的五条意见。英宗看了大表赞同，却并未付诸实施。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他晋升为侍讲。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秋季，火星进入南斗。徐理私下对朋友刘溥说：“灾祸快来了。”他急急忙忙把妻儿送回南方。不久，发生了英宗被俘的土木堡事变。郕王把大臣们召来商议对策。徐理大声说：“我观察天象，又仔细核对了历数，看来上天不再庇佑我们了，唯有南迁才能避难。”太监金英厉声喝斥他，大臣胡濙和陈循都说这是万不可行的。兵部侍郎于谦说：“主张南迁的人，应当问斩。”徐理十分沮丧，不敢再说南迁的事了。

明景帝即位后，派了十五位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去招兵，徐理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彰德。敌人退兵以后，他奉召回京，仍任原职。徐理念念不忘升官。但是，自提议南迁遭到大家斥

责讪笑之后，很久都得不到提拔。为了升官，他特地送陈循一条玉带，又引用占星术对陈说：“你佩带了这条玉带，一定会吉祥发达的。”没有多久，陈循果然加封了少保，非常高兴，常常在景帝面前保荐徐理。然而在当时用人与否多半取决于谦。徐理便求于谦的门客去游说于谦，想谋得国子祭酒的职位。于谦在景帝面前替徐理说话。景帝说：“说的是那个提议南迁的徐理吗？他为人险诈，将会把国子生们的心术都搞坏了。”徐理不知道于谦推荐了他，反以为于谦败坏他，因而深深怨恨于谦。陈循劝徐理更名，他把名字改作有贞。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徐有贞升任右谕德。黄河在沙湾决口已有七年，前后治理多次都未成功。大臣们一致举荐徐有贞，景帝将他升为左佥都御史，派他去治河。徐有贞到张秋一带察看水情以后，向景帝提出治水的三条办法：安置水闸，开凿支河，疏浚运河。景帝批准了这些办法。但是，办理漕运的督漕都御史王愷以漕道淤浅漕运船只不便航行为理由，请求尽快堵塞决口。景帝命令徐有贞照王愷的意见，把决口堵起来。徐有贞从实情出发，权衡利害得失后，坚持自己的意见，向景帝奏道：“临清一带河水浅是原来就如此，并不是因为决口没堵才造成的。管漕运的大臣只知道堵塞决口刻不容缓，不知道即便冬季堵住了，来年春季又会决口，这是徒劳无益的。我不敢这样急功近利。”景帝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徐有贞召集了大量民夫，亲自督率。从张秋开始修渠建闸，把黄河和沁水连起来。在支流不通畅的地方，修了九座拦河坝，以抬高水位，使支流通畅。还筑了更大的拦河坝，用土石、竹木等材料建成水闸。历时五百五十五天完

成了全部工程。他将渠命名为“广济”，将闸命名为“通源”。在工程尚未竣工的时候，景帝为漕运一事很为焦急。工部尚书江渊等人奏请派中书带领文武大臣督领京都的卫戍军队五万人去帮助整治，限期三个月必须完工。徐有贞得知后奏明景帝：“京都的卫戍军队一旦开赴工地，每天的花费难以计数。如果遇到河水上涨，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事也作不成。现在，决口都堵好了，溃决的河堤也修好了，剩下的事情用沿河的民夫就能做好了。”原议便撤销了。工程完工后，徐有贞奉诏回京，参与内阁事务。景帝还重重地奖赏了他。后来，他又出京巡视漕河。济宁等十三个州县的河夫都拖欠了官府的钱役和摊派，官府又催得很急，他便替河夫们说话，使官府把这些钱役、摊派都免了。景泰七年秋天，山东发生大水灾，许多河堤被毁，只有徐有贞建筑的河堤完好无损。徐有贞还修复了旧堤决口，自临清至济宁还安置了减水闸，水患从此消弭。回到京城，景帝召见他，厚厚给予奖赏，并将他提升为左副都御史。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帝身体不适。石亨、张辄等人谋划要迎立太上皇，他们把这个打算告诉太常卿许彬。许彬说：“这是流芳百世的大功业。我老了，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徐元玉足智多谋，你们可以和他商议。”石亨等当夜就到徐有贞家。徐有贞听到这件事很高兴，他说：“这件事必须让内宫知道。”张辄说：“可以秘密地通报。”于是，就让太监曹吉祥将他们的谋划禀告了太后。一天夜里，石亨等人又在徐有贞家聚会。徐有贞爬上屋顶去观察天象，然后急匆匆跑下来对大家说：“时机已经到了，切不可坐失良机。”当

时，正值边境不安宁，徐有贞就让张辄借口防备发生不测，领兵进入皇宫。石亨掌管着宫门钥匙，四更天，他打开长安门，把张辄的军队放进去。然后，又关闭宫门，以防止宫外别的军队进去。当时，天色阴晦，石亨、张辄都感到很惶恐。他们问徐有贞：“这事能成功吗？”徐有贞很肯定地说一定会成功，并催促他们赶快行动。到了皇宫南部，宫门紧紧关着，他们破墙而入。太上皇就着灯光独自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徐有贞等人马上跪伏在地上请太上皇复位，还把皇帝乘坐的大轿也叫了进来。士兵们惧怖异常，连轿子也抬不起来，徐有贞等人上前帮助，抬着太上皇才得以离开。这时，天空突然放晴，星月当空，太上皇一一问了徐有贞等人的姓名。他们一行来到东华门，看管宫门的官吏拒不放他们进去。太上皇对门官说：“我是太上皇。”说完便转身另寻他路。太上皇登上奉天门，徐有贞等人着便服朝贺，高呼万岁。

景帝次日天亮便要登朝，群臣都在阙下等候。忽然听到宫殿内有呼喊吵闹的声音，大家惊愕不已。过了一会，各处宫门都打开了，徐有贞出来向君臣宣告：“太上皇已经复位了。”他催促大臣们赶快进去朝贺。当天，太上皇任命徐有贞兼学士，成为内阁成员，参与大政事务。次日，又加封兵部尚书。徐有贞对石亨说：“我如果得到加官进爵，一定追随你。”石亨在复位后的英宗面前替徐说了许多好话，英宗便封徐有贞为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执掌文渊阁职事，还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俸禄一千一百石，世袭锦衣指挥使，并颁发诰封文书。徐有贞得势以后，便诬陷少保于谦和大学士王文，并杀害了他们。原在内阁任职的大臣大都遭他

排挤。连陈循这样向来对徐有贞有恩德的人，都不能幸免。朝中大权都落入徐有贞手中，朝野上下对他侧目而视，畏惧不已。而他却更加横行无忌，动不动就去见英宗，英宗也对他十分信任，重要的事都叫他去处理。

徐有贞虽已得宠，却总觉得还不如曹吉祥、石亨。他看出英宗对这两个庸才并无厌烦之意，便从中离间，说了他们如何贪婪横行等等坏话，英宗也慢慢听进去了。御史杨瑄上奏章弹劾石亨、曹吉祥霸占民田。英宗向徐有贞、李贤核实，他们异口同声说杨瑄说的是实情。英宗下诏褒奖了杨瑄。石亨、曹吉祥恼羞成怒，日夜都在谋划，罗织罪名陷害徐有贞。当时，英宗正对徐有贞百般信赖，恩宠有加，常常屏退左右和他单独密谈。曹吉祥让小太监偷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又故意转而密告给英宗。英宗十分惊讶问道：“这些话是从哪里听来的？”曹吉祥答道：“是徐有贞告诉我的。你们哪一天谈了哪件事，外面没有不知道的。”从此，英宗开始疏远徐有贞。恰在这时，御史张鹏等人正打算举发石亨别的罪行，还没来得及上奏，就被给事中王铉偷偷告诉了石亨、曹吉祥。于是，石、曹二人便跪到英宗面前去哭诉，说内阁已被御史们操纵了。英宗听信谗言下令将御史们投入监牢，还把徐有贞、李贤也抓了起来。突然，雷电冰雹交加，狂风大作，摧林折木。英宗忽然有所感悟，一反石亨的意愿，把徐有贞放了出来，并命他为广东参政。

石亨等人对徐有贞的怨恨有增无减，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让人写匿名信去责骂皇上，反过来说这是徐有贞对皇上怀恨在心，让他的门客马士权干的。英宗听信了他们的诬告，就

下令追捕徐有贞，在他赴任途经德州时抓住他，连同马士权一起作为钦犯下了大狱。经过严刑拷打，却没有得到罪证。适逢承天门发生火灾，徐有贞得以赦免。石亨和曹吉祥对徐有贞获释深感不安，对英宗说：“徐有贞自己撰写的武功伯卷上有‘继承大禹治水，建树了极大的功业’一类的话，又自己选择武功为封邑。大禹曾经接受禅让而作了皇帝，‘武功’是曹操最早的封号。看来，徐有贞是心存非份之想的。”英宗向司法重臣征询意见，刑部侍郎刘广衡等人回奏说，应该把徐有贞斩首于闹市，且暴尸街头示众。英宗只是把徐有贞削为庶民，流放到金齿去了。

石亨罪行败露，死在狱中，英宗不慌不忙地对李贤、王翱说：“徐有贞有什么大罪，不过是石亨他们陷害他，把他放回故里吧。”明宪宗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徐有贞恢复了仕宦的身份，在家赋闲。他既已获释回归故里，就总是希望皇帝再召出去做官。他常常仰观天象，说将星就在吴地，他也因此更加自负。他总是把铁鞭带在身边，经常挥舞操习。当他听说韩雍征讨两广战功卓著时，就扔掉铁鞭叹息道：“这小子也应了天象吗？”从此，他浪迹天涯，十几年后去世。

徐有贞刚出狱的时候，拍着马士权的背说：“你真是一个侠骨义气的人，以后我一定把一个女儿许配给你。”他从金齿流放归来，马士权经常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履行诺言，而他却绝口不提这件事了。马士权后来离他而去，终身都不再提及这件事了。世人因此而看不起徐有贞，却十分敬重马士权。

（刘荣汉 译）

【原文】

徐有贞，字元玉，初名瑄，吴人。宣德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为人短小精悍，多智数，喜功名。凡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

时承平既久，边备媮惰，而西南用兵不息，瑄以为忧。正统七年疏陈兵政五事。帝善之而不能用。十二年进侍讲。十四年秋，荧惑入南斗。瑄私语友人刘溥曰：“祸不远矣”，亟命妻子南还。及土木难作，郕王召廷臣问计。瑄大言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太监金英叱之，胡濙、陈循咸执不可。兵部侍郎于谦曰：“言南迁者，可斩也。”瑄大沮，不敢复言。

景帝即位，遣科道官十五人募兵于外，瑄行监察御史事，往彰德。寇退，召还，仍故官。瑄急于进取，自创南迁议为内廷讪笑，久不得迁。因遗陈循玉带，且用星术，言“公带将玉矣”。无何，循果加少保，大喜，因屡荐之。而是时用人多决于少保于谦。瑄属谦门下士游说，求国子祭酒。谦为言于帝，帝曰：“此议南迁徐瑄邪？为人倾危，将坏诸生心术。”瑄不知谦之荐之也，以为沮己，深怨谦。循劝瑄改名，因名有贞。

景泰三年迁右谕德。河决沙湾七载，前后治者皆无功。廷臣共举有贞，乃擢左佾都御史，治之。至张秋，相度水势，条上三策：一置水门，一开支河，一濬运河。议既定，督漕都御史王竑以漕渠淤浅滞运艘，请急塞决口。帝敕有贞如恇议。有贞守便宜，言：“临清河浅，旧矣，非因决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决口为急，不知秋冬虽塞，来春必复决，徒劳无益。臣

不敢邀近功。”诏从其言。有贞於是大集民夫，躬亲督率，治渠建闸，起张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顺者，为九堰障之。更筑大堰，槌以水门，阅五百五十五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广济”，闸曰“通源”。方工之未成也，帝以转漕为急，工部尚书江渊等请遣中书偕文武大臣督京军五万人往助役，期三月毕工。有贞言：“京军一出，日费不貲，遇涨则束手坐视，无所施力。今泄口已合，决堤已坚，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议遂寝。事竣，召还，佐院事。帝厚劳之。复出巡视漕河。济宁十三州县河夫多负官马及他杂办，所司趣之亟，有贞为言免之。七年秋，山东大水，河堤多坏，惟有贞所筑如故。有贞乃修旧堤决口，自临清抵济宁，各置减水闸，水患悉平。还朝，帝召见，奖劳有加，进左副都御史。

八年正月，景帝不豫。石亨、张辄等谋迎上皇，以告太常卿许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无能为。徐元玉善奇策，盖与图之。”亨即夜至有贞家。闻之，大喜，曰：“须令南城知此意。”辄曰：“阴达之矣。”令太监曹吉祥入白太后。辛巳夜，诸人复会有贞所。有贞升屋览乾象，亟下曰：“时至矣，勿失。”时方有边警，有贞令辄诡言备非常，勒兵入大内。亨掌门钥，夜四鼓，开长安门纳之。既入，复闭以遏外兵。时天色晦冥，亨、辄皆惶惑，谓有贞曰：“事当济否？”有贞大言必济，趣之行。既薄南城，门锢，毁墙以入。上皇灯下独出问故。有贞等俯伏请登位，乃呼进犂。兵士惶惧不能举，有贞率诸人助挽以行。星月忽开朗，上皇各问诸人姓名。至东华门，门者拒弗纳，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反走。乃升奉天门，有贞等常服谒贺，呼万岁。

景帝明当视朝，群臣咸待漏阙下。忽闻殿中呼噪声，方惊愕。俄诸门毕启，有贞出号于众曰：“太上皇帝复位矣。”趣入贺。即日命有贞兼学士，入内阁，参予机务。明日加兵部尚书。有贞谓亨曰：“愿得冠侧注从兄后。”亨为言于帝，封武功伯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赐号奉天翊卫推诚宣力守正文臣，禄千一百石，世锦衣指挥使，给诰券。有贞遂诬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杀之。内阁诸臣斥逐略尽。陈循素有德于有贞，亦弗救也。事权尽归有贞，中外咸侧目。而有贞愈益发舒，进见无时，帝亦倾心委任。

有贞既得志，则思自异于曹、石。窥帝于二人不能无厌色，乃稍稍裁之，且微言其贪横状，帝亦为之动。御史杨瑄奏劾亨、吉祥侵占民田。帝问有贞及李贤，皆对如瑄奏。有诏奖瑄。亨、吉祥大怨恨，日夜谋搆有贞。帝方眷有贞，时屏人密语。吉祥令小竖窃听得之，故泄之帝。帝惊问曰：“安所受此语？”对曰：“受之有贞，某日语某事，外间无弗闻。”帝自是疏有贞。会御史张鹏等欲纠亨他罪，未上，而给事中王铉泄之亨、吉祥。二人乃泣诉于帝，谓内阁实主之。遂下诸御史狱，并逮系有贞及李贤。忽雷霆交作，大风折木。帝感悟，重违亨意，乃释有贞出为广东参政。

亨等憾未已，必欲杀之。令人投匿名书，指斥乘輿，云有贞怨望，使其客马士权者为之。遂追执有贞于德州，并士权下诏狱，榜治无验。会承天门灾，肆赦。亨、吉祥虑有贞见释，言于帝曰：“有贞自撰武功伯券辞云‘纘禹成功’，又自择封邑武功。禹受禅为帝，武功者曹操始封也，有贞志图非望。”帝出以示法司，邢部侍郎刘广衡等奏当弃市。诏徒金

齿为民。

亨败，帝从容谓李贤、王翱曰：“徐有贞何大罪，为石亨辈所陷耳，其释归田里。”成化初，复冠带闲住。有贞既释归，犹冀帝复召，时时仰观天象，谓将星在吴，益自负。常以铁鞭自随，数起舞。及闻韩雍征两广有功，乃掷鞭太息曰：“孺子亦应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间，十余年乃卒。

有贞初出狱时，拊士权背曰：“子，义士也，他日一女相托。”金齿归，士权时往候之，绝不及婚事。士权辞去，终身不言其事，人以是薄有贞而重士权。

王廷相传

——《明史》卷一九四

【说明】王廷相（公元 1476—1544 年），字子衡，号俊川，又号秉衡。河南仪封人。明代著名学者。弘治十五年（公元 1502 年）进士，历任兵科给事中、都察院御史、山东右布政使、兵部尚书兼前官等职，后因郭勋案牵连而被罢斥为民。王廷相学识渊博，自幼即以文才出名，他对经学尤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星象、历法、地图、音乐、上古典籍、宋代理学等，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王廷相在他所著的《慎言·道华篇》中提出了类似遗传学的“气种说”。他在该书中写道：“人有人之种，物有物之种，各个具足，不相凌犯，不相假借。”他还指出：“万物巨细刚柔，各异其才，声色臭味，各殊其性，通千古而不变者，气种之有定也。”这里的“气种”，是指不同生物性状遗传稳定现象的物质基础，对人类遗传过程中出现的“人有不肖其父，则肖其母，数世之后，必有与祖同其体貌者”的现象，他解释为这是“气种之复其本也”。王廷相在这里所讲的“气种”，已经很接近现代生物学中所说的遗传因素。

王廷相，字子衡，明代仪封人。自幼时即以有文才而出名。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任兵科给事中。后因居丧而离职。正德初年（公元1506年），他服丧结束后进京，被刘瑾告发治罪，贬为亳州判官，后迁转为高淳知县。

再后，王廷相被召回任御史，他上奏说：“到处发生叛乱，而将帅们不能平息。将领的权力小，则不能防御敌人；军机不严密，则不能扼守险要之地。叛兵所到之处，群众酒肉款待，有的甚至亲自为叛军服务效劳。叛军有生杀权，而正式的将帅反而没有这样的权力，所以士卒兵勇不听命令。应相机处置，凡后退者杀。河南地势平坦开阔，叛军易于奔跑流窜，山西地势险要，也让他们肆然深入其内，这是将帅的罪责。假若将军队布防于黄河沿线，使叛军不能向西，分兵把守井陉、天井，使叛军不能向东，而由大将率大部队威逼进攻，那么，叛军就会进退无路，可不战而将他们擒获。”皇帝严令各位大臣，依照廷相的建议执行。事后，廷相任陕西巡按，裁撤了镇守中官廖堂，而被诬陷。这时他已改任督察京畿地区教育，被奉诏逮捕下狱，贬为赣榆丞。此后几经转折，任四川佥事、山东副使，都是负责教育工作。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因工作成绩卓著，而升任山东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四川，平息了芒部沙保叛乱。即召回负责都察院事务。历任兵部左、右侍郎，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予机密。最初皇帝曾下令省去进贡用快船，守备太监赖义又要求增设，廷相建议根据货物轻重而定船数，而大量裁减宣德以后不符合祖先规定的船只。龙江、大

胜、新江、浦子、江淮五关的守臣借稽察之机而大获私利，安庆、九江利用春秋检查而索取贿赂，王廷相建议将他们都撤掉。草场、芦的税银大多为中官杨奇、卜春与魏国公徐鹏举所侵吞，根据廷相的要求，逮捕了杨奇、卜春，剥夺了徐鹏举的俸禄。三月，廷相任左都御史，上奏说南京守备权力太大，不应让魏国公世代居官。给事中曾忬也有类似建议，于是解除了徐鹏举的兵权。

二年后，王廷相被加授兵部尚书兼前官，负责团营，同时仍负责都察院事。两次考察合格后，加任太子太保。京都居民偷盗万寿山上的陵树，巡按杨绍芳援引盗窃大祀神御物的律文，将其斩首。王廷相说：“大祀神御物指神御在内的祭礼器皿、帷帐而说的。律文规定，偷盗陵墓树木的人，只杖责一百下，服刑三年。现在舍去本律不用，这种处罚不合理。”因违背皇帝的意旨，而被罚去一个月的俸禄。皇帝准备去承天，廷相与各位大臣劝阻，但皇帝不听。跟随皇帝去承天回来后，己满九年，而加封为太子太保。雷电击震奉先殿，廷相说：“人间事项和睦顺利之后，天上道义也就自然顺了，大臣遵守法纪之后，小官吏也就廉洁了，现在廉洁不存，贿赂盛行，过去利用晚上天黑干利己的私人勾当，现在却光天化日下抢掠。大臣贪污，小官吏便全行仿效，京官贪婪，那么外边任职的官员便有恃无恐。我负责法规纪律，不能根除这些弊病，请求先将我罢免。”廷相用这些暗刺尚书严嵩、张璁等人。皇帝只是挽留他留职而已。

最初，王廷相请求以规定的六条标准考察任免御史。皇帝令他上奏他所未说完的想法，以编成规章制度。于是他采

用张孚敬、汪𨾏所上奏的意见，以及新的规定共十五事上奏皇帝。皇帝让全部按照执行。到皇帝祖庙受到灾难，皇帝下诏书反省时，因之对廷相说：“御史巡视各地职责极其重大。你总管督察院事已有多年，自从制定六条后，没有依律罢撤一个人，你应深刻反省。”王廷相非常惶恐的称谢。

王廷相掌管都察时间很长，有很高的权威。负责团营时，与郭勋共事，往来其间没有什么做为。给事中李凤来等人议论权贵侵夺民利，奏章转到都察院，廷相令五城御史核实，迟缓了四十多天，给事中章允贤于是弹劾王廷相徇私情而慢待上级指示。皇帝正准备责问廷相，廷相已来向皇帝报告御史所核实的情况，其中郭勋侵贪最多。皇帝命令郭勋自己检讨报告，于是弹劾郭勋的人群涌而起。郭勋又稽留皇帝命令而惹怒皇帝，便被逮捕下狱。同时皇帝遣责廷相与郭勋结为朋党，而将廷相削职为民。三年后，廷相去世。

王廷相知识渊博好发议论，以治经学著称。对于星历、輿图、乐律、河图、洛书以及周、邵、程、张等人的著作，都有评论，但他的学说却比较乖僻。隆庆初年（公元1567年），恢复官职，追赠为少保，谥号肃敏。（赵荣译）

【原文】

王廷相，字子衡，仪封人。幼有文名。登弘治十五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兵科给事中。以忧去。正德初，服阙至京。刘瑾中以罪，谪亳州判官，量移高淳知县。

召为御史，疏言：“大盗四起，将帅未能平。由将权轻，不能御敌，兵机疏，不能扼险也。盗贼所至，乡民奉牛酒，甚者效力。盗有生杀权，而将帅反无之，故兵不用命。宜假

便宜，退却者必斩。河南地平旷，贼易奔，山西地险阻，亦纵深入，将帅罪也。若陈兵黄河之津，使不得西，分扼井陘，天井，使不得东，而主将以大军蹙之，则贼进退皆穷，可不战擒矣。”帝切责总督诸臣，悉从其议。己，出按陕西，裁拟镇守中官廖堂，被诬。时已改督京畿学校。逮系诏狱，谪赣榆丞。屡迁四川佥事、山东副使，皆提督学校。

嘉靖二年举治行卓异，再迁山东右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巡抚四川，讨平芒部贼沙保。寻召理院事。历兵部左、右侍郎，迁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初有诏，省进贡快船。守备太监赖义复求增，廷相请酌物轻重以定船数，而大减宣德以后传旨非祖制者。龙江、大胜、新江、浦子、江淮五关守臣藉稽查权利，安庆、九江藉春秋阅视索贿，廷相皆请革之。草场、芦课银率为中官杨奇、卜春，及魏国公徐鹏举所侵蚀。以廷相请，逮问奇、春，夺鹏举禄。三月入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备权太重，不宜令魏国世官。给事中曾忬亦言之，遂解鹏举兵柄。

居二年，加兵部尚书兼前官，提督团营，仍理院事。两考满，加太子少保。畿民盗天寿山陵树，巡按杨绍芳引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内祭器帷帐之物而言。律文盗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忬旨，罚俸一月。帝将幸承天，廷相与诸大臣谏，不纳。扈从还，以九年满，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后天道顺，大臣法而后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贿赂盛行，先朝犹暮夜之私，而今则白日之攫。大臣污则小臣悉效，京官贪则外臣无畏。臣职宪纪，不能绝其弊，乞先

罢斥。”用以刺尚书严嵩、张璪辈。帝但谕留而已。

初，廷相请经六条考察差还御史。帝令疏其所未尽，编之宪纲。乃取张孚敬、汪𤟇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进，悉允行之。及九庙灾，下诏修省。因敕廷相曰：“御史巡方职甚重。卿总宪有年，自定六条后，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谢。

廷相掌内台最久，有威重。督团营，与郭勋共事，逡巡其间，不能有所振飭。给事中李凤来等论权贵夺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核实，迟四十余日，给事中章允贤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诘责，而廷相以御史所核闻，惟郭勋侵最多。帝令勋自奏，于是劾勋者群起。勋复以领敕稽留触帝怒，下狱。责廷相朋比阿党，斥为民。越三年卒。

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洛书及周、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隆庆初，复官，赠少保，谥肃敏。

唐顺之传

——《明史》卷二〇五

【说明】唐顺之（公元1507—1560年），字应德，一字义修。江苏武进人。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会试第一。明代文学家和科学家。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唐顺之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寇于海上。升右佾都御史，巡抚凤阳，至通州（今江苏南通）去世。崇祯时追谥襄文。学者称“荆川先生”。

他是明代重要学术流派唐宋派代表。其文论本主张在形式上要符合唐、宋文的“开阖首尾经纬错综之法”，对文章内容，则始终要求以儒家“六艺”为指归。他的文章实践了自己的主张，文风简雅清深，间用口语，不受形式束缚。《明史》说唐顺之文章“洵洋纡折，有大家风”。他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等皆有深入研究和著述。对古今诸多书籍加以剖析补充，按类汇集。

唐顺之著作有《荆川先生文集》十七卷；还有《右编》四十卷、《史纂左编》一二四卷、《两汉解疑》二卷、《武编》十卷、《南北奉侠集》二卷、《荆川稗编》一二〇卷。近代林纾辑有《唐荆川集》，是较通行的唐顺之选集。

《武编》是唐顺之集古代兵书的大成之作，全书分前、后两集，共有十二卷一百八十九门。单前集就引用《武经七书》、《太白阴经》、《虎铃经》、《武经总要》等历代兵书四十余种，详细介绍各种兵法战略，各种武器和军用器械等。后集介绍古代治军用兵的典型事例，是历代用兵实践的总结。其中第五、六两卷，主要叙述各种兵器和军用器械的形制、使用和制造技术，如详细介绍了历代常备的冷兵器、攻守城池器械、特种武器〔如水底雷、飞空神砂火（即往复式火箭）等〕、管形火器（如鸟铳、千字铳、百步火龙、飞悬神铳等）、各种战车（如双轮屏风车、如意车、轻便战车等）战船等的制造和用法。并详细介绍了制造兵器的钢铁产地、冶炼技术、制造工艺、产品质量以及各种火药的配方、制造理论和技术等。因此，《武编》是研究古代军事史和兵器科技史的重要著作。

唐顺之，字应德，江苏省武进人。祖父名贵，曾任户科给事中。父亲唐宝，任永州知府。顺之生下来时就有超常的天赋。长大成人后，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二十三岁时，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的会试中得了第一，改任翰林院庶吉士。主考官张璁厌恶进士出身的翰林，下令将庶吉士一律调离翰林任其它职务，但他唯独想让唐顺之留下。唐顺之坚决拒绝，于是被调任为兵部主事。他借口有病，辞职回了家。过了很长时间后，他被任命为吏部官员。

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的秋天，皇帝下令选派京城官员担任翰林之职，唐顺之由此改任翰林院编修，负责编校

几朝的实录。当任务快要完工时，唐顺之又一次声称有病，想请假回家，张璁扣下了他的请求报告，没有给以答复。有人说唐顺之这么做是想远离张璁，张璁怒火中烧，便替皇帝草拟文告，让唐顺之依照吏部主事的待遇离职回家，永远不再录用。到了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的时候，朝廷选任太子宫官员，于是起用了过去的官员兼任春坊右司谏。唐顺之与罗洪先、赵时春因请求朝见太子，再次被撤职罢免，遣返回乡。唐顺之在阳羨山中选择了一块地方建屋隐居，读了十几年书。尽管朝廷内外很多人都推荐唐顺之，但均没有结果。

当倭寇侵扰、蹂躏大江南北的时候，赵文华出任军队统帅，他向皇帝上书，推荐唐顺之。唐顺之被起用为南京兵部主事。但唐顺之因父亲病故，丧期未满，不能出征。于是朝廷特令免丧，任命他为职方员外郎，升做郎中。他离开京城到蓟镇核查兵籍，回来时报告，蓟镇兵员短缺，少三万多人，现有的兵也不能打仗，因此他给皇帝写奏章，提出九项建议。由于这个原因，蓟镇总督王忬及下属都受到降级处分。

不久，唐顺之奉命前往南畿、浙江统帅军队，他与胡宗宪一起商议抗击倭寇。唐顺之认为对付倭寇最好的办法是应该把他们阻截在海外，假如放任倭寇登上陆地，那么，内陆就会遭到践踏、侵害。于是他亲自乘船在海上航行，从江阴直抵蛟门，一昼夜行了六七百里。随行的人都受不了了，呕吐不止，而唐顺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倭寇的船队停泊在崇明和三沙，唐顺之率领水军，把倭寇引到洋面上，予以围歼，消灭入侵之敌一百二十人，击沉敌船十三船。唐顺之因战功赫赫被提升为太仆少卿。胡宗宪认为唐顺之的权力还不

够大，便又加封他为右通政。唐顺之听说倭寇进犯长江北岸，急忙下令总兵官卢镗到三沙抵御，自己带领副总兵刘显火速去援助，和凤阳巡抚李遂一起在姚家荡大破倭寇。敌人狼狈逃窜到庙湾防守。唐顺之率军攻打庙湾，双方互有伤亡。李遂计划包围倭寇，将其困住，唐顺之则认为这样不妥，他率领着部下进攻倭寇营垒，并以火炮助战，但没有成功。此时三沙又屡屡告急，唐顺之便又往三沙增援，他督率卢镗、刘显进击，但没有成功。唐顺之激愤之下，亲自跃马布阵以便再战。倭寇构筑起高大的了望楼侦察官军情况，见唐顺之的军队军容整齐，不敢再战，便固守阵地不出击。刘显请求撤退，唐顺之不允许，并亲自持刀冲锋。当离倭寇营垒百步远的时候，卢镗、刘显担心失败，坚决请求唐顺之撤回来。这时正是盛夏天气，唐顺之由于在海船上生活了两个月，生了病，返回江苏太仓。李遂调到南京任职，唐顺之便被提升为右佥都御使，替李遂任凤阳巡抚。唐顺之这时病得已很重，但因为军情紧急棘手，不敢推辞。他渡过长江，倭寇已经被李遂等人剿灭，正赶上淮河、扬州一带发生饥荒，唐顺之向皇上提出了保卫海防及善后事宜九项建议。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春天，汛期来到，唐顺之抱病坚持出海。渡过焦山，来到通州后死去。终年五十四岁。死讯传到北京，嘉靖帝下令祭葬。按照往常惯例，四品官员只赐予祭奠，唐顺之因为有功劳，得到恩赐祭葬的待遇。

唐顺之兴趣广泛，天下学问没有不研究的。对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无不深入研究其发生原委。他把古今所有的书籍都加以剖析补充，按类编

排，写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当世。学者们都感到高深莫测。他写的古文，恢宏恣肆，纡徐曲折有名家风范。唐顺之一辈子要求自己很严格，讲求节操。他把门板拆下来当床用，也不铺褥垫。他的哲学思想是向王畿学习的，曾经关起门来专心致志地冥思苦想，整整一个月忘记睡觉，有很多自己的体会。晚年由于赵文华推荐他做官，他曾向罗洪先商量是继续隐居山林、还是出山为朝廷效力。罗洪先说：“你从前名字已经隶属于官籍了，这身子已经不属于自己所有了，怎么还自比于处士。”于是唐顺之出山作官，但他的声望因为这个缘故受到损害。崇祯年间，他被追谥为襄文。

他的儿子鹤徵，是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的进士，位至太常卿，也因为博学多闻而闻名于世。

（李书 于天池 译）

【原文】

唐顺之，字应德，武进人。祖贵，户科给事中。父宝，永州知府。顺之生有异禀。稍长，洽贯群籍。年二十三，举嘉靖八年会试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张璁疾翰林，出诸吉士为他曹，独欲留顺之。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

十二年秋，诏选朝官为翰林，乃改顺之编修，校累朝实录。事将竣，复以疾告，璁持其疏不下。有言顺之欲远璁者，璁发怒，拟旨以吏部主事罢归，永不复叙。至十八年选官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谏。与罗洪先、赵时春请朝太子，复削籍归。卜筑阳羨山中，读书十余年。中外论荐，并报寝。

倭躏江南北。赵文华出视师，疏荐顺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忧未终，不果出。免丧，召为职方员外郎，进郎中。出核蓟镇兵籍，还奏缺伍三万有奇，见兵亦不任战，因条上便宜九事。总督王忬以下俱贬秩。

寻命往南畿、浙江视师，与胡宗宪协谋讨贼。顺之以御贼上策，当截之海外，纵使登陆，则内地咸受祸。乃躬泛海，自江阴抵蛟门大洋，一昼夜行六七百里。从者咸惊呕，顺之意气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师邀之海外。斩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仆少卿。宗宪言顺之权轻，乃加右通政。顺之池贼犯江北，急令总兵官卢鏜拒三沙，自率副总兵刘显驰援，与凤阳巡抚李遂大破之姚家荡。贼窘，退巢庙湾。顺之薄之，杀伤相当。遂欲列围困贼，顺之以为非计，麾兵薄其营，以火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屡告急，顺之乃复援三沙，督鏜、显进击，再失利。顺之愤，亲跃马布阵。贼构高楼，望官军，见顺之军整，坚壁不出。显请退师，顺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贼营百余步。鏜、显惧失利，固要顺之还。时盛暑，居海舟两月，遂得疾。返太仓。李遂改官南京，即擢顺之右佥都御史，代遂巡抚。顺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辞。渡江，贼已为遂等所灭。淮、扬适大饥，条上海防善后九事。

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十四。讣闻，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赐祭，顺之以劳得赐葬云。

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别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

《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生平苦节自厉，辍扉为床，不饰衾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晚由文华荐，商出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顺之遂出，然闻望颇由此损。崇祯中，追谥襄文。

子鹤徵，隆庆五年进士。历官太常卿。亦以博学闻。

潘季驯传

——《明史》卷二二三

【说明】潘季驯（公元 1521—1595 年），明浙江乌程人。字时良，号印川。明代水利专家。为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进士，任御史。巡按广东，推行均平里甲法。自嘉靖末年到万历年间，四任河道总督，主要负责黄河治理工程。关于治理黄河提出了有名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原则。具体表现在通运河与黄河，治理黄河与治理运河相结合，借引淮水入河，用以冲运黄河泥沙。与此相关，有关治河的其他具体技术措施，包括筑堤、修坝、建闸、埽工等，潘季驯都有自己的见解。他著有《两河管见宸断大工录》（《四库全书》著录时更名为《两河经略》、《河防一览》）等著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治黄专家。

潘季驯，字时良，明代乌程人。嘉靖二十九年（公元 1550 年）中进士，被任命为九江推官。后提升为御史，巡按广东，推行均平保甲法，深受广东人欢迎。他临离职前，还上书皇帝，请后继广东的官员继续执行均平保甲法，皇帝同意了他的建议。升为大理寺丞。嘉靖四十四年由左少卿升为右佥都

御史，总管河道。并与朱衡共同开凿了新河，加任右副都御史。不久因居丧而辞职。

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黄河在邳州睢宁县决口。诏令季驯再次出任旧职总理河道，堵塞决口，次年堵塞成功，他却因所开新河使运粮船损失较大，而被勘河给事中雒遵弹劾罢官。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夏，季驯再次复出，任江西巡抚。次年冬，召回京任刑部右侍郎。当时，黄河在崔镇决口北流，清河口淤淀，淮河南徙，高堰湖大堤被冲毁，淮、扬、高邮、宝应之间到处为水所浸泡。大学士张居正深为忧虑。河漕尚书吴桂芳提出恢复旧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摯却要塞决口，使水归原河道，两人的意见不统一。正巧这时桂芳去世，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夏，命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的身份代替桂芳原职。季驯认为黄河故道久已湮塞，即使可以疏浚修复，但其深宽肯定不如现在的河道，提出修筑崔镇而塞决口，再修筑遥堤以防止正堤溃决。他又说：“淮水清黄河水浊，淮水水量小黄河水量大，黄河水一斗，就有沙达六升，伏秋时节含沙量可占百分之八十，若不是急流冲击，泥沙必然沉淀。所以，应借清白淮水以冲刷浑浊的黄河水，修筑高堰拥堵淮水流入清口，以冲抵大的黄河水，使黄、淮二水并流，那么黄河入海口的泥沙可自行冲走。即桂芳所开凿的草湾也可不必修治了。”于是上书提出了治河六条建议，皇帝让照之执行。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冬，淮、黄二水工程完成。次年春，季驯被授为太子太保，升为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季

驯初抵黄河，即亲自查看虞城、夏邑、商丘地势。老黄河上流，自新集经过赵家圈、肖县，出徐州小浮桥，非常宽深。自嘉靖中黄河北徙，河身已变浅，迁徙无常，曹、单、丰、沛等地常常遭受水灾而不知所从。季驯上疏请求恢复黄河故道。给事中王道成以刚刚修筑了崔镇高堰，再兴大工程比较困难，河南地方官员也陈述了三点困难，季驯的这一建议便未能实行。不久，季驯改任南京兵部尚书。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正月又为刑部任职。

季驯再次复职，是受到了张居正的帮助。居正死后，家属都被禁闭。居正的儿子敬修自缢身亡。季驯曾建言说：“居正的母亲已年愈八十岁，早晚将离开人世，乞请特予赦免。”又说判治张居正案太急，张氏亲属死于监狱的已有几十人。最初，御史李植、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巍有矛盾。季驯赞同时行、巍，痛斥反对居正的人，引起那些人的恼怒。李植于是弹劾季驯与居正为同党而庇护居正，使季驯被罢官，降为平民。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御史李栋上疏说：“隆庆年间，黄河决于崔镇，阻塞运河。几年以来，居民安居，河水安流，大家都说：‘这都是潘尚书的功劳。’过去宋礼治会通河，到现在人们还赖其利，皇帝同意督臣万恭的请求，给予宋礼后人以谥荫照顾。现在，潘季驯的功劳不在宋礼之下，而且是季驯在世时，让他为平民，岂不伤害百官的心，有失朝廷报功封奖的典例。”御史董子行也说季驯罪轻而处罚重。但皇帝却下令剥夺他们二人的俸禄。此后，为季驯鸣不平的人不断。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给事中梅国楼再次推荐季驯，于是起用季驯，任为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自吴桂芳以后，黄河、漕运皆一起总理，由此，又开始设专官治理黄河。次年，黄河暴涨，进入夏镇，冲毁田地房屋，许多居民被溺死。季驯又筑堤塞堵决口。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冬，加授季驯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季驯四次奉命治理黄河，前后达二十七年，非常熟悉黄河的地理形势险要。从筑堤设防、设官修闸，到土石埽工，事无巨细，皆悉心考虑，终积劳成疾。三次上疏请求辞职，皆未获准。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泗州发生大水，城中进水达三尺，威胁到皇帝祖陵的安危。有人提出开傅宁湖至六河入长江；有人提出浚修高家桥引水入高邮、宝应间各湖；有人提出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流淮河上游水量；有人提出决张福堤以排泄淮水。季驯认为皇帝祖陵墓地的王气不宜轻易冲泄，但巡抚周采、陈于陞、巡按高举认为周家桥在祖陵后一百多里，可以疏浚行水，大家见解不统一。都给事中杨其休请求允许季驯离职。季驯离职后三年去世，卒年七十五岁。

（赵荣译）

【原文】

潘季驯，字时良，乌程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九江推官。擢御史，巡按广东。行均平里甲法，广人大便。临代去，疏请饬后至者守其法，帝从之。进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进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与朱衡共开新河，加右副都御史，寻以忧去。

隆庆四年，河决邳州、睢宁。起故官，再理河道，塞决

口。明年，工竣，坐驱运船入新溜漂没多，为勘河给事中雒遵劾罢。

万历四年夏，再起官，巡抚江西。明年冬，召为刑部右侍郎。是时，河决崔镇，黄水北流，清河口淤淀，全淮南徙，高堰湖堤大坏，淮、扬、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河漕尚书吴桂芳议复老黄河故道，而总河都御史傅希摯欲塞决口，束水归漕，两人议不合。会桂芳卒，六年夏，命季驯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代之。季驯以故道久湮，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河，议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又：“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藉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遂条上六事，诏如议。

明年冬，两河工成。又明年春，加太子太保，进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季驯初至河上，历虞城、夏邑、商丘，相度地势。旧黄河上流，自新集经赵家圈、肖县，出徐州小浮桥，极深广。自嘉靖中北徙，河身既浅，迁徙不常，曹、单、丰、沛常苦昏垫。上疏请复故河。给事中王道成以方筑崔镇高堰，役难并举。河南抚按亦陈三难，乃止。迁南京兵部尚书。十一年正月召改刑部。

季驯之再起也，以张居正援。居正歿，家属尽幽系，子敬修自缢死。季驯言：“居正母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乞降特恩宥释。”又以治居正狱太急，宣言居正家属毙狱者已数十人。先是，御史李植、江东之辈与大臣申时行、杨巍相讦。季

驯力右时行、巍，痛诋言者，言者交怒。植遂劾季驯党庇居正，落职为民。

十三年，御史李栋上疏讼曰：“隆庆间，河决崔镇，为运道梗。数年以来，民居既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书功也’”。昔先臣宋礼治会通河，至于今是赖，陛下允督臣万恭之请，予以谥荫。今季驯功不在礼下，乃当身存之日，使与编户齿，宁不堕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报功之典哉。”御史董子行亦言季驯罪轻责重。诏俱夺其俸。其后论荐者不已。

十六年，给事中梅国楼复荐，遂起季驯右都御史，总督河道。自吴桂芳后，河道皆总理，至是复设专官。明年，黄水暴涨，冲入夏镇，坏田庐，居民多溺死。季驯复筑塞之。十九年冬，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季驯凡四奉治河命，前后二十七年，习知地形险易。增筑设防、置官建闸，下及木石椿埽，综理纤悉，积劳成病。三疏乞休，不允。二十年，泗州大水，城中水三尺，惠及祖陵。议者或欲开傅宁湖至六合入江，或欲浚周家桥入高、宝诸湖，或欲开寿州瓦埠河以分淮水上流，或欲弛张福堤以泄淮口。季驯谓祖陵王气不宜轻泄，而巡抚周案、陈于陞，巡按高举谓周家桥在祖陵后百里，可疏浚，议不合。都给事中杨其休请允季驯去。归三年卒，年七十五。

王士性传

——《明史》卷二二三

【说明】王士性（公元1546—1598年），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浙江临海人。明代杰出地理学家。他是王宗沐的侄子，小时候家里很穷，但好学上进，王宗沐爱他象亲生儿子，给予经济援助。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考中进士，任朗陵（今河南确山县）令。以后历任礼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宪、山东参议、太仆少卿、鸿胪卿等。喜欢旅游，在任官赴任途中沿路旅行考察。旅游地区达现今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旅踪之广，与徐霞客不相上下。著有《五岳游草》十二卷，《广游记》二卷，《广志绎》六卷。在自然区划、山脉分布、区域地理和旅行考察等方面都具有较突出的成就。

王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升任礼科给事中。第一次向皇帝陈述政见时，提出朝廷最主要的政务有两项：第一是亲自阅览奏章，第二是节约财政开支；各级官府的主要政务有三项：第一写各种文告，第二督促学习法律条文，第三对官员进行考核；军队的主要事务有四项：第一在中州地区备

战，第二掌握晋州地区的要害地方，第三北部边境的边防问题，第四辽东战功问题。奏疏共几千字，谈的问题切中时弊，大多数意见被采纳实行。皇帝指令制造鳌山灯。没多久，慈宁宫发生火灾，士性请皇帝停止制造鳌山灯，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杨巍建议罢黜丁此吕，士性弹劾杨巍阿谀逢迎宰相申时行，时行接受杨巍的奸诈逢迎后，作为宰相应该具有的公正、正义的品德全都失去了，士性的弹劾不起作用。时行是士性的主考官。又过了很久，士性又向皇帝上疏，说：“朝廷用人，不能专门选取那些为了保全自己而不肯发表意见，保持沉默，或是遇到什么事，没有紧迫感，缓急都不能依靠的人。请召回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等。这个意见不合皇帝的心思，不给上报。后来调士性任吏科给事中，又去四川任参议，又任太仆少卿。河南缺巡抚时，大臣们首先推荐王国，其次推荐士性去任此职。皇帝特意选用士性。士性上疏辞退，说是自己的资历威望不如王国。皇帝怀疑士性是故作恣恣，并且说王国确实可以任此职。于是王国外任河南巡抚，调士性到南京任职。又过了很久，调士性任鸿胪卿，不久死去。

（杨文衡 译）

【原文】

士性，字恒叔，由确山知县征授礼科给事中。首陈天下大计，言朝廷要务二，曰亲章奏，节财用；官司要务三，曰有司文网，督学科条，王官考核；兵戎要务四，曰中州武备，晋地要害，北寇机宜，辽左战功。疏凡数千言，深切时弊，多

议行。诏制鳌山灯。未几，慈宁宫火，士性请停前诏，帝纳之。杨巍议黜丁此吕，士性劾巍阿辅臣申时行，时行纳巍邪媚，皆失大臣谊。寝不行。时行，士性座主也。久之，疏言：“朝廷用人，不宜专取容身缄默，缓急不足恃者。请召还沈思孝、吴中行、艾穆、邹元标、黄道瞻、蔡时鼎、闻道立、顾宪成、孙如法、姜应麟、马应图、王德新、卢洪春、彭遵古、诸寿贤、顾允成等。”忤旨，不报。迁吏科给事中，出为四川参议，历太仆少卿。河南缺巡抚，廷推首王国，士性次之。帝特用士性。士性疏辞，言资望不及国。帝疑其矫，且谓国实使之，遂出国于外，调士性南京。久之，就迁鸿胪卿，卒。

左光斗传

——《明史》卷二四四

【说明】左光斗（公元1575—1625年），字遗直，号浮左，又号沧屿。桐城人。明代水利专家。他为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累官至左佥御史。刚直敢言。后因弹劾魏忠贤等，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与杨涟等被诬陷下狱，备受酷刑，死于狱中。左光斗曾出理屯田事务，提出了在北方发展农田水利的三因十四条建议，从而使水稻开始在京都畿辅地区推广种植。他的农田水利措施包括浚川、疏渠、引流、设坝、择人、择将、兵屯等。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考取进士，任中书舍人。后被授为御史，巡查中城吏治，逮捕法办了许多吏部的坏官吏，获得假印章七十多枚，假官一百多人，使京城为之震惊。

左光斗出任屯田方面的官员，他说：“北方人不知水利，一年地荒，二年耕者迁徙，到第三年人与地都没有了。现在要想使旱涝不能为灾，只有兴修水利这一条办法。”因此他上疏提出了三因十四条建议，即：根据天时、利用地利、依据

人情。十四条为：论疏通河流、修治渠道、引水、建坝、修闸、修水库、查勘土地、修筑池塘、招徕农民、选人、选领导人员、军士屯田、设立垦田机构、富民用钱买爵。左光斗的建议清晰系统，皇帝下令按照这一建议执行。由此，水利事业大兴，北方人才知道种植水稻。邹元标曾说：“三十年前，京都的人不知道水稻是什么东西，现在到处都是水稻，全是兴修水田的好处。”太监刘朝号称东宫太子有令，向左光斗索要戚畹废庄。左光斗将太子的命令原封退回，说：“天下的寸尺土地都属于太子的，今天怎么能私自给人呢！”太监气愤的走了。

明光宗去世，李选侍占据乾清宫，强迫皇太子封皇后。光斗上奏说：“内廷有乾清宫，犹如外廷有皇极殿，只有天子能居住，皇后配天子才得以共同居住。其他嫔妃虽然也与天子以次相配，但不得长期居住，这不只是避嫌，也是为了区别尊卑上下之别。李选侍既不是皇子的长母，又不是亲生母亲，却泰然处于正宫，太子退居于慈庆宫，使得上下难行礼节，这还叫什么名分？李选侍事奉先皇帝没有成为皇后的德义，对太子又没有养育之恩。这样的人，怎能将皇太子托付给她呢？况且，太子年已十六岁，内有忠厚老臣辅佐，外有公卿百官，怎怕没人，而须象照顾婴儿一样？更何况太子正值长知识时，不应接触这些个人私欲的情况，因此，何必将太子托给妇道人手？现在不赶快决定，将来李氏必借抚养太子的名义，实行专制统治。武则天那样的祸害再出现于现在，将来就会有不忍言及此事的人。”当时李选侍想专揽大权，对大臣的奏疏，都让先进乾清宫，然后再转到慈庆宫的太子处。李氏得见光

斗的奏章，非常恼怒，准备严加罚谴光斗。屡次派使者宣召光斗，光斗说：“我是皇帝的法官，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去。你们要干什么？”李选侍更为愤怒，邀请熹宗到乾清宫商议。熹宗不肯去，让使者取来光斗的奏章，看后认为说的对，便要选择日子移宫，光斗才免于受李氏的打击。当时，宫廷政府相互猜疑，危机四伏，光斗与杨涟齐心协力，排除太监势力，扶持幼主，使皇位没有旁落。由于他们两人出力最大，所以，朝廷内外并称他们为“杨、左”。

过了不久，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说皇帝不应该薄待庶母。光斗知道此事后，即向皇帝说：“先皇帝去世，大臣们从乾清宫奉皇帝居于慈庆宫，我们认为皇帝不应回避李选侍。所以，我们于初二日上奏《慎守典礼肃清宫禁疏》，宫中为之恼怒，几乎要降大罪于我们。幸得皇帝保护，将奏疏发至内阁。初五日，阁臣等上疏再次催促，便奉令移宫了。至初六日，皇帝即位，便驾临乾清宫。由此，宫内秩序井然，内外和睦。皇帝既然应当还住乾清宫，那么，李选侍就当迁出，这是极明白的道理。惟有移宫以后，应存大礼节而不计小的过失。若为小事牵引使内宫不安宁，则对国家会有损害。希望立刻诛杀盗宝宫奴刘逊等人，其他人则予以宽处。”皇帝便告谕群臣，详述了李选侍虐待皇帝母亲的各种罪状。到召见大家时又说：“我与李选侍有仇”。贾继春因此而获罪离去。

当时，朝臣议论改元。有人说可去掉泰昌不纪；有人说去掉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有人说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启。光斗力排众说，建议以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讨论便同意了他的意见。孙如游由中旨入内阁，光

斗坚决反对请予以排斥。后来，光斗负责畿辅地区教育，杜绝各种请托，判事准确如神。

天启初年（公元1621年），朝廷议论要起用熊廷弼，治罪言官魏应嘉等人。光斗独自坚持反对意见，说廷弼有优秀的才能，但气量不够宽宏，过去让他守备辽敌完全可以胜任，而现在让他去收复辽地却难以完成。不久，廷弼果然战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秋，光斗上疏请召回文震孟、满朝荐、毛士龙、徐大相等加以任用。并请召回贾继春与范济世。济世也是在“移宫”事件上与光斗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一奏疏未被皇帝采纳。当年，光斗被提升为大理丞，进为少卿。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二月，左光斗被授于左佥都御史。当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等人都据有重要地位。光斗与他们政见相同，经常为国家前途品评人物，正人君子都信赖他们，嫉忌他们的人越法认为不能容忍了。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为同乡，便将阮氏招入京中。正巧吏科都给事中缺职，应补升的人，首先应是周士朴，次为阮大铖，再次为大中。阮大铖求得上级命令，使士朴不能升任，而以为自己的职位。赵南星憎恶这样做，要按照规定处置大铖。大铖怀疑光斗发现了他计取名位的阴谋，非常恨光斗。熊明遇、徐良彦都想得到佥都御史之职，但赵南星却推荐左光斗任此职，因此二人也恨光斗。江西人又因其他事恨魏大中，于是，他们共同向给事中傅櫬弹劾左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光斗上疏辩解，而且诋毁傅櫬与东厂理刑傅继教结为兄弟。傅櫬为此也怨恨光斗，又上疏攻击光斗。光斗乞求免职，此事才算了结。

杨涟弹劾魏忠贤，光斗曾与之共谋，光斗又与攀龙共同揭发崔呈秀的脏私，忠贤与他的党徒都恨光斗。到忠贤驱逐了南星、攀龙、大中，下面将要涉及杨涟、光斗时，光斗愤怒至极，草拟上奏弹劾魏忠贤及魏广徵三十二斩罪，准备十一月二日上奏，先送妻子儿子南返回老家。魏忠贤刺探知此事后，提前二天借会推事而将光斗与杨涟削籍。大家愤恨不已，接着又重拘汪文言狱案，加入光斗之名，派遣使者去逮捕光斗。父老乡亲紧拥马前号哭，声震原野，连捕刑人员也为之落泪。至京则下狱中严刑拷问。许显纯诬陷他们受了杨镐、熊廷弼的贿赂，杨涟等人开始都不承认，不久又怕不承认被酷刑折磨死，他们寄希望于司法部门，为了缓死而图将来澄清事实，大家都冤招。光斗承认收贿二万。魏忠贤于是假托圣旨，仍令显纯五天一追究，不移交司法部门，大家这时才后悔失算了。容城孙奇逢是一仗义之士，与定兴鹿正因光斗对畿辅地区做了许多好事，便倡议大家凑钱，大家争相响应，凑钱达数千，计划代为交纳，以缓解光斗的刑狱，但这时，光斗与杨涟已与同一天被狱卒所杀，当时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七月二十六日，光斗年五十一岁。

光斗已死，贿赂之事并未完，魏忠贤令地方长官严加追究，逮捕光斗随从等十四人。他的大哥因此事连累而死，母亲因痛哭儿子而死去。都御史周应秋还认为有关部门追究不力，上疏要求撤去有关人员，由此，使许多人家破人亡。到魏忠贤定《三朝要典》时，“移宫”一案，定杨涟、光斗为罪魁祸首，建议开棺戮尸再行惩处，有人为之辩解，才未实行。等到魏忠贤被诛杀后，光斗被赠封为右都御史，录用他一个

儿子为官。此后，又追赠光斗为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赠谥号为忠毅。

(赵荣译)

【原文】

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除中书舍人。选授御史，巡视中城。捕治吏部豪恶吏，获假印七十余，假官一百余人，鞫下震悚。

出理屯田，言：“北人不知水利，一年而地荒，二年而民徙，三年而地与民尽矣。今欲使旱不为灾，涝不为害，惟有兴水利一法。”因条上三因十四议：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曰议浚川，议疏渠，议引流，议设坝，议建闸，议论陂，议相地，议筑塘，议招徕，议择人，议择将，议兵屯，议力田设科，议富民拜爵。其法犁然具备，诏悉允行。水利大兴，北人始知艺稻。邹元标尝曰：“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稻，种水田利也。”阉人刘朝称东宫令旨，索戚畹废庄。光斗不启封还之，曰：“尺土皆殿下有，今日安敢私受。”阉人愤而去。

光宗崩，李选侍据乾清宫，迫皇长子封皇后，光斗上言：“内廷有乾清宫，犹外廷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处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事先皇无脱簪戒旦之德，于殿下无拊摩养育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令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况睿哲初开，正宜不见可欲，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及今不早断决，

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氏之祸再见于今，将来有不忍言者。”时选侍欲专大权。廷臣笺奏，令先进乾清，然后进慈庆。得光斗笺，大怒，将加严谴，数遣使宣召光斗。光斗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选侍益怒，邀熹宗至乾清议之。熹宗不肯往，使使取其笺视之。心以为善，趣择日移宫，光斗乃免。当是时，宫府危疑，人情危惧，光斗与杨涟协心建议，排阉奴，扶冲主，宸极获正，两人力为多。由是朝野并称为“杨、左”。

未几，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言帝不当薄待庶母。光斗闻之，即上言：“先帝宴驾，大臣从乾清宫奉皇上出居慈庆宫，臣等以为不宜避选侍。故臣于初二日具《慎守典礼肃清宫禁》一疏。宫中震怒，祸几不测。赖皇上保全，发臣疏于内阁。初五日，阁臣具揭再催，奉旨移宫。至初六日，皇上登极，驾还乾清。宫禁肃然，内外宁谧。夫皇上既当还宫，则选侍之当移，其理明白易晓。惟是移宫以后，自宜存大体，捐小过。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即于国体有损。乞立诛盗宝宫奴刘逊等，而尽宽其余。”帝乃宣谕百官，备述选侍凌虐圣母诸状。及召见又言：“朕与选侍有仇”。继春用是得罪去。

时廷臣议改元。或议削泰昌弗纪，或议去万历四十八年，即以今年为泰昌；或议以明年为泰昌，后年为天后。光斗力排其说，请从今年八月以前为万历，以后为泰昌，议遂定。孙如游由中旨入阁，抗疏请斥之。出督畿辅学政，力杜清寄，识鑑如神。

天后初，廷议起用熊廷弼，罪言官魏应嘉等。光斗独抗

疏争之，言廷弼才优而量不宏，昔以守辽则有余，今以复辽则不足。已而廷弼竟败。三年秋，疏请召还文震孟、满朝荐、毛士龙、徐大相等，并乞召继春及港济世。济世亦论“移宫”事与光斗异者，疏上不纳。其年擢大理丞，进少卿。

明年二月拜左佥都御史。是时，韩爌、赵南星、高攀龙、杨涟、郑三俊、李邦华、魏大中诸人咸居要地。光斗与相得，务为危言覈论，甄别流品，正人咸赖之，而忌者浸不能容。光斗与给事中阮大铖同里，招之入京。会吏科都给事中缺，当迁者，首周士朴，次大铖，次大中。大铖邀中旨，勒士朴不迁，以为己地。赵南星恶之，欲例转大铖。大铖疑光斗发其谋，恨甚。熊明遇、徐良彦皆欲得佥都御史，而南星引光斗为之，两人亦恨光斗。江西人又以他故衔大中，遂共嗾给事中傅忭劾光斗、大中与汪文言比而为奸。光斗疏辨，且抵櫬结东厂理刑傅继教为昆弟。櫬恚，再疏讦光斗。光斗乞罢，事得解。

杨涟劾魏忠贤，光斗与其谋，又与攀龙共发崔呈秀贓私，忠贤暨其党咸怒。及忠贤逐南星、攀龙、大中，次将及涟、光斗。光斗愤甚，草奏劾魏忠贤及魏广徵三十二斩罪，拟十一月二日上之，先遣妻子南还。忠贤諗知，先二日假会推事与涟俱削籍。群小恨不已，复构文言狱，入光斗名，遣使往逮。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缙骑亦为雪涕。至则下诏狱酷讯。许显纯诬以受杨镐、熊廷弼贿，涟等初不承，已而恐以不承为酷刑所毙，冀下法司，得少缓死为后图，诸人俱自诬服。光斗坐赃二万。忠贤乃矫旨，仍令显纯五日一追比，不下法司，诸人始悔失计。容城孙奇逢者，节侠士也，与定

兴鹿正以光斗有德于畿辅，倡议醵金，诸生争应之。得金数千，谋代输，缓其狱，而光斗与涟已同日为狱卒所毙，时五年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年五十一。

光斗既死，赃犹未竟。忠贤令抚按严追，系其群从十四人。长兄光霁坐累死，母以哭子死。都御史周应秋犹以所司承追不力，疏趣之，由是诸人家族尽破。及忠贤定《三朝要典》“移宫”一案以涟、光斗为罪魁，议开棺戮尸。有解之者，乃免。忠贤既诛，赠光斗右都御史，录其一子。已，再赠太子少保。福王时，追谥忠毅。

孙元化传

——《明史》卷二四八

【说明】孙元化（公元1581—1632年），字初阳，号火东。清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孙元化曾跟随徐光启学习火器和数学，因此对西洋火炮应用于保卫边防甚有研究。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广宁失陷后，孙元化上备京、防边二策，详陈筑台制炮之术，深得孙承宗的赞同。兵部侍郎王在晋代熊廷弼经略辽东，孙元化随同前往。其后，孙承宗代王在晋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他听从孙元化的意见，修筑城堡炮台、练兵屯田，大力加强防务。孙元化则仿制西洋巨炮。后来孙元化协助袁崇焕镇守宁远。袁崇焕领导军民筑城坚守。发射西洋巨炮，屡次击退清军的进攻。崇祯初年，袁崇焕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又请求孙元化辅佐。

孙元化深受徐光启的重视。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作乱时，徐光启上疏奏请“速召孙元化、王征于登州”，孙元化任登莱巡抚。崇祯四年末（公元1632年初）登州参将孔有德等起兵叛明，孙元化希望能加以招抚，命各郡县勿迎击。到孔有德部即将攻占登州时，孙元化仍派人

招降。登州城在叛军里应外合之下陷落，孙元化等被执。明朝官军克复登州后，孙元化、王征、张焘等被一同解送京师（北京）。孙元化、张焘被处死刑。

孙元化受徐光启的影响，亦受洗入天主教。他曾出巨资在家乡嘉定建教堂和教士住宅。他与西方传教士关系颇佳。

孙元化著有《几何体论》一卷、《几何用法》一卷、《泰西算要》一卷、《西洋神机》二卷等。这些都是有关西方数学及火炮的著作。他还为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 1566—1640）撰《则圣十篇》作序、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 1582—1649）著《睡答画答》校订。徐光启撰《勾股义》，亦得孙元化帮助。

孙元化，字初阳，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县）人。明代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乡试时考中举人。他所擅长的西洋炮法，是从徐光启学习而得的。清兵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后，孙元化分条陈述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在朝廷请求给予他官职，因而他在前线任赞画经略职。他主张修建炮台、教授操练西洋炮法，请求据守宁远、前屯（今辽宁兴城、绥中西南），又向王在晋陈述政见，但王在晋没有任用他。孙承宗视察边防，回到京师（北京）把情况奏明皇帝，孙元化被授予兵部司务职。孙承宗接替王在晋的职务，于是打破了关口重叠的非议，修筑炮台、制造大炮，完全按照孙元化的主张。回朝，授孙元化职方主事职。过了一些时候，孙元化协助袁崇焕镇守宁远。孙元化回到朝廷，不久被免去官职。

崇祯初年（公元1628年），孙元化被起用为武选员外郎，

又晋升为职方郎中。袁崇焕当时已任经略，请求孙元化辅佐，于是孙元化改任山东右参议，整顿宁远、前屯的兵员装备。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皮岛（今属朝鲜）副将刘兴治作乱，朝廷议决再设登莱巡抚，提拔孙元化以右佥都御史任登莱巡抚，驻登州。第二年，岛上的民众杀死刘兴治，孙元化奏请由黄龙任副将，淘汰冗兵六千人。到孔有德起兵反叛明朝，朝野因此而责备孙元化没有征讨叛军。叛军放回孙元化，朝廷发出诏书逮捕了他。首辅周延儒谋求为其开脱，以免其死，但没有成功，便请孙元化的老师徐光启入内阁以图援救，但仍没有成功。结果，孙元化和张焘一起在闹市被执行死刑，参议宋光兰、佥事王征被充军。（王冰译）

【原文】

元化，字初阳，嘉定人。天启间举于乡。所善西洋炮法，盖得之徐光启云。广宁覆没，条备京、防边二策。孙承宗请于朝，得赞画经略军前。主建炮台教练法，因请据宁远、前屯，以策干王在晋，在晋不能用。承宗行边，还奏，授兵部司务。承宗代在晋，遂破重关之非，筑台制炮，一如元化言。还授元化职方主事。已，元化赞画袁崇焕宁远。还朝，寻罢。

崇祯初，起武选员外郎，进职方郎中。崇焕已为经略，乞元化自辅，遂改元化山东右参议，整饬宁、前兵备。三年，皮岛副将刘兴治为乱，廷议复设登莱巡抚，遂擢元化右佥都御史任之，驻登州。明年，岛众杀兴治，元化奏副将黄龙代，汰其兵六千人。及有德反，朝野由是怨元化之不能讨也。贼纵元化还，诏逮之。首辅周延儒谋脱其死，不得也，则援其师光启入阁图之，卒不得，同张焘弃市。光兰、征充军。

徐光启传

——《明史》卷二五一

【说明】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明代松江府直接隶属“南都”南京，故称“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家庭，幼年时代便接触到农业、手工业生产知识。徐光启一生勤劳俭朴，关心国计民生和有旺盛的求知欲，不能不说受影响于其家庭。二十一—四十岁期间，先后以秀才和举人的资历在家乡和广东、广西等地，以课馆为生。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结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并加入天主教。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以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此后在明廷担任过不少重要官职。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终于位，时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年七十二岁。《明史》本传说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赀”。徐光启有治国济世的才干，但到他官位较高，掌握一定权力时，年纪已老；加之正值周延儒、温体仁二人把持朝政，其政治抱负无法得到施展。这对他个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徐光启是明末的一位优秀科学字家。他与利玛窦一起研究天文、历法、数学、地学、水利等学问。并和利玛窦等共同

翻译了许多近代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成为中国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他自己也有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等。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徐光启用力最勤，收罗最富的要算是在农业方面了。因此，在他的科学著作中也以《农政全书》为最重要。本书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为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大成的著作。全书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十二大项。徐光启的学术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对科学的认识和科学研究方法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省试考中第一名举人，七年后考中进士。由庶吉士做到赞善。曾跟从西洋人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完全掌握其方法。继而全面学习军事、屯田、盐政、水利等各种书籍。

杨镐四路兵马丧失于辽东，京城大为震惊。徐光启几次上疏要求让自己去练兵以报效国家。神宗皇帝嘉许他的雄心壮志，越级提升为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在通州练兵时，他上奏陈列了十条建议。当时辽东战事正吃紧，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徐光启上疏力争，才批准给了他少量民兵和武器军械。

没过多久，明熹宗即位。徐光启因自己的抱负不得施展，请求辞职而去，没获得批准。接着因病请假回乡。辽阳被攻破，熹宗下令起用他。回到朝中，他大力提议多铸造西洋大

炮，以供守城用。熹宗同意他的看法。正考虑采纳他的建议，而徐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的建议不一致，受到御史丘兆麟的弹劾。他又称病请假回家。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以原官起用，接着升为礼部右侍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魏忠贤勾结智铤弹劾他，终于丢掉了官职而闲居。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被召回朝廷，又提出练兵建议。不久，以左侍郎负责礼部事务。崇祯考虑国家财政困难，命朝廷大臣提出整理屯田和盐政的好办法。徐光启说，屯政的关键在于垦荒，盐政在于严禁私盐的贩卖。崇祯帝赞扬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升他为礼部尚书。当时，皇帝因为日食预报发生错误，想要处分钦天监台官。徐光启说：“钦天监预测天象是本照着郭守敬的方法，元代已经出现了应当发生日、月食而没有发生的情况。郭守敬尚且如此，所以不能责怪钦天监台官计算出差错。我听说，任何一种历法使用久了，就必定会出现差错，宜于及时修正。”崇祯帝听从其言，下诏请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来推算，进行改历的工作。徐光启任监督。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春季正月，徐光启送上《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道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当年冬季十月初一日，发生日食，又进上测候四说，其中以论述时差里差的方法最为详细周密。

五年（公元1632年）五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要事务，与郑以伟同时被任命。随即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徐光启颇有治国经世的才干，而且立志用于当世。

不过，到被信任而掌权时，年纪已老，又恰逢周延儒、温体仁独断专政，不能够有所倡议。第二年十月去世。赐诰封少保。

郑以伟，字子器，上饶人。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进士。改为庶吉士，授检讨，积功升少詹事。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官任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光宗的神主迁入祖庙，当承继为宪宗的后嗣，太常少卿洪文衡认为睿宗不应当入太庙，请求把其神主迁入玉芝宫，郑以伟认为不可而加以阻止，朝臣们议论结果是同意洪文衡的提议。随即以左侍郎协助治理詹事府。四年（公元1624年），郑以伟当值讲解儒家经义，违逆了宦官，上疏请求辞职回家。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召拜为礼部尚书。过了一段时间，和徐光启并为宰相。再次辞职，不批准。郑以伟为人廉洁自律，读书过目不忘，撰写的文章精深渊博，但不善于拟写批答公文。他曾说：“我腹中富有万卷书，但却受窘于几行公文，而被后仕者所看不起。”奏章疏文中有“何况”二字，郑以伟误认作是人名，在代皇帝草拟的圣旨中提出要归案审问。崇祯帝给以修正改错后，他才醒悟过来。从此，以文学见长的朝臣就被崇祯帝所轻视。于是乃有馆阁工作人员须历任过推知的上谕，而内阁大臣不再只选用翰林出身的人了。郑以伟屡次请求退休，不获批准。第二年六月，死于任上。追赠太子太保。御史说，徐光启、郑以伟相继去世，盖棺下葬时，口袋中没有多余的钱财，请朝廷加以优厚抚恤，以使贪赃枉法者感而羞愧。崇祯帝采纳御史意见，于是赐谥号徐光启为文定，郑以伟为文恪。

过了二年，同安人林钐任大学士，不到半年就去世。也有人说他廉洁奉公，得谥号文穆。林钐，字实甫，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殿试第三名，授任编修。天启时（公元1621—1627年），任国子司业。监生陆万龄提请在太学旁边建造一座魏忠贤生祠，聚凑了些钱，并强使林钐出来倡议。林钐提起笔来涂抹掉自己的名字，当晚即在棂星门挂冠而回家。魏忠贤伪造圣旨削去他的官职。崇祯即位，起用他为少詹事。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由礼部侍郎入阁，有诚实忠敬之称。

过了较长一段时候，皇帝想念到徐光启博学强识，要他的家属把遗留下的著作送上。徐光启的儿子徐骥入朝谢恩，进献上《农政全书》六十卷。崇祯帝下诏命令有关部门刊刻颁布，加赠太保，并录用他的孙子为中书舍人。

（范楚玉 译）

【原文】

徐光启，字子先，上海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又七年成进士。由庶吉士历赞善。从西洋人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遂遍习兵机、屯田、盐荚、水利诸书。

杨镐四路丧师，京师大震。累疏请练兵自效。神宗壮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练兵通州，列上十议。时辽事方急，不能如所请。光启疏争，乃稍给以民兵戎械。

未几，熹宗即位。光启志不得展，请裁去，不听。既而以疾归。辽阳破，召起之。还朝，力请多铸西洋大炮，以资城守。帝善其言。方议用，而光启与兵部尚书崔景荣议不合，御史丘兆麟劾之，复移疾归。天启三年起故官，旋擢礼部右

侍郎。五年，魏忠贤党智铤劾之，落职閒住。

崇祯元年召还，复申练兵之说。未几，以左侍郎理事。帝忧国用不足，敕廷臣献屯盐善策。光启言屯政在于垦荒、盐政在严禁私贩。帝褒纳之，擢本部尚书。时帝以日食失验，欲罪台官。光启言：“台官测候本郭守敬法。元时尝当食不食，守敬且尔，无怪台官之失占。臣闻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帝从其言，召西洋人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等推算历法，光启为监督。

四年春正月，光启进《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复上测候四说。其辩时差里差之法，最为详密。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与郑以伟并命。寻加太子太保，进文渊阁。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体仁专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赠少保。

郑以伟，字子器，上饶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礼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光宗祔庙，当祧宪宗，太常少卿洪文衡以睿宗不当入庙，请祧奉玉芝宫，以伟不可而止，论者卒是文衡。寻以左侍郎协理詹事府。四年，以伟直讲筵，与瑯忤，上疏告归。崇祯二年召拜礼部尚书。久之，与光启并相。再辞，不允。以伟修洁自好，书过目不忘。文章奥博，而票拟非其所长。尝曰：“吾富于万卷，窘于数行，乃为后进所藐”。章疏中有“何

况”二字，悞以为人名也，拟旨提问，帝驳改始悟。自是词臣为帝轻，遂有馆员须历推知之谕，而阁臣不专用翰林矣。以伟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赠太子太保。御史言光启，以伟相继没，盖棺之日，囊无余赀，请优恤以愧贪墨者。帝纳之，乃谥光启文定，以伟文恪。

其后二年，同安林钐为大学士，未半岁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谥文穆。钐，字实甫，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第三人，授编修。天启时，任国子司业。监生陆万龄请建魏忠贤祠于太学旁，具簿醵金，强钐为倡。钐援笔涂抹，即夕挂冠棧星门径归。忠贤矫旨削其籍。崇祯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礼部侍郎入阁，有谨愿诚恪之称。

久之，帝念光启博学强识，索其家遗书。子骥入谢，进《农政全书》六十卷。诏令有司刊布，加赠太保，其孙为中书舍人。

耿荫楼传

——《明史》卷二六七

【说明】耿荫楼，字旋极。北直隶灵寿（今河北灵寿县）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进士，曾在山东临淄、寿光等地做官，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清兵攻陷灵寿城时死难。做为农学家，他著有《国脉民天》一书，内容包括区田、亲田、养种、晒种、蓄粪、治旱、备荒等七目。他认为，书中所述“法参古人，酌以家训，事若琐屑，实则呕心血，试有成效，非未信而劳民。”全书的篇幅虽然很短，但内容却很着实。著名的亲田法就是在这本书中提出来的。亲田法的基本原则是在一大块田中逐年选出一定比例的小块，进行人力、物力的倾斜投资，以保证小面积的稳产高产，旱涝保收。其它部分按照常规进行耕种。

耿荫楼，是马从聘的同乡（即河北灵寿人），字旋极。明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作山东临淄知县。因长时间的干旱，荫楼便穿上囚犯的服装，在烈日之中曝晒，在祭坛上哭泣（求雨），顿时下了场大雨。后又担山东寿光县知县，荫楼又象在临淄一样求雨。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4年），

荫楼入朝廷任兵部主事，又调到吏部任职，担任员外郎。后请假回灵寿。清兵攻陷灵寿城时，荫楼偕自己的儿子耿参一同死难。后被赠与光禄少卿。

(曾雄生 译)

【原文】

耿荫楼，从聘同邑人也，字旋极。天启中，任临淄知县。久旱，囚服暴烈日中，哭于坛，雨立澍。摄寿光，祷雨如临淄。崇祯中，入为兵部主事，调吏部，历员外郎，乞假归。城破，偕子参并死之。赠光禄少卿。

黄省曾传

——《明史》卷二八七

【说明】黄省曾，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江苏吴县人。明嘉靖辛卯（公元1531年）举人。《明史》中对他的介绍非常简略，可他在科学上确有多方面的贡献。

历史上的黄省曾以诗学闻名，但他却“好谭经济”，他的著作很多，在农学上有价值的就有《稻品》、《蚕经》、《鱼经》、《艺菊书》、《芋经》等。其中《稻品》，又称《理生玉镜稻品》是现存中国最早的完整的水稻品种专志，书中一共记载了当时苏州地区的三十五个水稻品种的生育期和品质特性，是研究中国水稻品种发展史的坐标；《蚕经》，又称《养蚕经》，书中分为艺桑、宫宇、器具、种连、育饲、登簇、择茧、缲板、戒宜等九章，是第一部关于南方地区的栽桑养蚕的专书，在此之前，江南地区尚无蚕桑专书，而在此之后，东南地区此类专书不断，可以说黄省曾的著作开了风气之先。《鱼经》，又称《种鱼经》，《养鱼经》，书中包括三篇，分别讲鱼秧，养鱼的方法以及鱼的种类。这又是一本现存最早的养鱼专书。《艺菊书》，又称《艺菊谱》，书中叙述了与直播不同的菊花分根栽培方法，这些方法包括贮土、留种、分秧、登

盆、理缙和护养等六项，和宋代以记载花品为主的菊谱不同，本书着重于菊花的栽培，因此它的农学价值也就更高；《芋经》，又《种芋法》，大部分是辑录古代有关芋的记载，但其中的“艺法”一节，讲到了当时种芋的方法，比较有价值，此外本书也是古农书中唯一的一部种芋专书；黄省曾这些著作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因此有人又将其《鱼经》、《艺菊书》与《稻品》和《蚕经》一道，合称为《农圃四书》。此外，黄省曾还有《兽经》和《西洋朝贡典录》等科技著作，其中后者则是一本记载西洋经济地理的著作，在地理学史上有很高的价值。

黄省曾，字勉之。通过乡试一级的科举考试，成为举人。后跟从王守仁（王阳明）、湛若水游历。又曾经向李梦阳学诗。他的著作有《五岳山人集》。他的儿子名姬水，字淳父，在文坛上也有名气，曾向祝允明学习过书法。（曾雄生 译）

【原文】

黄省曾，字勉之。举乡试。从王守仁、湛若水游。又学诗于李梦阳。所著有《五岳山人集》。子姬水，字淳父。有文名，学书于祝允明。

王 祎 传

——《明史》卷二八九

【说明】王祎（公元 1322—1373 年），字子充，义乌（今属浙江）人，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历算家。从小敏捷聪慧，年青时便写得一手好文章。元代末年隐居青岩山，后为明太祖朱元璋征召为中书省掾史，与宋濂共同负责修撰《元史》，书成之后被擢升为翰林待制，并兼任国史院的编修官等职。

洪武五年（公元 1372 年），云南尚为元朝统辖之地，明朝打算派使节赴云南谕降梁王归顺新朝天子朱元璋，王祎奉命前往。适逢元朝派遣大臣脱脱到云南征饷。闻知王祎来此劝降云南王，决意加害王祎，当脱脱危逼利诱欲使王祎屈服而遭到严辞驳斥之后，便将王祎杀害。

王祎能诗善文，著有《王忠文公集》、《大事记续编》、《卮辞》等著作。在自然科学方面，王祎撰有《重修革象新书》二卷。这部书论述了天文学、光学和数学等方面的一些内容，其中包括宇宙理论、恒星观测、光的直线传播与成像原理、圆周率计算等。

王祎，字子充，义乌人。自幼聪明伶俐，成人后，体魄

魁梧，身材伟岸。从师柳贯、黄潜，以擅长写文章而著名于世。王祹目睹当时元朝政府的破败情形，写下了七、八千字的文章上呈当朝宰相，虽经危素与张起岩共同举荐，没有任何结果。于是王祹隐居青岩山，潜心著书立说，其名声愈来愈大。

明太祖朱元璋攻克婺州之后，召见王祹，委任他为中书省掾史。征讨江西时，王祹撰颂文献呈朱元璋，明太祖高兴地说：“江南有两位大学者，你和宋濂。论学问之渊博，你不如宋濂；论才思之敏捷，宋濂却不如你。”朱元璋当时创建了“礼贤馆”，李文忠推荐王祹、许元和王天锡到馆中任职，获朱元璋批准。接着授于王祹以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之职，后升迁为侍礼郎，负责编撰帝王的言行录，同时还兼任南康府事务，施政仁慈，受赐金带以褒奖之。朱元璋将登基时，召回商议礼仪之事，因为一些事违背圣旨，而出任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王祹向明太祖上呈奏章说：“祈求上天保佑永世太平之根本，在于皇上心底忠厚、为政宽容，顺天道、合民心。施行暴政，采取严厉手段治国，虽可暂时获得平静，但不能保持常久。现在浙西一带既已平定，应当减少那里的课敛税收。”朱元璋赞许地采纳了王祹的意见，但没有完全接受他的主张。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计划编修《元史》，任命王祹与宋濂为总负责人。王祹对于书写历史颇为擅长，他从浩繁的史料中，剔除支节，突显主干，胜任了修改定稿的主编之职。《元史》编成之后，他被提升为翰林待制，同时兼任制诰及国史院编修官等职。王祹还奉命预行教授大本堂，他的讲

授不仅循循善诱，而且清楚通达。应召赴朝廷面见皇上，每次都受到皇上赐坐，王祎均能够与皇上从容不迫、轻松自在的交谈。不久，王祎奉命出使吐蕃，尚未抵达目的地，便被召还。

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正月，朝廷商议招降云南一事，任命王祎持谕降书前往云南征招。到达云南后，王祎向梁王递交谕降书，声称云南王应当从速将其所属版图归顺明朝，否则明朝的征讨大军不日将征伐云南。云南王不听王祎的降谕，并把他安顿在一家普通的住所。过了几天，王祎再次告诫云南王，说：“朝廷顾及到云南百万民众的性命，不忍使他们丧生于刀刃之下。如果你试图恃仗云南距中原路途遥远且地势险要，而违抗明朝的意旨，到时候明朝之威武大军开进昆明，你就后悔莫及了。”梁王闻听此言，被王祎的威吓所慑服，并随即请王祎移住高级的客店。此时，恰逢元朝派遣其大臣脱脱前来云南征饷，脱脱便以危言胁迫梁王，决意要谋害王祎。梁王迫不得已，带王祎去见脱脱，脱脱欲使王祎屈服，王祎正言叱责道：“上天已经决定结束你们元朝的命运，让我明朝取而代之，你们这些残火余烬，怎么敢与日月相争辉！况且你和我都是各自朝廷的使者，我岂能被你所屈服！”有人劝说脱脱道：“云南王素负重名，你不可杀害王祎。”脱脱挥臂而说：“今天纵然是孔夫子在此，他也不得活命。”王祎转而对梁王说：“你要杀我，明朝的大军必然相继开到，你的大祸亦将接踵而至。”于是王祎就义，当时为十二月二十四日。梁王指派使者前往祭奠，并使之衣冠完整地入殓。建文（公元1399—1402年）年间，王祎之子王绅向朝廷申诉王祎的事迹，

皇上下诏追赠王祹为翰林学士，并赐封号“文节”。正统（公元1436—1449年）年间，改封“忠文”。成化（公元1465—1487年）年间，又传旨修建祠堂以祭祀王祹的英灵。

（曲安京 译）

【原文】

王祹，字子充，义乌人。幼敏慧，及长，身長岳立，屹有伟度。师柳贯、黄潛，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为书七八千言上时宰。危素、张起岩并荐，不报。隐青岩山，著书，名日盛。

太祖取婺州，召见，用为中书省掾史。征江西，祹献颂。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创礼贤馆，李文忠荐祹及许元、王天锡，召置馆中。旋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累迁侍礼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赐金带宠之。太祖将即位，召还，议礼。坐事忤旨，出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宽大以为政，法天道，顺人心。雷霆霜雪，可暂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敛当减。”太祖嘉纳之，然不能尽从也。

明年修元史，命祹与濂为总裁。祹史事擅长，裁烦剔秽，力任笔削。书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奉诏预教大本堂，经明理达，善开导。召对殿廷，必赐坐，从容宴语。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还。

五年正月议招谕云南，命祹赍诏往。至则谕梁王，亟宜奉版图归职方，不然天讨旦夕至。王不听，馆别室。他日，又谕曰：“朝廷以云南百万生灵，不欲歼於锋刃。若恃险远，抗

明命，龙骧鹢舫，会战昆明，悔无及矣。”梁王骇服，即为改馆。会元遣脱脱征饷，胁王以危言，必欲杀祎。王不得已出祎见之，脱脱欲屈祎，祎叱曰：“天既讫汝元命，我朝实代之。汝燬火余烬，敢与日月争明邪！且我与汝皆使也，岂为汝屈！”或劝脱脱曰：“王公素负重名，不可害。”脱脱攘臂曰：“今虽孔圣，义不得存。”祎顾王曰：“汝杀我，天兵继至，汝祸不旋踵矣。”遂遇害，时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敛之。建文中，祎子绅讼祎事，诏赠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改谥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滑 寿 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滑寿，字伯仁，晚号樱宁生，祖籍河南襄城，生长于江苏仪真（今仪征），后迁居浙江余姚。元末明初代医学家。

滑寿幼习儒，工诗文。曾拜名医王居中为师，精研医经，认为《素问》错简多，遂按脏象、经络、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脉、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十二项分类摘抄，集为《读素问钞》三卷，便于检阅。又撰《难经本义》二卷，订误、疏义。滑氏主张精研医经以掌握医学机要，“浚其源则流长”。内科诊治多仿李东垣，针法则尽得东平高洞阳之传。精于诊而审于方，治愈疑症顽疾甚众。其治疗验案数十则，载入朱右《樱宁生传》。滑氏认为“医莫先于脉”，乃撰《诊家枢要》一卷，其中归纳出“举”、“按”、“寻”切脉三法，以及浮、沉、迟、数、虚、实、洪、微、弦、缓、滑、涩、长、短、大、小、紧、弱、动、伏、促、结、芤、革、濡、牢、散、细、代等二十九种脉象及其主病，且对持脉要领和察脉法，以及妇人、小儿脉法，颇有独到见解。滑氏认为督、任二经皆有专穴，调节十二经气血，“宜与十二经并论”，遂采撷《素

问》、《灵枢》有关经穴专论，著成《十四经发挥》三卷，释名训义，附有经穴图。见于著录的医书还有《读伤寒论抄》（按：一作《伤寒例钞》）三卷、《本草发挥》一卷、《脉诀》一卷、《痔瘕篇》、《医韵》等，均佚。滑氏以儒者善解经义之长，对诸医经文多加阐发、归纳、考订，被誉为“医师一代之良”。明洪武（公元1386—1398年）年间卒，终年七十多岁。

滑寿，字伯仁，祖先是襄城人，迁居仪真，后又迁居余姚。少年时机敏好学，会诗文。京口有位名医叫王居中，滑寿跟从他学习医术。王居中教他《素问》《难经》等经典医著。学完经典后，他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看法：“《素问》虽详但多错简，我想把它的内容分为脏象、经度等十类，分类摘抄，方便研读。《难经》是根据《素问》、《灵枢》经义阐发而成，其中对荣卫脏腑与经络腧穴辨析虽博，但缺误亦多，我想探求其义旨，作注阐述，以供阅读，这样行吗？”王居中听后，高兴地连声道“好”。从此之后，滑寿学业日进。他又参合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之说，加以融汇贯通，所治疾病，没有不好的。

在向东平高洞阳学习针法之后，滑寿曾说：“人体手足六脉皆分阴阳而相互系属，只有督、任二经，循行于腹背，各有专穴。六脉诸经气血满溢时，由督、任二经受之。因此，督任二经宜与十二经相提并论。”于是采录《内经·素问》“骨空”诸论及《灵枢》所述经脉内容，著成《十四经发挥》三卷，通考腧穴六百四十七个。其他医著有《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瘕篇》，又采录有关诸书本草内容撰成《医

韵》，上述著作皆有功于人类。

晚年自号“撷宁生”。江苏、浙江一带没有不知撷宁生的。七十多岁时，颜面娇嫩如童婴，行走矫健敏捷，尚能饮酒无数。天台人朱右采撷滑寿治病有神效的验案数十例，撰成《撷宁生传》，所以他的著述更为世人所称道。

(朱建平 译)

【原文】

滑寿，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仪真，后又徙余姚。幼警敏好学，能诗。京口王居中，名医也。寿从之学，授《素问》、《难经》。既卒业，请于师曰：“《素问》详矣，多错简。愚将分藏象、经度等为十类，类抄而读之。《难经》又本《素问》、《灵枢》，其间荣卫藏府与夫经络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误亦多。愚将本其义旨，注而读之可乎？”居中跃然称善。自是寿学日进。寿又参会张仲景、刘守真、李明之三家而会通之，所治疾无不中。

既学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尝言：“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惟督、任二经，则苞乎腹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乃取《内经》“骨空”诸论及《灵枢篇》所述经脉，著《十四经发挥》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读伤寒论抄》、《诊家枢要》、《痔痿篇》，又采诸书《本草》为《医韵》，皆有功于世。

晚自号撷宁生。江、浙间无不知撷宁生者。年七十余，容色如童孺，行步趫捷，饮酒无算。天台朱右摭其治疾神效者数十事，为作传，故其著述益有称于世。

葛乾孙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葛乾孙（公元 1305—1353 年），字可久，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代医学家。其父葛应雷为当时名医，曾撰《医家会同》，官任浙江医学提举，对传播北方张元素、刘完素学说颇有贡献。葛乾孙为人倜傥温雅，好击刺之术。习儒，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但屡试不第，乃传父业，治病多奇验。精于医理，熟谙刘河间、张从正之说。元名医项昕，曾从其学。著有《医学启蒙》、《经络十二论》，今均佚。尚有题名葛氏撰《十药神书》，为治肺结核专书。书中仅录十首良方，如十灰散、花蕊石散、独参汤、保元汤等，至今临床仍在使用，且疗效颇佳。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其父葛应雷，以医名世。当时，北方名医刘守真、张洁古的学说在江南还未流行。有位姓李的中州名医，来吴县做官，与葛应雷谈论医学。他十分敬佩葛应雷的学问，便拿出张、刘的医书相赠。从此，张、刘二家学说才开始在江南传播开来。

葛乾孙体貌魁梧高大，爱好击刺、战阵诸法。后来改志

攻读经书，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多次应试，皆不中，乃传父业，专攻医学。然而，他一般不肯为人治病，有时施治则有奇效，医名与金华的朱丹溪相当。有位富家女患四肢痿痹病症，目瞪，不能饮食，许多医生诊治均无效。葛乾孙命人将她房中的香奁、流苏等东西全部搬走，挖一地坑，把病人放在坑中。过了很久一段时间，她手足能活动，口中发出声音。葛乾孙又给病人吃了一丸药。次日，病人自己从坑里爬出来。这是因为此女嗜香，脾脏被香气所侵蚀，所以得了此症。他治病皆象这样有奇效。

(朱建平 译)

【原文】

葛乾孙，字可久，长洲人。父应雷，以医名。时北方刘守真、张洁古之学未行于南。有李姓者，中州名医，官吴下，与应雷谈论，大骇叹，因授以张、刘书。自是江南有二家学。

乾孙体貌魁硕，好击刺战阵法。后折节读书，兼通阴阳、律历、星命之术。屡试不偶，乃传父业。然不肯为人治疾，或施之，辄著奇效，名与金华朱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痿痹，目瞪不能食，众医治罔效。乾孙命悉去房中香奁、流苏之属，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动，能出声。投药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盖此女嗜香，脾为香气所蚀，故得是症。其疗病奇中如此。

吕 复 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吕复，字元膺，晚号沧州翁。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人，后迁居鄞县（今浙江宁波）。元末明初医学家。幼年孤贫，曾从师学《尚书》、《周易》及词赋。后因母病，改攻医术。拜衢州名医郑礼之为师，得古代禁书及色脉药论等，攻读一年，试之皆效。遵师之教，记录治案，并加以考核参订。经多年勤学，为人治病，常获良效。其验案数十则，收入戴良著作中。著有《群经古方论》，对历代医书作者、内容、特点均有评述。又有《论诸医》一文，对历代名医皆有评价。

吕氏博学多才，除精于医理外，于经史诸子及天文、地理、兵刑、食货、卜筮、释老诸书无一不读。另撰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脉绪脉系图》、《难经附说》、《四时变理方》、《长沙论伤寒十释》、《运气常变释》、《松风斋杂著》等，均佚。

吕复，字元膺，鄞县人。少年孤贫，从师接受经学教育。后来，因母病求医，遇上衢州名医郑礼之，遂恭敬地以师礼

待之，因而从郑礼之处得到古人秘方以及色脉、药论诸书，试治疾病皆有效验。于是，他尽力购买古今医书，昼夜研读，从此开业行医，疗效神奇。他对《内经》、《素问》、《灵枢》、《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原论》、《太始天元玉册元诰》、《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语》、《中藏经》、《圣济经》等书，皆有评述；对前代名医如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至张子和、李东垣诸家，都有评论。他的著述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等，著作甚丰。浦江戴良将他治效最卓著的验案数十则编成《医案》。他还相继被推举为仙居、临海教谕和台州教授之职，皆不接受。

（朱建平 译）

【原文】

吕复，字元膺，鄞人。少孤贫，从师受经。后以母病求医，遇名医衢人郑礼之，遂谨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脉药论诸书，试辄有验。乃尽购古今医书，晓夜研究，自是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于《内经》、《素问》、《灵枢》、《本草》、《难经》、《伤寒论》、《脉经》、《脉诀》、《病原论》、《太始天元玉册元诰》、《六微旨》、《五常政》、《玄珠密语》、《中藏经》、《圣济经》等书，皆有辩论。前代名医如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至张子和、李东垣诸家，皆有评鹭。所著有《内经或问》、《灵枢经脉笺》、《五色诊奇眩》、《切脉枢要》、《运气图说》、《养生杂言》诸书甚众。浦江戴良采其治效最著者数十事，为《医案》。历举仙居、临海教谕，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维德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倪维德（公元1303—1377年），元末明初医学家。字仲贤，吴县（今属江苏）人。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迁居吴县。晚年在敕山建别墅，自号敕山老人。世代业医，祖、父皆为名医。倪维德自幼习儒，但淡于功名，热衷医学。当时的医生多宗《和剂局方》，与病多不合，遂研习金元诸大家之说，施于临床，疗效显著。贫人求治，不仅授药，而且还赠送煎药罐。主张医者当通习伤寒、内伤、妇女、小儿治法，不可单业某一科，故他治病，各科兼精。他感叹眼科专书缺乏，乃编撰《原机启微》两卷（公元1370年），为今存较早的眼科专著。书中论眼病机理及治则，又述方剂配伍与药物炮炙。其治学不拘一家之言，处方不执一说。他认为刘完素、张子和主攻，李东垣主补中气，是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治病学说。曾校订李东垣《试效方》行世。

倪维德，字仲贤，吴县人。祖父、父亲皆以医闻名。倪维德自幼嗜爱学习，后来专攻医学，并以《内经》为行医宗旨。北宋大观年间以来，医生多数采用裴宗元、陈师文《和

剂局方》来治疗疾病，所以古方新病多不符合。于是，倪氏检寻金代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著作，认真研读，并将三家治法应用于临床，治病效果，立竿见影。

周万户的儿子，八岁，头脑迷糊，眼睛昏花，不知饥饱寒暑，用泥土、木炭堵塞自己的嘴巴。倪维德为他诊断，说：“这是慢脾风病。脾藏智，脾慢则智短。”投以疏风助脾剂，服后即愈。顾显卿右耳下生瘰瘤，形大如头，痛不可忍。倪氏诊后说：“这是手足少阳经受邪所致。”给病人配药，服药一个多月病愈。刘子正妻患气厥病，又哭又笑，人们以为是鬼魔作怪。倪氏诊病后说：“病人两手脉俱沉，胃脘内一定有积滞，积滞不通则痛。”询问病史，果然如此，遂用新汲水和百沸水混合以导滞，病人吐出数升痰痊愈。

盛架阁妻左、右两肩及臂奇痒，并扩散至头面，止不住、用艾火烧灼可暂时止住。倪氏诊病后说：“病人左脉沉，右脉浮且有力，这是过食肥厚滋味所致。”遂处方，病人服药后即愈。

林仲实因劳损患热病，热象随日出、日入而变化，晴天阳盛则热象加剧，夜间及雨天寒凉则热退，这样已有二年。倪维德诊病后说：“这是由于七情内伤，阳气不升，阴火渐炽所致。所以有温则进，凉则退的症象。”遂配给李东垣治内伤的方药，病人服后立愈。他所疗治的病例，大都如此。

倪维德常说：“刘完素、张从正俩人多主攻，李东垣只调护中气主补，这是随时代病症变化而提出的治病主张，要适时疗病不得不如此。”所以，他处方不执泥一说。他又经常担忧眼科方论杂出，没有较系统的专科全书，于是编撰了眼科

专著《元机启微》。又校订李东垣《试效方》，并刊行于世。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死，年终七十五岁。

（朱建平 译）

【原文】

倪维德，字仲贤，吴县人。祖、父皆以医显。维德幼嗜学，已乃业医，以《内经》为宗。病大观以来，医者率用裴宗元、陈师文《和剂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书读之，出而治疾，无不立效。

周万户子，八岁昏眊，不识饥饱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诊之曰：“此慢脾风也。脾藏智，脾慢则智短。”以疏风助脾剂投之，即愈。

顾显卿右耳下生瘰，大与首同，痛不可忍。诊之曰：“此手足少阳经受邪也。”饮之药，逾月愈。

刘子正妻病气厥，或哭或笑，人以为祟。诊之曰：“两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积，积则痛。”问之果然，以生熟水导之，吐痰涎数升愈。

盛架阁妻左右肩臂奇痒，延及头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则暂止。诊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过盛所致也。”投以剂，旋愈。

林仲实以劳得热疾，热随日出入为进退，暄盛则增剧，夜凉及雨则否，如是者二年。诊之曰：“此七情内伤，阳气不升，阴火渐炽。故温则进，凉则退。”投以东垣内伤之剂，亦立愈。他所疗治，多类此。

常言：“刘、张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调护中气主补，盖随时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执一说。常患眼科杂出方论，

无全书，著《元机启微》。又校订东垣《试效方》，并刊行于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汉卿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周汉卿，松阳（今属浙江人）。元末明初医生。擅长针灸，兼通内外科。有人目瞽十年，周氏用金针刮翳，即目明能辨五色。有老妇患痢疾，为之针刺十指端，出血而愈。并用大针灼刺治愈“肠痛”。还用药治愈胃痛欲死、蛊证等，用按摩治疗腹胀大如臂，用外治法治疗眼被马踢伤，突出如桃的病症等。其治疗效捷，大多类此。惜无著作传世。

周汉卿，松阳人。精医，兼通内外科，针灸尤其神奇。村民蒋仲良，左眼被马踢伤，眼珠突出如桃。其他医生认为眼睛系络已经损伤，不能治了。周汉卿给病人患眼贴上自制的“神膏”，三天后病眼恢复如故。华州陈明远眼瞎十年，周汉卿诊视后说：“可用金针治疗。”接着，他为病人翻开眼皮，用金针刮去云翳，忽然能辨五色。武城某人患胃痛病，痛剧难忍，用力自掷，乞求摔死。周汉卿在病人鼻中放入药末，不久即喷吐出一条长一寸左右、有口有眼的“赤虫”，胃痛遂止。一位姓马的妇女“怀孕”十四个月还没生产，消瘦黧黑。周汉卿诊后说：“这是中蛊毒所致，不是妊娠。”用攻下药，粪

中排出象金鱼样的东西，其病果愈。有位永康人患腹疾，弯着腰走路。周汉卿解开病人的衣服诊视，见腹部有二股气往上冲，拱起大如手臂。用针刺中一个，砦然作响，又刺另一个亦如此，再加以按摩，其疾遂愈。长山有位姓徐的老妇患痢疾，手足颤抖，裸体奔跑，又唱又笑。周汉卿用针刺病人的十指尖，使出血，其病痊愈。钱塘王家女患瘰癧，环布头部及腋窝，共有十九个孔窍，窍穴破溃，流出白色液汁，都快死了。周汉卿为病人清理深达二寸的大病灶，其余小的用火烙灼，数日伤口结痂而愈。山阴有位姓杨的老翁项部长疣，大如瓜。酒醉后摔倒在台阶下，溃血多不能止住。疣溃败出血者必死。周汉卿用粗药末敷住伤口，血即止。义乌陈家有个儿子腹内有块状物，按之象一个口小肚大的瓶子。周汉卿认为：“这是肠痈”，就用大针烧灼后刺之，针入三寸左右，脓随针孔向外迸出有声，脓尽而愈。诸暨有位姓黄的年轻人，背脊弯曲，须拄杖而行。其他医生都作风病治疗，周汉卿认为：“这是血涩所致”，遂针刺两足昆仑穴，顷刻则弃杖而回。他治病效捷大多如此。

（朱建平 译）

【原文】

周汉卿，松阳人。医兼内外科，针尤神。乡人蒋仲良，左目为马所踢，睛突出如桃。他医谓系络已损不可治。汉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复故。华州陈明远瞽十年。汉卿视之，曰：“可针也。”为翻睛刮翳，忽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奋掷乞死。汉卿纳药于鼻，俄喷赤虫寸许，口眼悉具，痛旋止。马氏妇有娠，十四月不产，胎且黑。汉卿曰：“此中蛊，非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鱼，病良已。永康人腹疾，痾偻行。汉卿解

衣视之，气冲起腹间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鸣，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长山徐姬痼疾，手足颤抖，裸而走，或歌或笑。汉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痊。钱塘王氏女生瘰癧，环头及腋，凡十九窍。窍破白津出，将死矣。汉卿为剔窍母深二寸，其余烙以火，数日结痂愈。山阴杨翁项有疣如瓜大，醉仆阶下，溃血不能止。疣溃者必死。汉卿以药糝其穴，血即止。义乌陈氏子腹有块，扪之如罍。汉卿曰：“此肠痛也。”用大针灼而刺之，入三寸许，脓随针迸出有声，愈。诸暨黄生背曲，须杖行。他医皆以风治之，汉卿曰：“血涩也。”刺两足昆仑穴，顷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 履 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王履（公元 1332—？ 年），字安道，号畸叟，又号抱独山人，昆山（今属江苏）人。元末明初医学家。精诗文，兼工丹青，以医名世。公元 1371 年任秦王府良医所医正。认为张仲景《伤寒论》为伤寒而设，虽可用其法治温病，亦不过借用，而非仲景立法本意，乃撰《伤寒立法考》，备常论变，惜原文已佚。王氏精研伤寒，认为《伤寒论》中阳明、少阴、太阴、厥阴诸篇必有脱简，乃删去重复，补缺增订为三百九十七法。考辨医经，探本溯源，对《内经》、《本草经》、《难经》、《伤寒论》等医典加以阐述和发挥，并评述二十多位古代名医，明确提出伤寒、温病有别，指出温病乃“感天地恶毒异气”，“温暑及时行寒疫、湿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诸病为通治，”主张外感伤寒宗仲景之法，而温病治疗应采用后人清里热之剂，为后世温病学派和温病学理论的先驱人物之一。其论述二十一篇，合为《医经溯洄集》（一作《溯洄集》）一卷，另有《伤寒三百九十七法辨》、《百病钩玄》、《医韵统》等，均佚。其子王伯继承医业，门人许谦亦有医名。

王履，字安道，昆山人。向金华名医朱彦修学习，尽得其医术。有人曾说张仲景《伤寒论》为医学诸家之祖，后人不能超出它的范围。而《素问》说“伤寒为病热”，只讲其常不讲其变。到了张仲景才开始区分伤寒与温热，但言犹未尽。于是，王氏撰《伤寒立法考》，既言常又言变。又认为《伤寒论》“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只讲胸背满而不讲胸背痛，“太阴篇”无咽干，“厥阴篇”无阴囊上缩，一定有脱简。于是，选取《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删去其中重复内容二百三十八条，又依数增补，仍为三百九十七法。主要讨论内外伤疾病在经典医著中的不同论述，并收载“中风中暑辨”一文，合为一书，名叫《溯洄集》，共有论文二十一篇。另著有《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后世医家大加推崇。

王履精通诗文，还善于绘画。曾经在游华山顶峰时，挥毫作画四十幅，作游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当时人所称道。

（朱建平 译）

【原文】

王履，字安道，昆山人。学医于金华朱彦修，尽得其术。尝谓张仲景《伤寒论》为诸家祖，后人不能出其范围。且《素问》云“伤寒为病热”，言常不言变，至仲景始分寒热，然义犹未尽。乃备常与变，作《伤寒立法考》。又谓“阳明篇”无目痛，“少阴篇”言胸背满不言痛，“太阴篇”无咽干，“厥阴篇”无囊缩，必有脱简。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复者二百三十八条，复增益之，仍为三百九十七法。极论内外伤经旨异同，并“中风中暑辨”，名曰《溯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钩玄》二十卷，《医韵统》一百卷，医家宗之。

履工诗文，兼善绘事。尝游华山绝顶，作图四十幅，记四篇，诗一百五十首，为时所称。

戴思恭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戴思恭（公元1324—1405年），字原礼，一作元礼，婺州浦江马剑九灵山（今属浙江诸暨）人。明初医学家。戴氏幼年习儒，旁涉星象、堪舆、风鉴之术，尤嗜医药，志在济世活人。洪武年间因医名被朝廷征为御医，治效斐然，颇得太祖朱元璋器重，后升为太医院院使。永乐初（公元1403年）因老辞归。晚年著《证治要诀》十二卷，以丹溪学说为本，集《内经》、《难经》、《伤寒论》直至宋元名医二十二家的学术经验，参以作者个人心得，论述了多种内科杂病兼及疮疡、妇科、五官科等病症诊治。论述病因，列证辨析，阐明治法方药，内容简明实用，检阅十分方便，对后世影响较大。另有《证治要诀类方》（简称《证治类方》）四卷，所论持之有据，且时出新意。尚有《类证用药》一卷，已佚。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字原礼更为通用。曾跟从义乌朱震亨（丹溪）学医。朱震亨老师金华人许谦，为得朱熹之学之四传弟子，精通理学。朱氏又向南宋内侍钱塘名医罗知悌学医。罗知悌则学医于荆山浮屠，而荆山浮屠是金代河

间名医刘守真的学生。朱震亨医名大振，当时人们都称他为“丹溪先生”。朱丹溪爱戴氏才思敏捷，把自己所有的学术经验全部传授给他。

明洪武年间，戴氏被朝廷征召御医，所治病症，马上见效。太祖朱元璋对他很器重。燕王患痼病，太祖派思恭前往诊治，发现其他医生所开药方都不错，就考虑为什么没效的原因，于是询问燕王有什么嗜好，燕王说：“爱吃生芹。”思恭说：“病因找到了。”于是开药一剂，病人服后夜间暴泻，尽是细小的蝗虫。晋王生病，思恭治后痊愈。后来复发而死。太祖大怒，将晋王府的侍医都逮捕治罪。戴思恭从容不迫地向太祖申辩说：“我以前奉命给晋王诊病，曾告诉晋王：‘病虽然现在好了，但毒邪内伏膏肓深处，恐怕复发后不能再治好了。’现在果然如此。”晋王府的侍医因此被免去死罪。这时，思恭年岁已老，朝廷批准他凡遇风雨天可以免于上朝。太祖患病，不多时出御右顺门，把那些治疗不力的御医交狱司治罪，独抚慰思恭说：“你是仁义之人，不要害怕。”后来，太祖病亡，太孙惠帝继位，将那些御医治罪，独擢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戴氏因年老辞官归乡。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夏，朝廷又召他入京，免他跪拜，平时住旅舍中，有特召始进见皇帝。这年冬天，戴氏再次请求返乡，朝廷允准，赠给金币，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一个多月后，戴思恭去世，终年八十二岁。皇帝派行人前往祭奠。戴氏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等书，都是根据朱丹溪学说改写而成的。还校订朱丹溪《金匱钩玄》三卷附

上自己的见解。人们都说他无愧于老师朱丹溪。

(朱建平 译)

【原文】

戴思恭，字原礼，浦江人，以字行。受学于义乌朱震亨。震亨师金华许谦，得朱子之传，又学医于宋内侍钱塘罗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则河间刘守真门人也。震亨医学大行，时称为丹溪先生。爱思恭才敏，尽以医术授之。

洪武中，征为御医，所疗治立效，太祖爱重之。燕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见他医所用药良是，念何以不效，乃问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皆细蝗也。晋王疾，思恭疗之愈。已，复发，即卒。太祖怒，逮治王府诸医。思恭从容进曰：“臣前奉命视王疾，后王曰：‘今即愈，但毒在膏肓，恐复作不可疗也。’今果然矣。”诸医由是免死。思恭时已老，风雨辄免朝。太祖不豫，少间，出御右顺门，治诸医侍疾无状者，独慰思恭曰：“汝仁义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孙嗣位，罪诸医，独擢思恭太医院使。

永乐（公元1403—1424年）初，以年老乞归。三年夏，复征入，免其拜，特召乃进见。其年冬，复乞骸骨，遣官护送，赍金币，逾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证治要诀》、《证治类元》、《类证用药》诸书，皆隐括丹溪之旨。又订正丹溪《金匱钩玄》三卷，附以己意。人谓无愧其师云。

盛 寅 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盛寅（公元1375—1441年），字启东，吴江（今属江苏）人。明代医学家。从王宾处学得医术，王宾则尽得戴原礼之传，故盛寅间接继承戴原礼之学，又钻研《内经》以下诸家方书，遂医名大震。明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后因治太监胀病奇验，被成祖召见试诊，言其患风湿病，遂授御医之职。太子妃月经十月未行，众医误诊为妊娠，只有盛氏提出异议，诊为血疾，投破血剂，瘀血大下而愈。后避祸出任南京太医院职，宣宗时召还。善诗赋，著有《流光集》，已佚。医著有《医经秘旨》两卷，记录作者历经治验方药，并阐明疑似之理，对后学颇有启迪。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在同乡王宾医生处接受医学训练。从前，王宾曾与金华戴原礼交往，希望学到戴氏的医术。戴原礼笑着说：“我本来没有什么可吝惜的，只是先生不能稍微委屈些吗？”王宾抱歉地说：“我老了，不能再加入你的学生行列。”某日，趁戴原礼外出，私自拿戴氏的医书离去，遂得戴原礼医术之传。王宾年老将死，膝下无子，遂将所得戴氏

医书传授给盛寅。盛寅得到戴原礼之学后，又研究《内经》以下历代方书，行医治病很有名气。

永乐（公元1403—1424年）初，盛寅任医学正科之职。后因官司牵连，被派往天寿山修筑山陵。工地监工看见后都很奇怪，令他掌管书算。在这之前，有一位去江南督征花鸟的朝廷使者，住在盛寅的房子里，患胀病，盛寅把他的病治愈。这次，恰好在路上碰见，惊讶地说：“盛先生原本于官司无干！我事奉的太监，正为胀病感到痛苦，你何不随我前往替他诊视一下。”盛寅诊视后，配药，病人服后，胀病即愈。正值成祖在西苑校场练射，这位太监前往服侍。成祖远远看见他，非常惊讶，说：“都说你死了，怎么还活着？”太监把前后原由都告诉了成祖，对盛寅大加赞赏，皇帝随即召盛寅进便殿，令他诊脉。盛寅诊后报告：皇上脉象主风湿病。皇帝非常赞同，服药后果然有效，于是授盛寅御医之职。一天，雪后转晴，皇帝召见。皇帝谈起白沟河之战胜利的样子，表情严肃。盛寅说：“这大概是天意。”皇帝不高兴，起身去看雪。盛寅又吟诵唐人“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的诗句，听到的人都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又有一天，盛寅与同僚在御药房下棋。皇帝突然到来，两人收起棋盘，趴在地上，乞求死罪。皇帝命他俩起来接着把棋下完，还坐在旁边观看，盛寅胜三局。皇帝高兴，命盛寅赋诗，很快赋成。皇帝更为高兴，赏他象牙棋盘，并赠词一阙。皇帝晚年还想出塞巡幸，盛寅认为皇上年事已高，劝他不要成行。皇上不听，果然有榆木川病亡之变。

仁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其妃张氏月经十个月不来，许多

医生都诊为妊娠，向太子贺喜。只有盛寅认为不对，道出病因症状。王妃远远听到后，说：“这位医生说的非常对。有这样高明的医生为什么不叫他早点为我诊病？”等盛氏开出处方，一看是破血剂，太子恼怒，弃之不用。几天后王妃病情加重，又命盛寅再来诊视，他的处方与前次相同。王妃令他进药，而太子担心会堕胎，准备把盛寅加以桎梏，只等用药的结果。后来，王妃服药后瘀血大下，病很快就好了。在盛寅被拘时，全家害怕，都说：“这回差不多要被分尸而死。”三天之后，太子令红仗开路送盛寅回住宅，赏赐非常丰厚。

盛寅与袁忠彻平素都为太子所厌恶，虽然已经治好了太子妃的疾病，但怒气还未消，非常害怕。袁忠彻懂相术，预知仁宗寿命不长，秘密地告诉盛寅，盛寅还是害怕惹祸。等到仁宗继承帝位，盛寅请求派出到南京太医院任职。后来宣宗登基，召盛寅还京。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死。北京、南京太医院都祭祀盛寅。他的弟弟盛宏亦精通医药，其子孙后代继承他的医业。

当初，盛寅早晨在御医房值班，忽然头昏眼花，病重欲死，召聘医生抢救他，都没有用。有一民间医生应聘，一服药就救了他。皇帝询问情况，那人说：“盛寅空腹入药房，突然中了药毒。能和解诸药之毒的东西是甘草。”皇上问盛寅，果然如此，于是重赏那位民间医生。（朱建平 译）

【原文】

盛寅，字启东，吴江人。受业于郡人王宾。初，宾与金华戴原礼游，冀得其医术。原礼笑曰：“吾固无所吝，君独不能少屈乎？”宾谢曰：“吾老矣，不能复居弟子列。”他日伺原

礼出，窃发其书以去，遂得其传。将死，无子，以授寅。寅既得原礼之学，复讨究《内经》以下诸方书，医大有名。

永乐初，为医学正科。坐累，输作天寿山。列侯监工者，见而奇之，令主书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鸟于江南，主寅舍，病胀，寅愈之。适遇诸途，惊曰：“盛先生固无恙耶！予所事太监，正苦胀，盍与我视之。”既视，投以药立愈。会成祖较射西苑，太监往侍。成祖遥望见，愕然曰：“谓汝死矣，安得生？”太监具以告，因盛称寅，即召入便殿，令诊脉。寅奏，上脉有风湿病，帝大然之，进药果效，遂授御医。一日，雪霁，召见。帝语白沟河战胜状，气色甚厉。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怪，起而视雪。寅复吟唐人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句，闻者咋舌。他日，与同官对弈御药房。帝猝至，两人敛枰伏地，谢死罪。帝命终之，且坐以观，寅三胜。帝喜，命赋诗，立就。帝益喜，赐象牙棋枰并词一阙。帝晚年犹欲出塞，寅以帝春秋高，劝毋行。不纳，果有榆木川之变。

仁宗在东宫时，妃张氏经期不至者十月，众医以妊身贺。寅独谓不然，出言病状。妃遥闻之曰：“医言甚当。有此人何不令早视我？”及疏方，乃破血剂。东宫怒，不用。数日病益甚，命寅再视，书疏方如前。妃令进药，而东宫虑堕胎，械寅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当寅之被系也，阖门惶怖曰：“是殆磔死。”既三日，红仗前导还邸舍，赏赐甚厚。

寅与袁忠彻素为东宫所恶，既愈妃疾，而怒犹未解，惧甚。忠彻晓相术，知仁宗寿不永，密告寅，寅犹畏祸。及仁宗嗣位，求出为南京太医院。宣宗立，召还。正统六年卒。两京太医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药论，子孙传其业。

初，寅晨直御医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疗寅，莫能应。一草泽医人应之，一服而愈。帝问状，其人曰：“寅空心入药房，猝中药毒。能和解诸药者，甘草也。”帝问寅，果空腹入，乃厚赐草泽医人。

吴 杰 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吴杰，字士奇，武进（今属江苏武进）人。明代医生。弘治年间（公元 1488—1505 年），由于善医被召至京师，经礼部考试，选入御药房，但同情未入选的其他医生，而请求尚书改遣，与诸医同入太医院。正德年间（公元 1506—1521 年），进上清丸一服，治愈武宗喉疾，而升为御医。后来又治愈武宗受虎惊、血疾以及御马监卒腹痛等症。每愈帝一疾，则进一官，累官至太医院使，并随帝外出巡视。擅长脉诊，用药不拘泥于古方。呈进御用古方亦屡次获效。终年七十八岁。

吴杰，武进人。弘治（公元 1488—1505 年）年间，由于善于治病而被召至京城，经礼部考试，获高等。以往的规定：高等选入御药房，次等选入太医院，下等遣还原籍。吴杰向尚书请求，说：“属下等的医生被召来，在京城已等待了十余年，一旦遣还回乡，真是零落可怜。我吴杰宁愿辞去御药房之职，与这些人同入太医院。”尚书赞其义气而同意他的请求。

正德（公元 1506—1521 年）年间，武宗患病，吴杰用一

服药就治好了他的病，吴氏随之被升为御医。一天，皇帝从外打猎回来，非常疲惫，得了血疾。吃了吴杰开的药就好了，给吴氏升官一级。从此，每治好皇帝一次病，就给升官一级，一直加至太医院使。朝廷前前后后赐给吴杰有彪虎衣、绣春刀以及很多的银币。皇帝每次出外巡幸，必定以吴杰为侍从。有次，皇帝想南巡，吴杰劝谏道：“皇上身体欠安，不宜远行。”帝大怒，呵叱左右将他撵出。等到皇帝出巡返还，在清江浦垂钓猎渔，不幸溺水病起。到临清，皇帝急派使臣召吴杰。等吴杰赶到时，皇帝病情加重，于是随从返回通州。当时，江彬领兵护驾，担心皇帝病亡，自己会招来大祸，强烈请求皇帝巡幸宣府。吴杰为此担忧，跟皇帝近侍说：“皇上病急，只可返回宫廷。如果到宣府，皇上病逝，我们这些人那有葬身之地呢！”近侍害怕，千方百计地劝服皇上，皇帝才答应返回京城。刚回京城，皇帝就病亡，江彬遭诛杀，其他内外有关人员皆平安无事，这全赖吴杰之功。不久，吴氏就辞官回家。子吴希周中进士，任户科给事中；次子吴希曾中举人。

（朱建平 译）

【原文】

吴杰，武进人。弘治中，以善医征至京师，试礼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药房，次入太医院，下者遣还。杰言于尚书曰：“诸医被征，待次都下十余载，一旦遣还，诚流落可悯。杰愿辞御药房，与诸人同入院。”尚书义而许之。

正德中，武宗得疾，杰一药而愈，即擢御医。一日，帝射猎还，惫甚，感血疾。服杰药愈，进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辄进一官，积至太医院使，前后赐彪虎衣、绣春刀及

银币甚厚。帝每行幸，必以杰扈行。帝欲南巡，杰谏曰：“圣躬未安，不宜远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驾还，渔于清江浦，溺而得疾。至临清，急遣使召杰，比至，疾已深，遂扈归通州。时江彬握兵居左右，虑帝晏驾已得祸，力请幸宣府。杰忧之，语近侍曰：“疾亟矣，仅可还大内。倘至宣府有不讳，吾辈宁有死所乎！”近侍惧，百方劝帝，始还京师。甫还而帝崩，彬伏诛，中外晏然，杰有力焉。未几致仕。子希周，进士，户科给事中；希曾，举人。

许 绅 传

——《明史》卷二九九

【说明】许绅（公元1476—1542年），字大章，又字大绅，明代浙江嘉兴县人，后迁居北京。世医出身，精通医术，治病应手奏效。早年供职于太医院，任医士，后升御医。因疗疾有功先后加封为通政司使、礼部左侍郎、工部尚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享年六十六岁。著有《经验方》，已佚。

许绅，京师人。嘉靖初年，在御药房供职，被明世宗赏识，连续升迁至太医院使，越级加授工部尚书，掌管太医院的事务。嘉靖二十年，宫女杨金英等谋反，用丝帛紧勒皇帝，已经气绝。许绅急忙调配峻急猛烈的药，给皇帝灌下，辰时服药，未时皇帝忽然发出声响来，吐出几升紫黑积血，就能开口说话了。后又服了几剂药，便痊愈了。皇帝很感激许绅，加封他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赏赐特别丰厚。不久，许绅患病，说：“我不行了。以前宫中谋反时，我料想如果救不活皇帝必遭杀身之祸，因此受到惊吓，不是药物能够治好的。”不久果然死了。皇帝赐“恭僖”，加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官，抚恤祭典及其赏赐尤其丰厚。明代，医生做官到如此显赫地位

的，只有许绅一人。

(郭 健 译)

【原文】

又有许绅者，京师人。嘉靖初，供事御药房，受知于世宗，累迁太医院使，历加工部尚书，领院事。二十年，宫婢杨金英等谋逆，以帛缢帝，气已绝。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帝德绅，加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赐赉甚厚。未几，绅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宫变，吾自分不效必杀身，因此惊悸，非药石所能疗也。”已而果卒，赐谥恭僖，官其一子，恤典有加。明世，医者官最显，止绅一人。